郁達夫文集

第八卷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郁達夫文集



第八卷：政论 杂文

花城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郁达夫一九四〇年在新加坡与王莹、吴继岳、徐君濂合影（右起第一人徐君濂、第二人郁达夫、第三人王莹、第四人吴继岳）



达夫全集

第七卷

断残集



上　海

北新书局出版

1933

一九三三年上海北新书局版《断残集》封面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艺术家的午睡

晚上沿街弄着乐器且行且唱的人，是古代的诗的遗物。世界上无论哪一国都有，中国内无论哪一处都流行的。在月光下，在微风里，或是萧条秋雨之中，或是霏微小雪之下，伤心人听之觉得悲哀，得意人听之觉得快乐。我愿跟了这些 Minstrels 走尽天下，踏遍中国。

世界主义的实行者是乞丐和娼妇，真的国际联盟，应该从世界乞丐同盟和世界娼妇联盟始。

平生最恨的是警句(Paradox)和狗。不爱警句，因为可发的警句太少，不爱狗，因为犬吠声太多。G.K.C.hesterton是警句大家，M.Maeterlinck是狗的爱护者，我平时不爱这两人的著作。

日本文里，译者与役者同音。译者是译书的人，役者是演戏的人。日本的役者，多是译者（因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译外国文的剧本）。中国的译者，都是役者（因为中国的译者只能做手势戏），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异。

坐轮船过太平洋的时候，每想坐火车，坐火车过泰淮河外的时候，只想坐画舫。

一九二三，七月二十四日

原载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中华新报·创造日》第十二期

对　　话

来客　你近来发表的东西，何以总是颓丧得很，消沉得很。使你颓丧的原因，究在什么地方呢？

主人　我自家也不知道。并且我自家不知道我的态度究竟是不是世俗所说的消沉与颓丧。这也是当然的，因为我若自家知道自家的病状与病源，那我就可以下对症的药了。

客　你近来读书么？

主　什么也不读。

客　做东西么？

主　什么也不做。

客　你大约是一个厌世家罢！

主　这话不通。我生在世上，系由我投到世界怀里来的，决不自世界闯入我的生命里来的，只有世界可以厌我，而我决不能厌世，我那有厌世的权利呢？

客　你大约对于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有所不满罢？

主　中国的政治弄得好也罢，弄得不好也罢，社会进步也好，退

步也好，与我个人却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客　要是大家都取这一种不问不闻的态度，中国岂不要亡了么？

主　现在的中国人谁不取这一种态度？

客　那么现在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那些外交家、理财家，难道多在取这一种态度么？

主　喔，那些东西！他们是猴子。

客　这是什么话？

主　他们因为吃了太饱，消化不了，所以爬上秋千去耍。而站在圈外的人看了，以为是在玩把戏给他们看。并且有些猴子因为贪得不堪，于饱满之余，更要窃取圈外人的食物，被窃的那些可怜的人类，还在喜乐，说猴子好玩。

客　猴子的贪图无厌，都是由我们旁观者的不问不闻的态度养成的。

主　你难道说我有杀猴子的利器么？

客　你虽没有利器，你可以宣传他们的罪状。

主　宣传得厉害的时候，却好了一批新起的猴子，去代替旧的。法国的革命，也是如此，中国的革命，也是如此。

客　这样讲来，中国是完全绝望了么？

主　我也不能预言，不过最近三十年内，怕没有大的变革罢！

客　何以见得？

主　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太安乐了。改进的大障碍，不是几个有兵力的人，却是那些大猴子和小猴子，就是替那几个有兵力者吮痈的人，其次是替吮痈者吮痈的人，最后是物质生活安定的人。中国之大，有兵力者，只有几个？我们若有一个拚一个的决心，那么斩草除根，灭尽武人是很容易的。而中产阶级

则不然，他们寄住在武人翼下，为类颇多，偷安苟活，情愿把自家的金钱妻女，献给武人。他们心里只欲图一时的安闲，所以听到变革二字，就惶恐得不堪，要竭力的出来阻止。这些人若一个一个的除了，那么武人就失其依据，不倒而自倒。但是要杀尽这一阶级，却非易事，因为你我或者多是这一阶级的人啊！哈……哈……哈……

客　那么我们就去宣传覆灭中产阶级罢！

主　你又来了，我不是刚和你说过。宣传是没有用的么？

客　那么现在叫我们干些什么呢？

主　什么也不要干，什么也不要做，你只须懒惰过去，就是第一个社会改革家。

客　你的话愈讲愈奇怪起来了。

主　这理由是很简单的。你若要造成大变革，你非要有大多数的贫民不可。你懒惰一天，社会就可以贫弱一天。大抵一个中产阶级者，当他的财产没有荡尽的时候，决不会对贫民表示一点同情，也决不会起一点希图变革的心思。非但如此，若有了一点财产，他必要欺压贫民，阻止变革的。所以我说，你若是一个中产阶级者，你先必要懒惰过去，把你的财产荡尽，然后去和贫民协力合作。你若已经是贫民了，那么你第一应去讲究如何能使那些有产者也得马上变成贫民的法子。这个法子，也只有“懒惰”二字，可以当之。

客　何以呢？

主　因为贫民勤劳一天，所得的大半不得不把有钱的人吞去。

客　这是马克思的学说罢？

主　不是，这是拉发古的主张。

客　那么我们来宣传“懒惰”就对了罗，何以说用不着宣传呢？

主　不对不对，因为你这一次教他懒惰之后，下次就不能教他制炸弹了。所以宣传是无用而有害的。

客　中国于最近三十年内，没有大变革，你是根据什么而讲的？

主　我根据我自家的生活而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的生计，总还容易谋得。象我这样的懒惰无为，每天尚有饭吃，何况那些猴子们呢？衣食不穷的人，你无论如何诱他请他，要他加入变革运动，他一定是不肯的。所以现在的中国，决不会起绝大的变动，都因为大家的衣食，还容易谋得的原因。三十年后，怕生计的艰难，要与今不同了。以我个人的推算，大约大变更之起总在三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内。

客　你在希望这样的大变动么？

主　因为希望着也是无益的，所以我并不在希望。

客　我听你讲了半天，好象在做梦似的，什么也捉摸不到。

主　这样就对了罗，你要捉摸什么！被你捉摸着了，怕你就要生厌呢。

客　今天天气好得很，你不出去散步么？

主　我近来吃饭都懒得吃，还要散什么步？

客　我要去了。

主　你去罢！

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半月刊》第十七号

说 几 句 话

记者先生：这一年来，因为家累太重，又兼以身体不好，虽则见了世上的不平，想说话的地方很多，但终于隐忍过去了。有许多人说我缺少了勇气，有许多人说我因为有了职业，有了钱化，就不想做文章了。这两层猜测，都说得很对，可是有一点，我要声明。第一个猜测的缺少勇气，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前面说过的身体的软弱。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最大的原因），却因为目下中国不正的事情太多了。开倒车，走歧路，弄得太不成样子了。看了这些忘八的事情，简直令人哭也不是，乐也不是，到末了想说话也无从说起，只好扶头喝一杯酒，向天叹一口气，就算完事。第二个猜测，倒不得不加上一个条件，再来承认。我对于职业的有无，从来不十分介意。因为没有职业的时候，有一种"无职的职业"，我也很能享受，所以说我因为有了地位，就怕说话，却是错的。至于有钱化没有钱化，倒的确与做文章和不做文章，有一点间接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没有钱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家里闷坐，闷坐不过，只好拿起笔来写写，于是牢骚愤

滮，就一齐排泄在纸上了。闲话少说，现在我因为职守俱无，穷愁潦倒，正好再来重寻旧业，做几句文章，泄泄胸中的气闷。街上不平，请先从自家的身边打起。

从今年的阴历正月起，我在武昌的狗洞里住了半年。钱也化了不少，人也见了不少，武昌大学的奇怪的情形，也知道了不少。前两期剑公的通信里所说的种种事实，虽则不是十分体面的事情，虽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不幸我却不得不承认是真的。这一期，又有一位学生，写信来辩明，同时在这辩明的信里，又招认了两件最不体面的事情，我不幸又不能为他辩护，也只能帮他承认说是真的。

所谓最不体面的事情，是那两件呢？第一件，就是这位国立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个人的关系，上书湖北的军政当局萧耀南，要萧耀南用了他的势力来左右校长，用一个教书的人。我们先不必说这一件事情对不对，只须举出一个例子来说，譬如北京大学里，教员很多，意见学说，各不相同。若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因为他个人的关系，上一个呈文给章士钊或鹿钟麟或段祺瑞，要章士钊或李景林或段祺瑞用了他们的势力，来进退一个北大的教员，大家以为这事情是怎么样？若说因为湖北的军政当局就是武昌大学的董事长，经费等项，都要看他的喜怒如何的，所以萧耀南，十分有进退国立大学的教员门房斋夫之权。那么我又要说了，章士钊是教育的长官，鹿钟麟是负有保护北京地方安宁秩序的责任的军政当局，段祺瑞是一国的首脑，他们当然有进退一个北大教员之权，大家以为我这话怎么样？朋友们，我们还要叫什么“打倒军阀”，“教育神圣”？我说我们还是把娶媳妇儿，生小孩，大便小便等神圣的自由权，一齐交给了军阀罢！

第二件最不体面的事情，就是这一位国立大学的学生，上书萧耀南的时候，末后所具的名是“武昌师大国文系学生”。中国这几年来，大凡学校发生事情的时候，报纸上面总紧排着由一样的登广告者所登的两种极端相反的广告。一个广告说某某是混帐，忘八蛋，一个广告说某某是尧舜再世，文武复生，下面的具名，都是全校学生同具。这是近几年来见惯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的善于影射的证明，这也是中国人的卑怯的劣根性的表现。章太炎在湖北一个私立的大学里演说，仿佛很赞成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说头。我也时常这样的想，作恶要作得大，做坏人要做得彻底。大丈夫要光明磊落，自家做错的事情，要自家出来承当。若鬼鬼祟祟，影射模糊，成功了自己来享受荣华，失败了由全班的人来受难，这岂是男子汉的行为么？看了前一期的辩正的信，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一次的影射，非但是我们见惯了的平常的假冒全体学生的具名，却是更狡滑的留有逃避的余地的“武昌师大国文系学生”的具名。既要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不敢光明磊落的出来负责，倒也罢了，还要想出很狡滑的方法来，预备一条被人发觉后可以设辞逃避的后路的这一种人，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呢？

隐恶扬善，本来是忠厚待人的美德。这一次竟把我们的家丑外扬出来，恐怕不是为长者的所应做的事情。不过我在此地，有两层苦衷，可以说出来作我的辩解。第一，我上面的通信，并不是专为个人而发。我只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以后应该明白些，不要再去妄冀非分而攀附军阀的骥尾。并且做事情要负责任，不要畏首畏尾，希图影射。第二，我在武昌大学也曾窃食半年，与那位学生，名义上也有师生的关系，晓得了他的错误，而不以直

言相告，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

此次回京，本为养病。闲居不久，就又技痒，居然又弄起笔墨来了，请诸位编辑先生，不要笑我。以后想打的不平很多，大约这一次通信，还不是最后的一次吧！

郁达夫　十四，十，十七

原载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六期

牢 骚 五 种

一 自己的事情

美国的一位肺病诗人，在他的一本不朽的名著《Warden》的头上，仿佛有一段说到文人所写的东西，都是写他自己的事情的。实际上连我们最爱的女人身上的毛发有几多，月经有多少等问题都不明白的我们，那里能够真真实实的描写他人的事情呢？不过写自己的事情，有两层危险。第一，你若把你得意的事情，有名的朋友和你的关系等写出来的时候，人家要说你在台房里叫好，自捧自吹。第二，你若把你失意的事情，和无钱化无职业等苦处诉说出来，人家若不说你“弱者弱者，活该活该，你象一个女人，在无聊赖的啼哭。这是靡靡之音，亡国之兆。”就要说你在发牢骚，在骂人。

但我想自捧自吹，虽则是近世中国成名的第一捷径，究竟有点于自家的良心上说不过去。所以我在此地只想写点自家的失败的话，和自家心里想说的话，即使人家说我所发的是“牢骚”，究竟还比“吹牛”高尚些。

小子在一两月前头，在《现代评论》上写了一点小小的文章，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几个能在学生时代就受小政客的津贴的高徒侮辱了一场。这一场侮辱，比起现在的大学校长的被缚被打来，总算是文明得很。他们几位受人津贴的大学生，不过向我发了一封匿名信，画了一只狗，把我的名字写在狗身上。我当时看见这封信的时候，竟不知不觉的笑了起来。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我的儿子，老受了我的母亲和女人的运动，把小手举起来，骂我"老贼"。我的儿子的这种行动，和我的学生的此番的行为，竟同一个印板印出来的一样。芝兰玉树，桃李葑菲，竟一样的成达了。你说我这"老狗"、"老贼"，该不该掀髯大笑呢？儿子今年四岁了。

本来是肺部不强的我，两三年来，在京华的尘土里，只以Huren und Saufen为唯一的消愁之计。霜降前后，因为谋《创造》的复活，回到上海来的一天早晨，竟吐出了两三口鲜血来。我一见血痕，心里真觉得悲喜交集。朋友来吊问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赤化了"。到得现在想回北京去静养，又阻于兵匪，不敢出租界一步，大约这一次的赤化，要到明年的春季，才能化白罢？

二　赤　化

现在在中国最流行的是"赤化"两字。凡政治上的政敌，互相倾陷，要哀求英美日本的援助的时候，就说对方是"赤化"了。

我想中国人本来都是赤党。有钱有势的人，大家都去捧他，社会上就叫这一个人是"红人儿"。这岂不是赤党么？窑子里的最娇、最有买卖的妓女，叫作红姑娘。捧红姑娘的人，自然都称作赤

党。这一次居然有一个红姑娘自家称起大总统来了，这岂不是赤党么？几天前头，从浙江回上海来，看见沪宁杭沪一带的火车站上，满挂了红灯红布，上面写着凯旋的字样。我因为几日来没有看报，以为“五卅事件”起来以后，我们中国竟有一个象拿破仑一样的军人，去灭了英国，灭了日本回来了。后来问问旁人，才晓得这一位凯旋的拿破仑姓孙。我又问他：“欢迎他的应该是全国的人民，你我也应该参加在内，何以到现在我还不晓得这一位拿破仑的海外归来呢？”他又说：“欢迎他的，就是几个从前欢迎过何丰林、卢永祥、齐燮元的老主顾。这一位拿破仑打的不是英国、日本，仍旧是中国自家的几个不打仗的兵。他的凯旋却是不打仗的凯旋。”看看车站上的红灯红布，想想那些捧红人儿的主顾，我又要说了，这岂不是赤党么？

三　共　产

与“赤化”两字相类似的，是“共产”。骂主张稍为新一点的人为共产党，我觉得比一口含糊的骂人家赤化，还要进步一点。在我们中国，在那里实行恶意义的共产的，只有军阀官僚。是谁也知道，谁也曾经说过的。所以我想劝劝攻击共产党的诸君，你们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几个附和军阀的官僚，也应该给他们一个人一个子弹。因为这些畜生，才是你们所攻击的真正的共产蛋。至于那些光是纸上谈兵，空中画饼的学生们，还不能说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实行者，尽可由他们去研究共产主义的真义，是在什么地方。

攻击共产主义者的一般的目标，是在中国的共产党在收受

俄国人的金钱这一点。若要下攻击的说话，那么我想，只有我可以攻击他们。因为我既不收受俄国人贿买的共产党，又不是受过军阀官僚的运动的小政客，并且也不是有几万家产的“怕共产狂者”。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了，共产党员，既想在中国做一番事业，当然要一个经济的后援者接济他们。孙中山当日，也曾经受过日本人的金钱的。若能点滴归公，拿了人家接济我们的资财，来做我们良心上所应做的事情，我想也未始不可的。不过在这一个地方，我想提出几个质问，要问问共产党的诸君：“你们把你们的头目认清了么？你们以为这头目是在中国可以做一番事业的么？你们的头目，不在做暧昧的事情么？借了自由恋爱的名义而娶姨太太，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暗地里又受资本家的津贴的事情，一定是没有的么？那些年龄还没有成熟，没有十分判断能力的青年，你们以金钱去买他们来胡闹的事情，是的确没有的么？”上举的几个问题，若在良心上按来，你们觉得都可以答复得过去，那么共产党诸君，你们就是再受些俄国以外的国家的金钱，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神圣的目的可以使手段也化为神圣。笑骂由人家笑骂，你们但去做你们工作好了。

四 国家主义者，你们的国家在那里？

听说攻击共产党是激烈的，除了军阀官僚以外，还有一派国家主义者。总之不打仗的凯旋也好，主义的战争也好，由我们旁观者看来，觉得诸君都是能干的人，诸君都在社会上露头角，都可以受我们一班没有主义的老百姓的崇拜的。不过崇拜之余，我们清夜扪心，仔细一想，觉得这事情有点奇怪。譬如现在，我们

大家一样的寄住在租界上，在坐外国人的电车，在用外国人的电灯，并且有时候拿起笔来写点东西，还在抄袭抄袭外国人的可以扶助我们的主义的文章。现在寄寓在租界上的中国人，差不多生活境况，都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当大谈国家主义之余，若受旁人一问："你们的国家在那儿？"有时恐怕要回答不出话来。虽然有时，当我们穷促的时候，可以大声回答说："我们的国家在章太炎的身上，在宣统皇上的寓里，在我的便便大腹中。"但镇静下来一想，觉得一个章太炎，一个宣统皇帝，一个便便大腹，还有点不大够。那么不得已的时候，只好加一点添头，说张作霖、冯玉祥、李景林、孙传芳、蒋介石等等就是。但是照这样的说来，那么问的人又要说了："既然如此，你们的国家，已经是很好了，你们的主义，已经可以卖钱了，明年你们还打算主张什么呢？"……

国家主义者诸君，我对你们的主义是十分的尊敬的。毫没有讪笑你们的意思，不过我想光是高谈主义，是没有用的。文天祥、史可法，并没有留过学，并没有主义过什么主义。他们因为国家没有了，就挺出身体来硬干。若能回复他们的国家，他们就愿于国家回复之日，退归田里，若不能回复国家，他们情愿干干脆脆的为国家而死。我觉得这些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的人物，由我们后人追溯上去，才可奉赠他们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尊号。现在我们当事功未立之先，就以国家主义者自命，歌于斯吃于斯，坐高车驷马于斯，觉得有点不大对。

我北京有一位朋友说："强者不言，强者是不必有什么主义主张的。虾蟆在田里一天叫到晚，但水蛇一来，不声不响的一口就把它吞了去。"事情须挺身出来硬干才行，不要瓦拉的乱嚷。

五　《创造月刊》及丛书

两三年来，于无聊之极，写下来的无聊的东西，足足也有十几万字了。这些东西都散乱的在各种杂志报纸上发表的。人家每问我何以不收集起来出书呢？我当受人家这样的诘问的时候，嘴里虽则是说："这些东西，是不成东西的，没有出书的价值"，但心里却在想："凡我的著作的读者，都是些穷极无聊，和我一样的苦学生。他们连天天坐电车，买面包的钱还不能自给，又那里能使他们再吃一刀痛，抽出几个钱来买书呢？况且出书的利得，都被书贾弄去吸鸦片烟，运动做官，我又何苦为资本家作走狗，去刮削穷学生呢？"因此我近来非但不愿意出书，就是已出的一两本浅薄的东西，都想毁了它们，免得遗臭在人间，受人家的利用。但这一次和上海的几位朋友一说，他们的意见却和我相反。他们以为我们不出书，终有一批比我们更不如的人来出书的。穷学生的受刮削，终究是一样的。我们若想救济救济这些目下正在受欺骗受刮削的穷学生，最好是由我们自家来印书出书，图作者和读者的直接交换。我被他们一说，心里也有点动了。所以第一就答应来编辑《创造月刊》，以后想继续的来把已出的丛书，加以改订，未来的丛书，马上付诸手民，无为城的王者，又想活动了。若苍天厚我，使我的痼疾能早一点痊愈，那么我们在《创造月刊》上见面的时期不远了，今天就止于此。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

原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洪水》第一卷第八期

广 州 事 情

人类社会，在无论如何的状态之下，总是有进步的。譬如一条冰河，面上虽则冻有极厚的层冰，然而只教这冻不是连底冻，那么底下的水，一定还是在流动着，这流动仍旧是进步。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虽则战乱迭起，民不聊生，然而中华民族，还没有死尽，不管它几次袭来的朔风雨雪，民众在表面上虽已受了不少的摧残挫折，但实际上一般国民的思想行为，还是在向新的方面跑，还是在著著进步。

若要求中华民族进步的证据，但倾向广东一看，就可以知道。中山先生在广东经营以来，曾几何时，而现在的东南天下，已全部受他的感化了。不过人类的欲望的进步，比实际的进步还要快，我们的理想的飞跃，决不是特别快车或最大的飞机所能赶得上。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许多文化批评家、政治批评家出来努力，把他们的理想，全部揭发出来，把来和现实的政治文化比较比较，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文化，去理想还有几多远，我们进步的速力，实际上只有多少，要如何的做

去，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速力。这一种批评工作，与社会的进化，有极大的关系。可惜我们中国，还很少专门做这一种工作的人，可惜我们中国的当局者，还很少能够了解这一种工作的重要。

广州情形，从表面上看来，已经可以使我们喜欢了。宽广的马路，高大的洋房，新建设的公园，威严的衙门，凡初到广州的人，见了这些表面的建设，总没有一个不眉飞色舞的，以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一种能力，我们中国人，也有比各处工部局更有希望的经营才具。然而我们再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一条宽广的马路底下，曾经牺牲了多少民众的脂血。这些脂血，若完全洒在马路上面，倒也是可通的话，但是这些脂血，却被一个政府中的人吸收去了。他一个人肥胖得厉害，戴上了眼镜，坐起汽车来了，而广州的路上，便添了许多无立锥之地的穷民。这倒还小事，我们先来放开眼睛，且看看广州的政治，教育，和农工阶级的现状之后，再作总括的批判罢。

第一先谈广州的政治。在前清的时候，到广东去做官，是没有一个不发财的。辛亥革命以后，这一种官僚的黑暗，当然除去了许多。中山先生在广州建设政府以后，这一种污点，当然更洗了一洗。但是现在怎么样呢？政府中人，位在部长厅长阶级的人，当然是很清苦。每天晚上宴客的一席几百元的开支，日夜奔驰的几乘汽车的开支，汽车边上站着的四五个拿着手枪的护兵的开支，都只能由公家给付。他们的月薪，都只在五六百元左右，并且总是身兼十几个要职，这几个兼职，都是兼差不兼薪，只能收得一二千元一月的马夫费和办公费，此外却是分文不取的。所以这一个阶级的人，是十分的清苦的。因为他们中间，思想旧一点的人，家里或许有几位太太要养，年纪轻一点的人，或许有祖

老太太老太太要养，并且因为他们居在最上阶级的原因，亲朋戚友，来投奔觅食者，决不少于孟尝君的食客之数。一方面他们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也要用几个和自己的政治见解一致的人，要支撑他们的门面，对于同阶级者，或比他们更有实力者，也不得不费点周旋来往的费用。所以他们的确是很清苦，至少这一阶级的大部分，都是很清白的。不过其中有两三位，因为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太接近的缘故，所以外面的人言啧啧，但记者却没有上外国银行去调查过他们的存款，在此地断不能瞎说，总之现在广州中央分政府省政府中间的第一阶级，就是厅长、部长、委员或主席阶级，以外表来说，就是坐汽车而有拿手枪的护兵在车上站着的阶级，他们的私收入，只如上所说，比较起北政府的官僚来，当然是进步了不少。其次比他们次一级的秘书科长阶级，却不能说了。他们的利害，大约和上一阶级者相通，假如革命政府和省政府等，对于人民的剥削，有不能拿到青天白日的底下来说的地方，那么这些黑暗的罪恶，都应该归在这一阶级的身上，因为暗中的敲刮，表面的粉饰，都是这一个秘书科长阶级做成的。其他若征收机关，地方县政府，小团体等的黑暗，恐怕比前清末叶，进步不了许多。不过这一层，我们要原谅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无新的训练的人，并且大半是第一阶级的亲戚故友，一时要他们改变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只好慢慢的待他们的自毙，或积极的作第二次的洗刷工作。这是讲到政府机关的操守方面的话，还是小事，现在我们要讲到政治中心人物的施政的思想上去了。

国民政府，是国民的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它的基础是建设在国民的全数上的。然实际上在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的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

人。民众的代表，虽则也有列席发言的机会，但是这几个代表，若不先表示软化，便要压迫得不能容身。因此国民政府的各机关，和中央党部的门前，民众请愿的团体旗帜，络绎不绝，结果思想上行动上，就分出了左右两派来。所谓左右派的不同的思想行动，大约大家已经知道，可以不必再说，不过这两派的分歧的要点，却很不容易看出。他们的口头都在说为民众谋利益，都在叫一样的口号。然而兵工厂的工人，完全被解散了，工会与工会的中间，受了一派的人的运动，互相攻击起来了。到得不能解决的时候，要仰仗政府的设施的时候，政府仍在说政府的话，被压迫阶级的满肚皮的苦楚，仍旧是吐不出一二分来。在这一个混乱状态之下，当然是谁也说不出什么是左，什么是右的，不过我们分析分析这两派的中心人物，或者可以看得见一点模糊的色彩。总之国民政府中的人物，有几个是在做官，有几个是在作工。做官的要承上欺下，事情要做得漂亮才对。譬如在北京是张著左倾的旗帜，是以左起家的人物，到了广州，尽可以登报声明，说："我非左，我非左！"等到得了位置以后，又可以一面逢迎着有实力的几个人，讲极右的话，对了民众再说些调和的巧语，仍复可以不失他们的原来的声望。甚而至于要扩充他们的势力，就是拉拢一般机会主义者来，新组织一个新右派来都可以。这些人的口号也是为民众谋幸福，然而对于真正要为民众谋幸福的人，却丝毫也瞧不起，有时候竟有附和着权势来压迫民众的事情。这一派人的势力最大，位置最固，现在的政治舞台上的人数也最多。许多离奇不测的最高机关的命令，或独行独断的不近人情的行为，都是出于这一派人的献策。因为这一派人的飞扬勇跃，所以真正的欲为民众谋利益的工作者，也就隐遁不见了。事实上这些

真正欲为民众谋利益的人，说话不灵，献计不取，还有什么发展的余地呢？所以说国民政府中有左右两派，却是不通之论，实际上只有一派在那里扬威作事，其他一派的势力，早已于无形中消失了，迁都大计，军事行动，各党部和政府机关的小小的意见等类，毕竟是谁定的计划，是那一派的策略？

那么所谓左派的势力，就完全失坠了么？也不是的，物理上的精力不灭的原则，在政治上也应用得到。现在民众已经觉醒了，带了面具跳狮子的事情，被人家看穿了，工人的组织也日就坚强完善了，被利用的事情，次数积得多起来，被利用者的经验知识，当然也已经进步了。他们的势力不死，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效的，不过现在不是起来作结总账的时候，他们还潜伏在社会的下层里，在作基础建筑的水门汀而已。

政治是左右社会一般的南针，广州的政治，既是在向这一个方向进行，当然广州的教育，也可想而知。

党化教育，在今日的状态之下，是谁也赞成的。现在不是读死书，做学问的时候。然而这一个党化却不是正大光明的大多数的民众的党化，仍旧是几个有势力的人在后台牵线作法的党化。所以广州的学生，年青一点，热情如火，渴慕正义的学生，现在都屈伏在旧势力之下，见了铁杖，连头也抬不起来。政府说“马”，学生就“马”，政府说“鹿”，学生也只好“鹿”。甚而至于政府对待学生和学校的高压手段，学生及社会，不能加一句批评。结果就是党政训练所的学生的开除，中山大学学生的甄别，和大批思想较激烈一点的教员和校长的革职。况且目下又当迁都移鼎的当儿，什么事情都挂在半空天里，因而广州的教育，现在也完全还是在冬眠的状态之中，什么也停顿，什么也没有。“若是冬天来

了，春天大约也总不远了吧！"这一句英国诗人的至语，我希望广州的学生不要忘了。

广东的农工阶级，表面上似乎很热闹，各行有各行的工会，各乡有各乡的农会，此外还有农工商学界的大联合会，然而实际，他们的结束力很弱。几个农工运动的小头目，又都是小政客出身，对于政府的措施，非但没有监督促成的决心，有时候，且竟有受一部分人的运动，甘心作几个人的爪牙，来摧残同类的。因之一行中的工会和他行的工会冲突者有之，或竟在同一工会之内，分出两派来争闹者也有之。当农工运动起来的初期，农工阶级全体没有自觉的时候，这一种现象，原是免不了，但以农工为基础的国民政府之下，有这样的事实发生，至少也是首领人物，应该反省自责的地方，而几个野心者，还在居中利用，因此在建筑他一个人的地位和声望，这岂不是世界革命的一大耻辱吗？所以有人说，广东是一个牛奶海，许多左派，到了广东，颜色都变了。这一句讽刺，希望真正为民众工作的人，不要忘了才对。

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有许多关于军事政治的具体的话，在目下的状态里，记者也不敢说。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现在总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不过我们的共同的敌人，还没有打倒之先，我们必须牺牲理想，暂且缄守沉默，来一致的作初步的工作。末了还是中山先生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署名曰归

告浙江教育当局

浙江自古是文化灿烂之邦，不过近几十年来，弄得萎靡不振，鬼怪横行。杭州的市民，到如今还不晓得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中国。他们只知道在西湖边上喝喝茶，在荐桥大街买买菜，吃的是油，穿的是绸，做的是梦，父亲是如此，母亲是如此，儿子也是如此，孙男孙女，完全是一个样儿。无反抗心，无男子气，一个军阀来，就开一次欢迎会，一件新事情起来，在这事情已经过去了的时候，也打一个电报凑凑趣。闲下来就到城隍山上去问问流年，看看八字。这一种封建时代的生活样式，在最近的杭州城里，还在流行着，支配着，恐怕在将来，也是不容易变更的。

现在可是不同了，青天白日的旗帜，张在吴山的顶上了，虽则现在军兴未艾，还没有整理内部的余暇，可是教育机关，也已经成立，种种新兴的什么部什么部，也都有了负责的人了。你们这些为民众工作者，当然要想一种方法出来，使昏梦未醒的一班杭州市民，开开眼睛，清清头脑。

浙江人在外面从事教育的人很多，而浙江的教育的腐败不

振，连比广东的一县都还比不上。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在浙江从事教育的人，都是以教育为招牌，而一意专心于结交权贵，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位，同时把持着教育会，不让新人进去，不使学生有自由发展的余地的原因。所以在前清末叶的几位老古董，现在还在那里变把戏，时势一变，他们也一变，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教育机关，他们总不肯放手，弄得每次改选职员的时候，笑话百出，比赌选议员的行动，还要奇怪。他们物以类聚，和江苏的几个教棍如黄任之、沈信卿之流，结合在一处，招牌虽挂得很好看，然而实际上的营私舞弊，为虎作伥，比军阀官僚门下的卑卑小子，还要厉害。所以杭州的大学，在前五年已有决定的杭州的大学，不消说还办不起来，就是许多已创立的中小学之流，也弄得变成了中原之鹿，只任他们的剥削敲吃，成绩一年坏一年，内容一日凋零一日，在这一回的杭州革命以前，几几乎成了空旷的茅亭，毫没有一丝的书香气味。更可痛的，就是这一批教棍，在不久之前，还连结了军阀，在杭州杀死了许多妨碍他们的进路的学生。象这样的杭州的教育界，在这一个时期里，若不根本的改组一番，那我们要革命干什么？岂不是比猫猫虎虎，做牛做马的过去更坏么？

所以在这一个当儿，我想浙江的当局，应该下一个决心，把那些卑污苟贱，无所作为的教棍赶一赶清楚，根本的划定一笔整款出来做教育经费，好教吴山脚下的健儿，能够得到新的训练和新的觉悟，来继续他们以后的更彻底更不妥协的革命工作。

第一，我想杭州有许多外国人的产业——譬如什么哈同，什么梅某的——马上可以由教育当局取得回来做杭州教育界的公产。第二，我想当孙传芳在杭州时所加的杂税，可于军事结束之

后，划作教育经费。第三，有许多从前虐杀人民，敲剥小民的官僚政客的不动产，都应该没收起来，作创办杭州中山大学的基址。

这几件事情，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在杭州当教育重任的诸君，我希望你们不要反叛了我们民众的信托。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新消息》周刊第二号

在方向转换的途中

目下中国的革命，事实上变成了怎么的一种状态，暂且不论，然而无论何人，对于我们中国现在大众的努力目标，至少至少在精神上，总应该承认底下的三点：

一，这一次的革命，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

二，这一次的革命，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

三，这一次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初步。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革命，精神上有三种意义，所以这一回的革命运动，和往日的情形不同。第一，目下中国的全民众，不论其手中有无枪械，凡系无产阶级或被压迫阶级中的人，全部都立在同一的战线之上，直接间接，都在从事于革命运动。第二，这一次的革命运动，并非是个人与个人权力之争，也并非是由于少数人的发动，或得成就于少数人之手的。第三，从世界的大势，人类的本能看来，这一次的革命的最终理想，没有完成以先，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

从理论说也好，从实际说也好，凡是头脑清晰一点的人，对

于中国这一次的革命运动及其趋势，都可以看得十分明白，而局中的人，现在还有许多，在那里东西迷惘，这实在是中国革命的耻辱。

现在就各种事实综合起来，把我们这一次革命运动的障碍物来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迷梦者所受的毒，其出处是在什么地方的。总而言之，帝国主义者，当这一个生死存亡之际，他们要拚死的活动，拚命的挑拨，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这一层谁也看得清，谁也识得破，并且其根不深，伎俩有限，为害还小。其次，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还是中国人脑筋里洗涤不去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

现在当革命运动还未完成的中间，武力当然是革命的重心。然而当全民众还没有武装，有兵器的阶级，还自成一个阶级的时候，这一种武力，很带有几分危险性，尤其是在中国。

革命当然是一种暴力行动，这一种暴力行动的直接演动者，当然是革命的军队。然而这些军队，苟对于革命没有了解，他们就要以革命的成功，作为他们一个阶级的特异功绩，反过来就可以继承旧日的军阀，而再来压迫民众。

这一种现象，在无论哪一国的革命史上都可以看见，也是社会革命过程中必经的一条黑暗之路，然而在中国的封建思想很深而民众的自觉还没有彻底的民族中间，革命运动不入这一条黑暗之路则已，一入这一条黑暗之路，则中国的民众，中国的无产阶级，至少要吃十年大苦。

所以在这一个危险过程中，我们民众所应该做的工作，自然只有两条路：第一，把革命的武力重心，夺归我们的民众。第二，想法子打倒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

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么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

况且现在中国革命，还只做成了一半，万一功亏一篑的现在，不幸有上举的黑暗行为出现。那么非但这一次的革命，要全部化为乌有，就是世界的被压迫的民众，也要受我们的影响。我希望大家努力，大家反省，使中国民族不要成了世界的笑柄。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上海

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九期，该期衍期出版

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

自己生性疏懒，有许多外国朋友来访问过后，竟没有答访过一次。更有许多外国的朋友，对于我及创造社同人有所批评建议，及翻译我们的作品的要求，例如法国的摩南君，俄国的泊来佛君，日本的小烟君及《改造》杂志诸君，都没有答复他们，或和他们谈议过。近来闲居在上海，专门来弄文笔的事情了，所以空下来的时候，很想追溯前情，做点文章来求他们的宽恕。可是一天两天地捱拖了下去，到现在并且事过境迁，有许多事情，已经成了过去，没有答复的必要了，因此一直到现在，我从来不曾做过答复海外的朋友的文章。

这一回，当南军正到上海后的一礼拜内，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在南京挑拨了友邦，虐杀了我们的许多的同胞还不满意，更想在上海附近，再行一次大规模的屠杀。开来了几万海陆军，上海的交通大道上架设了无数的机枪大炮，弄得最爱和平的中国百姓逃生无路，入地无门。我也在这一个当儿，逃上一处比较安稳的地方去躲避了几天。记得在三月二十五日的午后，一位朋友和我

在街上匆匆遇见，说到今天的日本人发行的上海《每日新闻》上，有一篇送给我的公开状。

后来到一位朋友的家里，才看见那一封信。是山口慎一君写给我的。我头脑健忘，对于曾经遇见过一两次的朋友，每想不起来。山口君，我确曾在内山书店会见过你，但是那时候相见匆匆，致我们不能深谈到中国的文艺界的趋势和现状。现在让我来借此杂志的余白，和你谈一谈。

你所批评的李初梨君的戏剧，我和资平的小说等，我暂不置辩，因为对于艺术品的评量，批评家有绝对的自由，作者并无抗议的必要。我在此地所想和你谈谈的，第一是我个人的心的变化——因为你曾经谈及了我的私事——第二是创造社的抱负，就是创造社在目下的潮流里所取的态度，和对于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见。

你对于我个人的飘泊，似乎很表同情，并且对于我的不羁穷苦的生活，大有尊敬我的意思，山口君，我想对你说的话，是在这一点。

中国十余年来的内乱，弄得国民生计干枯尽了。中产者尚且无以为生，更何况无产者，当然是弄得死无葬地。在这一个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的铁蹄下的中国青年，一般手无寸铁，知识发达，追求光明，如饥如渴的青年，那一个能不和我一样的飘泊，那一个免得了这一种不羁穷苦的生活？青年的渴求光明，是自然性。求之不得，就不得不苦闷，苦闷之余，前面就只有两条去路。一条是走往消极方面去的自杀，一条是积极进行的革命，喋血。然而中国的国民性，早已被三千年来的道德虚伪所腐化了。走积极这一条路的人，前面的敌人，不但只有帝国主义和资

本主义，他们还要打倒了三千年来的陈死人，才能吐一口气。这三千年来的陈死人所遗下来的铁锁，就是盘据在现代一般青年人心里的利己的思想，做官发财的思想，卑鄙龌龊，最善于利用机会的思想，只想打倒别人而把自己的地位抬高来的思想，甚而至于假了很好的名义，来营他的私利者有之，假了公共的事业，来建筑他个人的名誉者有之，此外更有种种很巧妙很光面，而为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卑劣万状的阴谋诡计，要打倒一两个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是容易得很，可是要打倒这一种中国民族的卑劣阴险性，却真是谈非容易。中国人心早已死了，所不成的就是这一种不可救度的利用机会的卑鄙的野心，举近例来说，在我的周围，在我的手下，就发见了这一种青年的腐劣行为。更拿大一点的事情来做譬喻，则这一次的革命领袖中间，也何尝没有这一类的野心狼子？

我从前是绝对的承认这一种仇敌的来势的厉害，所以只愿退避，不敢前进。现在被我的手下的暗箭伤了几处，倒反把我的勇气鼓舞起来了。我觉得这一种鬼蜮，终有一天要死在大天使的照魔镜下的，若把这照魔镜的金光灿烂的镜面来收藏起，那么鬼子鬼孙，将要愈聚愈多。所以我觉得走消极的路，是走不通了，我想一改从前的退避的计划，走上前路去。所以我就不远千里的跑往南方，南方的天地，当然要清明得多，可是那三千年来的陈死人的余孽，却也同时增加了无限的军马人数，因为在这腐劣性和理想主义的中间的那一个缓冲国——就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消灭了以后，那一批鬼蜮的阵势，就不得不加紧肉搏的原因。

我看了来势猛烈，觉得无为的牺牲了自己，也于社会人世没

有益处，所以就变更了计划，再回到上海来重守旧垒。我想以一己的力量，来拚命的攻击这三千年来的恶势力。我想牺牲了我一己的安乐荣利，来大声疾呼这中国民族腐劣的遗传。我想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这是我几年来心境变迁的经路，这也是我在南方的失望，所以又跑回到上海的旧巢里来的原因。你说"我身子虽住在黑暗里，而仰慕光明的心思，却仍是未死"的这句话是对的。在这一点，至少你也是我的知己之一。酒逢知己，千杯嫌少，今天听了你那一句话，并且听了你的对我的爱护和希望，我也来向你吐露一点儿衷曲。

你的信的末段，是希望创造社的进展，希望创造社的攻破旧势力，希望创造社的努力于新的建设的。这不但你这东邻的好友的希望是如此，就是国内一般同情于我们，和我们立在同一战线上的许多真的新青年，也在一样的希望，一样的督促。就是我们的几个同人，也日夜在以完成此任务为努力的目标。我们的几位同志，已经出去作实际的工作了。大约你总也已经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和恶势力激战的中间。有几位同志，并且已尝到了铁窗斧钺的风味了，我们是断不愿以艺术家自豪，而只想躲避在逍遥山上追逐美的幻梦的。

我国的无产阶级的觉醒奋起，是你所知道并且已经说过的。我国的知识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受一样压迫痛苦，也是你所洞悉的。但是我国的新文艺——假使中国有新文艺的说话——的产生，本来就是根据于被压迫者的同情，本来就是为向无产阶级者来宣传阶级斗争的这一点，你却还没有看清。在政治的革命之先，总有思想革命为它的前驱。五四运动以前起来的新文学运动，到了五四，收了一个结束。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的效果，

在现在当然还不能看出。可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间，创造社所经行的路径，是明明在告诉读者以将来的趋向。我们最初是要求人心的解放，其次是旧道德的打破，第三步就和那些无聊的偶像决斗，接着就与资本家脚下的文人，启了衅端。我们都是无产者，我们也不敢以知识阶级自命，我们更配不上说同情于无产阶级，在最近我们所主张的，是直接行动，是彻底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世界化。

《创造月刊》，虽则有时过于文雅，不免引起人家的误会，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宗旨，是始终没有变过。我们的不平与攻击，就是无产阶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不平与攻击，我们的喜怒，就是无产阶级者在心的深处所感到的喜怒。我们所想走的路，是一般无产阶级者事实上被环境所迫，不得不走的路。所以你所忠告于我们的话，虽系出于你的好意，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奉行得很久了。你若再能读一点我们的半月刊之类，或我们在他处印行的书籍，我想你一定会相信，相信我这一句话的非诬。

写了半天，我所想说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文艺"的主张，终于没有说及。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仿佛在日本的文坛上也正在议论辩驳。不过我想这问题在中国的新文学上，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日本的文学，发轫于资本主义开展的初期，其后明治大正两代，资本主义开展到了再也不能前进的绝境，文学也因而陷入了穷地。一班在资本主义时代造成的作家，就和新进的受世界潮流的作家对抗起来，于是乎有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一个名目，因为日本的已成作家，都为有产阶级辩护，讴歌有产阶级的生活的。而中国则新文学运动起来的时候，从事于文学的知识阶级，都已成了无产者了。在中国这样的无产国里，有产阶级的人数本

来是很少，并且从这一个阶级——大抵不外乎军阀官僚及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走狗——里，断不会产生出新文学家来的，因为新文学起来的时候，就带有和已成阶级——就是少数的有产阶级——宣战的使命。况且现在中国思想革命的时候早已过去，已将入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了，我想将来中国若没有文学则已，中国若有文学，一定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断没有象日本那样的讴歌有产阶级的文学发生。所以山口君，临末，我想夸一句大口："中国的将来，是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文学，也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有产阶级的足迹，将要在中国绝灭了的原因。"

拉杂的写了一大篇，希望你能够将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志愿，翻译过去，告诉你们日本的青年同志，我们大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废除国界，打倒我们共通的敌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

原载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洪水》第三十卷第三十期，该期衍期出版

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

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

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现在还要反过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者、日本资本家和支那往日的旧军阀旧官僚等，联合成一气，竭力的在施行他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我们觉得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比往昔的旧军阀更有碍于我们的国民革命。中华民族的全民革命，若不成功，世界〇〇是不会发动的。无产阶级只知有阶级，不知有祖国，尤其是无产阶级文艺界上的战士，不应该有国境的观念。

目下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尽其全力来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唤醒日本的军阀和资本家的迷梦，阻止他们帮助蒋介石或张作霖。在过去的半年中，日本无产阶级帮助我们的地方，我们也认得很清，在此地不得不表谢意。今后希望我们更有密切的

提携，强烈的互助，庶几世界被压迫的民众，全都能够得到自由，得到平等，造成一个世界无产阶级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八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日本《文艺战线》第四卷第六期

谁是我们的同伴者？

革命，革命，我们中国十六年来，革命已经革够了。然而总账一结，我们因革命而得到的是什么？

第一，先讲我们的命。罗马的奴隶，虽则没有自由权，然而同鸡犬那么的遭虐杀的事情是没有的。俄国的农奴，虽然是可以由主人自由买卖的财产，然而至少主人对于这自己的财产，总有一点爱惜之情，把这个活财产拿来腰斩，勒死，打靶的事情．想来总也是没有的。但是共和国民的中国人，却是如何？孙传芳底下的大刀队的杀人如草，现在可以不必谈起，近几月来的以共产两字而被杀的冤鬼，如数数看，还数得清么？我们的命在哪里？我们的革命的结果在哪里？

第二，来讲自由。堂堂的大英帝国、大日本帝国，他们的出版物里头，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研究经济学说，批评苏俄政体的书，一天不知要出几千百册，而共和国的中国如何？一本马克思的传记，还不敢公然发卖的中华民国，究竟是什么政体？在我们中国，文学团体，也可以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罪名来解散，

讨论学术的会议，也可以以秘密结社的名义来拘人。日本出兵山东，他们的无产政党，天天在公开讲演，攻击政府。英国出兵上海，他们的工党领袖，报纸上每日在作反对的宣传。我们中华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又在哪里？

第三，讲租税。自从辛亥年革命以来，我们人民的负担，有过轻减的例子没有？最近的苛捐的骤设，得过了我们人民的同意没有？

第四，论孙先生说的考试权，就是中国人一般所说的做官，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参政的权利。试问我们背犁头握镰刀的老百姓，手里没有兵权，朝里没有亲戚的知识阶级，要想去做一点政治工作，要想去为民众服务，要想去凭良心握一点政权，这事情办得到办不到？

凡此种种，说下去有千千万万好说，平心而论，比较起来，我们现在所有的现状，比起两三年前怎样？

革命革命，革到如今，除我们老百姓死于刀枪弹丸者不计外，即以现在还活在这里的民众来讲，他们的倒悬状态，究竟减轻了一点没有？

这些失败，这些革命的反成功，它的原因究竟是在哪里的呢？是在我们认不清同伴者。我们都被些同伴者所卖了。

我们大家都承认革命是非用武力不可的，所以我们到如今就不厌含辛茹苦竭我们的脂膏，来养成军队。然而养蛇者被蛇咬，养痈者患痈死，到了革命的军队养成，现在就一变而为压迫民众的军队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军队不是我们民众的同伴者，我们要革命，还须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大家都承认，革命的群众，是要指导者引导的，所以我

们到如今就唯命是听的服从那些当局者。然而到了大权在握，他们就恋恋于利禄，漠漠对民生，从前的为民众争自由，谋解放的人，一旦假面揭破，投机成功之后，现在就只以做官为事，反过来要反对自由，反对解放了。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知道，将政权聚集在一处，使少数投机者去行寡头政治，是不行的。我们要将政权夺回，使它属于大多数者才可以。那些比旧官僚更恶毒的流氓新政客是卖民众，卖朋友的恶党，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同伴者，我们若要革命，不得不先打倒这一个新官僚阶级。

我们还有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在背后，所以我们没有枪械，没有金钱。我们所有的唯一武器，就是多数。而这我们的多数中的多数，却是农民。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发达，所以在中国各埠的资本主义式的工厂里作工的工人，只够作打倒外来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之用，而中国的新旧军阀和附属在这些军阀的尾巴上的那些新旧官僚政客及投机师之类，则非要农民起来打倒他们不可。孙总理的提倡农工政策，把农字放在头上，我以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中国也以农立国，是谁也在那里说的，中国的农民，是组成中国社会的重心的阶级，是谁也承认的，而到现在为止的各期革命运动中，农民却从来还没有作过中枢，我以为这就是我们革命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当然农工是要联合在一起的，在中国的外来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国的新旧军阀和新旧政客官僚是打不倒的。但依“我们的唯一武器是在多数”而说，那么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一个武器也未免太不注意了。

然而时机早已成熟，湖南的农民，已经把他们的锋芒露过了，船到桥门自会直，我相信闽广的这些多数阶级，也一定会相

继的起来。不过我们现在正当革命吃紧的时候，想使这多数阶级，自然的起来，未免有点望孙子来报忤逆儿子的仇的样子。我们应该知道工人的组织，因为各工厂都带有外国帝国主义的色彩，所以完成是很容易的。唯有中国的农民，因为国情不同，和受压迫受了太久的原因，要他们自动的组织，却是很难。但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所讲的话，我们现在也可以引用，人口中的庞大的大众（农民）之对于政治的不关心，是使政治社会堕落的最大原因，可是，可是这并不是不可救药，不能征服的事情。我们要革命，要引他们为我们的同伴，只看我们的宣传，只看我们的努力如何的。我们中国的小农，岂不是也日日在被大农侵蚀么？我们中国的农场佣工，岂不是比俄国的农奴，状态更坏么？我们只教能够唤起他们的不平之心，告诉他们以组织之方，帮助他们去向大地主大农那里去夺回他们的剩余劳动价值就对了。若那些大农大地主能够及早觉悟，能够看穿他们的被军阀政客的再掠夺，能够和小农佣农连合在一起，共同奋斗，那中国的农民运动，岂不就成功了么？

革命本来是荆棘丛生的一条道路，在这条路上的行旅者，多一个忠实的伴侣就胆大一点，那些欺骗我们的新旧军阀，欺骗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我们已经把他们看穿了，我们应该早一点到农民中间去工作，应该早一点去锻炼我们的多数者的武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民众》旬刊创刊号

乡村里的阶级

封建时代的社会基础阶级，为农民阶级。现在各国的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基础阶级，虽有由农民阶级而转移向工厂劳动者阶级去的趋势，然而实际上，占社会人的大多数者，仍旧是农民，象中国这样的封建势力不曾除去，资本主义还没有发达到相当程度的国家，当有产者和无产者争斗的时候，成败的决胜点，在于多数农民的依附与否。

然而农民的一个阶级里，里头更包有种种经济地位不同的阶级在那里。他们因为利害的相反，当革命起来的时候，每有背道而驰的现象。所以我们想鼓动农村革命，第一先要认清农村里的各种阶级，而施以与各阶级相应的宣传。

第一，农民中间，最悲惨的，当然是农村里的无产劳动者。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全视雇佣者的有无，为他们能维持生活与否的标准。这一个阶级，其利害生死，完全与都市无产劳动者一致，当然是无产阶级联合战线上的战斗员。他们的中间，只教有人去组织，可以和都会的无产劳动者，在同一指导之下，依

同一的方向，杀往前去的。关于获得这一个阶级，另外没有特别的难处。

第二，是没有田地，而有相当的小资本，可以在农村里自立的小农。这一个阶级对地主的敌忾心，因为利害的冲突，无形中酿得很浓厚。所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于他们是有拥护的必要的。真正农工革命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可以投降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的侧面军。可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到，就是要使他们十分的了解第一个佣农阶级的苦楚，不可使他们两阶级中间有反目的事情。这一个阶级的获得比较容易，因为在革命的初期，最先须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于他们没有害处的。于同时在革命的初期，小资本的保有，在相当的范围之内，也可以容认他们。

第三，第四，是有田地的中农和拥有资本田地的大地主等两阶级。这两阶级，因为与革命的方向完全相反，所以在革命的进行中，不得不出来百方阻挠。然而他们是绝对的少数，是不足顾虑的。

所以中国农村里的阶级四层，有多数的二层，都是我们的同伴者，和我们是有十分合作的可能的。既然结成了这一条联合战线，那么想打倒几个少数中的少数者之大地主和资本拥有者，真是势如反掌的容易了。

所以农村革命，就是大家不去干，若要干起来，那革命的成功，当然是可以指日而待的。同志们，大家兴起努力，再往前进。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民众》旬刊第二期，署名曰归

讨钱称臣考

因为考据很流行，所以想来做一点“小”考。

平常朋友很少，不大有人寄刊物给我，所以一点考据的材料，都是由我自家去找得的。而材料的获得，又都系在一大堆无聊的刊物的滥读之中。

偶尔读到了“讨钱”和“称臣”两字，想来作一点我自家身边的考据。

按：“卖文来养活”似乎与“讨钱”不同。讨钱是乞丐的行为，而“卖文来养活”则是文士的行为。

我曾向商务印书馆等卖过文的，所以对商务印书馆等并不是讨钱。

至于因要“讨钱”而“称臣”，则又有一考。

按：“称臣”两字很古很古，而见于近代文中的，则自《语丝》第十九期的“小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臣鲁迅诚惶诚恐谨呈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老爷麾下”始。

今又有郁达夫的向鲁迅称臣，或者鲁迅是称臣被纳，而带有

“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老爷麾下”之号阔了，也未可知。

而又因为要向北新讨钱而对鲁迅称臣，则郁达夫之讨钱处所，又不可以不考。

原郁达夫也曾向广东革命政府下讨过钱，则其曾向总司令等称臣过也明甚。又郁达夫虽号为卖文，而其实则也曾向商务印书馆等讨过钱，则其曾向高梦旦之流称臣过也又明甚。又郁达夫为日本的官费留学生，他对于日本的文化事业基金之钱，有没有讨过，虽则还须待考，而其在日本时——也许现在也还是——曾讨过些不由劳力去换来的钱，是麟之为麟，昭昭也的，则其曾向——或许是还在向——日本政府称臣也，更其明之又明，甚之又甚。

小子无良，一边的腿捧不上，就急急跑上一边去称臣，而且自己还在伪称系住在贵族大学内者以自豪，按《明律》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条的捧腿之罪，应该割去他的两只腿以示薄惩。

一九二八年八月

原载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六期

《白 华》的出现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飞到了北京，北京就改了一个名字。

东三省一隅，因为有人在反对，所以这旗帜还没有张起来。

南北总算统一了，第五次全体会议也算开成了，接着还有许多许多的什么会议，什么会议。

然而革命成功的现在，我们老百姓所得到的是什么？第一是各工会的解散，第二是民众运动的禁止，第三是各地学生会的要封闭，第四……第五……同样的好处，还举不胜举。

难道革命成功之后，民众就可以不要了么？难道革命成功之后，政治就可以由政府中几个人去包办了么？

我们且来看一看目下的政局及社会各杂乱的情形。

改正条约的声浪，在中国方面原是吹得很高，然而实际上日本对东三省的态度如何？非但是条约上所有的权利，他们一点儿也不肯抛弃，就是连条约上所没有的内政干涉，他们现在也在大胆地尝试了。还有济南的占据，济南死难的几千人的白骨，现在非但没有一点雪耻报复的兆头，大家连提也无人提起，谈也没有

人谈及了。

讲到裁兵，各地割据在那里的武装同志，还正在充实兵器，加募革命健儿哩！

谈建设，谈交通，我们只见到报纸上的各种会议和国府及各地政府门前的许多请愿的团体而已。据说历史是循环的，难道十六七年一转，中国的历史又要回到辛亥年的状态去了么？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还要讲乐观，还要讲理论，还要讲文学，实在是不通的事情，尤其当言论创作的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的现在。

可是“不平则鸣”是中国古代传下来的金言，胸中若有积愤，要想吐露出来，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于万不得已的时候，来显现一点颜色，或者也是促进革命的一种微之又微的小力。于是《白华》就出现了。我们假定《白华》有如虹霓，虹霓虽没有彗星般的魄力，但也许是天地之间的一种怨气之所结，《白华》将来如虹霓般练得净了，化作白虹，或许也可以贯日，可以打倒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帝国主义。化作长桥，或者也可以救度救度许多被压迫得没有路走的同胞。

《白华》，《白华》，我只在祝望你的成长。

一九二八年八月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六日《白华》第一卷第一期

中学生向那里走

——中学生的出路问题

托生在现代中国的民众中间，彻底的说起来，真正有出路的人，怕只有两种。一种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种是未离母胎的胎儿。老人的出路就是那条自然的死路，胎儿的出路就是出生，出生之后，可又是X了。

不要说别的，我们中国的老弱男女，在现代的不合理的社会组织之中，就是西洋人在数世纪之前所享有的人身自由 Habeas corpus的权利都还争取不到，更那里说得上财产，事业，思想，言论，和精神上的种种自由与发展呢？

当然，在现代中国的一部极少数人的中间，——（这一部分的人的称呼，我本想用一个“牞”字来代替的。因为它们是非畜非人，对于我们人类是一种最有危害的特异动物）——它们是有它们的出路的。这一部极少数的东西，就是新旧的军阀和附属在这些军阀之下的买办、官僚、走狗、龟兔之类，它们的横征暴敛，

敲剥欺凌，荒淫堕落，暗杀明争，就是它们的出路。可是它们的这一种出路，当然不是吾人的真正的出路，正如狗所爱吃的东西，不是我们人所爱吃的东西一样。并且中国社会的所以致有今日，我们中国多数民众的所以没有出路，正都因为有了它们这些少数东西存在在那里的缘故。

照这样的说起来，那么我们民众的两条出路，岂不是很简单明瞭的么，就是第一，马上去杀尽这些少数的东西，第二，否则就大家去自杀。

但是我们没有武器，没有组织，没有训练，没有勇敢，是马上杀它们不了的。那么，直截快当的另外的一条出路，就只有大家去自杀了。可是大家都去自杀了的时候，那连做棺材埋死尸的人都要绝迹了，少数的新旧军阀和它们的走狗龟兔，又那里肯来替我们收殓死尸呢？所以自杀的一条路，自然是不成话的无理的想头。

于是乎我们就不得不在这两条极端的出路之中，另寻一条生路。于是乎就不得不妥协。于是乎就有现在中国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于是乎就有国民党、改组派、共产党、取消派、中国青年党、自由主义派、军阀、绑匪、强盗等等的出现。于是乎更有所谓教育机关，大学、中学、小学等的产生。

现在先承认了这一个妥协的前提，我们才可以来谈谈中学生的出路。

中学生的定义如何，我却没有十分明瞭，然而大体的说起来，大约系指国民中间的一部分青年，在某一个相当的年龄之下，已经修完了相当的初等教育，为造成社会的健全人格，正在进入中等教育机关中，而在修学的男女学生而言。

所以中学生是一般国民中间的一部分民众，是年龄在十三四左右的青年，是为造成健全社会而在中等学校修学中的学生。

一般国民的出路，广义的说起来，也就是中学生的出路。同样，一般国民的出路的目标（就是马上去把那些军阀和寄生在军阀之下的走狗龟兔杀尽的这一件事情），也就是中学生的出路的目标。一般国民在无可奈何之中，暂时隐忍偷生，一步一步的在预备实现这目标的努力，也就是中学生的努力力点之所在，这是无待赘说的。

但中学生是年龄在十三四岁左右的青年，所以中学生的努力方向，又不得不顺随年龄的生理条件，而另有限制与特情。

人生的十三四岁，若以节季来比拟，正是阳春二三月生活力极盛的时候。身体的发育，到此特行紧张，一步飞跃，就须脱离幼年的稚弱而转入青春泼剌的活动期去，所以在这一个时期里，比什么都重要的，就是将来的强健体格的锻炼与育成。我以为中学教育的目的，若在造成为改革社会而奋斗的勇士的时候，那就是把现在中学科程中的大半科目，尽行删去，而以强身养气的操练来代替，也并不为过。总之，社会的组成，由于个人的集合，个人的事业作为，系于他的身体的康强，而个人身体的强弱的分歧点，却在这一个中学修学时代的两三年当中。

青年在中学修学时期里，生理上必然须发生的两种特异的现象，是谁也逃不过的。第一，是性的发动，第二，是因性的发动的结果，而对于人生的怀疑。这两种现象，若不适宜善导，使驱入于积极的能动的方面去，则一个青年的生死都还难保，其他什么国家，什么社会，什么人类的问题，当然都谈不到了。

所以我以为中学生的出路的第一条，就在上举的两重铁门关

的打破，与一个轰轰烈烈的壮强身体的培成。

但是光有了强壮的身体，而没有高深的学识，稳固的理想，有用的技术，来指使这个身体，那么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新旧军阀底下的兵卒龟兔之类，都是这一批东西——也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中学生的出路的第二条，就在有用的知识的获得。

大抵一个人的记忆力最强，习惯性最容易养成，好奇心最发达的年龄，就在这十三四岁的中学时期当中。而这记忆力、习惯性、好奇心的三者，却是获得确实的知识的三大要件。所以中学时代读在那里的书卷，是一生到死也不会遗忘的基本知识。别的人我不晓得，单就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觉得在大学里，在社会上，所得到的经验学问，真正有限得很。我现在在这里使用的一点外国文的根底，和常识的一般，都还是在中学时代修得的东西而已。

可是说到学识，也有种种的不同的。有些学问知识，说起来原也很高深，性质上许也很有趣，但是因为不适合于我们现代社会的缘故，修得了之后，往往是非徒无益，反而有害的，也很不少。所以我觉得中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当中，要先定下一个标准来，注意到时代社会的潮流趋势，加以一番慎重的选择才可以。革命八股的无意识的抄袭，标语口号的瞎喊盲吹，甚而至于周公孔子之乎者也的满口文章，都是不合于时代的偏狂者的行径，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学青年所应走的道路。

在五四运动起来之后，中国的一般学生口上，盛行着两句最普通的口号，叫"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现在时势变迁，这两句口号，也同时调小曲一样，换了一换新鲜，改作了"读书

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了。这两句话虽则冠冕堂皇，说来顺口，但其实是有点不大讲得通的，假如你到了无书可读——除了革命八股之外——没有读书的自由的时候，那你还有什么“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呢？

总而言之，无论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我们都是国民的一部分。一般国民的出路，就是我们的出路。一般国民的出路的目标，已在前面说起过了。我们因为地位现状的不同，所走的道路，一时或许有点参差小异，但是归根结蒂，多数民众所走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就是如何的去尽我们的最善，而来把这出路的最后目标实现出来，就是“马上去把那些军阀和寄生在军阀之下的走狗龟兔杀尽”的这一件事情。

原载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中学生》第六号“中国现在中学生的出路”栏

学生运动在中国

学生本来是不成一个阶级的，因为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无论系属于那一阶级或那一团体的国民，大家都要经过一个学生时代才行，多则十余年，少也五六载。所以就人的一生讲起来，属于学生时代的年限，比到属于专门职业的年限，简直是无限小与无限大之比。从这一个定数看来，我们晓得学生时代不过是人生所必经的一个特殊阶段，而这团体中的分子又是最游移不定的番代成分，所以我说学生在秩序经常的文明国里是不能成一个固定阶级或团体的。

但是在中国则学生在社会上的意义，有点不同。

中国的学生具有我们目下所说的诸条件的近代学生，是从戊戌变政之后，废止科举，设立学堂以来，方才产生的一种社会成分。从前的大学生，和举子读书人之类，是不合乎现代所说的学生诸条件的，所以“学生”在中国的历史，即远溯自一八九八年起，到今日止，也不过只有三十余年，可是在这三十余年之中，我们试想想有那一种社会运动不是学生群众居于重要的地位的？辛亥

革命，若没有那些当时的热烈的回国留学生——不死者后来却都腐化成为军阀了——和各地的陆军学校、讲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的学生在参加运动，是不是可以把满清的统治权夺得过来的？五四运动，烧毁卖国者曹陆的第宅，使一般低能外交家心胆俱裂者又是何人？“三一八”流血于国门，给昏庸的段祺瑞，奸佞的章士钊——那时的命案刑事私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束，若还没有结束的话，我倒想推荐大律师章士钊再来重理一理，当时的受难家属在上海的人正可以到他的事务所去请教请教（这也并不是劝大家去打死老虎的意思）——以当头的一棒的，难道不是学生群众么？其他如“五卅”的惨案，一九二七年上海军阀的驱逐，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试想想看有哪一宗社会革命运动不是学生居于重要的地位的？

何以中国的学生在社会上会有这样重大的意义的呢？这原因我想先来说一说明白。

第一，中国人口虽混说是四万万，然而其中的识字阶级向来是只有一百万不足。而此一百万读书种子之中，真正家庭富裕，得安然享受读书权利的人，怕只有百分之一二。何以在中国读书会这样的艰难，读书的人数会这样的少的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向来的在上者的政策，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百姓愈愚，统治阶级愈可以为所欲为，而一己或少数阶级的私欲就愈可以扩张得极大。所以民国成立以前不必去说它，就是民国成立以后，直到今日为止，各军阀只晓得先事剥削以饱私囊，私囊饱了，就再养一己之兵以维持其剥削永续的能力。对于教育，则极端在压迫，阻挠，不使发达，不使长成，若可能的话，则他们军阀还处处在想做出比秦始皇更惨酷的事情来。唯其是这样，所以

学生为自身学业计，为将来出路计，不得不结束得特别的牢，不得不反抗得分外的烈。而又因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和军阀联合在一处压迫中国民族，压迫得异常的紧，所以稍稍明达事理，通一点国际情势的中国少数学生，就更不得不负起唤醒民众的责任。上层的压迫压榨得如此其紧，下层的民众又被蒙蔽得如此其愚，所以夹在中间的学生就自然地不得不形成一个有机的阶级，而以上抗强权，下领民众为他们的职责。社会愈混乱，军阀愈跋扈，则这一个阶级的任务也愈加的大。这就是学生阶级在中国的社会上居然发生了重大意义的第一个原因。

上举的第一个原因，若可以名之曰造成学生阶级为中国社会的推动力的客观条件的话，那现在所举的第二个原因，可以名之为心理的条件。何以呢？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一切集团和个人的心中泛滥着的腐化的病菌，只有学生阶级是侵蚀不进的。换言之，就是中国人之还留得一点天良，能使这一点天良焕发，保有着牺牲奋进的精神和勇气的，在中国，只有学生阶级。从前曾有一位道学先生说过，中国人的文法变化只有一个字，就是你揩油，我揩油，他揩油，你们揩油，我们揩油，他们揩油，揩油的外国字是Squeeze，所以文法变化叫作I,you,we,they squeeze, he squeezes。这中国人的损人利己之心，实在是三千年间有中国民族以来的最大特征。说起来原是世界上人人都有的这一个利己之心，何以会只在中国如此发达的呢？这是因为中国在过去，无论在宗教上，哲学上，都没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者提倡过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的缘故。我们都明白知道，佛教思想也是外来的思想，但佛教的垂训，最后的涅槃也不过是想消极的消灭了自己的肉体，因以脱离苦海而免去烦恼。要去把苦海弄得甜蜜，要去把烦恼扫一

扫干净这些奋斗的精神，佛经里是没有的。孔子的哲学，也只是一种明哲保身，危邦不居乱邦不入的为我哲学。古来的中国哲学家中，倡道牺牲，和外国的基督教精神差近的，只有一个墨子。然而他自从受了孔子的抨击以来，就一向不为儒家所重视了。此外象在一般民众脑里时时盘据着的侠客剑仙之流，大都也不过是劫富济贫，拿了贪官污吏的钱财来和贫民大家分润分润罢了，要他自己牺牲了财产生命来救大众的那些侠客，是不大有的。而在外国呢，却不然。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为大众而牺牲的最大的模范。基督教的这为大众而牺牲的教义在中世就开了武士道的花，以后一直传下来，直到现在，虽则外形虚伪的基督教是被打倒了，然而它的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是依然存在的。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制度，在中国以外的各国都行得好，唯有到中国来却行不出的最大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在以上所说的这一大堆废话，目的并不是在提倡基督教，不过是想说出中国人的损人利己之心，是一切进步的障碍，是一切腐朽的原因而已，而这损人利己之心只有在学生时代的青年，是没有的。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学生，大约都是年龄在二十左右，血气方强，没有同污恶的社会接触过，家累全无，只在向未来着眼而并不顾到左右过去的青年。因此，在中国社会里只有他们能够前进，奋斗，牺牲；只有他们是纯洁勇敢，没有其他的目的而只在为正义呼号的团体。所以屡被欺骗的民众只有他们的说话是要听的，裁判贪官污吏军阀财阀，只有他们配举起第一块石头来。说他们是被利用的人，就是想利用他们或曾经利用过他们的恶党，说这话者自己就先应该惭死。压迫破坏或阻挠他们的运动的人就是正义

的敌人，他们的轨外行动，正因为有这洁白的正义的光在那里照耀的缘故，是无论何人都应该容认的。他们的父母师长正应该因他们的这些行动而感到光荣，什么管理不严，什么引咎自劾，都是些卑污贪鄙到极点的无耻之谈。请看一看当日曾利用了他们而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现在却和他们立在相反的地位的伟人杰士的行动心迹，我们就可以明白了。

因为上举的两大原因的结果，所以学生运动在中国，就必然的成了推进社会的一大原动力。近来每看见有人在举出历史上的大学生的节义正气来替这一次的学生运动作辩护，其实这些是可以不必的，因为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一个最上的辩护。况且象东汉李元礼的杀张让之弟，宋陈东的身殉李纲的古例，是和现在的学生运动的意义不合的。他们的牺牲是尊奉封建社会的礼教的结果，系为君主一个人的牺牲，而现在的学生运动，却是有代表群众的公意，完成社会革命的大使命带在那里的。所以现在的学生运动，将来必然地要和劳苦群众联合起来，结成一条共同战线，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历史的事实上，若要举出一个和现在的学生运动意义相吻合的例来，那只有一八四八年维也纳的革命，大致和现在中国的情形很相象。那时候的学生是和乌屋克曼站立在一条战线之上，而目的在将哈泊斯婆尔希家（Hapsburg）的专制统治打倒的，详细的情形请看Wilhelm Blos著的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的《德国革命运动》(Die Deutsche Revolution)的二三八页以下各节就可以知道。学生运动的真精神若光表现表现在请愿游行这些形式之上，那是不能够发生什么社会的意义的，因为中国在学生阶级之外，还有许多许多的劳苦群众在那里。学生阶级必须浸入到群众的里面，去作一个酵素，使他们也同样的蒸发起

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来和帝国主义对抗，来和为帝国主义作爪牙的军阀、统治资产阶级、奸商及一切阻挠社会前进的对象来对抗，我们才可以见得到新世界开始的曙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原载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青年界》第二卷第一号

悼罗佩脱·孝脱义士

义士罗佩脱·孝脱！你是生长在美国，皮色言语血系，完全和我们中国人不同的美国市民。中国亡了，中国的四万万人民都做了亡国的被压迫者或奴隶，与你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中国不亡，或者竟强大起来，与你也是一点儿益处都没有的。然而你因为看不过军阀的纵火劫掠奸淫破坏，看不过强权者的侵入中国国土来屠杀劳苦群众与无辜的妇孺，所以竟为中国挺身作战，以一当千，而身殉了正义。

我们中国自己原是有一个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的。去年六月，阎冯复返中原，密谋再起，副司令似乎微露了一点做总司令的野心。于是总司令就将向中国四万万贫苦的群众身上榨取剥削来的金钱二千六百三十余万，由中国汇出，贿赂日本的陆军当局，于八月中旬在上海划付，由东京的南某收受，去私自在陆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司令部里边平均分配。交换条件，是务须于最短期间内，将张胡子数十年中所积贮在那里的军械火药，烧炸一个精光，结果就发生了九一八暴军入占北大营的事情。

我们中国自己原是有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今年一月二十七日，日本军阀因满蒙的无抵抗，既各得了贿赂，又建立了功名，就来威胁上海，提出最后通牒。主要题目是要求总司令杀尽中国的爱国群众，封闭一切中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处所，让出自吴淞至真如西三十里以及龙华一带的地盘来作日本租界。二十八日，总司令的命令来，是日本的要求件件答应，但有一个交换条件，是请日本军快点来盘据闸北，建设租界。（在这事情之先，上海有一家T.U.S.与C.K.S.的地产公司出现，于去年十二月中，几乎把宝山县地皮一直买到了松江。）总司令威震中国，令出必行，要旧日防守在上海一带的中国驻军，全部退出，午后六点，已有监视缴械的大军开到了苏州、枫泾的两处。革命的士兵，感到了前后被夹攻的危险，觉得死在自己同胞的阴谋之中还不如死在日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于是乎就有了自二十八日夜起到今日止的上海附近的孤军血战。

义士罗佩脱·孝脱！我们中国全国有军队三百余万，开来援沪的军队．半月以前只听见了一次张发奎的旧部到了湖南的株州，但是以后就忽而不听见了，说是不容易假道，仍复是被阻在那里。还有一月以前，广东的航空队早已出发来援沪了，可是到今日为止，我们被包围在上海的三百万市民，却终于没有见到过一只中国的战斗飞机。只在五月以前，日本机飞到了杭州，听说在笕桥一带炸毁了许多中国的战机，是深藏隐伏在那里作教练之用的。

义士罗佩脱·孝脱！这些总司令、副司令等，都是我们中国的同胞，而你却是与我们皮色言语血系各异的美国的市民。

义士罗佩脱·孝脱！我在这里的吊你哭你，也不过是亡国之

民的一种表现，只不过想空学学耶利米的哀歌而已。更进一步来说，则我简直比亡国之民，还更怯弱万倍。因为宣判那不知是何处马骨的所谓日皇的死刑，而毅然决然竟独自去执行的，却是一位已亡了国而正在计划重新建设的大韩民国的壮男儿。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

原载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文化通讯》第一卷第一期

“天 凉 好 个 秋”

全先生的朋友说：中国是没有救药的了，但中国是有救药得很。季陶先生说：念佛拜忏，可以救国。介石先生说：长期抵抗，可以救国。行边会议的诸先生说：九国公约，国际联盟，可以救国。汉卿先生说：不抵抗，枕戈待旦，可以救国。血魂团说：炸弹可以救国。青年党说：法雪斯蒂可以救国。这才叫，戏法人人会变，只有巧妙不同。中国是大有救药在哩，说什么没有救药？

九一八纪念，只许沉默五分钟，不许民众集团集会结社。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却又来得太多，多得如天主教日历上的殉教圣贤节一样，将来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中国若依旧不亡，那说不定，一天会有十七八个国耻纪念。长此下去，中国的国民，怕只能成为哑国民了，因为五分钟五分钟的沉默起来，却也十分可观。

韩刘打仗，通电上都有理由，却使我不得不想起在乡下春联

摊上，为过旧历年者所老写的一副对来，叫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有理。你过你新年，我过我新年，各自新年。”

百姓想做官僚军阀，官僚军阀想做皇帝，做了皇帝更想成仙。秦始皇对方士说:“世间有没有不死之药的?若有的话，那我就吃得死了都也甘心，务必为朕去采办到来!”只有没出息的文人说:“愿作鸳鸯不羡仙”。

吴佩孚将军谈仁义，郑××对李顿爵士也大谈其王道，可惜日本的参谋本部陆军省和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不是孔孟的弟子。

故宫的国宝，都已把外国的收藏家收藏去了，这也是当局者很好的一个想头。因为要看的时候，中国人是仍旧可以跑上外国去看的。一个穷学生，半夜去打开当铺的门来，问当铺里现在是几点钟了?因为他那个表，是当铺里为他收藏在那里的，不就是这个意思么?

伦敦的庚款保管购办委员会，因为东三省已被日人占去，筑路的事情搁起，铁路材料可以不必再买了，正在对余下来的钱，想不出办法来。而北平的小学教员，各地的教育经费，又在各闹饥荒。我想，若中国连本部的十八省，也送给了日人的话，岂不更好?因为庚款的余资，更可以有余，而一般的教育，却完全可以不管。

节制生育，是新马儿萨斯主义，中国军阀的济南保定等处的

屠杀，中部支那的“剿匪”，以及山东等处的内战，当是新新马儿萨斯主义。甚矣哉，优生学之无用也。因为近来有人在说：“节产不对，择产为宜”，我故而想到了这一层。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想再写了，来抄一首辛稼轩的《丑奴儿》词，权作尾声：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彊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一九三二年九月末日

原载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六日《论语》第三期

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死是全部的全物必须经过的最后的一重门，但我们人类——尤其是中国人——仿佛对死这一件事情，来得特别的怕，因而在新年里，在喜庆场等地方，大家都不敢提到这一个字，以为不吉。其实我们人类是时时刻刻，日日年年，在那里死下去的，今日之我，并非昨日之我，一刻前之我，当然不是现在的一刻之我了。死，怕它干吗？照英国裴孔（一五六一——一六二六）说来，人对死的恐怖，是因见了临终的难过，朋友的悲啼，丧葬的行列，与夫死相的难看等而增加，正如小孩的恐惧黑暗，会因听了大人的传说而增加一样。伟大善良，有作为的人，是不怕死的。裴孔在他那篇论死的文章里，并且还引了许多赛乃喀、该撒、在诺的话在那里，教人不要怕死，教人须做好人，做事业，热心于令名的流传。但我想写这一篇论文的裴孔自身，当伤了风，睡在他朋友家里的冷床之上，到了将死的时候，一定也在那里后悔的，后悔着不该去做那一回冰肉的试验，致受了寒。哲人中间，话虽说得很透辟，年纪虽也活得相当的高，但对于死的恐

怖，仍旧是避免不脱，到后来仍要去迷信鬼神的，很多很多。尤其年老的人，怕死更加怕得厉害，这只须读一读高尔基做的托尔斯泰的印象记，就可以晓得这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对死是如何的恐怖了。

厌世哲学家爱杜华特·丰·哈尔脱曼，从科学的生物学的研究，而说到了人的不得不死。教人时时刻刻记住，生是偶然，而细胞的崩溃，与肉体的死去，却是千真万确，没有例外的。在这教训里，当然是可以使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并不是在说，人横竖是要死的，还不是猫猫虎虎地过去一辈子就算了。反之，因感到了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故，加紧速力去用功做事业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原是死对人类的一种积极的贡献。再退一步说，假使中国的各要人，都能想到最后是必有一个死在那里等他的话，那从我们四万万穷苦同胞身上所绞榨去的一百三十万万的公债，及不知几千万万的租税等，都不会变成私人的户头，存到外国银行里去了。人是总有一死的，要昧尽天良，搜括这么许多钱干吗？这岂不是死之一念，对人类的消极的贡献？可惜中国人只在怕死，而没有想到死的必不能避免。厌世哲学，从这一方面看来，我倒觉得在中国还有大来提倡的必要。从厌世哲学里，必然要演绎出来的结论，是自杀。善哉，叔本华之言，“自杀何罪？”人之所以比上帝厉害的地方，就在上帝要想自杀，也死不成功（因为神是永生的），而人却可以以他自己的意志，来解决自己的生命。既然入世是苦，生存是空的时候，那自杀也不过是空中之空罢了，罪于何有？吃白食的宣教师们说自杀是罪恶，全系空谈，不通的立法者们，把自杀列入刑条，欲对自杀者加以重刑，尤其是滑稽得可笑。一个对死都没有恐惧的人，对于刑律的威

胁，还有一点什么恐惧呢？

不过自杀既不是罪恶，而人生总不免一死的话，那直接了当，还不如大家去自杀去罢，倒可以免得许多麻烦。厌世哲学的真义，是不是在这里？这我想不但哈尔脱曼没有说过，就是厌世哲学的老祖宗叔本华也不在那么想的。否则象猴子似的这一位丑奴儿，何必要著他的《想象与观念的世界》，何必要见英国诗人贝郎而吃醋，何必要和他娘去为争财产而涉讼，何必要和一个同居的女裁缝师去打架呢？人之自杀，盖出于不得已也，必定要精神上的苦痛，能胜过死的时候的肉体上的苦痛的时候，才干得了的事情。若同吃茶喝酒一样，自杀是那么便利快乐的话，那受了重重压迫的中国民众，早就个个都去自杀了，谁还愿意去完粮纳税，为几个军阀要人做牛马呢？

快乐的自杀，有是一定有的，猜想起来，大约情死这一件事情，是比较其他的死来得快乐一点。"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还不算情死，绿珠、关盼盼、柳如是等，也算不得情死，至于黄慧如、马振华等，更不是情死了。快乐的情死，由我看来，在想象中出现的，只能算《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这从肉体的方面着想，大约一定是同喝酒醉杀，跳舞跳杀是一样的结果。其次在史实上出现，而死的时候，男女两人又各感到精神上的快乐的，大约总要算德国的薄命诗人亨利·克拉衣斯脱（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和福艾儿夫人亨利爱戴（Frau Henriette Vogel）的情死了。当这快乐的耶稣圣诞节前，且向大家先告个罪儿，让我来把这一出悲壮的大戏剧的结末，详细说一说，权当作这一篇短文的煞尾罢！

克拉衣斯脱不幸，生作了和会向拿破仑低头，会对伐以玛公

喀儿·奥古斯脱献媚而做大官的大诗人歌德并世的人。因而潦倒一生，弄得饘粥不全，声名狼藉，倒还是小事，到了一八一一年的时候，他的忧伤郁闷，竟使他对人类对世界的希望完全断绝，成了一个为忧郁症所压倒的病人。正在这前后，他因他朋友亚·弥勒（A.Mueller）的介绍，认识了福艾儿夫人亨利爱戴。她的忧伤郁闷，多病多愁，却正好和克拉衣斯脱并驾齐驱。两人之间，就因互爱音乐的结果，而成了莫逆的挚交。有一天克拉衣斯脱听了她的歌唱之后，觉得这高尚的颂赞歌诗，唱得分外的美丽，他就兴奋着对她说："多么美丽吓！这是最适合于自杀的时候的。"当时她还不说什么，只默默地对他凝视了一回。后来她又问起他说："前回的戏言，你记不记得起了？我若要求你将我杀死的时候，你能不食言否？""我克拉衣斯脱是一诺千金的男子汉，那会食言！"于是一八一一年十一月二十的午后，两个人就快快活活的坐车出了柏林，到了去朴此达姆有三五里远的万岁湖滨(Wansee)。在旅舍里高高兴兴的过了一夜，第二日并且还打发人送信到了城里。便在这翌日的午后，两个人散步到了湖滨的洼处，拍拍的两声，他们的多愁多病的躯壳，就此解脱了。城里的朋友们接到了他们两人合写的很快乐的报告最后消息的信后，急急赶来，他们俩的不幸的灵魂，早就飞到了天国里去了。福艾儿夫人是向天躺着，一弹系从左胸部衣服解开之后穿入，从左肩后穿出的，两只纤手还好好地叠着搁在胸前。克拉衣斯脱是跪在亨利爱戴的面前，一弹系从嘴里打进脑里穿出的。两人的红白相间的面上，笑容都还在那里荡漾着哩！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二日

原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说食色与欲

食色性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朱门酒肉朽，野有饿死骨”，所以要有阶级斗争。一边是“后宫佳丽三千人”，“尽日君王看不足”，一边是“石壕村里夫妻别”，“夫戍萧关妾在吴”，所以要革命。然而食色两欲，因为是基本的欲望，满足满足是非常容易的。任你是一个怎样的大食家，只教有斗酒只鸡，三碗白饭，一个大饼，总也可以打得倒了。吃饱之后，就是何曾请客，再也吃不下去的。至于色字，我想无论怎样的精力家，最多十个女人也就可以对付了罢，经历过十个女人之后，就是西施太真，再也挑不起性欲来了。所以原始的基本欲望，是容易发付的；最难对付的，却是超出乎必要之外，有长无已，终而至于非变成病态不可的那一个抽象的欲字。哲学家或名之曰欲念，中国的旧套文章里所说的欲壑，就是这个东西。

照西洋哲学家说来，这一个欲字，是进化的主动力，因为有欲，大家才去做工，发明，贮蓄……然后才有社会，进化，文明……。这原也不错，从欲念的好的方面说来，当然是如此的。可

是在中国，这好的方面的欲念，反不见发达，而在作长足的进步的，却偏是这欲念所催生的坏的一方面的事实。中国人因为有欲，所以要去刮地皮，卖官爵，争地盘，×××，弄到后来，变得目的意识也完全忘了，甚而至于倒认手段就是目的。《儒林外史》里的一位吝啬者，到死时不肯断气，只在顾惜油灯里的两根灯草，决不是想象，却是中国社会里常有的事情。正唯其是如此，所以老子要劝人知足，佛家要苦说涅槃，叔本华要绝灭意欲，而罗素在说所有欲的务宜抑制，创造欲的必使增加，才是消灭战争的根本大法。哲人之教，诚然不错，但中国可惜是进化得太早了。

当欧洲产业革命未起来之先，中国在数千年前，就饱满了这些知足无为的大训，所以正应该激励欲念的生长，催发物质的进步的时代，中国倒落得个逍遥自在。及到十九世纪以后，西洋物质文明的绚烂华富，流入了中国，中国人之久苦于无为知足的干枯寂寞者，就一跃而从这极端跳到了那极端。于是江河日下，洪水滔天，我们中国人就成了一个创造由他们（西洋人）去创造，享乐且由我们来享乐的民族。斯般格拉正在愁虑到西洋文化没落的年头，中国要人恰好是穿四十两银子一双的丝袜，开五十两银子一瓶的香槟酒的日子。霹雳一声，日本和其他各帝国主义的军队，堂堂开入了中国，穷苦老百姓，非但食色都无，连一条性命都保持不了了。忧国之士，才议论纷纭，思想起何以彼之能强，我之能弱来。于是守旧者，就说物质文明害了中国，急进者就说先知先觉，先圣先贤，便是造成现代中国积弱的罪魁。两方都说得有理，可是两方似乎都还没有说得全对。

总之，第一是“时机”的问题：中国正因进化得太早，便成了落后得太迟，当应当提倡物质文明的时代，只提倡了些幽灵似的精

神文明。第二是“取舍”的问题：西洋物质文明，同时候侵蚀到了东方，而日本却取了它的好的一方面，中国只取了它的坏的一方面，譬如是一个胡桃，日本人取了它的肉，而中国人却只取了它的壳。

物质文明有什么罪呢？欲念又有什么罪呢？

原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寒 冬 小 品

——节季气候及迷信

《田家五行》，是一册江浙乡下农民的宝典，关于冬季的气候及迷信之类若干条，抄在下面。

十二月下雪，主来年丰稔。初三日雨，主久阴，冬春难得晴。冬至后逢第三戌为腊（按今年冬至是废历十一月廿五，第三戌为十二月廿六），腊前后三两番雪，谓之腊前三白，宜菜麦。谚云：若要麦，见三白。又云：腊雪是被，春雪是鬼。又云：一月见三白，田翁笑赫赫。霁而不消，名曰雪待伴，主再有雪。交腊后东南风多，主来年水大，岁朝如未立春，亦照此占。

十二月十二日，是蚕的生日，嘉湖各地，于此日祀神。

二十四日，谓之小年，吴中人家，必祀灶神，相传谓系辞灶之意。除夜宜安静，记云：除夜犬不吠，明年无疫疠。风俗相传，其夜有行瘟使者，降疫于人间，故宜以黄纸书"天行已过，使者须知"，揭于门额。

十二月谓之大禁月，有一日稍暖，即是大寒之候，谚云：一日赤膊，三日龌龊。

冬至后九九气候谚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筚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一云锥刀不入土，又云穷汉街头舞）。六九五十四，贫儿方得志（一云篱笆出嫩枝）。七九六十三，布衫担头担。八九七十二（读如腻），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

从冬至起，计算节季气候，似乎是东方天文家的习惯。中国则说冬至百六是清明，日本则说二百十日及二百二十日，定有暴风。元朝征倭，全军覆没，盖适逢着了这二百十日与二百二十的飓风之故。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原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梦想的中国　梦想的个人生活

我只想中国人个个都不要钱，而只把他们的全部精力用到发明，生产，互助，与有意义的牺牲上去。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至于无可奈何的特殊天才，也必须使它能成为公共的享有物，而不致于对大众没有裨益。譬如天生的声学家，可以以他的歌唱，天生的画家，以他的美的制作，天生的美人，以他或她的美貌，等等，来公诸大众，而不致于孤负他或她们的天才。至于这一个乌托邦的如何产生，如何组织，如何使它一定能于最短时期内实现，则问题又加大了，这一个短篇幅里说不胜说，而在这漫长的冬夜里，也有点不敢说。

因目下的社会状态压迫我的结果，我只想成一个古代的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因为仙人是可以不受到实际生活的压迫的。这当然是不能实现的梦想，来问中提出了这话，我落得大着胆，偷着懒，作这一个答复。

原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新年的梦想”栏

山　海　关

小的时候，所知道的山海关这一个名字，是在社戏场里得来的智识。一面大纛旗，中间写着一个吴字，遮在一位英风烈烈的须生的背后；还有许多跑龙套的，穿盔甲的，驰骋在他的前面。这一位白面须生的大帅，拿的是银枪，穿的是白盔白甲，唱两句戏，就是一阵锣鼓，戏台上热闹得异常，我们在台下的小孩子们也喜欢得无底，于是便拍着手连喊着："好戏，好戏！"

后来长大了，读到了吴梅村的《圆圆曲》，看到了清朝的开国史，又于去北戴河的时候，遥望此关，胸中真有无限的感慨；但是小时候在戏台上所见的那位威风凛凛的将军的状貌，却总在脑子里和山海关的三个字联结在一起。

"炮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我们小百姓同王小二似的小心翼翼地过了年，正在祷祝着政府不要再加租税，外国人不要再打进来的一月三日，忽而在报上又见了一张照相。这照相上的相貌倒也象是一个人，一双鼠目，满含着淫猥的劣意，鼻下的一簇小胡子，似乎在证明他的血统，象是大和民族的小浪人的落胤，

可惜这照相只登了半截，所以心肺究竟是狼是狗却看不出来。照相的上面第一段，也登着很大很大的日军侵入山海关，此人应该负责的一行大字，可是背后的一面大纛旗却不见了。

“春风昨夜到榆关！”卢弼的这一句话，倒成了千百年前的《烧饼歌》，报纸的记载里，果然说日军进关，中国兵后退，平津戒严，“故国烟花一夜残”了。

山海关是河北临榆县之所辖，系属于中国本部十八省的地域，日本人是宽宏量大，对中国决没有领土的野心的，——这是日本人的宣言——可是中国人却比日本人更是宽宏量大，对自己的领土，更没有野心，所以日本人大约也是迫不得已，只好进关来替中国人来代行管理管理。

昨天我们几个敢怒不敢言的穷小子，还在私议，说中国目下的现状，正和明末清初的时候一样，有南朝的天子，也有北地的吴王，还有洪承畴、钱牧斋，还有马士英、阮大铖，还有一班在议避讳，上尊号的读书人，色色俱全，样样都有，但只缺少了几个崇祯帝、史可法、瞿式耜之类的呆人。

现在山海关一开，这一出“明清之际”的活剧，越演越象，越演越来得起劲了，但我们这些在台下看戏的人，都因为上了年纪，有了一点智识，非但叫好不敢再叫一声，就是拍手也不敢再拍一下；战战兢兢，大家只在台下预备着一副眼泪，好于大难来时也上台去演一出“哭庙”的悲剧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申江日报·海潮》

营救郑毓秀博士的提议

监察院委员高友唐于弹劾郑毓秀一文(见一月十三日《申报》)中，举发郑毓秀贪污舞弊，证据确凿。论此事之是非，不但久成上海律师公会之谈话材料，就是上海居民大概也都如瞎子吃馄饨肚里有数吧，不必我们来批评。该弹劾原文中的账目之类，暂且按下不录，现在且先抄一段弹章的末尾下来再说：

“……以上所列三款，实犯《刑法》三百五十七条，一百七十五条之罪，按之《刑法》一百四十条，应加重本刑三分之一，无可曲宥。伏查郑毓秀自卸任后，在沪充当律师，对于词讼案件，一手包办，为所欲为，始则以白为黑，继竟无中生有，民事不能拘押，则以假扣押恐吓之，刑事不问虚实，但有控告，则以拘押恐吓之，均为诈财或胁迫和解之工具，其所诈之财，闻已在数百——不知是否千字之误，待考——万元。推检中虽不乏自好之士，稍持正谊，即立予左迁。其无气节者，无不俯首听命，受其指挥，法院一时有‘博士电话到，推检吓一跳’之谣，乃纪实也。数年以来，上海人民，

因受郑毓秀恶势力所摧残，倾家荡产者若而人，负屈自杀者若而人，社会之道德陵夷，法院之人格扫地，皆郑毓秀杨肇煐等所酿成。祇以贿赂虽行，证据难获，人民受其害而无法告诉，以至郑杨等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兹幸天夺其魄，被友唐于当事人存款簿内，发现重大侵占，又于其交代册中，发现湮灭证据及侵占，讵能再事姑容。况上海为外交视线所集之地，现值收回法权之际，若不严加纠弹，则外人必有所藉口，影响于收回法权者甚巨。谨依弹劾法第二条，检齐当事人存款簿五本，交代册三本，提出弹劾。请政府破除情面，迅将前上海地方特区法院院长杨肇煐，前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郑毓秀，……，……等，一并移转杭州地方法院，从重治罪，并追缴侵占各款，以儆奸贪，而平众怒。为国家整纲纪，为法界挽声誉，胥在于斯……”

记得前几个月，山东江苏，各有几个贪了七八百元赃的知事枪毙了，最近在广东，也有几个调查日货委员会的委员，为受了几百元的贿被枪决了。知法犯法，自然应该罪加一等。自民国成立以来，二十年间，为受了几百元的贿的缘故，被枪决的知事小官，不知曾有了几十百个。这一回郑博士的犯罪，政府若真的“破除情面”，执起法来，审定有罪，那一定是个死罪，因为死罪是最大的刑罚，若有比死罪再大一点的刑罚的话，那或许会再加一等，也未可知。不过这是上下平等，法治精神贯彻到底的国家，才办得了的事情，在中国则大有商量的余地。我现在因为要营救被告贪赃枉法的郑博士、杨院长等，特郑重提出两条办法如下：

第一，行政会议开一个会，同发封北新的事情一样，马上下

一个"应毋庸议"行政命令，来取消法律的起诉。不然——

第二，请王宠惠、魏道明两博士，组织一调查团，如李顿爵士之调查满洲一样，先来调查事实，然后再据法理来研究应否得罪之类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三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论语》第十期

炉边独语

一

言论自由，在中国还谈不到。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中国民众以革命的大牺牲所要求之民权，至今尚未实现，实为最可痛心之事。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纪载，几为报章所习见；甚至青年男女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这样看来则欧洲中世在黑暗时代所给与百姓的人身享有权（Habeas Carpus），在中国还依然仍旧没有获得。三四千年前周厉王秦始皇当国的时候是如此，三四千年后革命成功的现在也还是如此。试问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都还不能保有安全，那还有什么言论不言论呢？没有言论的人，是可以存在的，但世上是否可以有一种没有身体的人的？

英国小说家康泊东·麦干萚，最近因为写了一篇回忆录，漏泄了大战中当他在希腊英国情报部服务时候的秘密，被罚了两千元。这事情幸亏是发生在自由主义摇篮地的英国，所以C.M的首级保住了，假使是在中国的话，大家试想想，结果将变成怎么

的一个样子？萧伯纳倚老卖老，说英国可以放弃印度，结果也只受了一次殖民地总督的警告，试想想这事情若发生在中国，则又将闹成怎样的结局。

所以我感在目下的中国，要主张争取言论自由，还是主张者的一种奢侈。

二

王薇子先生，以陈紫荷画的《秋风马背图》索题，两三月来，不曾缴卷，现在偶尔翻阅日记，见到了这一件事情，就想出了四句歪诗：

一幅青春失意图，残山剩水认模糊，秋风马背仙霞岭，载得船娘九姓无？

因为他当时正从福建失意回来，所以便想到了宝竹坡的江山船，这事情是从《李莼客日记》里看来的。

三

偶然翻开王仲瞿《烟霞万古楼集》，看见了一首他示三岁儿子善才的诗，觉得有趣之至，抄在下面。

善才生二十五月矣，计识得二百五十余字，示以诗云：

阿爷四岁识千字，一一形书晓其义，儿今三岁字二百，他日为文定奇特。人间识字天上嗤，阿爷自误还误儿，儿莫学阿爷！知书娘道好，至今饿死无人保，夷齐庙里要香烟，谁捧藜羹到门祷？阿爷配食两庑去，赖尔门庭来洒扫。秦皇烧书

黑如炭，豫让吞之不当饭，鱼盐作相盗作将，天下功名在屠贩。儿不闻，仓颉作字鬼神哭，从此文人食无粟。又不闻，轩辕黄帝不用一字丁，风后力牧为公卿。

王仲瞿奇才不遇，诗象是太史公的文章。曾在杭州武林门外两马塍之间和夫人金秋红结王庵以偕隐，现在已经没有人晓得这王庵的遗址了。友人陈紫荷为他撰过年谱，但因材料不多，中途废止。每谈到“江东余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之句，还是慷慨激昂，说总有一天要把这王仲瞿的年谱编成。

四

悲哀之词易工，也是自然之势。因为人的感情，快活的时候，是弛放的，悲哀的时候，是紧张的。子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悲哀的感染，比快乐当然更来得速而且切。李后主亡国之后的词，简直是一字一泪，无论何人读了，也不得不为他肠断，比起前期“花明月暗笼轻雾”来，自然是“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好得多了。还有欣赏文学的心境，中国人与外国人似乎稍微有点不同。外国人就文论文，似乎以倾向于艺术至上主义者为多。譬如英国人读贝伦、奢来之诗，对于诗人们的乱伦悖德的私行，完全置之度外。还有维农的强盗杀人，蓝鲍的色情倒错，在法国都不妨碍他们的大诗人的声誉。而中国人则当读到文天祥、岳武穆的诗歌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却是这些作者的人格的背景。从这一方面说来，又是悲剧比喜剧更容易成功的一个秘诀。严分宜、阮大铖，诗并非不佳，然而没有人去读，就因为他们的人格卑污，不能构成悲壮美的背景的缘故。

原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

日本的政治舞台，本来就是武人角逐的斗兽场。明治维新以前，在专政的所谓幕府将军，所谓摄政关白，那一个不是凶暴的军阀？二千五百年来，除了神功皇后，圣德太子等几个杰出的人才，利用了皇位，稍有建白以外，日本人每在举以夸世的万世一系的皇族，在政治上何尝有过一点威力？一世纪前，黑船骤至，红毛碧眼儿的铁炮，惊破了矮人们的迷梦，于是乎尊皇攘夷，大政奉还的统一局面，方始成功了。

维新以后，愚昧的军阀，胁于全国的潮流，逼于世界的趋势，又受了坚忍的文治派的启发，不敢再为戎首，来破坏这个曾经过不少的流血和牺牲，惨澹经营，艰难造就的宪政。七十年间，这蕞尔的岛国，所以能够称霸于东洋，逞凶于世界者，都是法治精神之所赐也。

到了现在，议会政治也疲敝了，由贫富的悬绝而来的不安也扩大了，又加以世界新潮流的激刺，与政治中枢人物的无能，藏牙隐爪，久思蠢动的武人们，自然要乘此良机，起来篡夺政治了

啦。暗杀的横行，国本社的活动，共产党的检举，南满洲的出兵，哪一件不是武人篡夺政治的证据？日本是在十字路上了，是在将从法治转向武治去的前夜了，这不但我们旁观者看得很清，就是日本本国的老政治家尾崎行雄，也在伦敦声明过武人的将行专政，日本国运的将次告终。

我虽不是预言家，但我相信日本在十年之内一定会起绝大的变动。先是军阀的横行，法律秩序的全灭，后来就是被压迫的大众的奋起，日本国体政体的改造。我们且等着罢！血样的红光，定会从这日出之国里照射到全世界来！

原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非法与非非法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北平成立了分会，为营救许多因抗日及反帝而被捕的学生之类，曾费了不少的气力。北平市党部，因而有诬为非法团体的建议。

法，种类似乎很多很多。上海附近常有人出卖富阳法，中国全国又有人人会变的戏法，《三娘教子》里头还有一根打小孩的竹棒叫作家法，这些法，倒是我们所习见的东西。至于法治精神的法，立法司法的法，我们却只在各种委员的名称上，衙门的招牌上，以及报纸的命令上看见过。真正的法律的化身，正义的公判，是非的决断，在中国的社会上，政治上，好象是不大遇得到的样子。外国人画的法律的女神，是眼睛上包着一块布，手里头拿着一具天平称的。我想在中国若要画出这女神来，也可以全抄这幅外国的画，不过要再在她手里的秤盘之上，加上些枪杆子或用金子打成的法码之类就对。

最近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所竭力反对和援助的几件案件，是大家所晓得的：（一）镇江新闻记者刘煜生的被害事件，（二）

因反抗日帝国主义者来侵而被捕的学生工人事件，（三）为争政治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等的自由而遭拘禁的政治犯事件，等等。我们要决定该同盟的是非法或非非法，还须先问一问它所反对的事情是非法或非非法才对。

所以我们要问，刘煜生的被害是非法的不是？满洲国是不是我们大家应该承认拥护的合法组织？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上应不应该给予人民的？

中国到了目下这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大家应该醒醒了，尽躲在门角落里撒烂污，难道真的就不怕天明的曙光到来了么？

原载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一文一武的教训

中国在最近又接着了两位外国导师的教训，一位是文的，一位是武的。

文的，当然是那位油嘴老翁萧伯纳。他在北平对新闻记者说：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一切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在打着仗的。他又说，长城是无异于平常的矮墙了。

武的，就是新近攻进热河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大炮和飞机。这些大炮和飞机，也在笑着对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真客气，对自己的老百姓真太不客气。东三省一让几千几万里，现在这热河，等你们的战时公债弄到手，后援慰劳金收集起来之后，少不得又要退让的。长城一道，本来是筑以防外国的来侵的，现在却作了外国人的堡垒和界线，总算是中国人替外国人费力筑成的防御工事了。

一面想起在所谓国难期中的山东、四川、贵州的战争，真不得不令人佩服，佩服这两位外国导师的教训的确切。末了，我只

好来抄两句改两句旧诗，以表彰我大中华民族的进步。

改《诗经》：兄弟阋于墙，外迎其侮。

抄人嘲李鸿章翁同和诗：宰相合肥天下瘦，军机常熟庶民荒。

改昔人咏长城诗：秦筑长城比铁牢，当时城此岂知劳，可怜一月初三夜，白送他人作战壕。

原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谣言预言之类的诞生

谣言、预言等辈的养育处，第一就须在大家贪懒不做正经事情的地方。中国的谣言、预言，所以特多的原因，就因为中国的全部国民都是闲惰不做正经事情的缘故。从在上据高位者起，一直到都市乡村的游民乞丐为止，中国何尝有一个正经在拚命做事的人？谣言、预言的发生时期，总在大乱初平，或变乱继起之后；而酿成这些谣言、预言的重大酵素，当然是在当局者的专制压迫，与一般已被愚民政策驯服了的百姓的无智。

中国每当一次战争或大灾之后，总会有许多离奇不可思议的谣言与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预言印刷品出来。在危急多难之秋，谣言的发生，原是不得已的事情，一传两，两传三，先说是西京造反，后来就会变青菜冷饭，从一个字，变成十个字，或竟变成一件有头有尾的故事，也很容易。俄国郭果里的《巡按》，爱尔兰郭莱傲里夫人的《谣言的传布》两剧，就是这一面的传神实写。这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在国民智识发达，社会根基巩固，统治者不是乱杀人乱压迫的地方，这种现象，究竟少些。至于预言呢，

那更足以证明统治者的压迫言论的坏影响了。有识者早见到了社会破绽，但不敢明言直说，所以只好托之神意天启，造成幻妙的预言，以广流传，不是某处某地掘了一块碑，便是某村某镇出了一个怪。预言制造者，更以能利用国民弱点，了解刺激心理的人居大多数，是以预言的内容，总侧重在易朝换姓，人民大量死亡的各种事情之上。这倾向，从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诸观点研究起来，原可以成一部象The Golden Bough一样的大著的东西，在此地，我只好简单地说，中国的预言之由来，所受的是道教的影响，其源出于河图洛书，降至近世，则统治者的压迫，国民的懒惰与无智，就是造成这些无稽之谈的炉灶。

在最近半个月中的情形之下，我倒很想起了两件事情：第一，杨树浦、闸北的橡胶厂爆炸，据说因为铁锅是日本货。但不知在爆炸之先，有没有人看见日本人进去放炸药。第二，长城倒，热河崩，不晓得有没有刘伯温的碑出来。

原载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说宣传文字

文字的宣传，在中国一向就把它的效力看得很大。读檄可以愈头风，传檄可以定江南，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者便是文武的全材，笔尖儿一扫，更能够扫去五千人。到了现代，这文字宣传的用途，尤其广了，专卖日货的店门上会贴起誓不买卖仇货的传单，在撕揭广告纸做衣服的乞儿身上，也挂起了航空救国的大字，并且在不久之前，热河曾打了许多次的胜仗，当"九一八"以后，义勇军杀敌，也不知杀死了几万。

几日来局面变了，报纸上连缩短阵线，诱敌深入等文字都觉得陈腐了，于是乎就变成了声明。一则曰：外间所传之直接交涉，并无其事；再则曰：日军若侵入长城以南，我军必誓死抵抗，责任应归日负。甚而至于远处在西南的粤省，也下了屯粮御侮的命令，上海的码头工人且发了迎汪救国的宣言。

这些原都是很好的宣传文字，大之可以镇压人心，小之也可以虚张声势。但声势虚张得太盛，落后也有变成不能自圆其说的危险；日本人有一句谚语，叫作"笛声彻天，踊者不前"，日文报

上每以这一句话来嘲笑我们，事实上我们却也着实有点被嘲的资格。可是我们的祖先，也有些远见，他们早就看到了这些由他们创造出来的文字宣传，将来一定要变成童叟无欺的空心招牌，所以又为我们留下了一句后脚，叫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我再在这里重言一句，好教日本军人不要太看轻了我们，只管杀进城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说文章的公式

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总不上轨道，乱跑野马，唯独文章一事，却每是规规矩矩，数千百年，如出一辙的。晋谢康乐评张华的文字说："张公虽复千篇，犹是一体耳"，这句话，到现在也还可以应用。小说作品中的三角五角恋爱，姑且不必去说起，就是军人的通电，第一总以"天祸中华，干戈迭起"为起讲，中间总以"庆父不诛，鲁难未已"为声讨，落后总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为誓约，末了总以"旧时袍泽，海内高贤"为证人。而文字的变化尤其是最少的，却是报上社会记事的文章，这些文章日日有，张张有，可是作者也不会得生腻，读者似乎也不觉得讨厌。让我先来抄一个公式：

某地某氏，花信年华，小家碧玉——或年届破瓜，丰姿绰约，或徐娘半老，丰韵犹存——与某处某生，一见倾心，结不解缘。始则陈仓暗度，继则栈道明修——或一度春风——竟而珠胎暗结，大腹便便。近且鹣鹣鲽鲽，我我卿卿，双宿双飞，俨如夫妇。

这几句文章，在那一则社会新闻里，都缺少她们不得，仿佛是菜里的鸡汤，味之素。至于诗词里的抄袭前人，论文里的生吞活剥呢，只教泡制得巧妙，倒还可以原谅，但在仅仅几百字的社会记事里的这一套十番响鼓，老在那里翻来复去，我可真不懂得作者读者两方面的所以会感到兴趣的心理。

原载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谈 健 忘

五分钟的热忱，是说中国人对于任何的奇耻大辱，在五分钟后便会忘记的，比到烂柯山的樵夫，虽则经过时间的长短有点不同，但都系健忘则一也。说起健忘，似乎也不一定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记得在德国文学家轶事里，也曾看到过一则：

> 戏剧作家兼文艺批评家勒辛Lessing氏，有一次在写作之余，出去散步，于途中遇见了一位送信的邮差。“有我的信没有？”勒辛问。“先生叫什么名字？”邮差反问。勒辛抓着头皮，想了半天，却终于想不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苦笑着说：“让我回家去问一问来。”

象这一种集中注意力之后的失心状态，似乎是各国人所通有的，不过中国人的健忘却来得更实际一点。譬如军阀的火并开始，互发通电的时候，两方各骂得狗血淋头，誓不俱生。但不久之后，又化干戈为玉帛，一刹那间便称兄道弟，情逾骨肉了；军阀们是如此，政客们也是如此。我们只教把旧报拿出来一翻，便可以看见许多这样的事实。国民革命军到上海的时候，宣传揭贴上

所要打倒的，尽是些北洋军阀。所画的是一个乌龟，身上挂着一个军阀的名字。易帜之后，却张三李四，都是同志了。有通缉明令的张宗昌被杀之后，政府还给以抚恤。替父报仇的某某，国家也予以特赦。五四运动起后，大家都主张着非孝，现在的宪法条文里，却又规定儿子有孝敬父母的义务来了。除去这些实利主义的健忘不谈之外，则一般的健忘，对于我们人类的益处，的确也是不少。

第一，最普通的事实，就是晚上有了不得了的急事，一宿之后，早晨起来见了太阳，就什么也冰消雾散，所急的事也觉得可以有出路了，这是任何人都常常在遭遇的经验。第二，生死的痛苦，是尽人皆知的，幸亏健康者会忘记死，所以才去经营事业，形成社会；女人产后，会忘记临盆的痛苦，所以又会去生第二第三的小孩，保存种族。现代英国散文家Rober Lynd所著的一篇《无知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Ignorance”里，也曾谈起过这些，我在这里却想把末一字易作Forgetfulness，叫作“健忘的快乐”。对这题目的最具体的证明，就是西太后于战败之后，将海军经费拿来营造的那座颐和园。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似乎只以长城为界，不再南侵了。我不知为了航空救国之故，特烦电影皇后等提倡娱乐救国而得来的许多爱国捐，会不会去庐山或西湖造起第二座颐和园。

原载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

资本帝国主义末期的法雪斯蒂狂犬们听着！你们平时自负着是执法的机械，日本天皇的顺民，社会治安的保障的，你们真的知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了？

小林多喜二氏，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即使你们因他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而目为非法，也尽可以按了你们国家现行的法律以判罪；于秘密中，黑暗里将他惨杀，以卑鄙恶劣的手段，禁止他的丧葬行列，禁止他的尸体解剖，禁止这被害事件的新闻记载，只仅仅以心脏麻痹四字了之，究竟是小林的心脏麻痹了呢，还是你们的心脏麻痹了？这简直是匪的行为，兽的行为，你们自在夸耀的世界一等强国的正义在那里，法治精神在那里？

你们平时老在扬言讥笑，笑中国是匪国，笑中国是不懂法治的劣等国家，以惨害大杉荣的全家老幼男女，及这一回的惨害小林事件看来，则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法治，究竟比中国政府及中国劣等军阀的行为优秀得多少？

象这一种行动，你们还要强辩说是合乎日本帝国国法的话，

那你们的帝国简直并不是在昭和治下的帝国，你们的国法也不是日本帝国的国法了，你们不是日本帝国的叛民是什么？你们自以为是统一的国家，但日本帝国之内又有了你们这一个警察帝国，昭和皇帝之外，又有了你们这些警察皇帝，长此下去，日本帝国还可以称作统一的国家的么？

你们出兵侵入满洲热河，出兵图吞上海的时候，唯一的口实，就说是为保持该地的治安，为保护该地侨民的生命财产；现在在你们帝都之下，尚且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对一为社会谋幸福而奋斗的日本国民，还要加以惨害，难道你们的保障治安的天职，就在这同疯犬似的乱咬乱杀么？

你们若想一洗这一个叛君称帝，蔑视法纪，扰乱治安的污点，第一警视总监就应该负责自决，切腹以谢你们的天皇及皇宗皇祖之灵。第二，凡与这一次谋害小林事件有关的刑事侦探警察等人，都应该按照预谋杀人的刑律，施以极刑，方能维持法纪。否则等将来你们日本的民众审判到来之时，一定还须加重和扩大对你们的刑罚。

一九三三年三月

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一期

说　妥　洽

英国约翰·毛莱（John Morley）的妥洽论，实际上是鞭挞时人的不妥洽论，而中国的对日不妥洽，实在却是最彻底的妥洽。一让，再让，三让，而东三省，而热河，而……这还不是妥洽是甚么？因看到了中外名实的相反，所以来说一说妥洽。庄子曰：名在实之宾也，大哉言乎，中国人的优根性，就在此矣。

却说妥洽之由来，因为如此这般，猫猫虎虎，个人就可以从中得利。某执政因妥洽而做了皇帝，某将军因妥洽而得了地盘，某先生因妥洽而巩固了自己的权位，借得他人的力量，成就自己的素愿，国家于我何有哉，百姓于我何有哉。这不是妥洽之功用又是什么？

在中国，并且非但人是最爱妥洽的，就是正直无私的神道，大抵也是爱妥洽的。小时候看到的社戏里的百寿图，那位短命鬼，居然会因一餐酒食之力而加添了寿数。人死了，只须上城隍庙里去多烧些纸帛，鬼也为贪了贿赂之故，会减轻它们加于死人的毒刑重罚。所以多行不义的中国红人，往往去修庙进香，压榨

穷苦阶级的洋场财阀，每又是好施乐善。慈善风行，罪障消灭，而小百姓乃愈来而愈苦，这又是中国的天道神明爱妥洽的反响。

这些原是大人先生们中间的妥洽，但在我们小百姓之间，却又不然了。穷人和穷人，每会因一钱之故，而相骂，而相打，而丧失了性命。穷乡僻壤的居民之爱打官司，喜因细事而械斗，暂且按下不说，就以上海街头而论，一日一夜，在细民的中间，偶因不相干的一句话，或一举动之故，而惹起的明争暗斗，叫骂杀伤，真不知有几十百起，结果倒便宜了巡捕房里的先生，弄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这又是不妥洽之害也。

如此说来，则我这短文的结论，自然是“由此观之，可以人而不妥洽乎”了。

原载一九三三年四月三日《申报·自由谈》

政权和民权

最近的报上，正在喧传着一位奔走南北的国民党老同志的谈话，说，政府已具绝大决心，准要把政权开放了。

政权开放，由我们这些绝对不曾尝过政权滋味的小百姓猜来，大约总不外乎是有饭大家吃，有官大家做的意思。以后天下太平，大家都有个前程，你也可以不必争，我也可以不必闹，雍雍穆穆，欢聚一堂。挂起国旗，套上皮带，诗人得预备去做个诗官，做小说的也少不得去做点稗官，听说北平的女子，且早已赶上了做女巡官，照这样子，大家做官，对外则共赴国难，对内则预备立宪——这四字在满清光绪年间也曾哄动过一时——蒸我髦士，縻尔好爵，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但仔细一想，我们有的是四万万同胞，任你把委员议员的数目，增加到无以复加，大约总也容不了四万万个鸟官。并且能者多劳，要人亲人，至少也得兼摄着十七八个显职，衙门是八字开的，宪法是纸上写的，叫化子扮作春官，一梦邯郸，后来的二百记大板，可真消受不了。所以寒酸惯了的我们这些穷骨头，还是

趁早来巩固巩固我们的民权，倒来得实在些。

我想政权既要开放，何以民权却偏要那么的封闭。一本《马氏文通》，居然可以做危害民国的证据，一篇诉穷的小说，竟也构得成一个新闻记者的死罪。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许多不吃羊肉，略带羊羶气的政治嫌疑犯，一次纪念先哲的集会，也得早去叩禀，必待核准，方好施行。诸如此类的事实，真很多很多，多得记不胜记，我想政权既要开放，民权又何必封闭得这么紧呢？

原载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说木铎少年

直率痛快的骂人，原是要有特权的人才能骂的。从前有一种皇恩钦赐的木铎老人，穿起黄袍，拿着板子，日日在农村或市镇上闲行，只教遇见有不孝的乡党子弟，他就可以仗了皇帝的势力，任意打你骂你，或竟拖你上就近的衙门里去处你以死罪。现在朝代换了，一批新的皇恩钦赐的木铎少年，却应天运而生，揭笔杆而起，来演起这把戏来了。

木铎少年，自然要比木铎老人强得多。老人们穿的那件有皇恩钦赐四字写着的黄麻外套，少年们当然不屑穿了，说不定他们还会和叛逆子弟一样地穿上一套摩登的洋服。这么一来，第一他们就可以避去为主公做忠实走狗的嫌疑，而装作光明正大得同武都头一样的一条英雄好汉。他们可以在金銮殿上放屁，可以在众人头上撒尿。但乡党的叛逆子弟若见了他们而捏一捏鼻，则他们就会忘记了自身的恶臭，而大声的骂你是鬼鬼祟祟，十足下流，不敢掀开鼻子和他们较量。

他们还能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向主公讽示以如何来处置叛

逆，说："某某，某某，不是那么被做了的么？你为什么不步此后尘呢？"他们更会借了光明正大的招牌，公然的来通风报信，说："某某就是某某的化名，住在什么地方。"

记得《左传》里有一段叫作蹇叔哭师。秦穆公不听蹇叔之谏而出师，蹇叔因自己的儿子也在一道，所以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吾收尔骨焉。"当时讲这一段书的塾师对我们说："蹇叔这老头儿真厉害，他在哭声里，就告诉了他的儿子以地理和战略了，这文章真写得多么婉曲！"我觉得现代的那些木铎少年们，却都有蹇叔那么的本领。

原载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说　春　游

春天的好处，在于人的不大想吃饭；春天的坏处，在于人的不大想做事。“终日昏昏醉梦间”，这便是春天的神致。醉了做梦，自然是不想吃饭，也不想做事情了，但是例外却也有，燔间乞食的齐人，就是可以破坏这定例的例外。总之春天不是读书天，春服既成，春情初动，踏青扫墓，还愿进香，倒似乎是春天的唯一的正经。李太白的春夜宴桃李园的一序，真正是能够把捉住春天的心理的大块文章，中国颓废诗人的哲学，在此短短一序里，也可以见一斑了。

但是李白也并不是一味出卖颓废的诗人，同时在他的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里，他也曾说明了他的可以颓废的原委。“方今内有夔龙皋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方，江海之人，高枕无事，则琴壶以宴友朋，啸歌以展霞月，吾党之职也……”回头来一看我们中国目下的现状，却是如何？但远火似乎终于烧不着近水，华北的烽烟，当然是与我们无关，所以沪杭路局，尽可以开游春的特别专车，电影皇后，也可以张永夜的舞

场清宴。

说到游，原并不是坏事。《礼记·月令篇》说："仲夏之月，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况且孔子北游，喟然而叹，迫二三子之各言其志。太史公游览名山大川，而文章以著。德国中世，子弟之修了修业年期者，必使之出游，以广见闻，所以于修业年限Lehrjahre之后，必有游历年限Wanderjahre的规定。象这一种游历，是有所得的远游，是点缀太平的人事，原也未可厚非。不过中国到了目下的这一个现状，饿骨满郊而烽烟遍地，有闲有产的阶级，该不该这么的浪费，倒还是一个问题。

虽然，游春可以不忘救国，救国也可以不忘游春，但这句话是真的么？

原载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声 东 击 西

中国战略上的名词，与安外攘内相对的，还有一个叫作声东击西。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的侵占，明明是在东北，而中国大军的去向，却偏不朝着这一方面走。尤其神出鬼没，使人难料的，是西南的防御计划。自东北打来，我想无论如何大的大炮，现在一炮，总也还打不到西南，但西南的边境，却已在筑起防御工事来了。

这一种声东击西的中国战略，不但在实地作战上用得着，就是在一般的宣言上也用得着。请看五一节市总工会《告工友书》里，先说要一致团结起来，打倒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接着就说中国生产落后，要克苦耐劳，加紧工作，使出品成本减轻；末了尤注重于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见五月一日《申报》本市新闻栏）的一段文章，就可以明白。

外国人在政战上商战上或实地作战上，用这一个战术的，原也不少，不过他们用得比中国巧妙，使人一眼看去，不容易看出所以然来。譬如日本明明有野心想併合察绥，掩占平津，积极地

在暗中策动，而日使有吉向记者之言，却说日本目下所取的态度，是静观主义，大致是对中国既不打仗，又不交涉的意思。奥国为意大利修理几万枪械，表面上似乎只是商业上的买卖契约，但实际却早被英法看穿，而提出了抗议，说是为保持欧洲的和平，实行各国的军缩，不得不取这强硬的态度。

用这声东击西的战略，原是中外一例的，可是中国人的用处，似乎只用在对内，而外国人的用此，却专在对外，不过有这一点不同而已。

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旭

说　冒　骗

翻阅五月四日的《申报》，看见广告栏里，有周佛海先生启事一则，说："佛海长男，年甫十龄，乃竟有不肖之徒，假借本人为长男结婚名义，印发喜柬。并于柬上注明'倘荷隆仪请投送镇江招商东巷九号'等语，显系假托名义，冀图敛财"云云。看了这一则启事，使我发生了两种感想，第一，是中国读书人的没有出路，而又不肯去走正当的革命途径；第二，是官场的婚丧庆吊的送厚礼的陋习。

这假托名义者，晓得去印喜柬，分发给相当与署名者有关的人，显然是读书人无疑。而被假冒者，又系是身膺党国重寄的现任官史，则独在官场中，能以这些婚丧之事敛一笔财的事情，也很明白。

说到中国的冒骗，花样实在真多不过。卖酱鸭的店名，有陆稿荐、真陆稿荐、老陆稿荐、真老陆稿荐等，还有印成"如再假冒，男盗女娼"的商标印纸来表白心迹的店家。浙江绍兴乡下脚夫之狡猾者，闻每有代一健旺活着的富翁，向各亲友去假报死信，

以祈骗一顿饭，和二百钱的谢礼的人，中国在冒骗上的发明的天才，实在是无奇不有，有时候每使人感到以这一种智慧，而只应用到冒骗上去，真是大才小用，可惜得很。

但中国的冒骗假造，目的也有不专在敛钱上面的。记得当安福系专政的时候，某总长为安插私人之故而大裁了一批部员。事情过后，某总长适逢着整十的生辰，正在华堂开筵，接受贺客的当中，棺材店里，忽而送来了一具白木的棺材，说这是今天府上差人来定做的，当然是被裁属吏们的把戏。还有某甲因恨某乙之故，居然去替他登了一个报，说某乙欲聘请几位五十元一月的书记，应征者须于每日早晨五点钟来某乙家面谈云云，结果弄得某乙寝食不安，无暇分辩。这些当然又是假冒的花样新翻，以期捣乱的恶作剧。

然而不管怎样，照中国近来的假作荐函以干事者之众多，和冒骗者的花样的新奇等事实看来，则目下一般读书人的绝无出路的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铁案。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论语》第十七期

自力与他力

佛徒参禅，似乎有自力启悟和他力助成的两种，而现在中国流行的，却全是一种他力宗的思想。某院长的求神拜佛，希望菩萨来救中国，是大家周知的事实，可以不必提起，就是某委员的静待日本自毙的五年计划，也是他力宗的禅心的显露，最近则某部长又自外国传来好音，说敌若袭平津，美国必出来干涉，我们且诱敌深入罢！凡此种种，都是中国人的他力主义的乐天思想，说得好听一点，是“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说得彻底一点，是勤吃懒做，乐祸幸灾，借刀杀人，无为而治的取巧心理。

但是天理虽有必然，而人事却不能一定。俄国小说里，有一位棺材业者，看准了他邻人的一位重病富翁的必死，便私下忖度了他的尺寸，制就了一口棺材，待售重价。可是那位富翁却因病重而去试转地疗养的结果，竟死在外国温泉地方了。我们恨俄国的出卖中东路，恨俄国的不来代我们打日本人的愤怒，岂不同这位棺材匠的愤怒是一个样子？

从前，衮衮诸公，还有一个国际联盟的后盾在那里，所以敌

人批我左颊，我更向以右颊，说是遵守联盟规约的君子之国，礼仪应该如此。现在再失热河，三让多伦，大约是到了褪下裤子来请敌人打屁股的地步了，若再诱敌深入，决定放弃平津而待美国的来援，正和吃了砒霜药老虎的计策一样，君子虽然是君子到了极点，但是死君子在活小人的面前，究竟有点什么意义呢？

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著书与教书

著书者与教书者，所走的，虽然都是关于书的一条路，但这两种职业，却是绝对相克的事实，是一般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所不能了解的。大家总只以为教教书，就可以把教材来出一本书。著书的人，于未完成他的书之先，就可以拿了他所收集的材料去教教。这两件事情，是一而二，二而一，最容易简单也没有的事，殊不知其中的甘苦，却有远超出乎寻常人所能猜度的范围之外者。

先来说著书与教书的目的。两者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一样，都在传播智识，创造文化。其次，副目的当然也是什么人都所不能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吃饭。不错，著书者与教书者的目的，完全是一样的。不过世人若只因目的的相同，而即认这两件事情为合一体，那就不对了，因为为达到这目的之故，而经过的过程，有大不相同的地方在那里。

第一，两者的群众，或者说听讲者 The Audience 与读者 The Reading Public之间，就有大大的差别。著作家的读者群，

是没有时地、年龄、智识、阶级、职业等的限制的，而教书先生的听众，则大抵都须受着上举的各种限制。还有著作者的读者群，是不大会与著作者见面的，而教书先生的听众，却是面对面的活着跃动着的人。单就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就可以感到，著作者是何等的自由，而教书者又须受几多的束缚！所以有许多学问很好的人，一立上讲台，往往会说不出话来；而有许多辩才雄健的人，就是没有真学问，也会说得头头是道，使听者倾心。

第二，是著作者与教书者的心理的变化。著作者，因为享受着上面所说的许多自由，所以他的全部心灵，可以专注在著作的一点上。不嫌精细，不怕深沉，推敲磨练，到自己觉得满意的时候，方将他的著作拿出去问世。而教书者，因对方坐在那里恭听的，是名为人的感情动物，所以因时因地都不得不受着听众的感情的支配。感情一动，思路就要散乱，先且不必说讲者自己的情感气分，就是单以听众的情感反映到讲者的心里去之后的那一种反应作用来说，教书先生就不容易有十足的把握了，更何况现代的青年或大众，都是富有着叛逆心理的生物呢！

第三，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从事于创造文学 Creative Literature或者说创作的人，是绝对不宜于教书的；因为创作者须以情感为根底，而教书者所独重的是理智。理智的伸展培养，往往可以把情感杀死，而情感的热浪高潮，也容易把理智搅乱。所以一位大诗人，而请他来教诗的时候，也许会变成一个最坏的诗学教授。诗人的朗读，有时候还远不及三等优伶的演习 Rehearsal的说白。但中国却有一个恶习，每喜欢请那些创作者去教书或讲演，这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勾当。听众一时失了望，致生出后悔被骗的心来，倒还事小，若创作家因受了一时的牵

掣，而永久失去了他的灵感与诗情，那才是民族的一大损失呢！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清谈的由来

凡稍懂一点历史故实的人，都知道清谈始于魏，盛于晋，衰于陈隋。以横槊赋诗的魏武帝，居然会杀孔文举，害祢正平；以述典谈文的魏文帝，竟也会煮豆燃萁，同根相逼，文士的不得不被迫入于清谈，在这里也可以想见他们的心事了。降而至晋，懿昭父子的凶狠残酷，当然要比曹魏更胜一筹。挥尘谈玄，既能免祸，又可图名，读书种子，焉得不竞尚此风，而来兼收名实呢？到了陈隋伤乱，天下纷纭，文绉绉的读书人已经是无尘可挥，无玄足述了，清谈的消灭，也是自然之理，然而文人苦矣。

近世的清谈，似乎变了一个样子。大报小志上，连篇累牍地载在那里的，大抵（一）是天灾，（二）是性罪，（三）是要人的行踪与传闻轶事，（四）是关于同时代的文人的连嘲带骂，疑假若真的消息与批评。“今朝天气哈哈哈”，果然是清谈的极品，“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更是谈言微中，情文并至的文章。究竟还是清谈误国呢，还是国误清谈？这倒真有点儿难说。

六月二十五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说　模　仿

据希腊亚利士多德说来，艺术的起源，是在模仿。若推理的倒测，是真的话，那中华民族，倒是一个最艺术的民族，何以呢？因为中国人是最富于模仿性的。虽然是好的意义的模仿呢，还是坏的意义的模仿，我们却也不敢断言。

中国人的善于模仿的秘诀，第一，是在模仿表面，而不讲实际；譬如，大家都知道了西洋文化的好处，中国人也非学他们不可了，于是乎阿猫阿狗，就都着起了西装，穿上了皮靴，揑起了手杖，以为这就是西洋文化的一切。虽然还有一种例外的吃大菜，倒是比较得实际一点。更如一说到了科学的可珍，全国上下也就会有一批歌功颂德的放屁虫出来，空空然的大喊大叫着"科学科学，科学科学"，而实际上什么是科学，怎样的提倡科学，如何的应用科学，却一概可以置之不论。虽然在政治上应用了纵横反复之术，来争取一点地位，和收取几十万节敬炭敬之类，倒是比较得实际的唯物史观与科学方法。

模仿最易成功的第二个秘诀，是在模仿人家的坏处，顶明显的

好例，只须听一听受着西洋人的教育的许多中国子弟之吃教者和吃洋行税关饭者的中国话，就马上可以看出来。他们别的事情，倒会置之不学，而独有那一口奇怪的外国人说的中国话，却个个都能够说得同外国人一样。名词动词的颠倒，抑扬顿挫的特异，你若闭上了眼睛，不看见在你面前说话的那一张黄色、斜眼、狮鼻的脸，那你会相信，是一位外国人在向你说教："耶苏是顶顶好的人！"个人既是如此，同样地，国家也是一样。从前向往着严寒的北国，现在却又有一部分人醉心于炙热的南欧的某一小邦了。

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有目的的日记

偶尔在友人的案头，看到了一册薄薄的什么座谈之类，其中有一篇日记，却是我留学时代的同学某君所作。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被人家攻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小报及什么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意。

某先生的那一篇日记，虽只短短一二页，但他的为什么要写那篇日记，他的目的在那里，却一看就十分明了，明了得同小孩子的直率痛快，在墙头上写“某某真正不好，可恶可杀，是一只狗”等匿名揭帖一样。

他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攻击某先生的对日本人所发的议论。据这一位先生说来，则日本的无产者群，是在同情于我们中国的被压迫的民众的；但这日记的著者，却完全以为不对，说日本的无产者，个个都是帮助军阀，主张侵略中国的黩武主义者，日记中并且还举出了一位他自己的朋友的话来作证。

我不幸早出世了几年，所以当日本来侵的这一二年中间，失去

了在日本留学的机会。但以平常遇见的几位日本朋友的谈话，及见到的他们中间所印行的小册子之类看来，则日本民众的反对政府出兵侵略中国的议论纪事，也不只是一次两次。所以我觉得日本的无产者群，完全是他们的军阀的走狗这一句话，显见得是过火的议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对人的挑剔。

其次是在日记的末一节里，忽然说到了债主的将来催逼，以证明他的穷到了无地立锥的境遇。一读到了这里，我真失声笑出来了。同人之中，我的惯于喊穷喊苦，是大家每用来取笑我的话柄，而独有这一位日记的著者，却是众人周知的文人中的富者。正因为他的理财方法，比我们稍好了一点，所以买我们的嫉视怨恨之处也着实不少。这事情是他也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知道的一种公开的秘密。而现在却突如其来的喊出了这一声穷，这岂不是同“中有黄金三百两，隔壁王儿不准偷”的告白一样地可笑么？天气怪热，写这一点感想，原不过想同这位老同学开开心，妄言多罪，健作为佳。

七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大 学 教 育

在目下的中国，有些人主张，大学教育，可以不要。更有些人主张，大学教育的门面是要装的，否则就不能够得到庚款．但文法科可以不要，或者至多，也只须留一个两个大学装装门面，其余的可以不要。

主张大学教育可以不要的那些人说："中国那里要什么学问？举国上下，有那一个人，那一件事能够证明是尊重学问的？专门人才，从中外的各著名大学里毕业出来的优秀学士，饿死者饿死，猫猫虎虎，得到了一官半职，勉强糊口，把专门技术，全部抛弃者抛弃，中国究竟要什么真才实学呢？"

主张不要文法科而要留几个大学装门面的那些人说："读书的目的在做官。可是中国的做官，何必一定要文法科出身的人呢？看看我们罢！学土木工程的，学采矿的，学地质的，学应用化学的，何尝不是一样的在这里做官？要文法科干么？回头制造了许多只有思想，不识时务的人出来，说长道短，图谋不轨，倒反而是国家的不利。要撑门面，得外款，只教有几个理工科大学或科学

研究所就够了。”

这两派所说的都很有道理，而且实际情形也的确是如此。试看看中国目下在发号施令的那些为党国服务者，何尝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过在这里，我还有一点小小的疑问。我以为学以致用，原是不错，但人格的锻炼，当然也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职能。能够抱定主义，甘心饿死，不屑同流合污，取媚于人的迂腐之辈，正足以证明是教育的胜利。能培植出这些人才来的大学，只有嫌少，断没有可以不要的道理。其次，就以“学以致用”一方面来说，难道真的做官就是读书的唯一目的了么？以中国的全部人口来分配，则文法科毕业的人才，何尝会太多？不必去说穷乡僻壤，就是离都会稍远一点的城镇乡市里，究有几个文法科毕业的头脑明晰者，在那里处理事务，指导群众？目不识丁的土豪劣绅，与稍能执事的讼棍痞徒的所以横行，就因为大学教育的不普及不彻底之故呀！若说大学教育，可以不要，那教育行政机关，及其他的许多有名无实，只知聚敛的虐民机关，就先可以不要。大学教育的目的，岂真只在于做官与骗钱么？

原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睡　病　颂

新近听见美国流行有一种睡病，势甚猖獗。虽则症状如何，我还不大明白，但从病名上看来，倒觉得是一种可喜的疾病。

第一，若将这一种类似寒热的病源菌研究出来，加以相当的中和而行注射，则有失眠症者，以后可以不患不能睡觉了。

第二，有怕老婆，有不了事，以及有晕船病，和遭遇不幸的人，要想救一救暂时的急者，也可以享受享受这酣睡的乐趣，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著的那篇有名的短篇《立泊·凡·允格耳》中的理想，到此才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出来，岂不是一件快事。

但世人的对这睡病的恐怖，似乎是因为怕它的一发而不能复醒。这，我想也不过是人无远虑的一种浅见，由想得通的人看来，长眠与短睡，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异的。譬如我们现代的沉醉于鸦片赌博，沉醉于醇酒妇人，沉醉于金钱权势地位的大中华同胞，一染上了习惯，何尝会有醒悟的时候呢？

暑期已过，新秋的凉爽节季又来了，我希望朝野上下，热心于名利，角逐在武坛、文坛的众同胞，都能去求一点睡病菌来酣睡酣睡，休养休养。这比到远上庐山，漫游青岛，去解避暑热总要简单便利得多。

原载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文

暴力与倾向

《明史》里有一段记载说："燕王即位，铁铉被执，入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终不回顾。成祖怒，脔其肉纳铉口，令啖，曰：'甘乎？'厉声曰：'忠臣之肉，有何不甘！'至死，骂不绝口。命盛油镬，投尸煮之，拨使北向，辗转向外。更令内侍以铁棒夹之北向，成祖笑曰：'尔今亦朝我耶？'语未毕，油沸，内侍手皆烂，咸弃棒走，骨仍向外。"这一段记载的真实性，虽然还有点疑问，因为去今好几世纪以前的事情，史官之笔，须打几个折扣来读，正未易言；但有两点，却可以用我们所耳闻目睹的事实来作参证，料想它的不虚。第一，是中国人用虐刑的天才，大约可以算得起世界第一了。就是英国的亨利八世，在历史上是以暴虐著名的，但说到了用刑的一点，却还赶不上中国现代的无论那一处侦探队或捕房暗探室里的私刑。杠杆的道理，外国人发明了是用在机械上面的，而中国人会把它去用在老虎凳上；电气的发明，外国人是应用在日用的器具之上，以省物力便起居施疗治的，而中国人独能把它应用作拷问之助。从这些地方看

来，则成祖的油锅、铁棒，“割肉令自啖之”等等花样，也许不是假话。第二，想用暴力来统一思想，甚至不惜用卑污恶劣的手段，来使一般人臣服归顺的笨想头，也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的中国人的老脾气。

可是，私刑尽管由你去用，暴力也尽管由你去加，但铁铉的尸骨，却终于不能够使它北面而朝，也是人类的一种可喜的倾向。“匹夫不可夺志也，”是中国圣经贤传里曾经提出过的口号。“除死无他罪，讨饭不再穷，”是民间用以自硬的阿Q的强词。可惜成祖还见不及此，否则油锅、铁棒等麻烦，都可以省掉，而《明史》的史官，也可以略去那一笔记载了。

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号“社谈”栏，未署名

错误的悲剧

《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 Errors)是莎士比亚的一篇少作的剧名，这喜剧的由来，是因为了两个主人的双生子和侍候着这两人的一对仆人双生子的面貌的两两酷似。

错误，原是我们日常所不能避免的一种精神不足的表现，因之喜剧的成分，也十九不得不借助于此。但是因悲剧的结果，而故意造成错误，或因错误的结果，而致发生悲剧的社会事情，在人事日繁的今日，为数也着实不少。譬如《天方夜谈》中的亚里·吧吧故事内之打混号门的粉笔十字号，斯替文孙的小说 The Wrong Box 里的箱尸之类，虽然都是令人发笑的一种错误的颠倒，但其间的严重性，也十足可以构得成一出悲剧。以最普通的几件日常事例来说，若乡间老头儿的娶新娘，当女家相攸的时候，去请一位白面书生来庖代；或投稿不中，假用了女作家的相片名字，去颠倒编辑先生的神志等等，都是如此。

以最近的时事来作譬喻，则偶因姓名的相同，或精神的异状，而致涉及嫌疑，被捉入官，不得不吃一番大苦的事情，也比比皆是。至若黄河水溢，平时不专心于河工水政的地方负责人员，各以错误责人，而不以陨越自勗的那些口实诬词，则更是可笑而又可叹的社会不幸，更无怪乎国府文官处的明令，要把委员的人名遗忘倒错了。

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申报·自由谈》

中国人的出路

两三星期前在报纸上曾见到英国文学家威尔斯先生发表一篇预言，说中国在一九三五年要大受日本的蹂躏，直到一九三八年，始克渐渐恢复。有一班人听到此种言论，以为中国总还有希望。于是就兴奋了起来，相信将来中国自己会得强盛的。但是考究威尔斯作此预言，他对中国的实在情形，未必能够了解。目前苏俄的五年计划，刚始完成；日本的侵略政策，又正在急进的扩展中，照这样情形，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无可避免，随时有爆发的可能。中国处此局势之下，当然规避不了，必得卷入漩涡中，总得振作精神，藉此做出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才行。

观察中国现在的情形，大致可以从两方面着眼：

（一）物质方面，现在中国农村已濒于破产。就江浙两省情形看来，尚觉得稍好一点。象在湖南、四川等省，农民的粮税都已预征到民国五十年；加之尚有天灾、兵灾等等祸患，人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因此农民在乡间，简直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迁入都市。但都市的负担，亦甚重。在较为富裕的人民，进到都

市后，尚可勉强支持，其余农村多数人民，已经枯竭得和石子一般，生活亦感觉不易。加之尚有许多巧立名目的捐款，如治安捐、卫生捐等等，人民化了钱，却享受不着丝毫的利益，没有什么实际的事业做出来。由此可以见到都市也渐渐要入于破产了。如此情形，我看中国在十年以内，物质方面是不会恢复到常态的。

其次是精神方面，我们见到欧美物质文明甚为发达，考其发达原因，根本是建造在精神上面。欧洲在三百年前，即为谋思想之解放与自由奋斗。争得个人团体的自由，立定精神的基础，然后再向物质的途上走去。后来有英国产业革命发生，更有所谓资本主义的形成。但是道德在欧美文明中，仍未至于破产者，皆由于精神的根基，建立巩固。反观中国现在情形，一切封建思想，旧道德观念，以及家庭、男女、社交的关系等等，都起了激变。所有旧观念，摧毁无余，但新道德的建设，却未巩固，以致很形危险。大概在十年以内，精神的建设，也未必能够成功的。

再则，中国在世界潮流中，算是落后的国家。欧战以后，各国均已奋起，一增加自己国家生产；二富裕自己民族生计。但其中发生很大的困难，是在大战以后各国既尽量生产，于是生产日见增多，而人民的购买力，既没有增高，且还嫌不足。消费力既不够，遂致生产过剩，更不得不设法推广销路。一九一八年以后，世界经济渐呈恐慌现象，一九二七年时美国尚未觉以为意，直到去年，才感到恐慌的影响。股票价值跌落，工厂停闭，失业者增多。所以急谋救济的办法，召开经济和军缩会议等等，想藉此可以解除恐慌的现象。可是结果给我们所见到的，在会议中各自谋划者，并不是世界共同的繁荣，乃是各谋自己国家的繁荣和出路。有许多重要问题如世界汇兑、金本位等等，不能得圆满办

法，仍旧是毫无结果。经济恐慌的症结，依然存在，不能解除。因此有人更进的提倡经济的国家主义 Economic Nationalism，主张各谋自己利益。如此看来，无论如何，在十年以内，世界大战一定要爆发的了。

在这种紧张急切状态之下，中国将如何办理呢？譬如俄国在东北示威，若以为是对中国帮忙，这是不成功的。中国的事，总非要自己努力不可。在最近几年之内，中国的军队固然要加整顿，但最主要的有两种准备。第一种是在经济的国家主义。中国现处在外人侵略之下，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关税不能自由。现在的海关，等于保护外货进口的工具，中国对外国进口货品，不能自由的加以控制。国内厂家所出的货品，质地又不及外货，抵制不住，经济日见衰落。所以要发展中国的经济，非将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不可，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种要算是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我们国家时时在想进步发达，但是帝国主义者却利用种种方法来阻挠中国的进步和发达。因为中国如发达了起来，他们就没有侵蚀的机会，所以要设法阻止，障碍进步，压迫政府，做他们的傀儡，作他们的爪牙工具，任凭帝国主义者剥削。这就是帝国主义非打倒不可的原因。

上述两点都是中国进步的障碍，能将这两种障碍取消，方始有成功的希望。又如要完成此种使命，不是专靠政治的力量，还是要人民自己努力。譬之政府常云，"剿匪"如不能成功，则帝国主义不能打倒，不平等条约不能取消，一切的工作都不能进行。这样，一切责任只有在人民的身上。象九一八以后，人民觉悟起来，向前努力。因为中国人的出路，就是在取消上述的两种束缚，才可有望，其余没有什么别的准备。

至于资本制度，在外国已有了相当的成绩，但中国不好，就因为没有制度的缘故，且没有精神的根基。象基督教那样的精神，在西方已深入人心，以之为社会根基。中国现在最苦的，就是自私的思想，要想拯救目前危象，只有两方面的出路，一是压制各人自私的心，不使之发现；二是改造各人内心，有负责和牺牲的精神。只要人人都能除去自私的观念，处处为大众着想，为人民求利，有天下为公的精神，纵使在专制政体之下亦无不可。所以必须从个人着手，养成此精神。再推而广之，根基巩固，国家自然会有希望了。

如此我们当认清了方向，先作自身修养的工夫，同时对社会团体的关系，负连带的责任，这样就是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大家知道一切对的事，若不敢做，就为无牺牲勇敢的精神。从前未和世界交往，范围狭小，还有一班人自持明哲保身的观念，以为少闻外事，自以为清高，这都是不合时代需要的。不要让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存留心中，要有牺牲勇敢锐进的精神，正如基督教十字军那种冒险的精神和热情一般。一切的事既有盼望，前途也就可以有光明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在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的演讲，亚诺笔述，原载同年十月三十一日《之江校刊》第五十八期

秋 阴 蕞 记

一 买 书 者 言

前两三年，英国 Holbrook Jackson 印行了一部Anatomy of Bibliomania 的大著。这部《爱书狂的解剖》的内容丰富，引证赅博，真可以和 Robert Burton 的 Anatomy of Melancholy 比比。爱书狂者的心理，古今中外，似乎都是一例的。中国有宋版蝴蝶装、明印绵纸等等的研究，外国人的收藏家，也有不惜化去几万金元，买一册初版（First Edition）诗集或文集的人。例如勃朗蒂氏姊妹三人的诗集之由 Aylott and Jones发行者，薄薄的一册 Poems by Curer, Ellis and Acton Bell 可以卖到八九百镑或千镑以上的金洋。原因是因为有一天夏洛蒂忽而发现了爱弥丽的诗稿，姊妹三人就商议着自费来印行一部诗集，恰好伦敦的 Aylott & Jones 出版业者答应以三十镑的价钱来替她们印刷发行，但一年之后，这部诗集，只卖去了两本。姊妹三人，于送了几本给友人之外，就决定把其余的诗集去售给箱子铺里糊里子去

了。但后来却以较好的条件，转让给了 Smith, Elder & Co. 去出版，所以由 Aylott & Jones 印行的诗集，就可以卖得到那么的高价。

这一种珍本市价的抬高，中国自胡适之做了几篇小说考证之后，风气也流行开来了。现在弄得连一本木版黄纸的《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之类的启蒙书，都要卖到几块大洋一本。所谓国学，成了有钱的人的专门学问，没有钱的人，也落得习些爱皮西提，去求捷径，于是大腹贾的狡猾旧书商，就得其所哉，个个都发起财来了。

前数个月，施蛰存先生曾写过一篇上海滩上买西文旧籍的记事，但根据着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则上海滩上的西书旧籍，价钱亦复不贱。每逢看到了一册心爱的旧书，议价不成的时候，真有索性请希脱勒或秦始皇来专一专政的想头。但走到了街上，平心静气地一思索，中国的同胞，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人，还有好几千万在那里待毙，则又觉我辈的买书，也是和资本家们的狂欢醉舞是同样的恶德了。

二 绍兴酒价

中国笔记中，记唐时酒价的，每以"三百青铜钱"，或"美酒斗十千"等诗句为解答，实在不可靠得很，亦犹答黄河水源之从"天上来"三字了局，是一个样子。现在中国流行最广，而色香味并佳的酒，总之是绍兴酒了，而这绍兴酒的价钱，也真奇怪，每家每处，都是不同的。绍兴城里如何，我不晓得，即以北平、天津、汉

口、南京、广州、上海等处来说，因地方的不同，而酒价有别，倒还可以说得；甚至在同一地方，于同一酒名之下，价钱还时有上落，这真是怪事了。当然酒的质地和分量的如何，更是另外一个问题。据我的经验说来，杭州的绍兴酒，的确要比别处便宜，这是质地分量上来说的话，至如有几家酒店，挂起几十年陈的一块招牌，动不动就是几元一斤，那却是欺人之谈了。前几日因为落雨，曾在岳墓前大醉过一场，顺口唱来，唱出了“十日秋阴水拍天，湖山虽好未容颠，但凭极贱杭州酒，烂醉西泠岳墓前”的二十八字，也是实写。绍兴酒以东浦、阮社两地的产品为佳，其余的地方，虽也有作坊，但味道总差一点，大约是水的关系。

原载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说公文的用白话

近来老听见有许多极端相反的消息，同时并传的。一个刚说，主持教育者又奖励起读经书来了，所以《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旧籍，最近又行了时；一个却说，公文也要用白话了，至少也要用上些新式的标点与符号。前几天，并且有一位在机关里办事的朋友，来问我以白话文的作法，和标点符号的用法。我就问以文言文是怎么做的。他说："文言的做法，是容易得很，譬如说公文罢，只教几个……等因奉此……一来，将来文一抄，不怕是怎么复杂的案卷，就一目了然了。"言下仿佛是在痛惜着这美妙的公文程式的将被革除的样子。我就告诉他，可以不必悲观，这公文程式，是怎么也革不了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崇古的国家，秦始皇的时代，还并且要使儒者以吏为师呢？

"可是现在是时势不同了！"他又担心着说。

我因为无法可以解除他的忧虑，不得已就只好想出了一个斯丹达儿 Stendhal 来说："请你放心，这一位法国的大作家，他做文章的时候，也还在模仿着《拿破仑法典》的用辞使句哩！"

白话文的提倡，到如今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结果只向六言告示和等因奉此的公文上占据了几个标点与符号的地位，就有这一大批人的暴怒与不平，我真不知封建制度的全部扫清，要在那一个年头？

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谈 结 婚

前些日子，林语堂先生似乎曾说过女子的唯一事业，是在结婚。现在一位法国大文豪来沪，对去访问他的新闻记者的谈话之中，又似乎说，男子欲成事业，应该不要结婚。

华盛顿·欧文是一个独身的男子，但《见闻短记》里的一篇歌颂妻子的文章，却写得那么的优美可爱。同样查而斯·兰姆也是个独身的男子，而爱丽亚的《独身者的不平》一篇，又冷嘲热讽，将结婚的男女和婚后必然的果子——小孩们——等，俏皮到了那一步田地。

究竟是结婚的好呢，还是不结婚的好？这问题似乎同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一样，常常有人提起，而也常常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照大体看来，想租房子的时候，是无眷莫问的，想做官的时候，又是朝里无裙莫做官的，想写文章的时候，是独身者不能写我的妻的，凡此种种似乎都是结婚的好。可是要想结婚，第一要有钱，第二要有闲，第三要有职，这潘驴……的五个条件，却也很不容易办到。更何况结婚之后，“儿子自己要来”，在这世界

人口过剩，经济恐慌，教育破产，世风不古的时候，万一不慎，同兰姆所说的一样，儿子们去上了断头台，那真是连祖宗三代的楣都要倒尽，那里还有什么“官人请！娘子请！”的唱随之乐可说呢？

左思右想，总觉得结婚也不好的，不结婚也是不好的。中庸之道，若在男女之婚姻上能适用的话，我倒很想把某先生驳复林先生的话再来加以吟味，先将同胞们都化成了象魏忠贤一样的中性者来试试看如何？

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说产业落后国的利益

两三年来，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波浪，席卷全球；原因当然是在生产过剩，欧洲大战后各国国民经济不裕，一般购买力的消失，国际间赔款偿还的结果，资本偏在堆积而不能流通等地方。恐慌的落局，自然就发生出失业的问题，政治和社会的不安问题，国际商场争夺更烈的问题等等。

但中国因为产业落后，所受到的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影响，却不甚显著，所以有些论客，反在歌颂我们中国产业落后的好处。

第一，说到失业，中国的四万万同胞，有业者本来不多，除了几处都会的工业劳动者外，大部分的壮丁，都以当兵打仗为职业。本来无业，失也无从失起，近来且到处皆在招募新兵，所以失业问题，在中国是容易解决的。

第二，说到政治和社会的不安，中国二十余年来，本来也就没有安过，所以老百姓对于怎么是安定的状态，怎么是不安定的状态，委实也分辨不清楚。

第三，国际商场的争夺，中国向来就没有过这么一回事。夺

来夺去，我们自己人中间，也还忙不过来，还管它什么国际不国际。

产业落后，既有此三得，最后还有一个大利，就是中国人乘此世界大恐慌的时期，却得着了一个买外国便宜货的机会；非但买者便宜，就是卖者，只教把中国商标一印一贴，也立时可以制造出许多同外国货一样的国产货品来，岂不快哉，也岂不痛哉！

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新 年 试 笔

小的时候，父兄们教我们元旦起来，应该先裁一方红纸，写“新正试笔，万事如意”的八个字，贴上书窗上去。现在老了，这些事情非但觉得可笑而不愿再干，并且从性情上说，也觉得懒得干了。假若要我说出新年的心愿，而来作我的一年的希望的话，那我只盼望着今年一年能够不动一动笔，不写一写字，而可以生活过去。

原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第二卷第一号

元 日 感 想

年轻的时候，当然不知人世的苦辣，只希望新年的到来，可以多吃些果品，多化些金钱；中年多病，已切身地感到了韦苏州的“病入新年感物华”的哀感；近来渐入老境，一到新年，想起范石湖的“老病增年是减年”，少不得又要黯然神伤了。

尤其是每年到了元旦的清晨，眼看看许多同时代者的喜乐的样子，耳听听他们的欢呼的喊声，总要想到那一位巴黎屋顶的老哲学家 Emile Souvestre 所说的“人自迎新侬忆古”的一句哀话；Un Philosophe Sousles Toits，象这样清新可爱的小作品，中国人不知为什么还不把它翻译过来！

说到怀古，去年的一年，实在中国人也真是不幸。日帝国主义者在东北的杀人如草，果然是可以不必提起，就是我们自己，闹来闹去，到如今也还是在一个混沌的局面之中。黄河成患，丰收成灾，想起那千千万万的饥民，谁也不能不恻然心动。这些倒还是天下国家的大事，暂且按下不说；即以个人的身边杂事来说，一年之中，有许多朋友，都不知上那里去了。提起文坛，更

觉黯淡，只见有关门的书店，不见有热烈的新书。弄弄幽默，谈谈风月，苟且偷生，总算又是一年过了。

闲话且少说，新正开笔，且让我来祝一祝大家的万事如意罢！

原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小学教育与社会

自己的小孩，进了幼稚园之后，本来是一天到晚在家里捣乱的顽童，居然也晓得起唱歌，写字，作画，行礼来了；那一位德国牧师的儿子弗利特利儿·弗留倍儿（Friedrich Froebel）的伟大，到现在，我才切身地感到。

统观中国各地的小学教育，除有些实在是荒僻得不堪的地方，仍在遵守着中国传统的私塾制外，大抵都改良，进步，而且也很有成效了；可是中国的社会全体，以及服务——尤其是做官——的人才，却反而一天比一天的坏，那又是什么缘故呢？若要归罪于教育，我想总是中学，或大学的不对罢？小学教育是容易统一，改善的；而小孩子的习气，也大半是于进中学或大学之后，渲染而成。所以卢骚的《爱弥儿》，罗素的《教育论》，对于十二三至二十余的那一段年龄，都不肯放松。中国的虐待小学教员（如薪金的微薄，劳动时间的增多，任职保障的全无等），原是使中国教育堕落的一个原因，但大学中学的当局之不负责任，将学校视作衙门，以教育追随政治，当然又是更大的原因无疑。

还有我们一出大学，一入社会，就以为教育是与我们无关了；做人和读书，或做官发财和教育，是象牛肉和金钢钻一样的完全无关的那一种观念，或者也许是促成中国社会紊乱的最后最大的一个总原因。

中国古人说："学到老！"雅典的立法者所龙（Solon）说："我在常是不断地学着的中间一年年的老了。"教育中年人的中年学校，和教育老年人的老年学校，世界上当然是没有的，重要的不过是在我们入社会之后自己对自己反省，和社会相互间的提倡勉励而已。

原载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说“沉默”

自发的沉默，中外一例地都视为人生的美德。中国人说：“祸从口出！”所以金人要三缄其口。英国喀拉衣耳说：“沉默与玄秘！若这时代还是造神坛的时代，那神坛正还该献造给它们。”他又引着一句瑞士的金言“言语是银的，沉默是金的”而改造过说：“言语是一时的，沉默是永久的。”比利时的那位神秘诗人梅泰林克在一本《心贫者之宝》（Le Tresor des Humbles）的散文集里，更把沉默推崇得至高至上，无以复加。

他甚至说，言语的沟通灵魂，远不如沉默的来得彻底。尤其是两人相爱的时候，决定此爱者，乃是来至两人间的最初的那一个沉默。在远道回家，别离在即，大喜临头，生命终息，或大大的不幸，将次到来的一瞬间，沉默总在我们的先头，所以人们在人数多的时候，最怕的也就是这一个沉默。沉默的严肃，就是爱和死和运命的严肃。

梅泰林克的赞美沉默，自然是有他的见地在的；但非自发的沉默，却未免有点儿难受。先让我来说一个故事：火德星君纪晓

岚，酷嗜淡巴菰，有一日正在吞云吐雾，校修着《四库全书》的时候．忽听报说：“皇上来了！”他把烟斗向靴袋里一塞，就匆忙地下去接驾。后来烟火烧上袜子、皮肉，于焦气都熏出外面来了，皇上问：“有什么在烧？”他老人家却只装着苦笑，镇静地回复说：“没有什么！”象这一种的沉默，可真是应了法国人的说法，言语是隐秘思想的艺术(Speech is the art of concealing thought)了；但艺术虽然成了功，而皮肉可不免受了痛。

原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说谎的衰落

《说谎的衰落》（The Decay of Lying），这是唯美者王尔特的一篇以对话来写出的论文题目。他诋毁写实主义，追怀古昔的美的虚幻世界，以为说谎造谣的这种艺术，至近代而衰落尽了，所以他的同时代的作家，和稍古一点的英法前辈，一个个都受了他的警句的嘲弄。他说美国人的没有好文学创制出来，就因为他们的开国元勋的不知道说谎。华盛顿斧砍樱树的那一个传说，就是窒塞杀美国人的创造本能的一种毒素。

王尔特的这种奇矫的见解，究竟对与不对，已经有许多文艺批评家畅论过了，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回头来一看我们中国古今的文人，觉得在说谎造谣的艺术上，的确要比西洋人落后得多。成王剪桐叶为圭，戏封叔虞，是何等有趣的雅事，而周公认真，最好的一个谎，就被拆破。赵高指鹿为马，也是一个好玩意儿。但背后要加以刑诛，谋成实用，趣事就变成恶事了。

到了现代，这说谎的艺术，更加变得恶劣到了极顶，新闻记事，每因说谎而露出马脚，小刊物的造谣说谎，恶劣当然更甚。不说

别的，就说关于我个人的记事罢，有一个刊物，刚说过我在杭州奔走于三四流政客之门，钻营牵拍，得了一个三十元一月的报屁股编辑；同时另一个刊物，却又说我在对雪赋诗，悠闲风雅到了无以复加；为求这说谎话的象煞是真起见，这位先生，还自绞脑汁，替我做了好几首新又不新，旧又不旧的很有独创性的咏雪诗。你想一般造谣的艺术，衰落到了如此的地步，中国的民族，还能创造得出大作品吗？

原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驻美德国大使的抗议

八日的路透电报说：纽约于昨晚在某公园曾举行大规模的假审判一次，以德总理希脱勒为被告；结果判决希脱勒犯有破坏文明之罪，德驻美大使向白宫提出抗议，终被却下云云。

看到了这假审判三字，却使我想起了许多与此相类的事情。杭州北廓法华山下，有一座东岳庙，俗称老东岳。春秋二节，香市之盛，比任何大展览会还要热闹。也举行审判，上坐东岳大帝，此外的皂隶书役，兵卒夜叉，无常鬼判，都由投玟的活人扮成。鼎镬刀锯，枷笼铁链，凡现世所有的严酷刑具，无一不备。据说犯不治之症，如医药无效的疯狂病者之类，只教半夜上山，去经一度朝审，病就能痊。因此无智的乡民，每年总要去参加这种朝审，人数大约一季总在三五万以上；这总算也是极盛大的假审判之一。

其次，我还看见过一出《打鼓骂曹》的昆剧。据说，原本是徐文长做的《四声猿》剧本中间的一种。剧中景况，是阎罗殿上，祢正平轻裘缓带，和阎王在道弟称兄。忽而鬼卒牵引着一位绕腮胡

满面，被枷带锁的罪囚到来。阎王和祢正平商量定了，就叫鬼卒开了枷锁，令那罪犯脱落囚衣，重穿起红袍玉带，装成了戏台上的曹操的样子。祢正平也脱下了轻裘，换上件破服，重演着一出《打鼓骂曹》的好戏。戏演完后，作丞相装的曹操，被鬼卒揶揄虐打几下，再换上囚衣，被上枷锁，重被牵入地狱。祢处士和阎王欢饮几杯，也就散了，阎王还弓身屈背，亲送之于殿外。这总算也是文人笔下的一次假审判，是为祢处士的幽魂吐一口气的。至若岳墓前头的铁像，于忠肃公庙貌的威仪，那又是隔世平翻的判案，自然还该作别论了。一回头来再想一想希脱勒，他是孔子所说的只恐没世而名不称的人。所以墨索利尼的一举一动，他都在模仿。因此英国的通信记者说："墨索利尼是一个Statesman（政治家），他却是一个Stageman（优伶）。"犹之乎说孙叔敖是一个高士，优孟衣冠者是一个伶人。可是德国自俾斯麦、威廉二世以后，居然又出了这一个世界的人杰，至被人家模仿作假审判，在希脱勒本人，当然是心满意足的了，德国大使真不识趣，还要提出什么抗议呢？

原载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说 姓 氏

姓氏的起源，当然是和人类一样的古。《白虎通》上说："古者圣人吹律以定姓；……姓有百者何？……正声有五，宫商角徵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异气殊音悉备，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管，或氏其事。"《通志》上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故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至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于文，女生为姓，故姓之赐，多从女，姬姜嬴姒姚妫姞妘姛妊嫪之类是也。"从这些地方看来，姓原是最古，是女性中心的家族制度开始的时候就有了；进而有氏，是社会上有贵贱之分的时候起始的，后来再进，姓氏便合而为一了。

古代人齿稀少，所以姓只百而已。其后生齿日繁，交通日广，唐宋以后，遂有千姓万姓以上的支别。我们小时候在私塾里读的《百家姓》，以赵氏起头，大家都说它是宋初的东西，因为当时南唐未灭，吴越王割据南方，势正强盛，妃孙氏，故而《百家姓》之首，

就是赵钱孙李的四族。其实通行本的《百家姓》，删繁就简，主意只在取便阅读而已，若以当时的姓氏来说，决不至有百家的。

古代姓氏的来源，既系如此，则姓氏的在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上的重要，自然是可以不必说了。现在当我们正欲打破封建社会革除家族制度的时候，对这姓氏的存废，当然是一个很可研究的大问题。五四时代，曾有人创议过废姓；朋友中间的有几位学科学的人，曾说废姓之后，可以以号码来代替姓名，譬如病院里的患者，上海巡捕房的巡捕，单以第几号第几号来代替姓名，也没有什么不便。北平的玄同教授，也曾实行过这主张，作家中间，更有一位叫作废名的先生。

原载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武士道的活用

当离奇的藏本失踪事件发生的翌日，因为我曾在日本住过多年，又因我个人到现在也还有几位日本友人，所以就有人来问："这一位副领事的失踪，是否日本武士道的活用？"意思就是是否日本政府授意藏本，教他自杀，用此苦肉计后，日本就可以借作口实，进兵京洛，而控制华南。我言下就摇头否答，以为堂堂的大日本政府，以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东亚唯一的领导国自居的大日本政府，决不会有此卑鄙陋劣的行为的。后来果然藏本寻获了，虽则他只是忍泪吞声，始终不肯吐白隐衷，但我却自以为我的推测，还不甚荒谬。其后在报上又见了些藏本大约是愤于政府的待遇，或系一时激而出此等记载，因而想起了前十余年在北京遇见的故佐分利公使的丰度与人格，反使我对于日本国民，更起了敬意。

但又不幸得很，现在虹口的事件又连续地发生了。公共租界内的居民，弄得白昼潜居，道路以目，比到一二八前夜的那种恐怖状态，只有过之。这又显然是武士道的另一种活用了。我不知

以后的公共租界，治安将如何的维持过去。虽名租界，但上海究竟还是中华的国土，若妇女幼童，或外国的侨民，不能在这一隅通商口岸，安居乐业，那还要工部局做什么？工部局原是直接的负责者，可是我们的政府与国民，也岂能够长此的装聋而做哑？租界的收回，和损害的责偿，自然是起码的问题。

进一步讲，又要联想到人性上去了。得寸进尺，陇蜀兼收，原是强者共通的心愿。罗马帝国，曾依此而席卷了天下，战前的日耳曼民族，也依此而雄飞到了非洲亚洲的中心。履霜坚冰至，我们租界外的民众，华南的民众，对于租界问题，华北问题，也应该想想。

原载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人言》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说肥瘦长短之类

人体的肥瘦长短，照中国历来的审美标准来看，似乎总是瘦长的比肥短的美些。从古形容美人，总以长身玉立的四字为老调，而“嫫母倭傀，善誉者不能掩其丑”，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典故。按常理来说，大约瘦者必长，肥者必倭；但人身不同，各如其面，肥瘦长短的组合配分，却不能象算术上的组合法那么简单。所以同外国文中不规则动词的变化一样，瘦而短，肥且长的阴性阳性，美妇丑男，竟可以有，也竟可以变得非常普通。

若把肥瘦长短分开来说，则燕瘦环肥，各臻其美，尧长舜短，同是圣人；倘说唐明王是懂得近世择美人鱼的心理的人，则不该赉送珍珠，慰她寂寥。倘说人长者必美，短者必丑，则尧之子何以不肖，而娥皇、女英又如何肯共嫁一人。

关于肥瘦，若将美的观点撇开，从道义人品来立论，则肥者可该倒霉了。訾食者不肥体，是管子的金言；子贡淫思七日，不寝不食，以至骨立，的是圣门弟子的行为。饭颗山头逢杜甫，他老人家只为了忠君爱国，弄得骨瘦如柴。桓温之孽子桓元，重兼

常儿，抱辄易人，终成了篡位的奸臣，被人杀戮；叔鱼之母，见了她儿子的鸢肩牛腹，叹曰：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遂勿视。凡此种种，都是说肥者坏，瘦者好的史实，而韩休为宰相，弄得唐玄宗不敢小有过差，只能勉强说一句吾貌虽瘦，天下则肥的硬好汉语来解嘲，尤其是有名的故事。

反过来从长短来说，中国历史里，似乎是特别以赞扬矮子的记录为多。第一，有名的大政治家矮的却占了不少，周公伊尹，全是矮子，晏子长不满六尺，而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孟尝君乃眇小丈夫，淳于髡亦为人甚小。其他如能令公喜公怒的短主薄王珣，磨穿铁砚赋日出扶桑的半人桑维翰等，都系以矮而出名者，比起长大人来（当然也是很多），矮小人决不会有逊色。武人若伍子胥，若韩王信辈，都系长人，该没有矮子的分了，而专诸郭解，相传亦是矮人。

看了这些废话，大家怕要疑我在赞成瘦子矮子了，但鄙意却没有这样简单。对于美人，我当然也是个摩登的男子，“软玉温香抱满怀”，岂不是最快活也没有的事情？至于政治家呢，我觉得短小精悍的拿破仑，究竟要比自己瘦长因而卫兵也只想挑长大的普国弗列特克大王好得多。若鸟喙长颈的肾水之精（子华子），大口鸢肩的东方之士（淮南子）能否与大王弗列特克比肩，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一九三四年九月

原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新语林》第六期

东 南 地 狱

东南本来是富庶之区，俗语也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是今日的东南却变成了地狱了。

这地狱里的百鬼夜行图，大约在各报的记载上，总早已经有了一点浮面的报告，但诸通讯记者所见到的地方，恐怕还只是地狱上面的最上一二层，自十层以下，到十八层为止的真相，总还要狰狞，还要险恶。

我，富春人也，所见所闻，不出富阳的一角，现在且先来写几件实例，借以添上些流民图里的波澜。

前年去年，是民国纪元以来的大有之年，米如沙粒，谷不值钱。所以乡民在年下，不但将新收的谷子，一齐出售，就是向来的积谷，也不得不洗仓变卖，以抵补谷价的折蚀低倾。今年春间，农民本来大家都不想再种田了，可是江浙内地的老百姓，没有工业可以从事，没有资本可以营商，除了力田苦作以外，更有什么法子？阿宏的老婆，到了要整理秧田的时候，苦劝她男人去借

了三分钱的高利贷，买几升谷子来做种的见解，按理原也不错。

秧田做了，分秧布种的时候到了，以阿宏夫妇，以及七岁五岁的两小孩之力，怎么也不能把六亩田在三天之内种好。先要耕，次要车水，再要耙平，然后插秧下种，少算算也得雇两三个人工来帮助，于是乎只得再去求借。田种下了，第一次的肥料也加了，耘也耘过了，但苍苍者天，就一直的不肯下一点雨。阿宏夜半起来，跑上田头，去向东向西地诅咒春星的晚上，不知接连有了几夜。眼见得秧变了黄，田开了裂，而天还不雨，不得已自然只好再去借了钱来车水。七八天后，秧仍是黄，田又加了裂，这可真没办法了。于是乎阿宏就日夜的埋怨他老婆，说尽嚷着种田种田，现在你去种去！埋怨之下，想来总也少不得几下拳打脚踢。

有一天五月中旬的月明的晚上，阿宏上田头去看了星月回来，向床头一摸，却不见了他的老婆。将两个小孩摇醒，问你娘呢？小孩们自然只张大了眼，在月光里发呆。阿宏出去，走了半天，田野里只见了几个同他一样在田头对星月长叹的自耕农夫，老婆的影子，却半个也不曾看见。绕了一圈，从屋后的一条小道，走回来时，月亮已经西斜了，在后屋的茅檐底下，阿宏方才看见一个长长挂在那里的他老婆的背影。现在阿宏的六亩田，同左右邻舍的田一样，只长满了些莠子，还有几茎青色的空壳稻头，在秋风里摇动。两个儿子，却在诸暨的两家寺院里读书，改了名字，变了僧服。而阿宏自己，不知上那里去了。他住的那一间同猪圈似的茅舍，门也没有了，窗也吹倒了，空到如今，已经有两个月来的样子。乡下人到了晚上，每不肯走过这间空屋，说有七孔流血的女缢鬼要出来讨替身的。这是离县城不远，去西北乡只有十八里路的黄叶村里的事情，是我表弟来杭州对我说述的旱灾悲

剧中的一小段。

富阳西乡，有一大平原，名叫黄天坂。三面是山，一方临水，每年山洪暴发，这黄天坂里的几千亩田，总比他处早几日积水，迟半个月退清。所以是十年九不收的地方。但前两年丰收的年岁，每亩田也收起了好几担谷。断桥头的王成发，今年五十二岁，向来是以勤俭著名的，今年特鼓老勇，租了好几十亩黄天坂的田来耕种。下种，插秧，借钱车水的情形，当然同阿宏是一样。田的干涸，秧的枯黄，当然又是同阿宏一样，这老先生，因旱生气，因气发疯。在六月后半个月，因为他田里的秧，都成了干草，索性就点了一把火，把秧都烧了。经他那么一烧，田的四周，沿烧过去，就成了几十亩的一块黑地。现在这几十亩的周围，都青青长出了秋草，而富阳乡下却添了一个骨瘦如柴，白发盈头的疯汉，天天在大道上指天骂地，见水就拜。这是我回富阳，上西乡去的时候，亲眼目睹的事实。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富阳是多得来记不胜记，而农村中的中坚分子，虽则不疯不去自尽，但因积忧成疾，饥饿而死者不知有几千百人。可是城里的棺材铺的老板，也因忧愁成病，死了好几个。原因是为了农民自杀者多了，棺材铺的老板想投机发财，进了许多的木料，但结果却一具也没有卖了。乡下人在这个年头，那里还有钱来买棺材，营丧事呢，死了的人，都是同野狗一样，光身白埋在干燥的土下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

原载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杭州《东南日报·沙发》第二一一七期

苍蝇脚上的毫毛

一　解　题

苍蝇脚上，究竟是不是同人类或禽类一样有毫毛，我可不晓得。此地的用这一个题目，意思是在表明微之又微、以至极微的代替形容词。自林语堂宣言了什么苍蝇宇宙以来，老看见有人用了这两字来回敬他；这原是很有趣味的文字的戏弄。但是偶用一次是有趣的文字，你用了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十一次，十×次之后，鲜味要失掉的。所以我在这里，首先得说明，并不是在效那第几十几次的颦，将苍蝇拿来作炮架，而说苍蝇的脚就是传染病毒的东西。

二　尚方宝剑

偶尔坐了洋车跑过苏堤，那位年老的洋车夫，在对了三潭印月的退省庵，喟然而作长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象彭

宫保那样有尚方宝剑的刚直的人没有了，所以我们老百姓得吃苦。若象彭宫保那样的人现在有几个，把坏人绰拉绰拉的杀杀干净，岂不痛快。”我说：“彭宫保的有没有尚方宝剑，我不晓得；但是他的先斩后奏的威风，只在安徽用了一次，杀了一个他自己部下的水师军官之奸占人妻而谋杀其夫者。但是现在皇帝没有了，你将怎么办呢？”他想了一想，愤愤地说：“皇帝没有了，百姓总有的！”我又问他：“假使你有了尚方宝剑，你头一个想杀什么人？”他说：“张寿元！”我问：“谁是张寿元？”他说：“是他把我们的财产夺去的。”我问：“第二个呢？”他说：“是某某！”我又问：“谁是某某？”他又气愤了起来说：“说来说去你还不晓得么？这一个大家知道的天下世界最坏的坏人！”我不敢问下去了，因为在他的气性头上，若问他第三个的时候，说不定他就会回转头来，说一声“是坐在车上的你！”

前些日子，有一个教育机关，问我来要一篇告诫学生的文章；我因为和学生生活隔绝得太久了，所以先请了一位大学生，一位中学生，一位小学的高年级生来问他们以同样的问题。

大学生说：“压迫学生，佯言不干，而暗弄枪花者斩！造了房子，而虚报账目者斩！把持学校，以学校为衙门者斩！……”他还要说下去，我说：“慢来慢来，你要杀的人太多了，且听了第二位说了再讲。”

中学生说：“我要斩的人，同大学生的意见一样，不过还要多几个。”

小学生说：“更多了，不过从我们的切身问题讲来，是有两种人不得不斩的：一，以学校为发财宝库，不顾学生性命者，不得不斩；二，背后牵线，想造成清一色而舞弊营私者，不得不斩！”

如此说来，尚方宝剑，的确是忙得很。

三　相

看相，似乎是中国人的特技，但是外国也有很精练的人。外国的工场管理人，就须备有这一种技能，方称上选。听说他们雇工人的时候，总须相一番面貌，看这一个工人，会不会变成细胞而来煽动罢工。但不知工场管理法的课本里，讲到这条的时候，用的还是柳庄的系统呢，还是麻衣的系统。可见世事总无独而有偶，不但"古已有之"，亦且"中外一例"的了。譬如说"点秀女"罢，外国也有标准美人的投票，花国也有总统的选举；法国革命的初期，并且还把"摸摸乐"脱得精光，抬着行街哩！

四　出气店

听说巴黎有一种店，店里陈设着极美丽细致脆薄的器皿，标上价目，旁边摆着一根铁杖，任顾客来敲打捣毁。敲完之后，算一算账，就此付钱了结。这一种店，生意兴隆，老有气愤愤的人跑来，一顿乱打，打得笑逐颜开，付钱而去。这一种店的名目叫作什么，我不晓得，就姑且叫它作出气店罢。英美的大都，据说这一种店是没有的，大约因为言论比较自由，大家都在纸上做文章了，所以可以省去一种特殊的营业。中国则更加自由了，妇女们受了气，可以上野外去号哭，叫化子受了气可以沿路而骂街；而且农村破产，国民经济枯完，这种店当然是开不得发的。可是《论语》却竟模仿了巴黎的企业者而变相地成功了，现在还更有许

多攻击《论语》者，目的大约也不外此。总而言之，长歌当哭，幽默当哭，攻击幽默，闲情也当哭，反正是晦气了出气店里的器皿。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原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论语》第五十五期

中国妇女应上那儿跑

记者先生：

你们的那个题目，就出得太彻底。照现在中国的情形来看，完全把家庭丢去，似乎是不可能的。而妇女的职业，又不见得十分多。况且大学毕业的男子，尚在这里叹就职难，更何况乎一般的女子。难道中国女子的教育，真正是这么的受得透辟，人人可以去做佣工而不至于怨恨的么？

我的意思，虽似乎是求全的责备，或者也许嫌太旧一点，总以为是家庭与职业，应该同时顾到。不得已而求其次，则独身成年的女子，应该离开家庭；已婚的妇女，还应该先顾到家庭，而后再谈职业。况且中国的封建制度，还没有完全打倒；若一小家庭的主妇（大家族中之已婚妇女，当在例外），不顾家庭而跑了出去，致使男人不得不受育儿治家之累，岂非将见笑于封建的余孽？

总之这问题，是一个现社会的大问题，断非短短的一篇小论所谈得了；上面的几句空话，也不过是过渡时代的一个补救策而已。

原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妇女旬刊》第十九卷第一期复兴号

残 年 急 景

一 遗 嘱

笑话年年有，今年特地多。近旁有一间学府里的祭酒，大约因为大兴土木，油水喝得过份，头脑烘得冬了，最近回环曲折，绕了许多道路，叩请某人下了一道谕旨。他命学生日日跪诵，说是新的遗嘱。而回到私室，笑对旁人，又说这是父亲大人的手谕。人问你父亲为什么与你不同姓氏？他又说，这是衣食父母之意。

二 天路历程

有一册书，名叫《更岂有此理》，中记一段上天之路；说天之离地，相去只三四百里，由下达上，迟行三日可至，往返，最多也不过五六日。人问"何所据而云然？"作者说："此事家谕户晓，人人共知。你看，送灶神上天，岂不是腊月廿四，而迎归则在三十，月小当然是二十九天。上天一次，往还岂不是五六日？以坐

轿的平均速率来算，岂不只三四百里？”记得前两年，林语堂氏也曾说过送灶神的用饧糖，灶神倒似乎是中国幽默的发电机。

三　醉司命词

因说到了灶神，更想起杭州才子缪莲仙之笔记《涂说》里，有一则游戏词：“笠舫有《沁园春》词四阕，题皆游戏，语趣而工。醉司命云：稽首轩光，吾宁媚于，郭公有灵。怕中郎厮养。误撞楼破，夫人乡忌，同踞觚听。蔬且充羊，豆还撒马，烛婢双行跪在陉。牙饧少，把糟糠风味，奏上天庭。　比邻妇也倾瓶；乍絮絮叨叨念有经。愿米盐凌什。团圞共爨，羹汤欢喜，火旺添丁。虞诩长增，孙卿休减，臣突黔于墨突形。神其醉，看朱衣赤髻，夺去忪惺。”这词用典故太多，虽工却少趣，还不如同一调的咏不倒翁词，倒来得轻松：“矍铄哉翁，适从何来，辱在泥涂？看三眠三起，公然倔强，一颦一笑，全是模糊。捧腹堂堂，点头娓娓，危目能持颠自扶。移时仆，似儿童逃学，装做须臾。　怪渠捻断髭须，惹春梦婆未认得吾。尽相君之背，者般富贵，人心如面，依样葫芦。托地翻身，凭空粉碎，还识先生乌有无？休轻诋，问人间强项，若是班乎？”

四　一元航空券

买航空券一元，有五万元的头奖希望。缪莲仙《涂说》里的一篇妄想词，却早把这钱的支配计划好了。“天上瞎一声，掉下了五万金。忙将三万来营运。一万金，买田置产；五千金，捐个

前程，还剩五千金，遨游四海，遍处访佳人。”

五　挽活佛联

《塗说》中更录有挽活佛一联云：“渺渺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万里，东来不复西归”。今夏喇嘛过济南，听说有三人热死车中，这一对联语，倒正好转赠给他们。

六　月夜听诗

我藏有木版《无稽谰语》五卷，作者自署为兰皋居士，上有甲寅仲夏之月自序一篇，想系乾隆五十九年之甲寅。后见坊间石印本，所称欢喜三续今古奇观，内容实在就是这“无稽谰语”的短篇集，不过把各篇前后颠倒了一下，将目录弄了一弄乱，合五卷成了四卷而已。全书笔墨清丽，趣味隽永；但记事多猥亵，似乎有伤雅道。原书第四卷中，有一篇《月夜听诗》的短文，写得很有趣，特抄在下面，以作中国幽默的另一体的榜样。

“临安某生，弱冠领乡荐；入都应礼部试，被放，怅然南归。行至维扬，资斧乏绝；暂寓僧寺西廊下，将求鬻文以作路费，奈人地生疏，无由自炫。一夕，月明如清昼，出步殿庭中，闻东廊窗内，有人喁喁絮语。近窗窥之，见二人对坐；一短而多髯，一翩翩年少，皆儒冠儒服，把酒对酌。少年者曰：‘弟不敢使兄独呕心肝，故数日来亦搜索枯肠，效灼艾分痛之意；但机致一畅，仅得一联云：诱他酒客常入座，引得诗人上了楼。’髯者点头曰：‘叶楼字极佳！可称后来之秀。仆承重委，推敲半月，幸腹稿已成，差

不辱命。'少年喜曰：'凭仗高才，倘使雀屏中选，非特多金报德，定当感佩终身。'年长者掀髯笑曰：'此诗一投，指顾赤绳系足；尚望谅我捉刀苦心，勿作寻常吟咏视也！'少年唯唯请教，髯者朗吟云：'酒家有酒出新篘，一幅青旗入两眸，只说东南多大店，谁知西北有高楼。'少年拍案曰：'楼字之妙，真令人百思不到。'髯者曰：'未也！四韵最难，无过瘳字，仆昨晚卧而思之，如有神助，得句云：'望将过去心先醉，吃了之时病也瘳。'少年顿足拊掌，乐不可支，叹曰：'岂弟瓜步州边，一时无两？当今天下，锦绣才人，尽搁笔拜下风矣。'髯又诵结句云：'若要一年生意可，再标几个在前头。'生不觉失笑曰：'闻君佳咏，顿开茅塞；但酒香唇燥，何不令窗外人与饮一卮？'髯者惊曰：'隔墙有耳，若使偷谱霓裳，不啻以蓝田双璧授他人矣。'少年者怒，拔关而出，奋臂直前，扭生胸，欲殴，生谢唐突。少年怒目厉声曰：'夺人妻子，誓不共天，何止唐突？'生曰：'耳聆佳作，实未尝目见闺仪，那得有夺妻之事？'少年益怒曰：'窃诗即所以夺妻，尚强辩耶？'生又谢曰：'仆异方流寓，室中自有糟糠，断不敢渔及君家尊眷也。'髯者闻言，出观曰：'既有家室，当无他虑；且观其仪度言辞，似亦略解涂鸦者，不可有伤和气。'少年亦改容谢曰：'一时情急，未及致详，以至开罪多多，幸入座共饮。'乃从容谢过。携生手，入室坐，满斟大卮以进。生问曰：'此诗何题？原韵倡自何人？何便有关佳偶？'髯者曰：'此间有查侍郎者，晚居林下，无凤毛而有掌珍，慎选东床快婿，先观仪表，继试内才，此兄姓郑，家累巨万金，援例授中翰衔，弱冠未婚。月前，侍郎公皮相外貌，选中三十有二人，郑兄亦在列。因拈闺中人咏酒帘诗一章，命依韵属和；其全诗，则余忘之，但志其原韵五字为篘眸楼瘳头耳。'生

曰：'然则郑兄何不即席挥毫？何乃商诸野寺？万一捷足先得，悔无及矣。'年少者作色曰：'谈何容易？无论枯题险韵，谁能七步而成？抑且闺中玉尺分明，非可冒昧下笔；是以同时三十余人，皆作缓兵之计，乞退而捻髭，陆续呈阅。吾幸幼识虬髯，求拜方略，荷蒙季诺，肯赐琼瑶，君已于窗外备闻，万勿漏泄，致败我密谋也。'生曰：'诺。'连举数觞，告别而返，乃挑灯振笔书云：'黄娇隔宿试新蒭，倩尔招摇引醉眸，疏雨杏花寒食店，东风芳草夕阳楼。却疑天上星旗落，会遣人间渴病瘳，留珮斛貂都细事，最怜卓氏在炉头。'吟毕，书于浣花笺上。翌日，问至侍郎家，告阍者曰：'远方之人，行囊告罄，聊奉和章，仰祈资助；寒闺自有荆布，非藉以作来凰引也。'阍者入白，出，达主人命曰：'尊构极佳，既非求偶，不敢延见，谨奉朱提半百，聊供途次一餐。'生欣然拜登，遂匆匆买棹以归。"

一月八日午后抄毕

原载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论语》第五十八期

答《申报·妇女园地》沁一先生

在《妇女旬刊》的一条短短答案之下，居然得领大教，这一块碎砖，总算还不白抛。

我的鄙见，是求全的责备，是要妇女们既顾到职业，又顾到家庭。

男子之就职难没有“之后”或“之先”，妇女方可如何如何等关于时间的问题，我记得没有说到。

小家庭的主妇，“绝对不可从事职业”的这“绝对”这“不可”，不知沁一先生从何处得来的文字。

对于五问问题，我就我的浅陋的学识所能答的地方，谨献刍荛。

第一问：请你去买一本很旧很旧的排陪儿（Ferdinand August Bebel 1840—1913）的《妇女论》来读读，就可以明白。这书英日都有译本，中国译本也有的。

第二问：上面关于男子就职难解决的时间问题，已经说起过了。你若要知道得更详细一点，请备一公函，去问教育部的学术

咨询机关程铸新。

第三问：原问的意思，我看不大懂。是不是说“现在中国，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打倒，所以不复有大家族存在了”的意思。原意若是这样的话，则请你请一日假，离开上海的租界一天，到各处的乡村或城镇去实际调查一下就对。

第四问：怕见笑于封建遗孽的人，就是既不能牺牲一切，上最前线去舍身取义；又不甘同流合污，去分取一点民脂民膏；只弄弄笔杆，苟且偷生的人。

第五问：安宁的小家庭，有是有的，不过现在还是少数，你也承认，我希望将来能由少数而进至于多数。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妇女旬刊》第十九卷第三号

说（勖）杭州人

去年中学生杂志会教我做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杭州——地方印象记》。我以为杭州的景物，写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只写了些杭州人的气质。实在是因为我现在也冒籍杭州，对杭州人看了过不过去的地方太多，爱之甚故不觉言之太激。殊不知那一篇文章出后，杭州人竟有许多对我感到不满，来函切责者，一连有了好几起。我觉得一一辩解，实在也有点忙不过来，想先抄一点古人的文章，来作一个挡箭牌。

田叔禾（当然是杭州钱塘人）的《西湖游览志》与《志余》，总算是杭州最普通的一部志书了罢？而《志余》卷六里，有一段说：

> 杭民尚淫奢，男子诚厚者十不二三；妇人则多以口腹为事，不习女工，日用饮膳，惟尚新出而价贵者，稍贱便鄙之，纵欲买了，又恐贻笑邻里而止。至正十九年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军，斩关而入，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米价涌贵，一斗直一十五缗。越数日，米既尽，糟糠亦与米价等；有赀力人，则得食，贫者不能也。又数

日，糟糠亦尽，乃以油饼捣屑啖之。老幼妇女，三五为群，行乞于市；虽姿色艳丽，而衣衫齐楚，不暇顾也。……

这是一段。又《志余》卷二十五里有一段说：

外方人嘲杭人，则曰“杭州风”。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譬之风焉，起无头而过无影，不可踪迹。故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又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灌水，织作刷油粒，自宋时已然，载于癸辛杂识者，可考也。

偶尔一翻，就可以翻出许多我的粉本；宋元人的笔记里，骂杭州人的地方，当然要更多，我与杭州人无仇；并且抄得太多，也觉与杭州人无益，所以不再抄下去。总之，杭州人先要养成一种爱正义，能团结，肯牺牲的风气；然后才可以言反抗，谋独立，杀恶人。否则，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行，挣扎到底，也无成效。外患日殷，生活也日难，杭州人当思所以自拔，也当思所以能度过世界大战的危机。越王勾践的深谋远虑，钱武肃王的勇略奇智，且不必去说他们，至少至少，我想也要学学西泠桥畔，那一座假坟下的武都头，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生死可以不问，冤辱可不能不报。

三月念八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杭州《东南日报·沙发》第二二八一期

毫 毛 三 根

一 骂的礼让

平湖陆清献公稼书，是清朝一代理学名儒，行事丝毫不苟，平时尝戒绝诙谐。但一翻他的《三鱼堂日记》，觉得有几处也很幽默。当他成进士，选庶吉士后，这道学先生似乎也处处在留心学说京话；日记卷三乙卯年的记载里，有许多音注：如"阜城，北人读阜若吴音之武"，"长班读郝若好上声"，"问长班，乍字读若灼，又窄字读若宰，近字读若形"之类，日记里记得很多。而最有趣的，却莫过于戊戌（顺治十五年）十月初五的一条：

> 十月初五，在家中，大人与谈及仰春公曰："逊翁每为余言仰春公之德；公尝与沈肖山有隙，两家皆大姓，各长一方，及有隙，各聚徒数百人，隔水而骂。沈氏之骂甚虐，而我众之骂者，未尝及其父母妻子也。沈氏之徒皆笑曰：'甚矣，泖人之不善骂也！'骂三日，而沈氏之徒皆去，无有骂者。怪而问之，则肖山阴使人问所以不及父母妻子之故，皆曰：'我翁之

谕也！故骂者如是。'肖山感悔，召其人去，勿令复骂。……”看了这一段日记之后，我们觉得君子之相骂，实在有点好笑。第一，是各聚徒数百人，隔水相骂的一点；当时相骂的声音，想来一定要比现在上海马路上的声音，还要嘈杂。第二，是三日的骂；这些人当勤勤恳恳从事于骂的中间，若要吃饭喝水大小便的时候，不知有没有停一停口。列阵相对而打仗，原是常事；至于列阵隔水而相骂，却是奇事了；大约最大的原因，总因为当时的印刷术报章杂志之类，还没有发达到现代那样的缘故。

二　建设的双重意义

去年秋后，旱期过去，却落了许多天的雨；所以有几条未曾铺上柏油的马路，弄得泥浆没膝。正当那时候，我有一位外国朋友，来杭州游览。陪他在泥途里游泳了半天之后，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今年天旱谷少，民食维艰，将来我们就打算在马路上种麦种稻。”他听了倒很以为是，说中国到底是一个农业国家。后来走到湖边，两旁的道路树上，都挂满了青虫，致地上铺着一地的虫粪，空中飞绕着许多的丝网。他又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昆虫局养在那里的秋蚕，因为外国的人造丝价太便宜，将来我们可以以这些天然丝来抵制。”他听了又点头称是，说江浙到底是丝绸的产地。

三　揩油的出典

人问上海俗语“揩油”的出典，有一位先生答得很有道理。他

说："这话的来源，是于西洋物质文明，借了帝国侵略主义的扶翼，远征到上海的时候起的。那时候，上海还没有电灯，行人夜半走路，都以为不便。于是人民集会，推举会长，去请地保代达贰尹，要求点几盏街灯。从此贰尹告县令，县令告太守，太守上督抚，督抚奏京曹，一直达到了皇上的天听。皇上批准，发下几十万国帑来设街灯，数目先就是半数。以后一层一层，半之又半，发到了地保那里，只剩了块把钱了；地保又收取了一半，以一半发给人民代表；代表也收取一半，以一半钱交给去实际买灯点火的人。买灯点火者，再以一半入腰包，以余下的一半，买了两根灯草，几勺菜油，总算在大路旁点起了一盏象放在棺材前头似的街灯。后来有一个黄包车夫路过，觉得这一盏灯也无济于事，就索性将几滴菜油，也并入了他自己车旁的油灯之内。"

原载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六日《论语》第六十三期

清贫慰语

洪范五福，二曰富；同时五极，四曰贫。当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而贫与贱，也是人之所恶的。可是贵者必富，似乎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的定则；因为“子夏贫甚，人曰：子何不仕？子夏曰：诸侯之骄我者，我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我不复见。”终而至于悬鹑衣于壁，这定则，在西洋却并不通用；倍根论富，也同中国的古圣昔贤一样，以大地为致富之源，但其来也缓慢，而费力也多。其次则他在说商贾之致富，专卖垄断之致富，为役吏或因职业之致富，虽则都可以很快的发财，然而却不高尚。

西哲的视富，也和中国圣人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调子一样。倍根的大斥高利贷的地方倒颇有些近世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剩余价值，与不当利得的倾向。

尤其是说得有趣的，是在讲到财神Plutus的势利的一点。他说财神于受到Jupiter大神的命令的时候，总缓缓跛行，姗姗而去；但一得到死神中之掌财魔王Pluto的命令的时候，却飞奔狂

跳，唯恐不及了。所以致富之道的最快的手段，是在弄他人至死，而自己因之得财的一条路，譬如得遗产之类，就是。其次则如做恶事，坏良心，行奸邪，施压迫，亦是致富的捷径。总而言之你若想富，你得先弄人贫。散文的祖宗，法国蒙泰纽，在他的一篇«论一人之得就是他人之失»的短文里也说：一位雅典的卖葬式器具者，每以劣货而售重价，因而Demades痛斥其为不仁，因他的利益，就系悬在他人的死的上面的。蒙泰纽却又进一步说：不独卖葬具者为然，凡天下之得利者，都该痛斥。商人利用青年的无节制，农夫只想抬高谷价，建筑师希望人家屋倒，讼师唯恐天下没有事，就是善誉者以及牧师，也是因为我们作恶或死人时才有实用。医生决不喜欢人的健康，兵士没有一个是爱和平的。

如此说来，很简单的一句话，是富者都是恶人，善人没有一个不穷的了。因为弄成了我们的穷，然后可以致他的富。不过因节俭而致富，因无中生有的生产而致富，如其富得正当而不害及他人者，又当别论。

那么贫穷的人是不是都可以宝贵的呢？倍根先生也在说，对于那些似乎在看不起富的人，也不可一味的轻信，因为他们的看不起富，是实在对于富是绝望了；万一使他们也能得到，那时候他们可又不同了。所以是清而且贫者为上，懒而且贫者次之，孜孜欲富而终得其贫者为最下。象黔娄子的夫妻，庶几可以当得起清贫的两字了，且看«高士传»：“黔娄子守道不屈，卒时覆以布被，覆头则足露，覆足则头露。或曰：斜其被则敛矣！其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

现在一般人的不守清贫，终至卑污堕落的原因，大抵在于女人；若有一位能识得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的女人在旁，那世界

上的争夺，恐怕可以减少一半。

其次则还有一位与势利的财神相对立的公正的死神在那里；无常一到，则王侯将相，乞丐偷儿，都平等了。俗语说："一双空手见阎君！"这实在是穷人的一大安慰，而西洋人的轮回之说比此还要更进一步。耶稣教的轻薄富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说，富者欲入天国，难于骆驼之穿针孔；所以倍根也说：财富是德性的行李，譬如行军，辎重财富，是进军之大累也。

原载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青光》

怎样消夏

——唯有读书好

今年的夏天，似乎不十分热。旁人的消夏方法如何，我可不晓得，但今年的夏期，我却比往年更多读了一点书。尤其是关于日本史的书，读了不少；并不是因为杭州等处的地图要变，所以先事准备的读书，却因下半年怕要到上海去教这一门功课。

原载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学校生活》第一一三、一一四期合刊

中国是一个灾国

“一雨街头尽激湍，未晴几日又愁干，从来说道天难做，天到台州分外难。”曾记得天台诗人戴石屏，仿佛有过这样的几句诗；实在在靠天吃饭做人的中国，做天也真不容易。动不动不是水灾，就是旱灾，间或还有风灾、火灾、兵灾、匪灾、……灾等。一年到头，报纸上差不多接连不断，登得次数最多的，便是各地的灾状；因而中外善士为灾民请命，为灾民而发起的游艺，善举，以及游艺助赈等广告记事，也特别的多。我每天看报，见到了这些，总要思索半天，觉得人世上的矛盾真有点莫明其妙。中国既有这么些个大善士，忠义之徒产生，何以偏会苍天无眼，独向中国来降这许多灾。或者还是因为在中国的中外籍大善士特别的多，天所以特来降灾，以彰他们的明德的么？

外国报上，记不测之灾的记事，当然也有；然而这总不过几年或几十年中偶发一次而已；并且灾发之后，总也不过记载至一星期或半月就休止，以后便恢复平时的状态了，独在中国却会得

连月连年的记载过去。难道因为记政治要犯忌讳，说国际要危及邦交之故，故而说说灾祥，反可以尽了报纸对社会的义务，终胜于发白纸三张的么？

总之，我觉得中国实在灾也太多，中外的大善士也太多，报纸上灾情的记载，也未免太多一点。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立报·言林》

出版界的年轮

年轮本来是植物学上的一个专门名词，不过用在此地的意思，却只是普通字义的解释。中国的出版界，和中国的政治、社会一样，花样实在太多，变化也真剧烈。前几年听说是杂志年、翻译年、小品年、杂文年，现在又说是小报年了。从堂堂的大论文，而一变为小品杂文，更从几百页的杂志，或十四十六张的大报，再变而为半张的蝇头细字的读物；在这一种变迁的反面，也就可以看出中国地图的变换，与中国国运人事的衰落来。

而这中间，尤其是显著的两个现象，是粗纸滥印的一折书的流行，和高价大部的古书类书的再兴。人家或者还要称赞这两件事情，说是中国现代的文艺复兴，但其实也就是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衰颓的极边的一个证明。

一折书是为适应经济破产后的大众而产生的企图，用意未始不善，结果影响，也不会没有；但试一检查这些一折书的内容，那就糟了。所翻印的仍旧都是封建时代的几本最普通流行的书；新的作品和新的选本，只占了十分之一的地位；而这十分之一的新

书，也浅薄、错乱到了万分。大众的思想，既不能脱出封建时代的臼窠，而新的芽蓓，又浅薄错乱到了这般的地步，试问这一国的国民，还有什么希望。

旧书的重印，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合之处；但大家都走上了这一条倒退的大路，新的光明的开辟，更没有第二个人出来担负，却是目下中国的特殊的现象。这些大部的丛书类书，是为中国有产的中坚阶级与知识阶级而印的；一个社会的上层阶级，只剩了一点过去的追怀，而没有了现在与将来，那这社会岂不是和地下的本贝城一样，岂不是个个都变成了僵尸？

还有一层，从中国出版界的流行上，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最大的弱点，是中国人的没有创造的精神。模仿取巧的小聪明，损人利己的恶习惯，是谁都具有的，但是新的创意，却在中国人的脑里耙扬不出半点来。所以在立身处世上，大家只知道做官可以发财；在经商营业上，大家只知道作伪就是正路。你出一本什么，我也马上出一本什么，你定一个商标，我也同样画一个葫芦；到了强邻压境，城下缔盟的时节，还要说一声："敌国外患，何代没有？犯而不校，斯真君子。我但求能胜国人，也就是一世之雄了。"

原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时事新报·青光》

人　与　书

书本原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就是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它产生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它供给了智识饥渴的乳料。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和大发明家，都从书堆中进去，再从书堆中回出来。

因书本与人类关连之亲密，所以古来学者多把书本当作人类的朋友看待。史曼儿说得好："一个人常常靠了他所读的书而出名，正象他靠着所交的朋友而出名一样；因为书本和人们一样，也有交谊。一个人应该生活在很好的友伴中间，无论是书或是人。"

同时亦有一位，他却把人生当作书本子来看，那就是诗人高法莱了，他说："一个人好象一本书，人诞生，即为书的封面；其洗礼即为题赠；其啼笑即为序言；其童年即为卷首之论见；其生活即为内容；其罪恶即为印误；其忏悔即为书背之勘误表；有大本的书，有小册的书，有用牛皮纸印的，有用薄纸的，其内容有值得一读的，有不值卒读者。可是最后的一页上，总有一个'全书完'的字样。"恕我续上一个"貂尾"，就是在人的诞生之前的受精成孕，就是书版未曾付印前之文人绞汁草稿了。

书即是人，人亦即是书。

原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立报·言林》，署名文

中国文学让外国人来研究

自从文学无用论——鄙人原也是这派论者之一——流行之后，果然各大学都撤消文科了；科学教科书好在外国文的都有，文学是不生产的。但是一批学理工，学机械，学造兵制炮，以及学航空海陆军的留学生回国来后，做的却都是等因奉此的工作，而实际的事情，聘的还是以外国顾问居大多数；至于生产，除人口增加之外，倒也似乎不甚见效。这原因，我想总还是中国人种的不好，所以在学问上也发生了等级的问题。第一，外国人之学政治、军事、机械、航空等者为超等；第二，中国人之学此等技术者为二等，所以降令作官，使弄文笔。准此类推，则外国人之学中国文字者，当更能比中国人超出一等，我所以提倡以后的中国文学，应尽先让外国人来研究，以冀符努力少而成功多的经济原则。若夫中国人之习外国文学者，自然比中国人之习中国文学者更胜一筹，研究中国文学者之所以不得不赴欧美留学者，原因在此。

至于孔子的应尊重，王安石、管子的宜熟读，却因为他们并不是文学家。亦犹之乎我们的读中国地理，中国历史之得用英文课本也。是不是？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宇宙风》第二期

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江淮一带，以及两广闽浙，向来有溺女之陋习；唯其如此，所以白乐天的“不重生男重生女”一语，成为中国古今独绝的反语名诗。自孔子讥女子为难养以来，国破家亡，以及一切大小不幸的事件发生，就都推在女子的身上。唐人有“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的绝句，因而弄得现在五省之亡，罪魁也必然地是翩翩的蝴蝶。字典里女字部的文字，坏字较好字为多，古今来的诗词文选，女流总列在卷末，与僧道同居。

革命成功，女权确立的今日，还是左一道命，右一条令的在取缔女子的奇装异服，禁止女子的赤足袒胸，理由总是坏乱风化；一若风化之维持，全须女子负责者。花柳药房的广告，化女子为蛇身，舞场营业的东家，以女子为诱鸟。这种情形，大约与男扮女装的小旦一样，当是中国唯一，世上无双的道地国粹。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宇宙风》第二期

新年的旧事

看梅花还早，烤炉火没有钱买煤，而写文章又有一位大作者在对我作人身的攻击，几乎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对他所犯的不赦大罪，所以到了新年，我也只好做一点旧事情来免免罪过。旧事情是什么？就是既不得罪人家，也不损害我自己的读书。虽然，在上城隍山，买书，或哼两句旧诗，死一个儿子，有一个老婆，记记日记，都足以构成犯罪证据的现在，读书想来也必于宪忌的无疑。不过《沙发》的编者，似乎又在想给那位攻击者以材料，常常来催稿子，这一种材料也只好供给一点。

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话在读史籍的中间，尤其感觉得真切。一部二十四史，读得头昏脑涨，结果却二三撮的实事，也捉摸不到。所以我今年打算把读历史的习惯改过了，来读文法。无论是外国文法书，或中国文法书，因为所载的，都是对于文字的法律，衍文自然必少，而报道想也一定正确，模仿文法书中的文字来作文，我想文体大约总可以简洁一点。

旧诗词，本来也是我所爱读的东西，但读旧诗既被列入罪状

之一，在这里只好乖巧一点，不作声了。

人到了中年，感觉最切的，是无钱的悲哀。平时每在痴想："那一位由国家养活、而专门在对我作人身攻击的先生，莫非因为在猜想我有了钱，所以气不过而干出那一种同小孩写无头榜似的勾当来的么？"若是这样的话，那我倒还得伶俐一点，不要被白骂了才对。今年正月，打算上市场上去找些致富奇书，或陶朱公集来读读，以期不负那一位先生的辱骂，虽然因为上了一次致富捷径的大道，买了一条航空奖券之故，我也曾被那位先生讽刺过，但富却终不可以不致。

好死不如恶活，人家来侵略，来辱骂，我但须还有退步，总还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的好。讨饭子也要性命，大财主生急病的时候，总愿意把全财产拿出来换几刻的残生。我近来倒也感觉到长生的可贵了，所以新年中第一就打算去找些养生秘诀的书来读读，预备做一个念二三世纪的彭祖。

新年里为免去被骂计，只想做点旧事，还是读书；而读书的范围，大约决定是上述的三种；质之《沙发》的读者，这也够被攻击的材料不够？

原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杭州《东南日报·沙发》第二五五三期

新生活与现代生活

新生活自从委员长在南昌提倡以来，推行已及两年，今天是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的日子。新生活的实际如何，趋向如何等问题，在南昌，在首都以及在各地，都已经由各位先进很详尽地阐说过了，在这里自然可以不必再说。新生活推行以后的状况如何，效力如何等，也都已经有报告在各处的刊物、新闻纸上披露了，这里更加可以不谈。现在我只想把新生活与近代的关系，约略地说一说。

自从欧洲资本主义的烂熟文化，流入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的国民生活，就起了一种绝大的变化，最简单的流露，就是在大家的心目中，人人都起了衣要洋服、食要西餐、住要高大的洋楼、行要最新式的汽车的欲望。欲望原是可以促进创造一个动机，我们当然不应该学古代的哲学家一样，一概地把欲望来杀死。可是享受欲同创造欲并不同时并进，互相致用的时候，那这社会就会枯竭而至于崩溃，永无再兴的一日。十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总算近代化了，摩登化了，但试问我们所享受所必需的

物质上的供给，有几件是我们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外国人要享乐，要舒服，就晓得自己去制作，去发明。所以为战胜黑暗之故，他们才有了电气；为缩短海陆空的距离之故，他们就有了飞机、火车、汽车与轮船。至于我们中国呢，只晓得坐享其成，只晓得利用人家的努力的结果，来恣助我们的享乐。穿一身好衣服，住一所洋式房子，有一乘一九三六年的汽车，就自鸣得意，自己以为生活已经近代化了，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摩登绅士，一位二十世纪前半世的最新的新人。殊不知实际呢，这不过是一点近代生活的皮毛，一个将血肉生命挖去了的剥制标本而已。近代生活的真义，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我们要想经营近代生活，先要从近代生活的精神上做起才对。先整饬个人，然后顾及团体，推而广之，使国家生活、社会生活，都合着近代的意义，那才是真正的大道。近代生活精神上的第一个特点，是在人人都能够营一种独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的方式，是古代的独立生活。近代的独立生活，就在除去了老弱孩提和残废者之外的个人无依赖的生活，有活动能力的尽量去活动，有创造能力的尽量去创造，食求果腹，衣求蔽体，行住坐卧以及死后埋葬只须有周围五尺之地就够了。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之下，照那样去操作，我不信世界上再会有一个不能独立的人。

中国的大家族制度，是养成依赖性、摧残独立人格的一种最坏的封建遗制，从前的所谓五世同堂等美谈，在近代社会里，早就不适用了，我们要营近代生活，当从先营独立生活，打破这一种富有依赖性的大家族生活做起。当然大家族生活，也有大家族生活的好处，如对于老弱者的孝敬，与对于幼小者的爱悌之类。

但这些互助的好处，在近代的社会里，应该扩大一步，依社会的前提去尽责的。我们不应该为了一家一族之故，而不顾到社会，我们更不应该在大团体里分将出许多势同对垒的小团体来。爱乡之心、爱家之心，原也不坏，但扩而大之，推这一点爱家爱乡之心来爱国爱人类，社国就有进步，生活也就上轨道了。

近代生活的第二个特点；是自治生活。生活要自由，原是人家在说的一句口号，但是你要自由，人家也一样的要自由的，我们平常曲解自由，老想把我们自由建筑在他人的牺牲之上，于是乎就形成了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目前的现状。长此下去，则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恶人当有更恶的人来磨他。欲求生存，尚不可得，更那里还能够自由，还能够生活，所谓自强，所谓自力振拔，重要的地方，就在自制自治地做人。

英国人是最爱自由的民族，但英国却上自绅士阶级起下至劳动社会止，没有一个人不晓得尊重他人的自由，当然他们对于殖民地的异种人又是另外的一种态度，这事自当别论。但是现在我们在讲的，是同等的人在同一社会里为人处世之方，并不是在说侵略的政策，所以自治生活，是近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木不自腐，虫那里能够蛀它，我们要想图存自拔，先要从这一点做起。

近代生活的最大特点，是积极的进取的一种倾向，工作的时候拚命地工作，娱乐的时候拚命地娱乐，两不相犯，各究其竟，这一种生活趋势，我们姑且叫它作积极生活罢。中国人向来的习惯，就是因循苟且，万事都作退一步想的，所以大家都没有一种轰轰烈烈的作为。人生世上，而无作无为，岂不同不生一样么？峨眉山的老道，镇日地打坐无为，虽活到了二三百岁，也只同一棵老树，或简直一块岩石的存在一样，这种生活，究竟有什么意

义？所以我们要求生活，先要有作为，古人有几个"为"字，都说得很对，我们若想不违背近代生活的真义，当照着几个"为"字做去。第一，是"有所不为，然后方可有为"；第二，是"见义勇为"；第三，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第四，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上举的三种倾向，是近代生活的特点，也就是近代生活的真义。现在既明白了这几点之后，然后再让我们来把它与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比较一下吧。新生活运动第一年所提出的口号：规矩与清洁，是不是就是造成独立的生活、自治生活的始基？新生活运动第二年所提出的口号：把生活来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又是不是全合乎上面所举的三种近代生活的精神的？

大家以为新生活运动，与近代生活是背道而驰的两种生活方式，我以为这只是皮相上的见解，想营近代生活，要拿住近代生活的核心才对，先是出入于舞场酒馆，或穿几件摩登西服，交几个漂亮女友，这并不是近代生活的全部。享乐是劳动的补偿，不劳动者的享乐，便是社会的害虫，一般人只把享乐的一面，拿来作近代生活的真谛，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唯希望我们大家能遵守着新生活运动的三化精神，同时也不违背于近代生活的主旨来营我们的生活。若更能加一点奢望，则于三化之外，再增入一种科学化的倾向，那就更觉得完美了。世界的和平，人类的福祉，全视乎这种生活的能不能实现。在上面的这一段废话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并不详细提及的原因，就因为我在预想着大家都已经明白了这新运的前因后果，而各自在开始实行了的缘故。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在福州广播电台的演讲，
原载同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福州《南方日报》

高楼小说

解题

平常不大会说大话，尤其不善于说谎话（撒一个谎就要被人家拆穿，而自己更是拆穿这谎来的第一个人，因为老会瞒不住地哄笑出来），所以只能学学虫吟鼠叫，顶多顶多也只吱吱地响几声而已；这一种响声，我想叫它们作“小说”。这一次因欲改变一下环境，寻求一点材料来写些游记之类的东西之故，飘然地到了福建，实在是只同断了线的轻气球一样，来也并无目的，去也不留踪影的一种汗漫——并非浪漫——的游行。福州地当闽江的曲口，年年要涨大水，因而寓居的处所，也拣上了南台江上的最高一层楼；所谓高楼者，就系指我现在寄住着的这一间屋顶间而言。读者诸君，看了我这一个标题，第一请不要误会，以为我在写高楼上的才子佳人式的粉红色的历史；也不要以为我在模仿那位巴黎学士院的才人，身住在屋顶而对窗外面的虫鸟世人，簸弄着哲学家

似的言辞。

一 说我的做了官

因为我人既到了福州，而这里的当局又发表了一道委某某为参议的命令，于是乎上海的各小报就有了材料了。有些说，某某人做了官；有些说某某人否认着做官；更有些说，某某人是可惜得很，竟把文学家的头衔卖去了，还只卖了二百元一月的小官薪——这一个二百元一月的官俸，也不知是那一个给批出来的，连据说是做了官的我自己，也还是莫名其土地堂（且学一学小报作家的大笔吧！）在这里！——总之是“耶苏自有理”，“公婆各有理”，你要说他们不对，他们倒也写得象煞有介事，连我上车前夜，和老婆在内房里闲谈的一幕都被揭发出来了；可是你若说他们对呢，那天下的是非黑白，简直是要颠倒了。但是，这些倒总还不在话下，现在既被说在做了官，那借这官字来做一篇小文章，总该是宪法上所不禁的自由，我且先从官字来立说吧！

按官犹事也，做官若只指做事，那做做官当然是没有什么。又官谓各当其任无差错也，那不管是从前我在上海杭州做些什么，现在到了福州又做些什么，原是与官不官无甚关系的。可是细味各小报及报尾的许多言论，似乎他们都不把官字解识得那么古奥。大约做官可以发财，可以摆官架子，可以打官话，可以指使小官，敲剥百姓，可以放火杀人，可以……等等，才是他们的所谓官字。若说做官是这样百事百可以的话，那我倒也很想做一下他们心目中的官，来对他们作一下威势看看；但这事实的不能成立，已经在他们讥讽我的文字的洪流上可以证明了；所以这一

次的说我做了官，终竟是无异于他们自己的证实了他们的不对。并且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想到从前他们所加于我的许多头衔，究竟是怎么样的内容。他们曾说过我是颓废派的代表，说过我是醇酒妇人，鸦片麻雀，无恶不作的文人。

二　说日本少年军人的发魇

日本的少年军官兵佐三千人，最近在帝都暴动，占领京中各官署要所，杀死了许多他们的天皇所任命的内阁官员，是大家在报上所新见的事实。这一幕政变的全武行，我不晓得还是叫它作悲剧呢喜剧。杭州人的俗话，叫好笑的趣事统作“发魇”，下面的一个魇字，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写法？但日本的这一回事情，我想法好以这两个字来批评。我们试回想想希脱勒的断行Coupd’etat的当时，后来在他所发表的反对党的罪状里，有因他们在滥行鸡奸的一条，这真是多么发魇的事实呀！

日本的少年军官，口口声声，只说是在尊皇爱国，但实际上却用了天皇所发给他们的子弹兵械，杀死了许多天皇所亲任的上级的官员，这还不是发魇么？明治维新，所赖以立国的根基，是在法治的两字，而现在却竟可以以三千的枪杆，推翻一切了；宪法的尊严，天皇的地位，在少年军人的眼里，岂不也只是一个魇而已耳了么？

很有人来问这一次日本的叛乱与中国的利害问题的，我以为这次叛变，关系中国的利害倒还事小，对于日本的将来，却是影响很大很大。中国的所以不能统一，不能御侮，终至版图日削的

原因，其弊是在政治的不上轨道，军阀的为所欲为；这一次日本的事变，倒有的象起中国的政情来了，那以后的日本，也就可以推想而知。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九日

三　说“中”与“一”

宋人有两句名言，叫作“兼近四隅，不失其所者，中是也；并总万物，不失其元者，一是也。”这几句话，无论在做人，弄政治，办外交上，都用得着。中庸之道，一以贯之，本来就是儒家的理想。均势不保，畸重畸轻，这现象在社会上流露，就变成贫富的悬绝，阶级的形成；在政治外交上流露，就变成依赖与屈从。然而从反面来攻击，原不患乎无辞，所谓以夷制夷，所谓二重外交，便是进攻的口实。弱国何尝没有外交？只教善处其中，始终如一，天下的难事就可以简易化了。

四　说谣言的滋长

空穴来风，必先有隙，谣言的起始，当然是有一点点因头。可是雪地滚球，愈滚愈大，结果弄得球心的一点，完全不见，也是谣言的自然之势。甲说一句“东京造了反”，乙就会把它变作“卵泡打着裥”；有一种游戏，叫作打密电，所利用的，就是这一种错误的传授。男女数十人，环坐起来，由甲密向乙的耳里传送一句话，以后由乙而丙而丁，依次密传过去，到了最后的一人，

叫他公布出来，这一句话会变得奇形怪状，完全与本意不符。别的不说，就只说关于我个人的上海谣传罢，先说我中了航空券的头奖，后说我到福建来做了官，又说我的俸金有一百五，二百，以至于三百，更说我是来做教育厅长的。关于一个人的事情，尚且纷歧杂乱到如此，关于社会的变动，政治的情报，自然更要添头添脚，换皮去骨了。弭之之法，还是以公开为上策，吠犬不咬，响屁不臭；万事能开诚而布公，谣言自然会失去它的诱惑的秘性。

五　说交通之与人情风俗

交通之有益社会，在小学的作文里，也时时可以看到；但是明知之，而不做之，却是中国人的通病，也无怪乎胡博士的要发“知难行亦不易”之叹了。即在福州一隅来说，西北障着仙霞杉岭，东南濒着大海，交通自古就不大便当的。因此弄得人情固执，社会守旧，封建时代的遗习，还到处可以看得出来。中原人士，对福建亦视同蛮域，一向就不大注意，结果，福建人自然也只好闭关自守，与中原气脉不通。现在虽则已经到了陆有公路，水有轮只，空有飞机的地步，但是因气候的不定，路工的未竣等等关系，和南京上海的交通，还是常常不能稳定，这在文化上、建设上、国防上，终觉得是一个绝大的障碍，我们只希望五丁力士的早日的来临。

六　说历史的循环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五序福建一文中说："昔东晋时有孙恩者，出没海岛，为闽浙患。恩死，其党卢循继之。循灭，余种悉遁入闽。今泉州夷户，有曰泉郎者，亦曰游艇子，厥类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船之式，头尾尖高，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往往走异域，称海商；招诱凶徒，渐成暴乱。嘉靖中，倭夷蹂躏之祸，此辈所致也。"又说："倭夷之志，在子女玉帛而已；然其倡乱者，非皆倭也，即所谓泉郎之徒也。"从这些话里看来，汉奸原是无代无之；亡中国者中国人，为虎作伥者，是伥鬼，仍系被虎吃了的人，并非老虎自身。所以中国人老爱说，历史是循环的；帝制虽除，而外戚宦官之祸仍烈，泉郎虽亡，而泉郎的同志，仍布满闽浙。这话虽有一半真理，但也觉得不可墨守旧文。历史虽有时有循环的外形，而其中可总逃不了进化的至理。现代汉奸之所凭借者，岂但了鸟船而已，其背后还有不驻兵区域的护符；倭夷之志，又岂只在子女玉帛？进一层更有和好的同盟。不过进化原理，有时也有例外，譬如张经、俞大猷、戚继光等的战绩，现在却还没有；非但没有，简直还在向后的演进。执此两端来看历史，我真不知还是来赞成进化论好呢，还是来说循环论好？

七　说文人的出路

先附来函一封。

达夫先生：

对不起——自己来介绍自己，我是一个岁数并不怎样大而生理上已经老朽的人。我的故乡是在已经被蚕蚀去了的秋海棠叶的一角上，姓恁名谁，恕不宣布——但并不犯共产党嫌疑，请放心。职业一向填什么证明书，或者保证书时都是“儒”，但现在可不敢“班门弄斧”，老实告诉你，我是一个教员。然而可不是“国粹”教员，而且有生以来，就没有同“国粹”打过招呼——除了有一次因念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生一场疟疾，而费去两瓶“金鸡纳霜”以外。虽然如此，我可很喜欢“国粹”的近族——“文学”，或者是“文艺”。然而虽然喜欢，但念的并不多，一则是职业的关系，二则是不认识外国字。英文除了“a boy and a dog”和“It is a cat”两句能认识，还能背着书本写下来外，其余则“恕不招待”。至于高尔基、歌德，还有什么大小仲马等，更没有半面之缘，虽然我可也知道，高尔基专门骂他舅舅，歌德则专门结婚，而大小仲马则是父子作家，然而这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至于真的高尔基等，如果在旧书摊上相遇，那也只能列入“It is a cat”之流；因为他们全是弯弯曲曲的东西，和我们的“横平竖直”，是丝毫不发生关系。因此我求知识的唯一方法，只有出在我们仓颉先生的手里。

在过去我念过“背插单刀”的黄天霸，还念过自第一集起，以至第三十二续集还没有止的《彭公案》，当然还有其他，如贾宝玉、宋江之流。“九一八”事变，从边塞被赶

到文化重心的北平，又幸从一位“鬼头鬼脑”的同学的狗皮褥子底下，翻出一本《呐喊》，虽然当时那位同学不大高兴，似乎认我有维持公安的嫌疑，然而终于被我从头到尾读过了，而那位同学也未因此而吃官司。于是我晓得文学之中，还有阿Q其人，但再找第二个阿Q就不见了。结果遇到《漂流三部曲》，而知道同老婆吵架，可以到城隍庙告状。然而这还不足为奇，不晓得是在某年某月，竟和你先生的《沉沦》，还有好多的什么集——恕记不清了——见了面，天卩卩，这是怎么了？“呜呼！呜呼！呜呜呼呼！！”当时确这样的“呜”过“呼”过，还赞成过封你为文妖的那位先生的高见远识。然而——也许不是然而，是因为“入鲍鱼之市，久而不闻其臭”的一句话，所以我又觉得阿Q怕老婆找城隍，和“捧着脸蛋乱咬”等，究竟比“柳条儿弯弯，花瓣儿片片”要来得实在些，或者有用些，于是我在“文艺”大道上，就错了轨而走入“引车卖浆”的辙里。

广读而不作，似乎不大甘心，况且还有“青年文艺家”这个美名词，在不断的窑姐般招着手。于是由读而作，由作而改，由改而丢，中间十足的经过四个整年，然而结果还只好“读作改丢”，至于和旁人一角量，则又成小巫见大巫之势；因此虽有投稿发表之野心，但勇气总是鼓不足，于是一页一页的开明稿纸，只有一匣一匣的自来火往回换。

现在灰心了！灰心告诉谁呢？老婆不管这些闲事，只要有自来火往回换，并且每天能伏在案头写稿纸；而

不象你先生往韩家潭跑去找银弟，她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所谓文艺先进者——如“思想界权威”——“小品圣人”——“艺术的艺术家”——“三角或多角大王”——以及被封为“颓废派”的你先生，还有等等，我是一个也不认识。虽然现在我的家，也和《恋爱日记三种》的作者一样——同周作人先生住在一个胡同里；然而周先生的家，我可没有去过一次，至于枣树上的红枣，更没有福份，只能看着眼馋而已。因此我有点彷徨了——不——大概是找不着路了吧！

在第八十二期《论语》上，晓得先生就任主编之职，贺，我没有资格，而且不知这种职务在先生身上，究竟是荣是辱，所以废话不敢多说。但从这里得到先生的通信处——因为主编总要到编辑社的——心中非常的高兴，以为在文学的道路上，今后至少要算是摸到一只电筒。然而第八十三期《论语》出版时，先生竟告诉我们暂不北来，预备在福建寻找郑成功烈士的遗迹，这是如何的失望啊！但“老天无绝人之路”，不晓得是在《时报》还是什么报，得到先生与陈主席有交情，而被封为什么“议”的消息，同时登出薪金“法币二百”，但第二天则又改成“三百”，究竟是二百或三百，与我并不发生关系——因为我不来问你借钱。但须等几个月以后，才能回沪就职，这遥远的日期，使人如何的着急呀！如何等得了呀！所以——大概是“不揣冒昧”吧——竟寄一封讨麻烦的求教信到福建省政府，求他们代转。然而心中又在恐惶，恐惶这封信会被丢掉，但这也只有祈祷上帝保佑

——阿门。

我的学识大略，已经在上边说过，究竟象——一知半解——门外汉——半路出家——不懂外国文——不愿看翻译书——这种人，若永久的下去，能否有一点希望？假若不可能的话，我就不必在做“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的梦，而致眼球一点一点的加长起来；设若能，又当怎样使他进步呢？这写了改，而改了丢的事，我实在不愿继续下去了！请指一条明路。

这是一封不客气的请教信，如果先生以为可以公开的话，请在下期《论语》上见复，否则盼望能得到一封指教信，因为一个找不着路的人，他的苦闷，不止一万分啊！

请求者黑白顿首

下面再来作答。

黑白先生：

对不起——恕我借了你的来信，当作我的文章。文人的出路，向来就只有两条，一条是“不做文人”，一条是“不要靠文章来吃饭”。我这答案，也许是文不对题，所答并非你所问的地方；但细味来函，则意在言外，这两层却是先决的条件。若这条件解决之后，则做文章当然是自由的行为；不但“读作改丢”这一套，尽可以反复地演，就是撚断吟髭，掉入醋瓮，也决不犯法，只教你吃得起痛。至于将来的有没有成功的希望，那请你不必顾虑，文学未必一定是几个有特权者的私产，世间无难事，所怕的倒是有心人。他如发表的援引之类，更

可以不必担心，不才如我，当然也能为你尽一臂之劳。其次是古人的许多教训，也可以为我们取法的，譬如顾亭林说，文不贵多，只须有几篇能传，就可以了。又如陈去非问崔德符以作诗之要，崔说："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总之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是第一步工夫。至于文字的内容，就是现在流行语的所谓意识呢，当从胡文定公释心远时所举的上蔡之语："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此之谓心远。"立言不为一时，文须有益于天下，才是真正作者。

一九三六年三月末日

八 说预言

世间的事情，大抵理有所必然，势有所必至；佛家说因果，儒家说知天，并谓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预言岂真有魔术的么？要不外乎推理度势而已。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古人并非星相家，也非天文学家，不过以经验来推算事理，大致微中。韦尔思的预言一九三六年有大战，系根据海军协约的期满，与夫俄德准备之完成等事实；更言日本的必并吞中国的全部，乃鉴于中国人的不喜欢抵抗。

可是预言也有时会不中，那便是人的问题了；悬崖勒马，鸣鼓反旗，虽有智者，也难捉摸，这不过是一时的小出入；结果却总如宋人之所说："善观天下之势者，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宁无事

之时，语人曰，其后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微见几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于可忧，而忧之于无足忧者，至忧也。”所以杞人忧天，夸父追日，人家或将笑他们的愚，我却想佩服他们的德。

九　说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是古人奖励读书的一句成语。从前读到一册坏书，读后每觉得为古人所欺；现在多了一点智识，反过来又觉得古人的不我欺了。总之，好书读了，原有所得，就是可以知道它的好处在那里，可是坏书读了，而知道它的坏的原因与地方，岂不也是一得？从前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之意，也不一定是从正的一方面着想，反过来在负的一方面，也何尝不可以为鉴戒。因此，从前是非有定评之书不读的，现在却马勃牛溲，一例的都想看看了，这大约总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

十　说登高而望远

《礼记·月令篇》里说：“仲夏之日，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我想远眺望，升山陵，又何必一定是在仲夏之月？大抵的人，上了高台，四望远处，总没有一个人会感到不快的，这我想也是 Inferiority Complex（不及错觉）的作用。人实在也太渺小了，而欲望之高，心愿之大，却真是万物之灵；除人而外，恐怕没有一件动植物，更及得人来。因而登之高处，俯视一切，一时就可以满足满足欲望，以为自己是高于一切了，自然也就感到快活。耶

苏之被引至高山，使看下界，撒但兄原也在利用这一点人的弱点。古人说游览，大抵是志在登高。譬如穆天子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望钟山之岭。又如齐景公游于牛山，而北望齐国曰："美者国乎，郁郁蓁蓁。"还有楚王登彊台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临方湟，其乐忘死。至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后，举目有了山河之感，那么登高而望远，可又有了别的意义；古人叫作卧薪尝胆，现代人就叫作瞭望失地，究竟是快乐还是悲哀，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要人，这话却不容易说。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十一　移家别纪

杭州信来，说是新修的一间草舍，已经油漆完成了，旬日之内，就打算搬进去住，教我若走得开，该回来一趟；于是就抛去了许多闽海的亲朋，走下了那一间四层楼的屋顶，踏上了就是乘她而去的三北公司的轮船，于是又做了鸡声马背，摇摇不定的长途的旅客。

船中两宵无事，暂且按下不表；踏上了上海的岸头，觉得第一件异样的怪事，就是海关检查员的工作的起劲。

"国内往来，又不是飘洋过海的外国商船，何以要查得那么紧呢？"我有点觉得奇怪，所以捉到了一位海关役员，就这么的问他。

他先对我一笑，随后就简单明瞭的答了我一声说："防走私呀！"中国国家的最大几宗收入，似乎是关税、盐税、统税之类，

农村破产，农民断种，田赋是靠不住的了，这走私的一道，却的确是可以制中国人死命的一条恶计。欲亡人国，先吸国髓，灯尽油干，不亡自亡，前几年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箝制，我们还在引为大憾，现在却连这一种不平等条约的关税协定都用不着了，这又是一种如何毒狠的进攻策略！人进我退，退到了不能退的地步，还要一声声地说和平，还难道是古圣昔贤“以礼让为国”的教训的结果么？我怀疑，我也在切齿。

上岸之后，去找几位住在上海的朋友，接谈之下，才晓得了最近各地查禁刊物的命令的苛严；外国人对中国人，用那一副手段，中国人对中国人，又用这一副手段，地厚天高，百姓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眼见得自己的老婆被人强占，而这被奸的女子，还要禁你发声，这气教你究竟将到那里去出呢！

踏到了四马路的书业市场去一看，在百业萧条的目下，似乎这一业还保留着一丝的活气。但是单行本不销，廉价的杂志却占据了出版界的首席，这状态又那里能够说是文化上的常态？上面压着一大块千斤重的铁板，一群面黄肌瘦的人，只在这重压下喘着渐渐短缩的气；渐喘渐短，渐喘渐微，这不是临终的现象，又是什么？

在阴晴的灰色天盖下，上了沪杭车座，那一批乘春行乐的同路客人，还是和每年春天所见到的一样，说的是上海话，穿的是外国衣，吃的是沙利文麦瑞儿的糖果和面包；真个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你假若向他们说一句“中国就得亡了！”我相信他们会大笑起来，因为“中国亡就由它去亡，上海是不会亡的”是他们的信念。

五小时后，天下了微雨，在黄昏的灯影里，遇见了到车站来接的儿子和女人。几个月不见了，心里虽则感到了异样的喜悦，

但面上却觉得总是生生的，这一种混合感情的难熬与痒蚀，我想就是叫最善写心理变化的鬼才泊罗斯脱来写，也写不周全的，所以在这里只能不说了。

第二天搬家，把书籍器具等草草安置了一下；第三天因感到了疲倦，不想挺起身来整理书籍，午睡之余，却拿起了笔，写了这一篇身边的杂记。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记于杭州之新居风雨茅庐

纸上谈兵两则

一　爱国心的功过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记者，曾写过一册叫作《爱国私心，还有点儿不够》的书。他大数狭义爱国之足以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终而至于对人类、对社会成一绝大的威胁。这话虽则有十足的宗教意味与懦弱的人道主义色彩，但大致当然是不错的。一味的蛮横，一味的强暴，假言爱国，便可以将人类互助，国际信义，以及自家的体面都置之不顾的Chauvinist们，结果，非但对人类、社会、文化是一大威胁，就是他自己本身，也势必至于变成众矢之的，非为周围的人所屠戮不能止。

对于他人的这一种侵略的、狭义的爱国心，既有了这样的判断，那么我们自已，也务必要小心一点，不陷入到这种爱国邪道

上去才对。敌国外患，何代没有？我们所持的是正义，所抗的是横暴，只教合此意识，同此目的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秉此大义来言战言和，就是失败了之后，也可以为天下后世人所谅宥。同时敌国之中，敌国的与国之中，能持正义，殉公道的人，数目也一定不少；我们只教能激励，能坚持，能鼓动，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所感化，而起来作我们的后盾。春秋时两国交战国民，联合起来制止杀伐的事情很多很多，这是在战云暗淡的期间，所应该注意的一点。

二　国防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

中国有一句格言，叫作“应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对于个人的行动尚且如此，对于一国的国防，自然更非有一种百年的大计不可。

国人所患的大病，就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种搪塞哲学；将这哲学实现到国防上去，就变成现在那么的狼狈不治之症了。当然，临时的救急处置，自然也不可缺少，但同时永久的计划，也一样的不能够忽略。试看看九一八事件以后，几年之中，我们的国防大计，究竟完成了几种？平时我们所奉行的，是不是全都搪塞一时的计划？若要作战，这当然又是该注意的一点。

原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四月一、十六日、五月一、十六日、六月十六日《论语》第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九十期

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在青年学术研究会演讲

主席，诸位，在这二星期当中，来找我谈话的朋友很多，演讲也讲了好多次，要说的话，差不多说完了。

诸位，人是一样的，我和各位也是一样的，关于知识和经验也是差不多。在过去一般社会上的人，就加一个专门名词在我身上——叫作浪漫派、颓废派作家——，在最近上海、南京、浙江各报纸上，象开玩笑般，说我做官了。做官是有多种的，我们且先来解释这个官字。官尤事也，官者，人尽其责之谓也。若是如此，那做官就是做人。我现在即使做了一个芝麻绿豆官，也和我的做人并没有相背或转变的地方。

对社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不贪污，不敲吸民间的膏脂，这是正当的做官，象这种官，也大可以做得，可惜以前贪官污吏和“只许官厅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类的官太多，所以把“做官”二字弄得不好听了，现在的官，只变成升官发财，贪官污吏之官。故上海各报骂我写文章没出路，吃不饱饭，就跑到福建来

“做官”了，象煞有介事的。

因此我便联想到青年出路问题，青年的出路，我以为可以分做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说。

说到积极方面，一个人是要生活的，是要从事生产的生活，能够利己利人才对。除做文章外，也可以从事生产事业，如工、农、商……等等，不过还是从小处做起，运用必要的技巧，去营生活，去从事一切，才是正当的做人。譬如上海小说家天虚我生，从前是个杂文编著者，后来心机一转，觉得咬文嚼字，做做文章，并不是一个人的正当事业，于是就去改行从事实业去了，这我们当然不能够说他是不对。还有在山东有一位武训公，他是未受过教育的，到处受人奚落，后来，他发誓了，要办一个学校，可是他没有钱，但他就去做了乞丐，到处行乞，结果，他办了二个、三个，以至十数个的学校。这也是做人不必尽走一条路的实例，只教目的、宗旨不变，手段是可以不问的。

以上数点足以证明做一件事情，应从小处着手，结果是会成功的，这些是积极解决生活问题的一面。在消极方面呢，当然是要把欲望降低来才对。Manpassat的Necklace故事，告诉我们一条假的项链和价值最贵项链，实用上也是一个样的。那女主人为了赔偿宝贵的项链而潦倒一生，由这故事，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训。

现在一般的青年，对于生活的欲望太高，在社会上得不到完满的生活，就想造成一篇暴力的文章，来左右社会。此种现象，在东京、上海各地都有，福州也有，唯比较少一点。

至于我的个人生活，倒也是无所谓的，有钱我也是这样子，一天不吃饭，二个光饼过一天也行，一个星期没有钱用，我也并

不要紧，故说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条件，不要太高，对于职业应该随便，如工、农、商等，小而卑的职业，都可去做，不要说是要做官，才算是工作。

今天我对演讲，是没有预备的，因为原定系十一时到十二时，在大清早起来，看到报纸上才晓得改为九时半，差不多是一起来，就走来了。

演讲，外国人的演讲，有些是讨论的方式的，所以我今天也来模仿一下，暂定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请诸位提出问题来讨论，因为单独一个说，有点象我一个人说是对，你们都不对的样子，故我特利用这个公开演讲的机会，来共同讨论问题。

“关于文学介绍”

这个题目，我前次在青年会已谈过了，记得在不久以前，上海有一班人，提倡“民族文学”，是非常卖力，那时候，结果是“此路不通”，到处碰壁，当时的人们，听到“民族文学”这四个字，就有点“头晕”，到了现在，就有事实来证明这“民族文学”怎样。

前几天晚上，有一个朋友来谈天，谈到现在很流行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文学中很重要的一支，此意很对。

报告文学是什么？

对内，用很浅显的笔调，来报告最近时事的消息，告诉给在水平线下的大众，同时也可介绍国际上瞬刻万变的情形，告诉国际上的人们，对中国的注视，或动向等。

对外，报告些远东的风云，东方的习俗、民意等等。

这一种报告文学，我相信，是能得到大家的欢迎，是能够一

时得到效力的。

“关于民族主义，浪漫、颓废主义”

民族主义，我是不提倡的，也不想打倒的。关于民族主义文学怎么样？我现在不愿意加个批评，唯各地多数刊物上，是已经实际都充满民族意识的文字了。

浪漫、颓废主义，以前很多人讲我是浪漫颓废主义者，这种论调，是非常不对的；“浪漫”，是每个人年青时代都有的，青年人对理想不符，社会不满，就起有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心，这种精神，是西洋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精神，我在年青的时候，也有此种普通的习惯，故一般人均目我为浪漫、颓废主义者。现在，我一经年岁加增了一点，年青时候的那种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的行为思想，都没有了。生活上因为在大病之后，也稍为改良，故一般人又说我是转变了，其实这也是环境使然的转变。

“关于旧道德……”

旧道德，是否应加发扬的？事实是很明显，时代如巨轮般流转，这个时代的环境背景是否还会再适合那个环境所产生的旧道德呢？事实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旧道德中，充满着虚伪、自利、自私的成份，这一种倾向，是破坏社会秩序最大毒素。

总之，道德无所谓新旧，唯真纯的人才能够说得上道德的两字，若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那不管你天天在高叫道德，结果终是一个坏人。

最后，我并不是想在福建做官，在最近会到闽南闽北走一圈，我希望在后来，能够再和诸位见面，现在时候已不早了，就此完结散会罢。

邓锜昌记录，经作者改定，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福州《青年学术研究会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防空自卫庸谈

鄙人对于航空防空，一点儿学识经验都没有；但承福建航空协会分会的不弃，嘱来作一次播音的宣传，辞不获已，只好来讲几句大家所知道的常谈。

诸位同胞！时势到了现在，看起来世界第二次大战是免不了的了。希脱勒进兵莱茵区域，并且还在要求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殖民地，罗迦诺公约、凡赛由和约，当然只是一张废纸；国联的丑态毕露，各国的自私自利的原形，暴露得丝缕无余。俄伪日三方面，又蠢蠢思动，万一风云一急，当然是我们中国人的晦气。

前世纪的上半，英国曾有一位科学军事通，著过一部理想小说，说外国兵包围伦敦，在泰姆士河上放散了毒瓦斯与病源菌，因之大英帝国的百姓，死得干干净净，�格罗萨克逊人种，终至于在地球上绝迹了。当时他的这一种空想，其用意无非是在警告英国的上下，教他们要安不忘危，着着准备，庶几可以免去国破人亡的惨祸，而这一种无稽的空想，现在却居然实现了；诸君但

看一看意大利在亚比西尼亚天空所放的毒瓦斯，就可以了解。所以现代的战争，并非单是兴败的问题，简直是人种绝灭的问题；战祸之所以会变得这般剧烈的原因，就因为以后的交战国的武器，就只在空军的能否制敌，与防空的设备如何。

在任何方面都落人后的中国，要想以空军来抵制敌人，是办不到的。迫不得已，只好更加注意于防空的自卫。当然，要想防空，一方面原也不得不组织有力的空军，以资掩护；可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飞机制造与航空的人才，所以积极的来讲，这两点，是应该由我们民众去努力的。至于消极的防空呢，我们先要有三种精神上的准备。第一，民众要守纪律而服从命令，譬如上方有命令来时，教我们后退若干公里，或掩藏若干时候，我们就该马上很有秩序地遵从，庶几可以使敌机达不到目的。更有如交通管制，灯火统制等紧要命令来的时候，我们也该忍一时的不便，绝对的服从。第二，是行动的神速；西方有一句古话，说潮水与时间是不等人的，而飞机与毒瓦斯，更是不等人的了，若行动不神速敏捷，到了战争时期，又那里能够保全我们的生命财产？第三，在危急的时期里，大家应有一致互助的精神；不要以为自己是逃出了险境了，他人就可以不顾。

我们先有了这三种精神的准备之后，然后才可以讲究科学的，机器的防空方法，譬如探照灯、高射炮之类的制造，安置，与使用，虽是军人的职守，但我们民众，平时也应该去研究；到了危急的时候，飞机炸弹是不问前方后方，或是战斗员与非战斗员的。其次是掩护物的用意，譬如植树栽林，使我们的财产，都掩盖在树林的底下，就是最简单的一法。起住宅时，不必太高，不可太密集，最好是家家能有地下室与隧道的设备。此外则临时

假保护物来掩护自己的住处，使敌机侦察不出我们的行止聚处的方法很多很多，我们应该平时留心，及时使用，方可有所备而无所恐。又其次，是口罩药品之类的器具的预备。万一敌机来散放毒瓦斯的时候，若备有种种器具药品在身边，虽则不能说是绝对的安全，但总可以救出一半的死亡。这些器具药品之类，买买是非常便宜的；我们若有戒心，在平时也可以略备一些，以防不测；不要到得临时，大家再来你争我夺，现出无秩序无训练的状态。

鄙人本来是一点儿航空防空的知识也没有的，上面所说的一席话，不过是最普通的常谈而已。诸位若要想得到更进一步的防空知识，请随时去向航空协会的诸君请教，他们会有小册子之类的宣传书分送给大家！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四日在福州广播电台的演讲，

原载同年四月二十日《福建民报·福建航空》

说　写　字

金石碑帖字画之类的嗜好，似乎中国人特别的强。当然外国人中间之偏嗜磁器骨董，或古书古画的人，也时常有，可终没有中国人那么的普遍。到了福州之后，第一着使我感到奇异的，是福州人的风雅绝伦。做十四字嵌字的诗钟，或打打灯谜，倒还不在话下，你若上冷街僻巷去走走，则会在裁缝铺的壁上，或小酒店的白锡炉头，都看得到陈太傅萨上将的字幅。海滨邹鲁，究竟是理学昌明之地，“胡为乎泥中？”大约雨天在街上乱跑的黄包车夫，将来也势必至要念几句诗。

说到写字，尤其是中国人的特别艺术；外国人的尊重原稿手迹，其意在尊重作者的人格和文学事业上的成功，而中国的字，却可以独立成一种艺术的。秦碑晋帖，稍为专门一点的书法，暂且不去说它，浅近一点，就譬如说董香光的字罢，实在是看了人人都会感到愉快的东西。我想就是不识字的农工大众，你若把董香光的屏条立轴，拿一张给他看看，他总会莫明其妙的感觉到好。更何况“小学既废，流为法书”般地有考古学文化学的价值著

在背后的古人的法书法帖呢！这些古人的字画，原是独立的艺术品，原值得我们钦敬的；可是现代的许多朋友，却将这欣赏艺术的主旨忘掉，把追求字画的一种风气，当作了烫头发、穿西服似的时髦行为看了，那才招了天下之大怪。不说别人，只先说我自己，自从到了福州之后，应人之索，乱涂乱抹，不知写尽了多少纸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私下想想，自小就跑进了十足洋化的学堂，十七八岁，便去异国，一直到了现在，手里总是捏铅笔钢笔的时候多；非但习字临帖的工夫没有，就是比较名贵的碑帖真迹，也看见得很少很少。若说我的歪七斜八的字里，会有一毫艺术气的话，那么强盗牌的香烟的商标，此处不准小便的乌龟，便都是艺术品了，岂不要活笑煞人？

那么我为什么不严词峻拒，偏要干这些出乖弄丑的勾当呢？这原也有我的哲学在里面的。第一，中国的纸业不振，借此来消费一些不为大众所需要的国纸，也未始不是一出有社会性的恶作剧；第二，爱逐流行的那些朋友，大抵总还是有口饭吃吃的人，教他们分出一点钱来，去惠及纸业工人及裱糊业工人，就是一种自由的罚金，间接的租税。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福州《小民报·新村》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谁也知道是俄国大托尔斯泰描写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杰作之名；战祸之惨，战斗员的恐怖与心理，我想无论那一个读了，也会感到不寒而栗，虽则其中也包含着许多神秘与定命论的色彩。当然，战争是一件惨事，若不是丧心病狂的人，总是拥护和平者居多。那一个没有室家？那一个不爱惜生命？爱国爱家爱己身，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但是到了我不愿战人逼你战的时候，说话可又不同。

看了这一个冒头，大约读者总也已明白，我所欲说的是那一回事。日本自从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提出了廿一条条件之后，其后十四年的五卅惨案，亦发动于日帝国资本主义者之杀戮工人；十七年五月三日，又在济南阻止我们革命军的进行而有惨杀我们外交官的事情。进至二十年，急转直下，就是九一八事件的发生，东北四省，一夜沦亡；接连着更有上海一二八、长城各口之冲突，中央"为维持和平计"，先不抵抗，后诉国联，再接再退，终而至于华北冀察都成了今日之局势。简单一算，除清朝割去的台

湾、高丽、琉球、旅顺口等不计外，民国以后的二十余年中，日本对中国的关系，总没有一年不再施行其侵略虐杀的政策。直到最近，武装运私，中国国家的税收，全盘被蚀；象这样的情形，若再延宕一年半载，国命的中绝，是意计中的事情，你说还能够浑浑然讲亲善说和平不能？

当局的所以不即战的苦心，当然也别有所见。战争的目的，是在求胜，并不在求败；明知必败而言战，是呆子做的把戏，非经国者的良谋。所以我们先得慢慢的准备，迟战一天，就有一天的把握。这论原也是真理；但是试问我们在准备的中间，他们是否也在准备的？准备到了十足，觉得自己有胜算的把握的时候，他们还能让你在中国更有立足的地方么？

还有一例，且看惨败在意大利铁蹄下的阿比西尼亚，就是教我们苟且迟战的一个好榜样；与其早亡，不如慢死，人当然是不愿意自速其亡的。这话也对，不过阿比西尼亚的国际关系，阿国的人口疆域与战备，和中国是不是一样的？阿意之比，是不是等于中日之比？中国的左右四周，是不是和阿国的四邻同样，全是叫唤不应的沙漠？因阿国的惨败而寒心的一点，以之自励则当然，以之自馁，却是大笑话了。

我们且一分析非战论者的层次。第一，国家的当局，负有经国济民的全责，当然要慎重考虑，不敢以国家为孤注，以胜负为尝试，隐忍不发，或许别有苦衷。第二，全国的军事专家，他们深悉彼我的虚实，觉得胜算还不能全操，所以宁愿充实内备，不肯轻意言战，而自取灭亡。这两层阶级，他们因自己所负的责任关系，虽则心有所感而口不发言，倒还情有可原；最可痛的，是一般高等华人，社会名士，以及挂牌学者，也在赞成秦桧，诋

斥岳飞，力主不可战，说今日中国的局势，亦犹之乎南宋南渡的当时，若不言战，还可以偏安一隅，苟延些时。这些人是社会的中坚，是一般知识薄弱的民众的向往者，他们这样的一唱宏论，意气激昂的民众，无异乎受到了当头的一盆冷水；学者临政，中国就只有拱手待亡了。

南宋主和，和的结果，已经写在历史上面，虽则苟延了几年，最后的结果，终于是亡是兴，想是读过《南渡录》的人，大家知道。所以和的结果，中国已经有了，这一回就来它一个战的尝试，也有什么不可？

我们再一回看日本，日本的民众，原不想战；大多数的兵士，也不想战；甚而至于几个军阀的首领，还不打算来同中国作战，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善于退让，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夺取中国全国的版图。这中间，民众的不想战，是为避免赋税兵役的苦楚；大多数兵士的不愿战，是在恨那些在上者的牺牲了他人而建筑自己的功名；军阀的不言战，是不必言战，而战功可收，系看穿了中国人的弱点。

强邻逼境的步骤，一步一步的紧起来了；我们的准备，也都注意在临时躲避，不曾筹及到将来的大计。书生无用，大家只在作纸上的雄谈，只想当局者能下一决心，以发泄一下大多数民众的郁气。在这一种饱含水蒸气的低气压之下，我深怕持之日久，中国将成一种鼓胀的痼疾，外部不去放水，内部或会破裂，非至于“盘肠大战”的局面，不肯收场。

一九三六年五月

原载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论语》第八十九期

东门老圃放言

——多事之秋

历本上写着八月八日（废历六月廿二）立秋，一年容易，今年的夏天又从此过去了。闰年节季较早，所以不到七月，就占了秋气。美国中西部大热的时候，中国的南京、西安、上海、汉口各地也陪着大热了几天；但是小台风起于南洋，席卷了中国的东南半壁，扬子江流域气压一松，各避暑地的贵客，似乎也正在起归乡之念。秋老虎当然要来，可是作伥的热鬼，先杀了势，想来今年的秋热，一定不会同上年那么的猛烈，而且也决不会继续到一星期以上。

暑期初过，稍稍凉冷了一点，大家都感觉着苏生，仿佛是一场大病的回头；人类原是健忘的动物，只教早晚清凉，就很容易地把过去的痛苦尽行忘掉；有一位英国的散文作家曾做过一篇文章，叫作《健忘的乐趣》（The Pleasure of forgetfulness），所说的就是这些事情。譬如以中国人民来说罢，一场场的国难国

耻，不知多到了多少次数，但都以健忘之故，而大家还可以苟安逸乐。还有从前军政当局的诸公，忽而相打，忽而相和；今日通缉，明朝上任，终于能和衷共济，一德一心者，所受的也是这健忘的恩荫。

因秋天的到来，而想到了健忘；更因健忘之颂而说到了天下国家，实在今年的秋天，真是一个多事之秋。欧洲的均势起了跷蹊，秤杆的一面，意德奥结成了一串，自然英法比与苏俄，也不得不重加铜模了，于是乎就有对洛加诺协定打强心针的五大国会议的呼号。国联破产，英国倒霉，天下的和平，弄得东倒西歪，说不定在暗云密罩之下，大雷雨就得爆发，于是几个理想主义者，就又有改正盟约条文之议。可是扶得西来东又倒，九九归源，这一个和平的假面，终于也不得不被铁与血来揭破。但请看一看西班牙新旧的交讧，左右的火并，岂非是重演出了中国内战不断时期的趣剧？杀来杀去，自然只是那些爱看牛斗的老百姓的头颅，而意德派军舰，法俄下动员，背后的争斗，倒要比台上的演员，更加来得起劲；你说一九三六年的秋天，在欧洲是不是比平时，更要多事？

再看东亚，既有了日本三相的宣言，又有了川越大使的经济提携，你望我提具体条件，我望你说最低限度，两面各在僵持硬挺的一边，华北走私增兵，华中事件迭起，西南的一角，还在称孤道寡，想做一做闭门的天子，这东亚的局面，岂不又是一个愁云黯淡的晦暝天？

气爽秋高，若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当然是大家的幸福，否则毒蕴于中，疮发在外，若不皮破血流地切开一下，恐怕终没有痊治的一天；长痛不如短痛，多情却似无情，糊涂搪塞，

总不如玉碎珠沉的来得干脆。秋虽多事，秋可亦是金风肃杀，清算一切的时期。

一九三六年八月

原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论语》第九十五期

关于使用国货

说起来很惭愧，鄙人自小到现在，就不大有购用外国货的金钱上的余裕。从小学到中学，穿的是青粗布长衫，毛布底鞋子，吃的是粗茶淡饭，用的是当时南洋公学印行或学部审定的教科书。当时的教科书，用的是一面有光，一面粗糙的洋纸；这，当然是外国货无疑，但是没有国货代替品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只能从俗。后来去日本读书，前后共十余年，这中间却是我平生受刺激最多的一段生活，从饮食品起，一直到使用的草纸等件为止，没有一件不是友邦的粗制滥造的廉价农工业产品；在这一个外国大洪水里游泳挣扎着的我这意志薄弱的青年，却终于深深地，深深地固持保有着了两件东西，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所征服，那就是：一个过去曾有四千年历史传统在背后的大汉民族的头脑，和一颗鲜血淋漓地在脉动着的中国人的心。

回国以后，一直到现在十三四年，东飘西泊，也走尽了中华儿万重的地面，一半原为了经济关系，一半也因便利之故，我从没有穿过一次洋服。与朋友们谈起来，大家的意见，仿佛也和

我的一样，他们对于饮食起居以及日用品之类，都抱着这一个主义：有中国代替品的时候，总以国货为第一义；没有中国代替品的时候，先硬着索性不用什么，到了万不得已的最后，才吃一点痛，后愿多出些钱，尽先去买西洋的好货来用。我个人对于外国货的最大漏卮，是外国的书报，以及文房具的购买；约计一年用在买外国书报上面的钱总有六七百元，买文房具的钱也有百元内外，最近开始在利用毛笔与中国本厂纸，大约年把之后，文房具项内的一笔开销，总可以省下来了。

看关税上面的统计，中国每年畅销的外货，光是化装一项，数目也很可观，这理由我却总不能够了解。因为自小就受了中国礼教的遗毒，每看见一般男子的用香水雪花膏的人，心里就会起一种愤怒，以为这些简直不是男子的行为。现在当这统一功成的二十五年国庆纪念的大节，却突然接到了一封福建省妇女提倡国货委员会的征文来信，使我对于那些喜欢使用外国化装品的男子，才双重的感到了不满，因为妇女们尚且在那里提倡国货，我们男子岂能够落在妇女们的后面？纵不想比妇女们更进一步，但是至少至少，堂堂男子汉也应该做到不为妇女们所轮笑的地步才对。

二十五年双十节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福州《妇女与国货》第二卷第四期

就家字来说

家这个字，在《说文》里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解释，但从我们的直觉来解说文字，总觉得宝盖底下的一个豕字，当然有将野兽的野心野性收服驯致下去的意思。

人有了家，就不能同没有家的人一样，少不得要思前顾后，畏首畏尾；从文明进化的一点上讲，或者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也说不定，但从艺术的人生观来说，家却是一副套在自由人身上的枷锁，因为艺术家的天性，多少总带有些薄命汉倾向的。

从家字出发的字，最容易使人想起的，是加上一个女旁的嫁字。

女子与家庭，正如眼睛和眉毛一样，眉毛虽则没有多大的用处，但眼睛上若缺少了这一簇毛，根本就不成一个样子。不过独身的男子，还可以开闭几次，做些视察，落泪，或睡眠的事情，但独身的女子，却不能代替牙刷、毛笔之类，收一点功用。

美国的华盛顿·欧尔文，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独身的文学家，可是他的称赞主妇，歌颂妻室的文字，却写得比中国的许多多妻主

义者还来得动人，这或者是同没有眉毛的麻疯病人一样，是一种不及错觉（Iuferiority Complex）的结果。唯其是如此，所以没有家室的人，只想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而苦于家累太烦，妇权太重的立泊·凡允·格儿先生们，又在想逃到山中去修仙学道，长醉不醒。一正一反，一反一正，社会人类，就永远地在这种矛盾错综之下维持过去。家若在这些地方有一点功用的话，那就因为它是一个永也不会被人猜破的长续的哑谜，永也不会被人吃厌的亚当的苹果。

当国事吃紧，民族垂亡的目下，我们自然又不得不想起国字下面的一个家字。“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话人人能说，但未必人人能够做到。陈伯南先生下野，先必将现银物件和莫夫人送到香港，战事未来，而军人的家眷却必同候鸟似的先搬赴安全地带。军人与国难期间的平民，不准结婚，不准成家立业的法规，虽则没有，可是到了 Hektor 将要去出征赴战的一瞬间，看见了眼泪汪汪的 Andromache 抱了小孩来送的情形，总到底不免有些英雄气短的牵挂与离愁。中国的国民，到了这里，于是就逢着了种种的难题：保国呢还是保家，没有了国有没有家？国字底下何以必定要带一个家？等等，等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论语》第一〇〇期

支那の現狀に就て

只今司會者から偉い詩人だと云はれて実に恐縮の至りですが，自分は一介の書生として東京に來，皆樣達と話をし，且つ又日本をも研究して見たいのです。自分の今までやって居ったのは主に文學の方面が專門で，別に飛び切った傑作を書いて居らず，變ったことも何もありませぬが，文學のことに就てくどくどしく申し上げても興味はどうかと思って，先づ一般のことに就て少し話して見ようと，先日から司會者と相談が決った訳であります。

それで，現在の支那の狀態，一般の社會狀態はどう云ふ形になって居るか，それから殊に農村破産の叫び聲の高い近頃に於て，農村狀態がどうなって居るかと云ふやうなことを申して見たいのであります。僕は支那の農村に生れて農村に大きくなり，今まで農村の狀態を見て來たものとして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ひます。

支那の社會と云ふものは，今も昔と餘り變らず，先づ社會

を組織して居る個人若くは民衆の團體は，まあ階級が四つに分れて居ります。昔から士農工商と云ふ風に分れて居ります。今でもその通りでありますけはども，少しは其の實質に於て變って居ります。先づ，士と云ふのは讀書人，昔はさう云ふ階級がありました。士の階級は人を治める階級として，ずっと革命前までは，支那の政府に在って社會を左右し，一般のことをやって來たのであります。所が二度も三度もの革命によって，この士と云ふ階級は今は全く打倒されたのであります。どう云ふ譯でまた此の士の階級が打倒されたか，複雜な原因も色色と有りませうけれども，先づ第一，今迄の愚民政治が通らなくなったのが最大なる原因ではないかと思ふのです。この士は今迄非常に潜勢力もあって，仕事もやりよかった——と云ふのは無産階級及び一般民衆は政治と云ふことには大抵無關心で，唯巧くやって呉れれば，働いて靜かに暮される樣にして呉れればそれでよいと云ふ風であったのであります。革命が起ってからは，その下の民衆も少しづつ政治に就て關心し始めました。又世界的影響をも受けて，少しは自分等の權利をも要求しようと云ふことになり，ここに於て士の階級は，所謂支那の言葉で言へば，紙で拵へた虎と云ふやうな，怖くも何でもないものになり，多數の民衆の前では，流石此の根深蒂固の特權階級も兜を脱がざるを得ない樣になったのです。

所が，政治は一日でも御留守にする譯には行きませんから，早速是に取って代ったのが革命の後に興った軍閥でありました。無論それより以前にも支那には軍人は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二三千年以來支那の爲政者達は大抵，軍人の政治に參與す

る事を禁じて居ったのであります。天下を取る時には馬上で天下を取るが，併し之を治めて行くには馬上では行かず武人でやって行っては政治が亂れると云ふ，その主義でやって來たのですから，革命以前には，武人の勢力を政治圈内に伸ばすと云ふ事は絶對に許されて居なかったのであります。それが，士の階級が打倒されて，軍人の階級が勢力を得，民國成立以來十餘年の間と云ふものは，先づ武人の天下として，又外國の勢力も入り，色色複雜畸形なことで經過して來た譯であります。

さう云ふ狀態の下で，他の農工商の階級はどう云ふ風になって居るかと申しますと，先づ農ですが，支那は今も昔も農業を本位として居る國家で，歷史上，哲學上，政治上の言論，國策及び施設が皆農業を基として居ります。農民は至って柔順なもので，唯，租税を輕くし，生活が安定で，働きつつ暮して行ければ何も不平なんかはない。それでありますから，民國に入って，所謂軍人が政局に立って以來は，此の農民階級が專ら軍閥の搾取資料に成っ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農民は清の終りまでは餘力がありました。極く邊鄙な田舍でさへ，家に居っても現金を何千圓，何萬圓と貯蓄して居り，作の惡い年が三年，五年あっても困ったことはなか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所が民國になって，所謂軍人割據の勢で，十有餘年この搾取階級に屢屢搾取されて後の狀態は迚も悲慘極まるもので先づ言語道斷の絶境に喘いで居ると云ふ形です。例へて言へば，昔は五口の家，十畝の畑を有って居れば，之を耕して行き，夫れによって食ふこと，着ること，生きて行くには困らないばかりでなく，祭日佛誕と云ふ樣な場合には少し贅沢な旅行も出來ました。所が今日とな

つて見ると，十畝の畑を有って居っても，第一租税が重く取られるし，第二に地方の行政等で何やらかにやと取られる。第三には，十畝位の畑を作るとすれば，一人や二人の雇人では足らないから，少くとも臨時雇ひ二三人は使は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ぬ。ところがさう云ふことに働く人には，多少所謂，社會主義の影響を受けて，勞賃が昔の二倍も三倍も高くなって居ります。それに，或る地方に於ては，ソビエートの組織あたりから，少しでも畑を有って居る地主などには，出鱈目なことをしたりするので，農民の中で，今まで中堅であった中農階級が先づ全然勢力を失って，何とも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くなって居ります。大きい地主はどうかと云へば，革命以後は田舍に絶えて行かれないので，彼等の持つ田地，畑，屋敷なんかをば全部放り出して居る有り樣です。今の処農民の中で農村に殘って居るのは先づルンペン同樣の者，榨取の上に榨取を重ねられた滓ばかりであります。さう云ふやうな人人は，支那で言ふ「恒産のない者は恒心がない」から，デスペレートな心理からどんな事でも爲し得る輩です。何しろ死の一歩前に立って居りまするので。でありますから，支那農村の破產と云ふことは今始まったことでもなく，革命以後ずっとさう云ふ風になって居ります。それで士の階級も無くなり，農村の階級も無くなり，工と云っても，支那の工人は，現代の意味に於ける工業勞働者でありませんから，例へば，仕立屋でも工人，建築師でも工人と云ふ風で，農村が全滅した上では工人なんて階級の存在する理由が有りません。

夫れから商と云っても，昔は商人は虐待されて，一般社會

には容れられなかったけれども，今は資本主義になって來て，商人も社會に一方の位置を佔めるやうになっては居りますが，併し，広い支那に於ては，日本の商人の勢力程社會に浸潤する訳には迚も行きません。ですから，支那の現社會に於ては，士と云ひ，農と云ひ，工商と云ひ，皆疲弊し切って，駄目になって居ります。

夫れで，どう云ふ訳でまたこう云ふ風になりましたかと云ふと，つまり今までの士の階級が打倒されて，軍人階級がそれに代って政治をやって居ったが爲めであります，こう云ふ狀態が若しもう少し先に続くとすれば，支那は文字通り自滅するより外に仕方がありません。幸に，今には支那の軍人も覺悟して來ました。軍人は國に仕へる者，國をして自分に仕へさ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と云ふことが分って來ました。それで，軍人でも，文人でも，民衆でも，皆な國と云ふものを考へ，又責任を持つやうになって來て居ります。それで漸く統一でも成らうかと云ふ所であります，所が幸か不幸か，支那が漸く斯う云ふ傾向を帶びて來るに付け，同時に，世界的な不安が又起って來て，支那は今御承知の通り，全く四方八方から脅かされて居る窮境に陥って居るので有ります。ですから，この時に當って，支那の民衆の一番望んで居る所は決して戰争ではない。今のやうな狀態では身動きさへも出來ないのに，どうして戰争が出來るものですか。それで，民衆の全般の望みは，第一に農村を興して貰ひたい。次には有無相通じて，餘る所を持って行って不足の所に足すと云ふ様な融通をして貰ひたい，さう云ふ風にして行けば，自然に政治も圓滑になり，社會も穩かになって行くのです。で

すから，一般民衆の又民衆の中の大部分の農民の望みは，先づ外國なり，或は本國の資本家なりが，その貧乏して居る農村に資本を入れて，例へば肥料を買はうとして金がない，田を作らうとしても，苗さへ拵へられないと云ふ狀態から，一步拔いて貰ひたいのです。それから，外國に對しては勿論，國內に於ても，再戰が再び起らないやうに，國家としての國防も必要でせうが，莫大な額に上る軍費を極度に減じて，兵隊は少し性質を優良にし，數を少くして貰ひたい。さう云ふやうな所が，先づ今支那の農村の一番要求して居る所です。

夫れに續いて工商人も同じです。農村さへ興って來れば，金廻りもよくなるし，それに從って交通も便利になり，物資も豐富になるから，外國とも取引が出來，國內に於ても金融が自然に裕かになって行きます故，生活も樂になります。それですからして，日本でよく言はれて居る抗日とか，排日とか云ふやうなことは，實際は又支那全民衆の最大努力，若くは唯一の希望では有りません。大部分の民衆は排日どころか，互惠平等の經濟合作，と云ふやうなことを寧ろ歡迎して居ります。

支那民衆全體が排日論者，或は共產主義者であると云ふ風に考へて居るのは，日本人一部分の偏見で，抑抑間違って居ります。皆樣は大抵多かれ少かれ，支那の事情に通じ，又五年なり十年なり，支那に行って居られる方も大分有る樣ですが，內地に入って行けばすぐ御分りになる樣に，支那の排日はそんな酷い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ぬ。支那の民衆は，唯だうっとして置いて吳れと考へて居る者が多いのであります。ですから，今や歐洲の風雲が險惡になり，東亞の平和も脅かされて居る間，日本

は須くそこを看てとつて，支那と一緒になる必要が有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ぴったりと一緒になることは出來なくとも，少くとも海を隔て手を握つて，さう云ふ所に力を入れてやるべきではないか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又その局に當る人は，若い血氣盛り，功名心に富んで居る軍人の方にばかりやらせず，例へば，思慮も學問地位もある貴君方がやって下されば，親善と云はなくても，自然に支那の民衆は日本と一致して行きますから，そんなにむづかしいことではなからうと思ひます。

今まで実際の政治に關してやっ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ぬから，政治のことはよく存じませぬので，次には支那の一般知識階級のことに就て少し申し上げたいのです，支那の知識階級は，その數に於て非常に少ない。少ないけれども，その少ない數は世界的に言っても，大概他の何處の國の知識階級に比べて遜色がない者であります。その知識階級が今所謂言論界，思想界，延いては一般民衆をも指導して居る訳ですが，実際に民衆はそれに從って行くかどうかは別問題として，兎に角，さう云ふ知識階級の人でも物の分って居る人は，過激な言論を弄して一般民衆並びに當局者に諛ふと云ふ様な人はそう沢山有りません。本當に國の爲に考へて居る人は，矢張り，日本と支那とは闘ふ柄ではなく，どうしても一致協力して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ぬと思って居るのです。例へば，イギリス人とアメリカ人とが，若し提携して行けば世界の平和を確保することも出來るし，將來の爲にもなるのと同じ事で，同種同文の両國民がそう何時迄も睨み合って行く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殊に支那のさう云ふ知識階級は

大抵歐洲邊りを歩いて來た人が多いから，歐洲に行って見て來た人は，又特に人種問題に就て痛く感じて居る者が多い様です。僕は歐洲に行ったことはないが，さう云ふ方方に聽きますれば，矢張り所謂人種の差別は大變な隔たりを來たし，將來に於ては異人種の鬪ひになるに極まって居ると云ふのです。

それは日本に於ても同じでありませうが，知識階級の人が斯う云ふ時に當って，一致して日本に對して不平を言ふのは無理もありません。矢張り日本の遣り方が少し出過ぎて居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ひます。例へば，ゆっくりやるとすれば，支那は幾らでも讓歩もし，両國の關係も調整出來ようが，そんなに急進のテンポでは少少困ります。所謂，脅威せずして穩かに，平等にやって貰って，お互に惠み合ふと云ふ風にやって貰へば，知識階級と云へども別に反對する理由も有りません。今は幸に日本の方向も變りつつあるやうに見られますが，所謂，經濟合作とか，或は不脅威不侵略と云ふやうな說がもう一度抬頭して居る樣ですが，若しも，日本がその主義で徹底的にやって行きますれば，支那も民衆の休息と云ふものを非常に欲しがって居るから，これから一緒になって行ってもまだ遲くはありません。そうすれば，よし世界的な戰爭が起こらうとも，東亞だけの平和は保てるであらうと思ひます。それに就ては皆樣の御努力を特に願ひたく思ふので有ります。及ばずながら，僕も支那に於ては知識階級の末席を汚して居るのですから，今までもさう雲ふ風にやって來た通り，これから先もこの方面に努力しようと何時も思って居る所です。別に言ふこともありませぬが，僕は十何年目に日本に來て，今日の前進日本の事情には少しも通じ

て居りませぬ故，皆様からの御高見をも承りたいと思っ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本《霞山会馆讲演》第三十九辑

〔译文〕

关于中国的现状

刚才司仪说我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这实在不敢当。我作为一介书生前来东京，是为了同诸位交谈，并研究一下日本的情况。至今我以专攻文学为主，没有写出特别优异的杰作，也没有甚么变化。我想，絮絮叨叨的谈文学问题，未必引起大家的兴趣，所以前几天和司仪商定，先就一般问题说几句。

那末，中国现在的状况，一般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呢？还有，农村破产的呼声很高的今天，农村状况是怎样的呢？我想谈谈这些问题。先说一下，我是生长在中国农村，亲眼看见过去的农村状况的。

现在的中国社会，和过去差不多。先就社会成员或民众团体而言，它分为四个阶级。这就是自古以来人们所说的士农工商四个阶级。现在也是这样，不过，其实质少许有变化。首先，所谓士，就是指读书人，过去有过这样的阶级。士，作为治人阶级，远在革命以前，就占据政府，统治社会，一般的办过事。可是，

经过二、三次革命，这个士阶级，现在是全被打倒了。为甚么士阶级全被打倒呢？或许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我想，第一，从前的愚民政治已经行不通，这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士阶级过去拥有很大的潜在势力，办事也好办。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一般民众大抵不关心政治，以为只要办事公道，让人干活，平静度日就行。革命发生以后，受其影响的民众也开始多少关心政治。他们还受到世界形势的影响，开始要求一点自己的权利。这时的士阶级，拿中国俗话说，就是纸糊的老虎，并不可怕。在多数民众面前，就连这个根深蒂固的特权阶级也不能不宣告投降。

然而，政治是一天也不可缺少的。于是，革命后兴起的军阀，很快就取而代之。当然，在此之前，中国也不是没有军人的，但是，二三千年来中国的执政者，则大抵禁止军人参政。得天下时，马上得天下，可是治天下，不能马上治，武人治天下政治乱。由于盛行这样的主义，革命以前是绝对不允许武人势力伸向政治圈的。可是，士阶级被打倒后，军人阶级便得了势。民国成立以来的十余年，大抵是武人天下，加上外国势力的侵入，使中国有种种复杂、反常的经历。

在这种情况下，农工商阶级是怎样的呢？先说农，古往今来，中国是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历史上、哲学上、政治上，中国的言论、国策以及各种设施，都以农业为基础。农民极为柔顺，只要减轻租税，使人生活安定，勤劳度日，就不会不满意。可是，进入民国，军人操纵政局以来，农民阶级竟成为军阀敲榨勒索的对象。清末以前，农民还是有余力的。即便是极偏僻的乡村，呆在家里干活，也能积存几千元、几万元的现金，三、五年收成不好，也不当一回事。然而，民国成立后，则由于军人的割据，屡

屡遭到这个榨取阶级的榨取，现在的状况是极为悲惨的，他们正在语言所难以形容的绝境中挣扎。譬如说，过去五口人家，有十亩地耕种，就有吃有穿，非但日子过得去，遇到祭日佛诞，还可以花些钱旅游。今日种十亩地，则第一，租税重；第二，地方行政等巧立名目搜刮；第三，种十亩地左右，雇一、两个人不够，至少要雇二、三个短工。他们多少受到所谓社会主义的影响，所以要求比以前高二、三倍的工资。此外，有的地方还受到苏维埃组织等的影响，对拥有少量土地的地主，干了荒唐的事。这样，在农民中，至今作为中坚的中农阶级全然失去势力，甚么事也办不成。那末，大地主是怎样的呢？革命以后，没法下乡，只好将他们原有的水田、旱地、家产等丢弃不管。现在，留在乡下的农民，大抵和流氓一样，都是受尽重重压榨的渣滓。中国俗话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也"，这种人出于绝望心理，甚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因为他们毕竟站在死亡的边缘上。可见，中国农村的破产并非今日始，革命以前早就开始破产。因此，既无士阶级，又无农村阶级。拿工来说，中国的工人并非现代意义的工业劳动者，所以，裁缝师也叫做工人，建筑师也叫做工人。既然农村已经毁灭，那就谈不上甚么工人阶级的存在。

接下去说商，过去商人是受虐待的，并非一般社会所能够容纳。现在是实行资本主义，商人也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地位。不过，就幅员广大的中国而言，远没有象日本商人势力那样渗透社会。可见，现在的中国社会里，士也好，农也好，工商也好，都已疲敝而完蛋。

为甚么会弄到如此地步呢？原因在于，从前的士阶级被打倒后，军人阶级取而代之，包办了政治。若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

那就只能使中国完全自灭。幸亏，如今中国的军人也觉悟过来，晓得了军人应仕于国，而不可以国仕于己的道理。于是，军人也好，文人也好，民众也好，都替国家着想，感到匹夫有责，促成暂时的统一。然而，不幸的是，正当中国逐渐的表示这种倾向时，却又产生了世界性的不安。众所周知，中国已陷入从四面八方受威胁的困境。因此，现时的中国民众所迫切希望的，决不是战争。依照今日的状况看来，中国是全然动弹不得的，怎能打仗呢。整个民众所希望的，第一是复兴农村，其次是互通有无，以所剩换取所缺，搞些贸易。倘若如此，则自然的会使政治也有所改善，社会也趋于稳定。所以，中国的一般民众以及民众中占大多数的农民，首先希望外国或本国的资本家，能向贫穷的农村投下资本，以协助他们摆脱无钱买肥料，无法育苗种地的状况。此外，无论对外国，或国内，都希望能做到不再打仗。作为一个国家，当然需要国防，但希望能极力的缩减巨额军费，逐渐的改善军队素质，并减少人数。这就是现今中国农村的迫切要求。

接下去说工商人，他们的要求也是一样。只要农村复兴，经济就好转，从而，交通也便利起来，物产也丰富多样。这就可以同外国做生意，国内金融也会自然的活跃起来，个个安居乐业。可见，日本人常说的抗日或排日，其实不是中国全体民众最大的目标或唯一的希望所在。大多数民众，与其说排日，倒不如说欢迎平等互惠的经济合作呢。

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全体民众都是排日论者或共产主义者，这是偏见，完全错了。在座的诸位大抵是多少了解中国情况的，有许多人或许是在中国呆过五年十年的，一去内地就晓得，中国的排日并不那么厉害。中国民众中，希望平安无事者居多。

因此，我想，如今欧洲风云险恶，东亚和平受到威胁之时，日本也有必要看清时局，同中国站在一起。即便做不到紧紧的站在一起，至少也得努力做到隔海握手。还有，日本当局不应该只让血气方刚，野心勃勃的年轻军人去办事，若果能让有学问地位，深思熟虑的诸位去办事，那末，即使暂不提亲善一事，中国民众也会同日本求得一致。我想，这也并不难办。

我至今没有参与实际的政治，政治这东西不甚了了。接下去，少许谈一下中国的一般知识阶级。中国的知识阶级，人数非常少。尽管少，但就世界范围而言，其人数，无论同哪个国家的知识阶级相比，大概都不会逊色。这个知识阶级，如今领导中国的言论界、思想界乃至一般民众。实际上民众是否跟着他们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拿这个知识阶级来说，在懂得事理的人中，玩弄过激言辞以取谄一般民众及当局者并不多。真正为国着想的人则依然认为，中日两国不可相斗，应一致合作下去。譬如，英国人和美国人携手前进，便可确保世界和平，还有利于将来，同理，同种同文的两国国民也不能老是这样的敌视下去。尤其中国的知识阶级，有许多人是去过欧洲等地的，他们从欧洲回来，大都痛感那里的人种问题严重。我是没有去过欧洲的，但听他们说，这个人种差别已造成很大的隔阂，将来势必酿成异种人间的战争。

这对日本也是适用的，这个时候知识阶级一致对日本鸣不平，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想，还是日本的做法有点过头。若慢慢的去做，那末，中国是无论多少都能让步的，两国关系也会有所调整，但采取那么急进的速度就不好办。若不威胁中国，相反的，心平气和的实行平等、互惠，则即便是知识阶级，也没有理

由表示反对。幸而，如今日本的方向也有改变的样子，所谓经济合作或不威胁不侵略之说正在重新抬头的样子。若日本以这种主义彻底行事，则非常需要民众休息的中国，自会同日本合作，这也不算太迟。到那时，我想，即便发生世界战争，也能确保东亚这一地区的和平。所以，我尤其希望诸位在这方面一起努力。我虽然能力有限，但在中国知识阶级中还占着末席。因此，正如过去所做的那样，今后还想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就谈这些。最后提一下，我这次前来日本，是相隔十多年的，今日前进中的日本的情况，我是一点也不了解的，所以希望诸位多发表高见。

李柱锡译

世界动态与中国

——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演讲

诸位同学和文化界的朋友们，本人此次乘赴日之便，归途经过厦门，承文化界诸君热烈的欢迎，并于最短期间内领导游览本市名胜，本人感觉非常荣幸，非常愉快。昨天文化界诸君和厦大同学要我讲话，因为在东京、台湾等地已经讲了不少，而且时间过于短促，没有什么话好讲，今天只好很简单的随便说一说，希望下一年——明天就是下一年了——能够再到厦门来，跟诸位作校有系统的谈谈。

诸位知道，从二十世纪初期到现在，世界有两件奇事，一是科学的昌明，一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烂熟。因为科学的进步，人生观、世界观以及社会建设都改变了；因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烂熟，造成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种种纠纷，这都是这两件奇事的作用。世界情形，在此十年中，非常的变动，变动最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人与人的对垒很显明的分开，一

种是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种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以国家来讲，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资本主义来侵略别的国家，一种是没有资本主义的组织发展，处在被侵略的地位，好象中国便是属于这一种的。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除了侵略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科学便是助长了侵略者的种种便利，结果，世界便多事了。中国和其他许多小国，都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压下，文化落后的地方，更是受到了摧残，这种情形，现在还是继续下去。因此整个世界便分成了两个壁垒，一方面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威力来推行他们的产物，一方面是受到了人家文化、政治、经济的侵略，而沦成为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前者就是法西斯蒂国家，他们的代表国如德、意等，后者便是弱小民族，如印度和中国等。这些弱小民族的国家，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文化落后，处处都受人家的压迫，在巨大压力的摧残下，到了不能忍耐的时候，他们便起来反抗。又因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单薄，因此，他们便联合起来，联合战线当然是有相当的力量，再加以各先进国家英、法、俄的援助，更加增进了他们的力量不少。然而侵略者的国家是最会打算的，每一件的利害得失，都得慎重的考虑，目前欧洲的形势虽然恶劣，但不幸的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东亚方面，和欧洲的情形虽然有点不同，但同样也形成了两个壁垒。东亚各国家大都以农立国，和西欧的以商业为中心不同，东方侵略者从不计及利益得失，不顾虑到将来，一遇到机会，就会爆发起来，这是东方民族的一种传统的习惯。因此，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心，说不定是发生在东方。然而在这危机下的中国，应该怎样呢？我以为战争一爆发，中国是直接受到牺牲的一个，你以为中国能够适合潮流和人家开战吗？这是不够的，而且反会变成了

人家的殖民地。那么最后的出路，应该怎样呢？我们的出路，便是积极的把国家整顿起来。我们不想侵略别人，只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弄成一个良好的国家。中国到今日，无论军阀资本家或劳动者都知道高压政策或共产政策皆不能实行，最大的问题是在最短期间内如何努力去完成整顿国家的计划。如果世界的危机，平安的渡过，那么，十年后的中国，决不会比人家落后。

反过来说，在此世界动荡中的文学是怎样呢？我们可以说，在此时期，世界文学是处在苦闷期中，除俄国外，其他各国都沉湎在苦闷的氛围中。新俄的文学虽然正很幼稚，但他们的内部已有了很好的秩序，他们充满了朝气，他们是向前走的。法国自从巴比塞死后，也很带着消沉的气息，虽然纪德是已经顶了起来，但也不见得有进展的趋向。欧战以后，法国许多青年文学家都走向逃避现实的路上去了，都在描写理想的轻快的通俗小说，伟大的作品是没有的。德国也是一样，德国的伟大作家大都是犹太人，自从希特拉登台以后，那些犹太作家都被赶到国外去了，在法西斯政府的统治下，德国是不会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意大利当然是法西斯国家的代表，自墨索里尼专政后，文学空气完全消沉了。在目前，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是处在苦闷的状态中，大家都在准备着侵略和掠夺殖民地，那里有工夫注意到文学？因此伟大的作品是不会产生的。在东方，日本从前虽然有普罗文学的出现，不久便在政府的高压下消沉了。国家经费的分配，十之七八用于军事，用于文化及建设事业者仅仅十之二三，现在日本文坛是回复到廿年前描写心理和历史的倾向去了。说到我国，这个时候大家心里都很苦闷，都想反抗，可是因为营养不良，不能充分地表现此种意识。虽然间或有一些能够表现一点

的，也因受到了压迫而消沉下去，所以中国数年来不能有伟大的作品发现。

目前的世界，虽然处在大压迫之下，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尽人的力量往前走，往前努力。外国的作家，很多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同样处在被压迫之中，他们的力量同样是薄弱的。然而我们相信，不断的努力，在将来一定是有出路的。

原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厦门《星光日报》，赵壁、马寒冰记录

可忧虑的一九三七年

被世界各国的预言家所断定，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定在这一年里要勃发的一九三六年，竟在我们的惶恐与危难之中，匆匆过去了。来临不久的这一九三七年，究竟是和平之鸽呢，还是□*械之神？现在谁也不能够预料。但是日德意合了纵，英法俄连了横，派黎斯的孾婆果一掷到欧西，卡你门的产地，斗牛师的故国，就变作了血肉横飞的恶战场。

不幸的中国，在艰难苦恼之中，虽勉强完成了统一，可是四面楚歌，糜烂的危机，也因这统一的成功而孕酿到了百分之九十有九。一九三七年，或者是中国的一个转机；一九三七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濒于绝境的年头。

"祸福无门，惟人自'造'"，太上之言，现在也还是真诠。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日居月处，应思危卵。民族的中兴，国家的再造，就要看我们在这一年内的努力的如何！

亲爱的众同胞，现在决不是酣歌宴舞的时候！

一九三七年元旦

* 此字原缺。

原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厦门《星光日报》第一版

日本の朝野よ支那を見直せ

西安に監禁された蔣介石氏も無事南京に帰還した，問題が將來に多少殘されてゐるが世間が騷いだほどのことがあらうとは思はれぬ。それもそのはずである。西安兵變の起った當時，日本では非常なる期待と懸念とをもってこの事變を見てゐたようであったが，われわれは初めから局部的な一小變動としか思ってゐなかった。一體，中國全國を共產化し，現存の中央政權を根底から覆へしてしまふといふようなことは今のところまづ全然出來ないと見てよい。なぜならば，中國全國の民意は國家の統一近代國家の建設に集中してゐるからである。

統一の實を擧げんとするには，今まで基礎の十分出來てゐない政權を打建てるより現存の實力ある政權に賴りつつ段段と修正して行く方が捷徑だとの考へを誰も持ってゐるからである。

張學良の振りかざした旗印は，抗日聯共といふから，日本人間の一部分の論客は，すぐ支那は赤化した，共產化したと早

合點をするかも知れないが，事実はそんなに簡單なものではない。

第一，民國十七年(昭和三年)以來今までの八，九年間の國民黨の共産黨に対する破壞的宣伝が，中國全國に侵潤してをり，有産者階級乃至ごく僅かの資産所有者たちが，共産黨を蛇蝎視してゐるは勿論無産者階級の大部分のものといへども，みな事なかれ主義の徒多く，張學良如き不人望極まる人物の掛言葉一つで，すぐ結束出來ようとはどうしても考へられない。

第二に，中國の目下最も重要なる課題は，何というても，まづ日本に對する問題で，日本との懸案が解決しない限り，内亂はおろか政局のごく微細な變動も全局を牽動するおそれがある。民衆はこれを望まない。

第三に，最近中國民族主義の抬頭，即ち民族意識の高潮は，從來の中國思想史上においてかつてその先例を見ないことで，國家主義的民族思想が世界主義的共産思想とどこまで一致出來るか，それも疑問である。

最後に，張學良の今度の西安事變は，やはり昔流の軍閥の氣まぐれ仕草で，事前に露國と連絡を取り，支那共産軍と氣脈を通じてゐようとは思はれない。よし支那共産軍の一部分と相當な諒解があるにしても，今は中央軍隊に先手を打たれてゐるから，大した發展も出來ないのであらう。

かかるがゆゑに，西安兵變が起ったからとて，直に中國は共産化するのはいささか早計な話である。それなら，中國は全く共産化する氣づかひがないかといふと，さうも行かない。現に二十萬の紅軍を擁し，苦しいながらも西北邊境の一角に割據し

てゐる共産黨は，しやぼん球のようにすぐ消えるわけはない。今後中國における共産黨勢力の增進か萎縮かは，一に日本の出方にかかってゐると僕は思ふ。

もし日本が軍事的侵略をやめ，好意的に中央政府の統一に助力し中國の內政に容喙干渉せず，互惠平等の原則のもとに經濟合作を計って行くとせば，中國共産黨はまづ成長する機會が少くなるであらう。

日本の言分では，日本は中國を侵略するのでなく，共産勢力の中國に侵入するのを防止せんとするのみである，中國政府にまかしては，とても安心出來ないから，滿洲國をてしらへ，冀察政權を樹立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と。日本の一部が本當にさう思ってゐるかも知れないが，それが卻って逆に中國に共産思想を激發し，共産黨勢力を堅固にしたとは見當つかなかったであらう。

もう一つの日本の見當違ひは，すべての中國の抗日論者を一律にこれを共産黨と呼ぶことである。滿洲市場を奪われた上海の商工業資本家たち，人民榨取の地盤を失った大小軍閥，彼等は自己の利害打算からして抗日論者とならざるを得ないのは自明の理で，これ等を全部引括めて共産黨と呼ぶのは何と滑稽なことではないか！

日本ではまた因果關係を前後顛倒にして，排日と抗日とを同じ意義に解釋してゐるようである。抗日は日本の侵略に抵抗することで，排日は日貨排斥を意味してゐるではないかと僕は思ふが，果してさうであるとせば，排日と抗日とは關係があっても，行動は必ずしも同一ではない。抗日は軍事的な行動で，日

本が侵略するから抵抗するのであって，侵略がやめば抗日もやむはずである。排日は經濟的の意味が多く，軍事的侵略のない時でも起り得るのである。中國で外國貨物に對する非買同盟をやった最初のボイコットはアメリカに対するそれで，たしか三十六，七年前のことかと記憶してゐる。原因はアメリカで二，三の中國移民が殺されたか，あるひは監禁されたかによる。その後，テオドル・ルーズヴエルト大統領が極力中國親善の政策を取り，文化的に，經濟的に，もしくは政治的に中國に與へた援助は実に莫大なるものであった。それから廿年ほど前においては，英國貨に対する非買同盟もあったのである。それが今一變して，日本でよくいふ“英米依存”といふような狀態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から，排日云云の態度を親日に転換さすのも造作がないと思ふがその要は日本の中國に対する政策の転變にある。

では，日本に対する中國一般の希望は，どういふところにあるか，僕は個人として下のようなことを述べて見たい。

まづ第一，日本は中國を再認識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ふ。

今までの日本人間のいはゆる支那通は，無論十分中國の事情を知ってゐる人も沢山あったけれど，その中の大部分は，やはり偏に失し，真をうがってゐないのが多い。たとへば出先官憲の人人，永年中國内地に放浪してゐた壯士たち，彼等は大抵中國人を罵倒し，中國を日本人に與へた天の賜物としか心得てゐない。中國の軍は悉く匪軍，中國の民衆はまた烏合の衆であると彼等はいふ。中國人は合作的精神，國家の觀念を全然持たず，みな我利々々亡者でこれを大國民として遇すれば卻って侮られると，かういふ風な見方をする日本の論客はいはゆる一を

知って，その二を知らないもので，中國ならびに中國民族をあまりに低く評価してゐるのである。これに反して，ごく少數の學者，文人および真の中國を愛してゐる人人は，また中國および中國民族を大に誇張して，褒めたたへ過ぎる。その結果は末怖ろしく感ぜしむ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過ぎたるはなほおよばざるが如しで，この兩派の論斷はひとしく日本の中國に対する政策を误謬に導く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ふ。

次には日本の中國に対する軍事行動をば，少し制限してほしいのである。防共といひ，居留民の生命財産を保護するといふが普通の平和狀態における警備は，そんなに沢山の陸海軍隊を華北，華南に送る必要がなからうと思ふ。もし混戰狀態にでも入るとすれば，またそれだけの軍隊では手薄い。であるから，中國本部における日本駐屯軍の增員は，徒らに中國人の猜疑心を刺激し，対日惡感を增長させるものであつて，日本大陸政策の侵略は，中國全部を併吞せずんば止まずとの危懼を中國人間に起さすに役立つだけのことである。不脅威，不侵略の政策は事実證據立てて見せなければ，中國人民はこれを信じようとしても信じ切れないのである。

それから經濟合作のことについては，日本方面にもっと遠大な計画を立て，広い範囲にわたって進行する方が本當ではないかと思ふ。有無相通じ，利益これを等分すといふ風に，日本の資本と中國の資本および労力物産とが合作して企業を起せば，誰も反対するものはなからう。利益を獨佔し，待遇を不平等にするから，最近の上海青島におけるような労働争議が起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ふ。

中國の労働者は，その數において多いばかりでなく，その生活標準もまた至って低いので，よくよくのことでなければ，ストライキなどを喜んでやるものではない。日本人間ではやれもすれば，一も二もなく直にこれを共産黨の策動だといふけれど，前にもいうた如く，今における中國共産黨の勢力は，十年ほど前のように全國の都市労働者間に普及してゐない。もしそれ國民黨が即ち共産黨だといふ風な見方をするに至っては，中國の現狀を曲解するもまた甚だしといはざるを得ぬ。

經濟提携に次いで，兩國の親善を促進するに最も有效なる方法として僕は文化の溝通を力説したい。

科學者，芸術家らは，國境と時代とを超越して，ともに理想を真，善，美に置くのであるゆゑ，軍人，政治家のごとく利得，權勢，功名等を重く見ない。昔の人は，世の中すべての爭鬪紛擾の原因を帰納して，名と利との二字にほかならぬというたが，ただ真理，道徳，美感を求めて，名利を問はざる連中の間には自然に爭ひが起つて來ないのである。

中國は科學におくれ，技術專門の人材に欠乏し，衛生狀態も十分に進んでをらず，文化の諸部門に至っては総じて日本におよばないというていい。日本がもしかういふ方面に着眼して，最大な労力と犧牲とを忍び，本當の切実な援助もしくは合作を計ってくれたならばその效力は千萬の外交使節にもまして，より大きい收獲をきっと得られるであらう。

最後にもう一つ，日本の言論界にのべたい意見がある。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ストは，とかく中國の抗日とか排日とかいふような記事を誇大に書立てる癖がある。それが中國に反映して，

また中國の民衆に妙な考へを起さすのである。日本でそんなに仰仰しく排日抗日の記事をかかげてゐるからには，それが大分参ってゐるに違ひない。日本に対する報復手段としてはやはり排日抗日を固執するよりほかいい方法がなからうと中國民衆は考へる。

であるから，ジャーナリストの目的は，あるひは日本人の警戒心を喚起するにあるのかも知れないけれども，その結果が卻って中國人の抗日熱を昂ぶらせるのである。われわれ文筆に従事してゐる人人は，今後お互にこの點に注意を拂って，两國間に現存してゐる誤解を一掃したらどうだとつくづく思ふのである。

原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第十一版

〔译文〕

日本朝野要重新看待中国

曾在西安被监禁的蒋介石氏，已平安的回到南京，虽然有些问题留待将来解决，但不至于弄得世间骚动，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看起来，西安兵变之时，日本是以极大的期待和担忧，表示关注的，我们则一开始便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局部的小小变动而已。可以说，现今的中国，实现全国的共产化，从根底上推翻现

有的中央政权，全然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全中国的民心，集中在国家的统一，近代国家的建设上面。

又因为，谁都晓得，要实现统一，与其创建至今还缺乏十分牢固基础的政权，倒不如依靠现时还有实力的政权，并加以逐渐的改善，才是捷径。

张学良打的是抗日联共的旗号，于是有一部分日本论客或许贸然的断定，中国已赤化，共产化了，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第一，从民国十七年（昭和三年）到现在的八、九年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破坏性宣传，已渗透全中国，不用说有产阶级乃至为数极少的资产所有者，都将共产党视为蛇蝎，就是拿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人来说，其中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的居多。因此，象张学良那样毫无威望的人物说句空话，就能迅速的结束上述局面，则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课题，无论如何，首先要数对日问题，既然中日两国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不用说内乱，就是政局的任何一个极小变动，都会牵动全局，这是民众所不希望的。

第三，最近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即民族意识的高涨，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未曾有过先例的，而国家主义的民族思想和世界主义的共产思想，能相容到何种地步，还是个问题。

末了，这次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毕竟是昔日军阀忽三忽四的表演而已，看不出事先与俄国取得联系，并同中国共产军通过气。即便和中国共产军的一部分人取得了相当的谅解，也不会有甚么大发展，因为事至今日，中央军早已先下手了。

可见，西安兵变一起，便断定中国共产化，则未免有点轻率。那末，中国是否全然没有共产化的忧虑呢？那也不是。现在，

共产党有二十万红军，虽然艰苦，但已割据西北边疆的一角，因而决不会象昙花那样很快的消失。我想，今后中国的共产党势力，到底是增强还是萎缩，将取决于日本的态度。

若果日本停止军事侵略，善意的协助中央政府实现统一，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平等互惠原则之下进行经济合作，则中国共产党成长的机会将会减少。

依照日本的说法，则不是日本侵略中国，而只是为了防止共产势力侵入中国而已，光靠中国政府就放心不下，于是需要制造满洲国，建立冀察政权。或许有一部分日本人确实抱有这种想法，但他们却没有想到，这恰恰给中国激发共产思想，使共产党势力得以巩固。

日本还有一个估计错误，就是将中国的抗日论者一律称作共产党。其实，被夺取满洲市场的上海商工资本家，失去榨取人民的地盘的大小军阀，他们出于自己的利害打算，也不能不成为抗日论者，这是自明之理，可是就连这批人都包括进去，一概称作共产党，岂不滑稽。

看起来，日本又将前因后果弄颠倒了，以致连排日和抗日都当作同义来解释。我认为，抗日是指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排日则意味着排斥日货。若果如此，则排日和抗日，虽有联系，但未必是同一行动。抗日是军事行动，有日本的侵略，必有中国的抵抗，若侵略停止，抗日亦应停止。排日大多有经济的意味，没有军事侵略时也会有排日。中国对外国货搞过抵货同盟，最早是抵制美国货，记得其起因，是距今三十六、七年前，有二、三个华侨在美国被杀或被监禁。后来，罗斯福总统极力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给予中国的援助确实是莫大

的。还有，大约在二十年前，中国对英国货也搞过抵货同盟。如今则一变而为日本人所常说的那种“依赖英美”的状态。可见，促使中国将排日等的态度转变为亲日，并不难，关键在于，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应有所转变。

那末，对于日本，中国一般的希望是怎样的呢？下面，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日本有再认识中国的必要。

至今日本人中间的所谓中国通，当然其中有许多人是十分了解中国的，但大部分人则仍抱有偏见，并不晓得中国的真情。譬如，被派遣的官宪，长期在中国内地放浪的壮士等，他们大抵骂中国人，以为中国是上帝赐予日本人的。他们说，中国军队是匪贼，中国民众是乌合之众，中国人全然没有合作精神和国家观念，都是利己主义者，若将这般人当作大国民相待，则反而受辱，如此等等。持有这种见地的日本论客，其实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而对中国和中华民族只能作出过低的评价。与此相反，极少数文人学者，以及热爱真正的中国的人们，则大大的夸张并过分的褒扬中国和中华民族，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俗话说，过犹不及也，我想，这两种论断，都会导致日本对华政策的谬误。

其次，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要少许限制。虽以防共，或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为由，但在一般的和平状态下进行警备，就没有必要派那么多的陆海军进驻华北、华南。倘使转入混战状态，则光靠这些驻军就又感到不足。而日本向中国本部派遣更多的驻军，则只能激发中国人的猜忌，加深对日恶感，就是说，日本大陆政策之下的侵略，只能产生中国人的危机感，以为日本是不并吞整个中国就不罢休的。宣扬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要以事实

为据，不然的话，中国人民是想相信也没法相信的。

至于两国经济合作，我想，日本方面应拟订更远大的计划，并在广泛的范围内付诸实行，才是正确的。还要互通有无，平等的分享利益。若日本资本和中国资本以及劳力物产，合作兴办企业，则谁也不会表示反对。只因独吞利益，不平等待人，才引起如最近上海青岛发生的那种劳资纠纷。

中国工人，不仅为数众多，而且生活标准极低，因此，除非不得已，一般不喜欢罢工。日本人则动不动就不加区别的判为共产党所策划。其实，如上所述，现今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在全国城市工人中的普及程度，远不及十年以前。若有人极端的抱有国民党即共产党的看法，那就不能不说是完全的歪曲了中国的现状。

除了经济合作之外，文化交流也是促进两国友谊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对此，我想强调几句。

科学家、艺术家是超越国界和时代，追求真善美作为共同的理想的，因此，他们不象军人、政治家那样，看重私利、权势和功名。古人说，世间争斗纷扰，皆起因于名利二字。然而，仅仅追求真理、道德、美感，而不问名利的人们，则自然的不争什么。

中国科学落后，缺乏专门的技术人材，卫生状况也不十分好，总之可以说，文化各部门不及日本。若日本着眼于这些方面，忍着最大的劳苦和牺牲，向中国提供真诚切实的援助或合作，则其效力必定胜过万千的外交使节，而导致巨大的收获。

最后，我向日本的言论界提点意见。日本记者所写的有关中国抗日或排日的报导，有种种夸大其词的弊病。这反映到中国来，便又引起中国民众微妙的想法，以为既然日本报刊如此夸大排日抗日之事，便说明大抵真有其事。于是在中国民众看来，要

报复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继续坚持排日抗日。

由此可见，日本记者的目的，或许是要引起日本人的警惕，但其结果却促进了中国人的抗日热。因此，我深切的感到，我们这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今后都要注意这一点，努力使两国现有的误解一扫而尽。

李柱锡 译

“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九一八不战而退，养成敌人之骄，促成我军之愤。这次被逼而战，证实敌人之怯，我军之勇。以义军而当骄师，胜负之数，不待蓍龟。塞墨壁垒之碑文，已永铭在宝山城头，卡儿寨旗之决心，亦早下在我民族胸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死犹如泰山，敌死则并鸿毛之不如。精诚团结，持久抗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唯战线后之生产问题，战胜后之建设问题，却为我民族目前之最大课题。文化界同人，于慰劳军人，宣传正义，抚视伤兵，倡制凯歌之余，对此应加以十二分的注意。

一九三七年九一八

原载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福州《小民报·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九一八特刊》

双十节感言

初到闽中时，曾于一处宴会的席上，写过这么的一首诗："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系掇拾杜老的"感时花溅泪"与"国破山河在"的两句而成的；现在虽还没有到这境地，但我们却不可不以此来自警。

文化界是识风浪的海鸥，我们要号吹在前，切不可悲歌在后。歌咏也好，漫画也好，做诗做文章也好，第一总要向实在的地方，有力的地方去做。我们的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劳农的大众，都在那里等我们去启发，去组织；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空头话，也不是闲文彩。我们于鼓动劳人去牺牲，去尽瘁之先，先还须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决心，这行动。文文山的《正气歌》，岳武穆的《满江红》，因为是他们血染成的文章，所以才有价值。前人有两句话说："夔州而后论工部，凝碧归来识右丞"，我们该做"每依南斗望京华"的杜甫，不该做"万户伤心生野烟"的王维。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福州《小民报·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双十节特刊》

战时教育

战时教育的意义，当分两层来说：第一，是适应战时的应急教育；第二，是准备战后复兴的国民教育。

从第一种意义来讲，战时的财力、物力、人力，应该统合起来，尽量接济前方；凡国家的一切施设，一切所有，都应该先顾虑及此。所以教育经费，在战时必然要减少，师资及壮丁，要被征去前方，或为战时必要工作而忙煞，教育的地点及设备，自然也不得不受种种的限制。因而上海的生活教育社，有下列的方案和办法，提出来供大家的研究：

（甲）战时教育方案

（一）战时教育之目的

一，培养并充实军事力量，以作持久战、消耗战之人力的补充。

二，培养技术人才，以谋抗战物力之数量的增加及效能的提高。

三，谋民众力量与军事力量之携手。

四，普及民众教育，提高民众文化水准。

（二）战时教育之总则

一，把一切产业组织，战时工作组织，及任何可以形成集体生活的地方，统在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这一个目标下面，变做战时的学校。

二，抗战之一切活动及对于抗战之全面的认识，便是战时教育的课程。

三，在上述新的战时学校内所施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自我教育，便是战时教育的杠杆。

（三）战时教育之机构

一，除研究院而外，各级学校皆予以改造。

二，全国设战时教育设计委员会，省设战时教育工作委员会，县设战时教育指导委员会，来主持整个战时教育工作。

三，按（甲）各人之生理状态；（乙）工作能力及（丙）当前工作需要，将原有学生、民众以及失学儿童分别加入所列各项组织。

四，战时教育机构。

（甲）文化细胞与文化网。

文化细胞是战时教育基础的机构；家庭、工厂、店铺、军队、里弄、村落统可以组织，它的工作有识字、传信、口头新闻报道、卫生、唱歌等活动。文化网则为若干文化细胞之总体。它对文化细胞的活动负着辅导的责任。此外它可以举行壁报及其他文化细胞所不能单独进行之事项。

（乙）战时工作教育机构。

利用战时各种各样的工作组织作为战时教育机构。倘若文化

网文化细胞代替了过去的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那么这种战时工作教育机构便多少是代替中学教育及普通科的大学教育。

按工作性质分，可有义勇团、救护队、侦察队、新闻网、国防生产突击队等新的教育机构。

（丙）各种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及救亡大学。

各种战时工作训练班有类平时教育之师范学校，救亡大学则类平日教育之师范大学。当前工作需要某种干部，便开办某种干部训练班。

（丁）研究院。

这是与国防生产及军事技术有关的研究机关；实科教授，成绩优良的实科大学生及专家方得加入。

（戊）战时宣传与教育机构。

如剧团歌咏团、战时普及教育队、战时教育服务团、农村服务团、宣传队等等。

（四）战时教育之方法

一，如何把普通的团体和战时工作组织转变为战时教育机构。

（甲）建立严肃的集体生活。

（乙）在集体生活中举行政治的自我教育。

（丙）在集体生活中举行工作的自我教育。

（丁）必要时，在集体生活或个别训练方式下进行文化教育。

（戊）缅行工作检查，自我批评，并总结各种工作经验。

二，自我教育之具体方法。

（甲）配合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势，订定工作计划。

（乙）工作执行。

（丙）工作检查。

（丁）自我批评。

（戊）工作经验的总结。

（己）理论的检验及变化。

（庚）理论与经验的记录（时间与精力可能允许的话）。

三，每一机构内应设一专人或专组，负责主持计划，检查批评，总结，及校阅工作记录之责。

（五）战时教育之课程

一，必修的课程

（甲）集体生活中之各项知能为集会、卫生、秩序等知能，团体与个人之认识等。

（乙）世界大势之认识。

一，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

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

三，世界主要国家对立之阵容。

四，世界前途的瞻望。

五，其他。

（丙）中国与日本的认识。

一，中国与日本之历史地理的认识。

二，日本侵略中国之历史。

三，中国国内之和平与统一。

四，中国全面抗战之意义。

五，中国之必然的胜利。

（丁）战时常识，如军事常识，防空防毒救护之知能。

（戊）民众训练工作的经验与理论。

（己）识字教育工作的经验。

以上可按各人，各战时教育机构之文化水准而异其学习之程度。

二，选修的特种科目。

按战时工作组织之性质异其科目。

三，研究事项。

（甲）机器之制造与修理。

（乙）贱价而又耐用的防毒面具之制造。

（丙）汽油之代用品。

（丁）生产合理化之研究。

（戊）其他。

（六）战时教育之教师

一、战时教育之教师，已失去了它绝对的意义；不仅是教育者影响了，教育了被教育者；同时教育者也为被教育者所影响，所教育。

二，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内相师相学。

三，但在相对的意义上，教师还是存在的。

一切工作干部都是战时教育的教师。

前进的知识分子，前进的大众，前进的儿童和技术专家——都是战时教育的教师。（提案执笔者王洞若）

生活教育社同时还提出有战时教育的具体办法一案（执笔者满力涛），对于大学或各种专门学校及研究院的办法如下：

a，设立一个战时专门教育委员会，按照战时的需要，看全国应有那些最高的专门研究机关，然后再看各大学的特点，和特殊情况，将各大学改成各种专门研究所。性质相同的可以合并起

来，性质相异的可以分开，多余的就裁撤掉，没有的立刻补设起来，大概现时极需的有如下的几种：

甲，机械工程研究所（附兵器研究所）；

乙，化学战争研究所（附防毒研究所）；

丙，战时经济研究所（附战时财政研究所）；

丁，粮食管理研究所；

戊，交通管理研究所；

己，电信研究所；

庚，军事政治研究所；

辛，航空研究所（附防空研究所）；

壬，医药研究所；

癸，其他。

b，使这些研究所和各该部门的工作组织，紧密地联在一起，全所的指导员和研究员，都要尽可能全体参加各该部门的实际工作。

c，各研究所应完全放弃旧日那种迂缓无用的课程，而以各该部门之紧急需要为课程。

d，各研究所除去专门的研究外，也应有经常的时事讨论，政治研究，其他必要的训练。

对于中小学校，他们以为应该全部停办，但为救这集团的分散后不易再聚集之故，拟加以彻底的改造：

a，全体师生皆停止一切平时的生活程序，而组织中学生救亡协会，儿童救亡协会，或各种战时服务团，以此等救亡生活为教育生活。

b，在此等组织中，成立自我教育指导委员会，依据一般救

亡团体的方法，执行政治的、时事的、工作的自我教育。

c，组织战时普及教育服务团，或小先生服务团，推行民众教育，在教育民众的工作中，教育自己。

d，在一般的工作以外，更尽可能地注意到语言文学方面的进修，和各种基本常识的学习。

对于一般散漫的民众教育，办法如下：

a，由政府、救亡团体、教育团体切实合作，组织战时普及教育委员会，负责设计指导，同时动员大中小学生，及文化人组织战时普及教育服务团，深入民间进行教育活动。

b，活动方法，最好完全改变旧日的态度，注重民众组织工作。首先根据他们的日常生活，组织一般的互助团体为难民互助会、战时互助会、民众消防队、村镇里弄联合会之类，然后再渐渐把它转化为直接的抗战团体，在教育活动中进行这些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生活中，进行普及教育工作。

（上列方案及办法各见«抵抗»三日刊第七、八号）

他们的方案和办法，究竟能不能被当局采取而见诸施行，当然是一问题，但战时教育的具体计划，总算也有了一个很粗的轮廓。虽则在课程与师资及编制方面，还很有可以讨论的余地，而接近战地的一般关心教育之士，所见者总大抵略同，关于战时应急教育的议论和实际，我就只抄录上举两文，作为代表，另外不更加以讨论。底下只想将关于复兴民族的新国民教育的内容，约略地来说几点。

由敌人的一意摧残轰毁我们的文化机关，和竭力逮捕惨杀我们的知识分子那两点看来，便知敌人想侵吞我国家，绝灭我种族，首务即在扫除我民族的文化，窒塞我民族的知识，而文化与

知识的养源，谁也知道是在教育。战时教育的第二层意义，重心就在这里。

中国教育的革新，初期是在前清的末季，改书院废科举，把向来的教育内容及举士擢才的制度，改成了现代化。其后民国成立，国民革命成功，虽在教育的内容，与学校的编制上，有很多的改进；但对于根本的国民精神与国民意识，仍没有加以最大的注意。所谓国民者，系指在国家这一个集团之下，共同奋斗、努力、生存着的一员而言；离开了国家这一个集团，这分子就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意义，因而也不得生存——断无生存之理——。是以国民的理想，就在国家的形成，而使它巩固发展永续下去；没有了国家，当然也就没有了国民。因此，国民教育的任务，就在集合在国家这一集团之下的一民族的共同思想，共同感想，与共同意志的养成。国民教育的基础第一当然是应置在这国家的集体思想，与民族的共通意识之上的。清朝是征服我们的异族，他们所施给我们的教育，自然不外乎培养我们的自私自利之心，削弱我们的团结力量，要我们失去了自觉而做一个驯服的奴隶。清朝养士施教，垂三百年，这一个教育中心思想，不幸到了民国，还仍保持着它的惰性的潜力；各自营私，不顾全体，只知有我，不知有国有同胞，就是这教育的成功。

所以在现时，或战后，我们要想施行复兴民族的新国民教育，第一就应该把这传统的奴性教育思想肃清，而把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渐渐地或急速地扶植起来，才能有济。但在这里应注意的，就是国民教育中对于国家观念的唤起，与民族意识的加强，并不是狭义的军国主义的提倡。只知侵略他人的军国主义，或欺凌压迫弱小民族的资本帝国主义，是我们所绝端反对的洪水

猛兽，也系包括在我们的国民教育纲要中的一项。可是民族意识加强，坚实的统一国家形成以后，本来是只欲用以自卫的国力，老有变成侵略倾向的可能；故而我们的国民教育中第二个核心，应该是国民道德的培养。在国家这一集团之下，国民全体，互相谅解，营共同的生活，对于一共同目标，协力前进，本系每一个国民的天职。但是在营共同生活的集团之中，要使共同生活健全发展，那个人的公德，第一就不得不使它尽量发挥。说到了公德两字，似乎颇有语病，易使人想起与私德的对立；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包括国民道德的全体而讲，公私之界，颇不易分；总之是凡一近代国家的国民，若不守住这国民道德，没有这道德的基础时，他就丧失了国民的资格，就是法外人了。

国民道德的内容，包含得极广，就是上举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也可以说是国民道德抽象的内涵；若想具体地把它列举起来，我们最好是用了已成的熟语来加以说明。陈主席屡次训诫僚属及青年的立身处世三大警句，就是国民道德的实际条项，现在想把它们来借用一下。

第一，是公正。不偏之谓公，不畸之谓正，这二字字义的解释，看去似很平常，但内容却极其复杂。先就“公”字来讲，必须有辨别、认识的头脑，才能分得出公私，向光明的大道前进。一不小心，堕入了借公济私的魔障，你自以为在替天行道，但实际却与公字往往要背道而驰；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认识不清，毛病大抵总在几微之处。其次“正”是正义感的发露，社会有社会的正义，国家及国际间，有国家国际的正义。我们是一国民，同时也是社会人，世界人；处处有正义要我们严守厉行，大小之间，并没有矛盾，并没有偏畸的。侵略者的幻觉，就在这正义感

的变形上面。我们是反对侵略的，所以我们对正义，尤不应曲解。

第二，是认真。系将上面公正的实际认清之后，移入力行时的一种毅力，亦即是帮助我们认识辨别的一种内在基础。因循，苟且，知而不行，行而不坚，或知而不足，不知而不求知，都是不认真的结果。

第三，是有勇气。勇者并不是蛮勇之谓；凡见义不为为非勇，欺凌弱小为非勇，贪图便宜，使乖取巧，自私自利皆为非勇，从这几点消极的方面来一看，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个有勇气的大概是怎样了。侵略者恃其兵力，横施虐杀，究竟是勇不是勇呢？当然不是的。

所以国民意识的确立，与国民道德的发扬，应该是我们的战后新教育的两大础石。这基础的筑成，先要赖于国语的统一，与文字的普及（有意、德各国先例可证），其次是史地知识的广播，尤其是民族成长与民权伸缩的历史。

每一国民，先有了这教育基础之后，然后方可授以适应于共同生活之专门技能与知识，以期各人尽其社会的职分，使得各从事于最适当的活动而竭尽其所能。在这一方面，当然要以科学精神为根底，先养成尊重科学的风气为急务。至于体育的锻炼，应与其他教育机关能保持平衡，原为斯宾塞尔氏以来所公认的学说，就是智德体三育的并进，但在战时或战后的教育，往往有偏重体育的倾向，我以为在我们的新教育纲目中，对这一点还应该慎重。三育并进，原是应该，偏重身体的锻炼，而忽略了国民教育的基础，以及专门知识技能的培养，则我们的新兴国民，也难保不演出德日军国民所犯的一样的惨剧。

教育是创造文化的冶炉，天地生人，原始人是同天地山川草

木一样的自然物。必须经过陶冶，加以训育，受过社会的同化作用，自家庭而学校，自学校而大社会，随时随地，接受他人及社会的影响，而亦同时影响于社会及他人，文化才有进步，对国家对社会才能尽其集体安全的联带职责。

战后的世界，面目当然要一变，战后的教育，趋势自然也不同。象罗素在《到和平之路》里所说的那种绝对和平主义者的教育主张，我们虽然也有一半赞同，可是那些迹近无抵抗的彻底非战论旨，我们却不能囫囵接受。他说我们应当把好斗的残酷，及愤怒等心理一概剔除，这是对的；但他说我们不应当存国防之心，这却难了。世界大同，消灭战祸，大家来努力创造文化，原是我们的理想。但在这理想未实现以前，我们还是要我们的国防。

十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三十日福州《闽政与公余》第五号、第六号

文化界的散兵线

文化人在抗战期间，凡一国民所应做的事情，他都应该去做，如应征兵之召，输款纳物，担任搬运，救护伤兵之类。此外因为是文化人之故，智识较一般人为高，头脑亦比一般人有组织，所以还要担负起文化人特殊的任务。

第一，是宣传。国际的，可以去唤起正义，揭发兽行，联合世界的文化人来扑杀那疯犬，就是专以侵略为事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这宣传，当然要包括日本的非战文化团体，及反战的日本民众在内。国内的，对无近代智识的广大民众，可告以战事的现状，国际的形势，抗战的方法步骤，以及将来的准备与出路。

第二，是组织。光是宣传，而不从事组织，是没有用处的，所以有了宣传和抗战方法之后，就要行动。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是一种，渗入到无论那一层的无论那一个团体里去，做这团体的脑细胞，如加入工会、农会、妇女抗敌会、学生救亡会、商民后援会，甚至乞儿总会、洋车夫联合会等等去做组织、推进的工作，又是一种。

第三，是广泛地带社会性的教育。不识字者，教他们识字，男女老幼，都可以。不必要正式的学校，规定的时间。写标语，画图画，大道讲演，说评话，扮装表现，领导或参加游行演剧等都是。

最后，才是弄笔杆，做文章，撰成万世不磨灭的作品。可以使顽者廉，懦者立，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更可以将敌人凶暴的印象，永印在我民族的心里。可以防战后的团结心松懈及民族堕落现象的发生。亦可以昭示子孙以父祖的创业之艰难与困苦。总之，文化人可做的事情很多很多，要纵的横的都会农村向各处去进行，造成一种社会的推动力与后一代的潜势力。但是，最要紧的，还是文化人自身，先要谋各党各系各派的精诚的团结。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州《小民报·文教周刊》创刊号

九国公约开会

九国公约会议三日在比京开会，我们为被侵略国家，当然要据理力争。但设想九国公约及一切国际和平约章，是有效的话，又何待事后再来开会，会后若只来一套劝告两国和平的决议，则议了又有什么用处？求人不如求己，我们对九国公约会议，只算尽了人事，决不可有依赖之心。所以我们还要加紧团结，加强抵抗。要知我国不成焦土，便成仇土，我人不为烈士，就是倭奴，生或死，存或亡，路只有两条，决无和平妥洽的第三条路，介在其间。

抵抗已逾三月，焦土只化了十分之一，以全部中国，统化焦土来算，起码还有两年半好支持。中枢对财政，也有二年的把握，兵力即广西一隅，可出二百万以上。这一个决心，这些个准备，才是九国公约约章的兑现处，此外的繁文缛礼，条款公文，都不过是前世纪遗下来的装饰品而已。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福州《小民报·文救周刊》第二号

对于九国公约国会议之要求

在四日的本刊上，本人已有劝国人勿对九国公约国会议生依赖心之警告。依赖心原不可有，但抗战心却不可不有。我们是被侵略国，我们的要求，当然是极简单。即一，望各公约会议国能一致拥护自所签订，并经各参加国批准之各条条款，尤须注意于第一条之精神，而务使此条条文得贯彻始终，收有实效。二，因违反此公约而惹起的一切关与国之损失，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之种种损失，统应由违反公约国负责赔偿之。三，为防止此等违反公约事件之再起，应由各公约国谋一永久和平之实施方案，切实执行。如限制侵略国之武备，或设立和平制裁执行机关。更如收空军为国际军，凡关于航空（凡商业上、军事上之一切）事业，概应由国际机关处理。凡毒气、细菌、轰炸各战略，只限于国际军实施制裁时准其应用之类。

这极简单的三项要求，除第三点，更有详细讨论之必要外，一、二两点，实系天经地义，是人皆知非贯彻不可的主张，更何况乎集各国优秀分子大成的代表诸公？

各签字国及参与国之难以取决之苦衷，我们原也有充分之认识。但国际间之正义不伸，各国之自私自利心不除，则国家亦等于个人，将来终必至于同归于尽，没有出路。世界文明没落，人类灭亡之端，就开始于此，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星星不灭，火必燎原。是各主张正义，渴望和平国家能应注意之点。我们原已准备下抗战到底之决心，与其委屈求全，宁愿英勇拼死。但万一犹有可至和平之一线希望，终不欲走上这一条同归于尽的绝路。为人道正义及己国生存而奋斗的各友邦，对此呼声，应不能置之于脑后。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福州《小民报·文救周刊》第三号

预 言 与 历 史

中国在每一次动乱的时候，总有许多预言——或者也可以说是谣言——出来，有的是古本的翻印，有的是无意识的梦呓。这次倭寇来侵，沪杭、平津、冀晋的妇孺老幼，无故遭难，非战斗死伤数目，比兵士——战斗员——数目要多数倍，所以又是刘伯温、李淳风的得意之秋了：叫什么““嘉湖作战场”啦，“末劫在泉唐”啦，之类。以形势来看，倭寇的不从乍浦及扬子江上游登陆，包袭上海，却是必然之势。不过前些日子，倭寇伪称关外有变，将华北大兵，由塘沽抽调南下，倒是吾人所意料不到的事情。而平汉、津浦的两路，乘现在敌势正虚的时候，还不能节节进取，如吾人之所预计一般的成功，也是吾人所难以解答的疑问。在这些情形之下，于是乎有预言。

预言倒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国粹，外国的军事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从历史的演化里脱胎，以科学为根据，对近五十年中的预言却也有不少。归纳起来，总说是世界大战，必不能免，中国先必受难，而到了一九四〇年前后，就可以翻身，收最后胜

利的，必然是美国。

外国邵康节，当然不会比中国鬼谷子更加可靠，只是中国的预言，纯系出乎神秘，而外国的预言，大都系根据于历史及科学的推算，两者稍有不同。

可是神秘的中国民族，往往有超出科学的事情做出来，从好的方面讲，如忍耐的程度，远在外国人之上，就是一例。更就坏的方面讲，缺点可多了，而最大的一点，就在于太信天命，不肯自强。譬如有人去算命，星者说他一年后必一定大富大贵，他在这一年里，就先不去努力，俨然摆起大富大贵的架子来了，结果，不至饿死，也必冻煞。大而至于民族，也是一样，现在到一九四〇年，足足还有三个年头，若只靠了外国人的预言，而先就不知不觉地自满起来，说不定到了一九五〇年，也还不会翻身。九国公约会议，似乎是外国预言的一个应验，但一面意德日协定，也是一个相反的应验。

常识大家斯迈侯尔氏，引古语说“天助自助者。”这虽不是预言，但从历史上的例证看来，这却是实话。所以，我们只有坚竖高垒，忍苦抗战，一面致意于后方的生产，一面快设法打通一条和外国交通的出路之一法。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救亡是义务

救亡是义务，不是权利。救亡在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遵各人良心的指示，去做工作，不必人来聘请，如发请帖之类，或预计报酬，如救亡一日所得几元几角之类。救亡若有团体，都应该统力合作，若为个人，亦应开诚布公将细流合入巨流中去。救亡没有阶级性，你可以救，我也可以救。你出十元，我出一钱，只教是已照良心尽了最大的力量就对，出十元者，并非上级救国者，出一钱者，亦非下级救国人。救亡并不是出风头，也不是可靠以吃饭，只闻有殉国之义士，未闻有救亡专家，或吃救亡饭而发财者。救亡与选举，或当委员无关。我不当委员，我所以不必救国，甚至卖国也可以，这理论，断不可通。救亡不必有名义，也不必有奖章或报告单，敲铜锣。救亡并不是争私人的权益名位，如救亡官几等几级，或置救亡地产若干顷之类。

存亡生死之谓何？精诚团结之谓何？这些普通的口头语，若大家自一想，就可以明白救亡的意义。包办救亡，或疑人独占救亡，闭而自己偏去助亡，都是民族的罪人。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日语播音的宣传要点

中国民众，本是酷爱和平的，日本民众，想也一样。中日的民众对民众，本无仇讐敌对的可能。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完全为少数军阀，与财阀的野心所促成。成功了，他们又可以创制幕府，或摄政关白的制度，无形中完成其篡弑的行为，失败了，再来一次二·二六事件式的虐杀。

军阀对日本国内那些愚民的宣传，完全在欺骗民众。日本民众，只须向每日报上所发表的伤亡人名栏一注目，就可以知道。死亡人数，究竟是日本民众数目多呢？还是军阀的数目多？几个发起这次侵略战事的军阀，有一个死过没有？伤过没有？

日本的庞大的预算，间接直接的租税，几十万万元。这些钱是出在那里的？是那一个人用得最多？

万一日本打了胜仗得好处的，是不是日本的民众？兵士的家族，以及未亡人与孤儿之所得，比起军阀来如何？

战争是在中国境内，中国民众的抵抗，系迫不得已。但中国却没有军阀，中国也并没有征兵；中国的斗士，一部分是招募而

来，一部分是义勇军。中国人口有四万万七千万，日本人口有七千万。但中国是男子数比女子数多，日本则反是。

日本壮丁的人口，每日每日在大量的减少，而一般物价却在高涨。工厂劳动者，许许多多人，失了业，本来已苦得不了的日本农民，更加苦起来了。日本全国社会的金融停滞起来，大家都没有了收入，及零用的金钱。这原因又在那里？

在中国的日本的俘虏，我们对他们都待得很好，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不愿意跑上中国来打仗的。但对于留在日本国内的他们的父母、子女，以及弟兄、姊妹与妻友，却都抱有十二分的同情。中国人民并没有残酷这一回事，你们的军阀的宣传，说我们在如何如何虐待他们，完全是歪曲的事实，请你们千万放心。

中国的民众，个个都已有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日本军阀若不觉悟，这战争恐怕也就要两年三年的延长下去。但我们所抵抗的，是军阀的野心，并不是日本的民众。所谓排日、侮日、抗日等等，都是军阀的逆宣传，想把我们对他们军阀所取的态度转移到你们民众身上去，激起你们的义愤，替他们来做爪牙，丧生命，希望你们不要上了军阀们的当。

我们所要求的，是人类爱，是国际间的和平，是大家的共存共荣，是文化的建设。所反对的，是侵略战争，是军阀们的野心，是对本国及他国人民的虐杀，是破坏。日本的民众们！你们假如同我们有同样的要求，有同样的疾恶之心，那请你们同我们联合起来，促使日本军阀们的觉悟，制止日本军阀们的暴行，为正义，为人道，更为我们东亚的黄色人种立下一个永久和平的基础。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这假冒还胜似那假冒

前几天，台江的一旅馆内，来了一位盲目军人，说因参加上海抗敌战争，被烟幕毒气所中，现在是受伤回来了。于是慰劳者，给予金钱者，便纷至沓来，这军人倒得了不少援助。后来报上揭穿事实，说这军人是在假冒骗钱。这是假冒之一。

上海报上，也曾登载过一位奸商，放送无线电的歌曲弹词，说是将所得利益，扫数送抗敌后援会转致前方应用的。但后经查出，此人系假冒救国而图发财者，结果予以枪毙。这是假冒之二。

厦门报上又登有金门有假冒难民之汉奸数名，混入厦市，意图刺探军情，业已捕获正法。这是假冒之三。

同为假冒，同为骗取金钱，我觉得那伤兵的假冒，性质却来得特别的可敬。第一，因为他晓得在这时候，男儿应去挺身杀敌。第二，他晓得卫国的军人，必受大众的拥护爱戴。第三，他的假冒，并不危害及社会国家。

因他的假冒，因社会人民之被他所骗者之多，在反面就可以

证明我们民众抗敌意识之普遍，证明后方的人民与前方的将士还紧紧地连系在一道。

一面也可以看出，我们在从前，对于退伍的军人，太不顾及他们的生计；现在中央颁发征兵制度，用意周到，深致意于兵士家族，以及退伍后的生计问题之确有意义。

至于假爱国之名，而来行窃取之实，甚且危及社会国家之假冒者，如上海的那位奸商，厦门的那些汉奸，总是死有余辜，出卖民族的大罪人。从前每一次抵制日货运动起来的时候，各地总有这样的几个吃抗日饭的暴发户发现，结果总被漏网，逃之夭夭。现在国法严明，若再有这一种卖国者出现，可真得千刀万剐他了，大家应该注意，严密地来检举才行。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自大狂与幼稚病

自大狂，亦称自我狂。系野心过烈，神经中枢起特别变化，理智为物欲所蔽，人性受兽性支配时的一种病态。这种病，原始起于个人，以为自我大于一切，一切就是自我。譬如三千里外，有人因见狗打架而发一笑，这自我狂者，虽远在三千里外，就以为人在笑他。同样的症状，很多很多，于是瞋恚无时，心神不定，愈演愈进，终非变成嗜杀狂的那一种恶症不可。这一种个人，在某一社会，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中，数目多的时候，则这社会，国家，或民族，也得渐由自大狂，而进至于嗜杀狂的末一段，因而自取灭亡。

自大狂的另一征候，是幼稚病。先由理智思想的幼稚起，渐而至于言语的幼稚，行动的幼稚，结果，也同样地，可以引个人或集团到嗜杀狂的境地。再进一步，即不杀人，也必至于自杀。

读者诸君，看了我这两种病态心理的分析之后，大约总也马上可以了解日本这一次侵略战争的原因在那里了。因几个军阀的自大狂与幼稚病的推动，日本当局竟领导全国走入了歧途。世界

各国，无一国不认日本为疯狂，而这疯狂的结果，无疑地必至于自杀。

我们要想抗战，要想制敌，第一得先克服这两种病态的萌芽。领袖曾再三的告诉我们，要镇静。又告诉我们，小胜勿骄，小败勿馁，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现在前线战事，虽小有不利之处，然决不足以动摇我们的自信。自信并非自大。战略上的一时移动与后退，决不是决定最后胜利的楔子，断不宜就抱悲观。悲观就是幼稚。我们要加强团结，我们也要奋斗到底。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读胡博士的演词

前昨两天，《民报》特载栏，录有胡适博士在美国向侨胞讲的演词一篇。前段所说的，中国已完成百分之百的统一，各党各派各系，从前是反抗中央的，现在各已精诚团结，在最高领袖指导之下，一致抗敌了。这话很对，新兴中国只单持这一点理由，我想就可以制胜而有余。但后段对日本的分析，胡博士未免太抱悲观。就是说日本的经济不至于崩溃，民众不至于起自坏作用的两点。日本经济制度的脆弱，国债数额之庞大，实为世界各国所绝无之现象。即在平时，人民已觉负担太重了，军阀财阀，每为此事而忧心，故有饮鸩止渴，此次大规模侵略的孤注政策之决行。在这一个危机之下，说日本的经济，于战后还可以榨出几十万万来，我却不信。日本历年所发的平时公债，大部分都压积在日本银行的金库里，日本公债的国际市场，早已没有顾主了。日本的经济学者，尚在惶惶然顾虑到恶性膨胀的结果，经济制度的必至于崩溃，而胡博士还在说日本战后经济之可靠，对这一点的分析，我却很抱有疑问。民众的动摇，是紧跟着经济制度而来的，

不管你警察如何的严密，军队如何的凶暴，民众若一有不平，则日本人老说的“农民一揆”是必然地要起来的，但凭军力的压力，怕是弹压不住的。

除此两点之外，胡博士的演词，我也全部赞成，尤其是注重于自力更生，劝国人不要生依赖之心的那一段话，确为我民族在这时候所必有的决心。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我们在后方

现在战争的唯一要素，是经济，我们大家谁也知道。敌人的经济，据外国经济家观察，最多只能支持到明年的三月（从今日起最多只有四个月），三月以后敌经济上的破绽，就将在国际汇兑大跌上，国内物价高涨上，纸币暴落上，泛现出来。我们的经济哩，对外还可以丝毫不受影响，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以国际贸易立国的工业国家。我们所有的是物质，只叫物资能够畅销畅流畅给，则天空海岸，尽管由人们去封锁，我们还可以营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国民生活。问题就在这一点，我们若要长期抗战，物质的生产还得维持。既生产了物资，则运销分送的交通，还得整理。但这两件事情，业须先以维持社会秩序，上下严守法纪为前提。

至于金融的调剂哩，要将死财化为活财才行。个人私财的堆积，货币流布得不匀，都是战时最大的症结。游资应该聚集起来，交给国家去经营大规模的适应战时的事业。

我们在后方，战时应做的事情，原是很多，可是最重要的，当是上述的几点。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福州《小民报·救亡文艺》

承前启后的现代儿童

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是我们全中国的民众在受难的时候，而受难最烈的，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和老年人与女子。日本军阀打进我们中国的土地，抢、掠、放火、杀人，还要对我们的妹妹、姊姊、母亲、叔伯母、嫂嫂、婶婶，甚而至于祖母，都加以非礼。人家说，日本军阀是强盗，所以叫他们作日本强盗。但是，由我看来，日本军阀比强盗更要凶、恶、坏，比禽兽，就是畜生，都还不如，因为强盗和畜生，不会杀人放火，不会侮辱女子。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是创造新中国，打倒日本军阀，建设世界理想国家的主人公，是承前启后的我们中国这一代的重要人物。你们应该记住日本军阀的凶、恶、坏，应该想法子把这些比畜生强盗还不如的日本军阀统统弄杀，好教世界上的人，大家得过平安的日子。你们还应该将这些畜生强盗的行为告诉你们的后一代，好永永教不忘记日本军阀——也叫做倭寇——是我们的世仇。

每年到了儿童节的日子，请你们回想一下，“我的打倒倭寇，为中华民族复仇的责任尽了没有，将倭寇的凶、恶、坏的种种暴行，告诉了大家没有？”你们的责任比什么都是重大，因为你们是在这时候的承前启后的人。

原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武汉日报·儿童节纪念特刊》

抗战自入第二期后

抗战到了第二期之后，我们的成绩如何？想是每日看报的人，都明白的。对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这一句话，自我军退出上海，退出南京的时候起，大家似乎都发生了怀疑。但是现在的鲁南、晋边，以及东南的捷报，还不够证明这一句话的确实么？我们应当对最后胜利，不发生疑义了罢？第二期抗战，还正在开始，而同时我们也已经在作巩固确实的第三期抗战的准备。这准备是什么？就是经这次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党国诸政纲。精诚团结，如炉火里在炼的纯钢，敌人的炉火愈来得凶，团结的锻炼，也愈来得坚强与凝固；领导我们抗战的最高领袖，被大众一致推戴拥护，负起了党国的全责，总裁一切，指挥一切，我们全国的民众，只教同船上的水手们一样，竭尽全力，朝领袖所指示的方向走去就对。

领袖曾经告诉我们，小胜勿骄。我们于听到了这一次的大胜捷报之后，当然也不敢自骄与自满；反之，我们倒要更加的自惕与自励。因为胜利的得来，并不是侥幸偶然的。并且我们的目

的，是在最后的胜利，这一次的大捷，不过是向最后的胜利目标接近了一步而已。

回头来，看看敌人对这次失败的结果如何呢？国内反战的声浪，愈涨愈高了。增税竭泽之后，民众全家自杀的报导，每日增加了。穷余计拙，就来使用毒气；因之国际间对这一个野蛮杀伐的民族的毒视，也到了不能再忍的程度了。人类的敌人，世界和平集团的敌人，这一群疯狂的野犬，你说还能再有几年的寿命么？我不相信，我绝对的不相信。

这一次的胜利，还是最初的胜利，不久的将来，我预料必有接二连三的捷报传来。其余的话，且留到下次，下次，再下次等时候再写就是。

四月五日在武昌

原载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汉口《少年先锋》第五期

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我们因为在日本住的日子长一点，所以平时交游的日本文士，也比较得多。以常识及平时的谈吐、修养、抱负来看，总以为文士是日本的优秀分子；文人的气节、判断力、正义感，当比一般的人强些。但是疾风劲草，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这些文士的丑态就毕露了。我们原有点被他们欺骗了的后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决不能与世界各伟大民族相并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断定日本的抄袭文化，决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放一点异彩的运命。矮子登场，弄了一辈子的轻薄小技，终也不过是些沐猴冠者而已。

所以会引起我这一段感慨来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读到了《日本评论》三月号上的一篇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的创作。

文人的幻想，原不是可以用道义的立场来批评的。文人对于作品中模特儿的引用，原也不是可以由被引用者来提出抗议的。但是，至少至少，对于事实的歪曲，诬蔑，总也应该在一个不超过常识的范围以内才对。使用挑拨离间的策略，也应该不远离开

艺术家的立场才对。

让我先来介绍佐藤的那一篇劣作《亚细亚之子》的内容。

有一位姓汪的革命文学家，在十七八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流亡在日本，与他的日本妻子，共过了十余年的放逐的生活，他本来学的是医学，他的妻子，本来是大学里学助产的看护学的。儿女也已长大了，大约两个已经进入了第一高等学校。有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个姓郑的中国朋友，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访问他了。这姓郑的使命，就是受了中国最高领袖的密谕，去煽动他回国来作抗日的宣传的。

终于芦沟桥事件勃发了，汪一个人便悄然留下了给妻与子的遗书，逃回了中国。在各地作了许多热烈的抗日的宣传。

最后他发见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并且也感到了自己是供作了被报复的牺牲。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时代的一位情人，却被他的老友姓郑的骗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

于是他就翻然变更，要求日本人容许他去作救济华北人民的工作，在北通州造成了一个日本式的医院，在倭寇保护下重迎他的日本妻子到了通州。

这是他那一篇劣作的大意。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同时也拙劣地使尽了挑拨我们违反领袖，嗾使我们依附日本去作汉奸的技巧。至于中国人的人格呢，对男人则说是出卖朋友的劣种，如姓郑者之所为，对女人则说是比日本的娼妇还不如，如那一位姓汪的爱人之所为。

介绍了这一篇劣作的内容之后，读者大约总也已经可以明白

我这篇短文的主旨了吧！就是：日本的文士，却真的比中国的娼妇还不如！

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的颂词。而对于我们私人的交谊哩，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大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

平时变化莫测的日本文人，如林房雄之类的行动，却是大家都晓得的。在这一个时候，即使一变而做了军阀的卵袋，原也应该，倒还可以原谅。至于佐藤呢，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流的侠伎了。

当然，日本的文士，也不可以一概说的。我们有我们的理知与判断，我们亦有我们的矜持，我们决不愿意象佐藤似的不分皂白地加以一例的阿谀的谩骂。日本老大家中，如秋田雨雀，如志贺直哉、岛崎藤村等，还是良心不昧的人。中坚作家如鹿地亘及其他的诸非战作家，更加是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文士了。我们对那些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于摇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样。对于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气节的作家，应该以全腔的热血来致敬。不分国界，不问人种地。

五月九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抗 战 周 年

以为三个月，可以全部灭尽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阀，近来也似乎有了觉悟，开始唱起长期侵略的鸟调儿来了。自以为三个月也可以亡尽的我国恐日病患者，现在都已霍然去了旧疾，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一日坚固一日，比开始抗战的当时，恰恰加强了三百六十五倍。这是目下的实际情形，这恐怕也要成为将来总决算时的两颗五位的算盘珠。保卫大武汉的决心，民众与士兵一样的铁定了下来，大家都在说："有力者只有在此时出力，有钱者情愿于不看见老头票的前夜，扫数的将法币贡献给国家。"因为敌兵一到，就会要你出命！力与钱自然要比生命落一等，为保守扶养生命的东西之故，而愿意先把生命不加以秤衡的呆子，现在的中华民族里，恐怕只有寥寥的几个，它们的名字就叫做汉奸。

抗战周年纪念的日期，恰巧与保卫大武汉的运动，交叉在十字街头；生命的火上，就加足了瓦碎的玉树神油，敌机的推进机，恐怕都要升化成一道黑烟，而缭绕在扬子江的高空。警报过多了，就也不足为怪，不以为奇，因为一般民众的抗战决心，大

部是由警报来唤起的。

黎明期近了，东亚的安定势力，不是虐杀，也不是乱炸，更不是奸淫与虏掠，恐怕是残留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最下层民众心里的人道与正义这两个无形的集团军。

抗战周年纪念日于武汉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一期

我们只有一条路

敌人的兵力，逼进了马当，我们自然只有一个拚死保卫大武汉的决心，来作最后的干城。

事在人为，有了决心，自然会收到成果。发动民众，加以组织与训练，使在前后方都能与军队打成一片，当然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就不成其为全民抗战，就不成其为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

有些人说，可惜时机太晚，缓不济急了；又有些人说，就是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一瞬间，恐怕民众运动，还是做不好。这些杞忧，也不能说它们是完全没有根据。但亡羊补牢，尚未为晚，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古话，又在那里教训我们以什么？事只在有没有决心，能不能够万众一心，上下一德地和敌人死拚。

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战，是我们第三期抗战的开始，即使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的抗战决心，也不因之而有动摇。生物的最后武器，是一个死，国家的最后阶段，是一个亡。在死与亡的面前，什么利害打算，得失估计是没有的，也绝对不容许有的。

所以在我们面前的，仍只是一条坦直的大道，抗战到底的大道，除此以外是更无第二条路的。

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抗战文艺》第十二期

政治与军事

蒋委员长当年对共产党用兵的时候，曾经说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话，而德名将克劳粹味知的名著《战争论》里，亦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长”。一个国家的政治，假如真正是彻底澄清的话，当然，内乱也不会起，外侮也不敢入，战争是决不致于发生的。即使受到了侵略，防御自然有余，准备那里会得不足？

现在，中国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侵略抗战，已经有一年了；虽则失地很多，而民众的×慨心，反而加强，国家的统一业，因以告成；以失来偿得，的确也还偿得过。可是以战争而论，截至现在为止，我们该坦白地承认，并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这原因，不在武器的不足，不在士兵的不勇，也不在国际助力的缺乏，根本问题，总还是在政治的不良。所以，我常常说，我们的军事上的失败，与其说在物质方面，还不如说在精神方面，来得适当。中国政治的不良，虽则积弊很深，但是贪污、不公、虚浮、腐败到绝顶的一段，当从国民政府分共以后算起，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时期。

从前的贪官污史，私财积至百万，已经是为众所共弃，青史上最坏的人了；但是现在呢，且数一数中央的大吏，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在外国市场的投资，在外国通都大邑的产业，个个都是在几万万以上。他们并没有兴产业，他们也没有做商贾，这些钱究竟是那里来的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居上者既然贪污，下面的人自然再也没有一个廉洁的了。就是到了生死存亡的现在，将领中间，仍有克扣军饷的。办军需，造工事的，个个都挂羊头，卖狗肉，一攫而又至千金万金万万金。伤兵医院长，难民救济所长，吃慈善饭的善棍，也还是一个样子。县知事，科长科员，下而至于办事员书记，公家的钱，老百姓的钱，敲得着便敲，诈得到便诈。直到联保主任，有借派公债抽壮丁而发财的，也有因办公差，放款项而得利的。而谋利不怕血腥臭得最厉害的，尤其是散布在各地的各级党棍子。中央虽也有严惩贪污的明文，实际上也着实执行了几次枪决；可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贪污只在五百元上下的，倒死得很多，而贪污到几百万以上的，非但毫不受影响，中央却还似乎是少他们不得的样子，左一个委员，右一个部长，总是非他们莫办然的。

官纪不正之后，自然是赏罚不明了。对国家民族，对抗战有功绩的人，膺中央的重赏者，原也不少，但是真正的专门人才，真正的想为国效命的忠良分子，大抵都被摈而不用；当道的，负重任的，多半或是一党一派的私人，或是出卖狗皮膏药的贩子。明朝的亡，亡于东厂；现在虽则已没有了外戚宦官，但是这一种风气，又何常与明末有点儿两样呢。抡擢人才，天下为公，取消小组织的命令，虽也尽管在发；可是小组织的活动依然，精诚团结的实效，一些也不曾得收。你排斥我，我排斥你，你也只想保

存实力，我也只想扶持党羽，正义不伸，廉耻丧尽，貌合神离，利令智昏，滔滔者天下皆是。在南京是如此，到了武汉，也还难免这样，降而至于内地各处，只有得比从前更暗无天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在这一种政治积弊之下，你说我们的战事，会不会取得绝对胜利的呢！

至于前线的士兵哩，实在是可爱，实在为国家民族而牺牲。他们所得的，只是七折八扣的几元军饷，所吃的，只是几个铁样的馒头，日夜风餐雨沐，死守在壕沟里，以血肉之躯，而与敌人的精强炮火来拼，没有后悔，没有怨言。这一种士兵，假如被西欧任何一国训练运用起来，有不独霸天下者，请你们来割我的头，食我的肉。

其次，是我们的老百姓了。做工事，是他们，上面发下来的钱，他们是拿不到的；被征用，被抽调，也是他们，上面的精详周到的命令，他们是看不到的。平时不施以教育，这时更不施以训练与组织——原因也因为了党派——实在饥饿不过了，受了几毫钱与几粒米的恩惠，为敌人所利用之后，受杀头枪毙等极刑的，也就是他们，上面的告诫，宣传品，他们或者是看不到，或者是看不懂。

上面所说的种种，还只是过去我们政治不良的一端，其他具体的细事，当然更举不胜举，书不胜书。中央近来也彻底地在励精图治，想把这些积弊，一件件的纠正过来。自第三期抗战序幕揭开以来，军事上已经有了把握，此后就在这政治的澄清。大约不久的将来，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个绝大的变革，把过去的贪污不惩，赏罚不明，虚名是务的种种弊政除去，而实施抗战建国的政治。最后胜利的枢纽，就在这里，我们对中央的拥护与期待，也

就在这里。

至于×人的国情，与国际的助力哩，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说。木不自腐，虫何由生？依赖他人，亦非上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努力，只在于我们自己。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香港《星岛日报》特稿栏

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

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已于七月廿四日在巴黎会议完毕；决议案甲项大纲六条，乙项对中国之特别议案五条，早已在各报登出。冷静的国际诸先进，如何地在深恶痛疾那些法西斯军阀的兽行，即此一端，也可看出；正义人道，终于是决定胜负的最后楔子，疯犬们的乱噬狂咬，流毒必将反至于自身。

在这一会议之后，令人不得不想起的，却是罗素在三五年前提倡过的一个提议。他以为纸老虎决不能吓退真疯犬。国际联盟，在仲裁亚国被侵略时丢了脸，在调查伪满及中日争端时，也是一样。没有扶持正义的国际十字军，对侵略国来加以强有力的军事制裁，则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决没有保障的可能。所以他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无论那一国的航空事业，不论是商用或军用的，必须由国际来经营，来管理。各主权国不准私自制造飞机炸弹，当然也包含高射炮及防空设置事业在内。万一有一侵略国，不守条约，蔑视信义，敢向正义人道挑衅的，国际空军就可以以轰炸来施以制裁。这提议若能实现，岂非国际间的一

大保障？可惜世界国家的理想，还不能实现；人类兽性的克服，还不容易完成，这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回过来再想一想日本军阀的所以要如此残暴蛮横的理由，实在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少数军阀的唯一企图，就只在满足个人的私欲。而私欲满足的最后阶段，就是富有天下，就是取帝位而代之。二二六事件，军阀们本就想行废立之举的，然卒因分赃不匀而失败；这一次的侵略中国，也就是他们想挟天子以令百姓的第一步。不管他们这一次对中国侵略的成功与失败，结果必将暗杀日皇，重建摄政关白之制，是可断言的。这是自然的成果，并非是我个人的臆测；三年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日军阀称帝的事情，换句话说，日人所夸说的什么万世一系，就将断绝在二三法西斯军阀之手。

七月廿九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五期

苏日间的爆竹

为争夺张高峰一带的据点，苏日间居然燃放了爆竹。衅由日起，解铃人当然仍是日本，珲春条约之前，张高峰本是我们的土地，一经订约，我们就让给了俄国。法西斯军阀手下的小喽罗辈，看到了大头目对中国的妄作妄为，于是也想抄一帖老方，也来一个立功的妄举，其目的原也只在升官发财与依次的擢为大将，××××。但结果却变作了一只似虎的劣犬，从此可以看出，为大头目的目无法纪，擅为戎首，已昭示了小喽罗们的可以不服从命令，不顾忌条约，一唯私人权利的嚣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螳螂黄雀，就去自然不远。我所以敢果断地说，日军阀不久将要篡位，但不久之后，这篡窃者也必将依次的被××。

这一次日军阀内阁的卑躬屈节，向苏联的叩首求和，原是他们的聪明。因为自从他们发起向中国侵略以来，纸老虎戳穿，一等国早已降落到了二等国的末座。并且，军火、壮丁、经济，也早已用去了十分之三四。几十年来苦苦经营的准备，在这一年之中，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一了。而换得的收获，却是“世界上××

××××”，“绝无法治精神的国家”，“×××××××××××
×××××××××××××××××××××××××××
×”等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头衔。苏联若譬它作老于航海的奥迭赛的船，那日本必将变成独眼巨怪零克洛泊无疑。所以这一次日法西斯军阀头目的叩首乞和，的确是他们的绝对聪明。

他们若再聪明一点，就可以悬崖勒马，撤回侵略中国的无理暴军了；可是骑虎之势已成，他们虽则眼看到了这次玩火把戏的终将失败，但心怯口强，终于是不肯走这一条上天之路的。

对英苏叩首言和之后，×××××××××××必将吐向我们的武汉。我们对大武汉的保卫，消耗疯犬气力的目的达到之时，××××××××××××葬钟已经挂起，坟墓也已经掘好，××××××××××××。同胞们，让我们先预备好一个最后××的准备！

八月十三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二十期

西方的猴子

听说猴子最善模仿，所以西蜀山中，善捉猴子的人，只教打一个活结，挂在树上，另外再以许多绳子，同时挂在附近的枝头，捉猴者远见猕猴来袭时，只须将脖子套进活结，装作悬梁自尽的样子，猴子们就都会一只一只的去上吊。这或者也是人猿同论者的一个有力的论据，你若不信，且看一看西欧舞台上的那位名角！

当希特勒正在德奥各闹市贩卖鸦片、投机博弈的时候，一看到了大音乐家华格纳儿媳未亡人的财产，他就模仿喀撒诺伐，一跃便变成了窃玉偷香的好汉。卓别灵漫游世界，到处得到了倾城倾国的欢迎之后，他就蓄起了胡子。蒂伯尔河畔的那一只雄狮，登坛大吼了几次的结果，他又树起了卐字旗。自从东方矮丑跳梁，不费一矢一炮，而强夺了我东四省的疆域以来，他又左思右想，竭尽模仿的能事，进兵莱茵区域，强并奥大利，直迫但泽市，现在且又侵及了捷克的边境。

柏林十四日的路透电若果属实的话，他又在总动员全国民

众，以秋操为名，大弄干戈，不知更有什么企图了。所以有人说，墨索里尼是一位善于反复的Statesman。希特勒却是一位善于模仿的Stageman。但是东方矮丑，已经演出了一出名剧三上吊，自己把颈项送上了树枝间的悬绳去了；不知这一位大否勒所表演的下一个节目，又是什么名堂？

纸春牛可以迎春，纸老虎难道是迎秋的象征不成？

八月十七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二十六期

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中华民族，所持以抗战的最大凭藉，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几个基本条件。外国的新闻杂志记者，以及到过中国的外籍观光者，曾屡次的在欧美各大报上著论申说，谓中国的日本的战争，你们只知道中国已经失去了几千方里，或几区地域；但是你若打开地图来一看，则中国所保有的完整省份，每一省之大，仍旧可以比欧洲的一国而有余。象这样的省份，中国在现在还有十几省之多。

至于中华民族的忍耐性，坚毅性，与反拨的弹力性呢，完全是由于我们丰富的资源，与悠久的文化所赐予的大宝；到如今抗战已及一年二阅月，而各乡村以及各内地的民众生活，仍旧是丝毫没有影响，除了有飞机不时来残杀妇孺的威胁之外，他们仍在安居乐业，不改他们的常态。所以，外国人也老在说，中国人民所暗藏以及含蓄着的富庶，就是抵抗的力量，非但外国人看不到，便是最狡猾细心奸诈的日军阀，也大吃了轻视灭估的亏；并且从这一次抗战的结果看来，恐怕连中国人自己，当抗战开始的时候，

也许还不自己觉得的；这潜在的国力、民族力，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其次，说人口呢，谁也晓得中国有四万七千万，日本只有七千万。若以动员可能的壮丁全数来说，照全人口的四分之一计算，中国总有一万万人以上，而日本却只一千万零一点。再以上战场的战斗员，须有特别训练的人才行的话来折算，无论如何，日本总只有二百万人可以送出，而中国则二千万人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上面的三大基本条件，并不是囫囵吞地便可据作万无亡理的铁律来论的；土地要利用，富藏要开发，民众要训练之后，才能发挥，增进它们的固有力量。而利用土地，开发资源，训练与组织民众，都要以政治的发动机来推动；我所以屡次的说，我们这一次在过去抗战中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如战略不行，统帅无力，士兵少勇等；也不是物质上的失败，如炮火不继，运输不灵，给养不足等；归根结底，却要归罪于政治的不澄清，民众的不训练与不组织，国是国策的不确立这三点。

这些弊病，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上自中央起，下而至于极偏僻的农村，甚至已沦陷的地域内，大家正在一心一德，注意于这谬误的纠正。中国若果是一只睡狮的话，现在已经在张眼睛，振精神，预备怒吼了；中国若真是一个病夫的话，现在也已经离病榻，断药饵，在试浴、试步的时候了。×人用以刺探我国情的一种药品的广告文上，有"起死回生"的四个大字，现在我们却有了一个上联的对句，叫作"抗战建国"。

八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三十一期

财聚民散的现状

《大学》的说财聚民散，财散民聚，是从本末内外的据点而立的言；当然，聚敛之学，是古圣昔贤所反对的害物，甚至于说“宁有盗臣”。中国在这一次抗战之中的“有钱出钱”的口号，却并不能以聚敛两字来指摘；因为国家民族都要亡了，若再不出钱出力，那这些钱与力，只有被异族来用的一个结果。亡国贱奴，等于一只猪，亡国奴的金钱财帛，等于猪身上的金毛与肥肉。与其任人来宰割，自然不如先行自救自处之为愈。

但是现在的一个大缺点，从私人经济来说，是财富的只集中于几个不劳而获的私人；从社会经济来说，是财富的只集于中央或首都都市，而不普散在各地与农村。

委员长曾经说过，我们这一次抗战的最后胜利，将决之于农村；一都市一交通要点的得失，与最后胜利的决算无关。既然是如此，则金融的普遍流动，当然是目下最重要的一个国策。我们只在报上看见中央所定的救济农村的理论与方案，但事实上土产不能消，交通运输不能便，以及小本借款之不易得，却只有得比

战前更加厉害。以整个中国来说，就觉得财太聚在中央；以一省来说，就觉得财太聚在都市与省会。后方的工作，与农产物小工业之待兴与待发，是谁也知道的；但一出中央所在之地，一出省会与都市，就只是一大块绝无水润的荒地，与一大堆绝无希望的散沙。

农村与小一点的市镇，都象涸辙之鲋，在未抗战之前，早已经在死亡线下喘气了，而抗战之后，秩序乱了一下的现在，其窘状当然更可想而知。

我们要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得先培植这最后胜利所依附的养源。农村、小都市、山区以及湖乡僻壤，都在渴望着实业部财政部的甘霖的到来；光是舍本逐末的几个慈善机关的分发一点小款，是不济于事的，何况更有善蠹的侵蚀呢？

八月廿三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八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三十九期

估　　敌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缢鬼怖人，其技不过七十二变，纵使变尽狞恶丑态，犹不能摇动定者之心。结果，缢鬼只能自食其报，大叫一声，化作几点腥血，入瓮而就毁灭之范。我们抗战一年有半，侵略者无恶不作，无丑不演，现在是快到第七十二变的时候了！我们镇静观变，各线都趋于稳定，一九三九年的卯运新开，这时候正好来细数一数这怪物的种种伎俩。

最初，敌人原懂得百战百胜，犹未为善，不战而胜，斯为上策的论法的。所以只竭尽其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的毒辣手段，以期于不费一矢一卒之间，实现其蚕食野心，灭我种族。九一八鬼脸一变，居然得到了绝大的成功，其后便故技是逞，得寸进尺，今日冀东，明日平津，几几乎鬼蜮而衣冠，演成了得意忘形的大丑剧。不意七七芦沟桥，八一三上海的两次玩火，终于焚毁了它的绿发獠牙，食刺猬而中伤，吞胡桃而遇壳，骑虎势成，小鬼才发见了仁慈的天使，终于也有发雷霆的一天。

平时自夸自号的东亚盟主，一等强×——本来似乎是个“国”

字，实在却系一个“盗”字，所以从略——等纸糊高冠，一触而被人戳破，于是乎恼羞成怒，原形毕现，就不惜倾其全国之师，数十年的军火积蓄，与夫最后的经济孤注，拼死命的来施行奸淫掠劫，屠杀毒化等王道政策了。这种疯狂的兽行，在他们向自己老百姓作欺骗宣传的时候，叫作皇军的荣誉，而在全世界文明人，以及被侵略的我们大国人的眼里，简直是黄鼠狼的绝命屁。证据很多，举不胜举。最直接了当的文献，我只提一提英国H.J.Timperley's《Japanese.Terror in China》（田伯烈著，《日本之暴行》）就对。

他们以恫吓和欺骗的手段，强拉了他们国内仅有的驯良老百姓，一船一船的载壮丁与军火而俱来，不旋踵间，就一船一船的载了白骨与死灰而回去。伤兵是要活烧，尸骨登岸是在夜间的。偶而被一二新闻杂志，透漏了一点消息，军部发言人，只说“是支那大陆里拣来的狗骨”。这些狗骨，据他们自己的统计，以及中立国公正人士的计算，现在却已经积到了七十四万具了。他们的老百姓也正在疑心，支那大陆里，何以死狗竟会如此之多。他们的豫计，（实际上也在一次一次的公开向他们的老百姓宣传。）是攻陷上海，攻陷南京后，我们一定会屈膝求和的。然而我们于要求了敌人一定代价，消耗了对方相当的兵力军火与经济之后，转移阵地，放弃点线，退一步稳一步，所有的土地，面积依然是那么的多，所有的壁垒，阵形依旧是那么的固。这才稍稍表现了我们一点长毛物五柱擎天的法术，而在小鬼蜮却早已力竭声嘶，手忙脚乱了。于是乎一变又一变地，再来五师团，再来十师团的攻徐州，攻武汉，攻广州。长江一役，狗骨堆积二十万具，广州附近，现在虽还不能正确的计算，但据欧美各国战地旅行者的报告，敌

人伤亡数将近十万，被牵制而进退不得的瓮鳖，其数也在十万左右。

当我们没有放弃武汉之先，敌人曾集中宣传，指天赌地的向他们老百姓立欺骗之誓说："只教攻下武汉，攻下广州，我们便可以征服支那了。以后便人人可以发大财万事大福，将欧美在中国的权利，无论大江南北，马上可以全部的夺取过来，变成独占。"

但是现在却怎么样了呢？敌国内已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国际间信用毫无，而军事上又陷入了扑空之辙，穷极无聊，只能再变一变了。这将近第七十二变的全貌，就如下述：

（一）只教攻击我们的领袖下野，目的就算达到。所用的是分化，离间，造谣，威胁等手段。

（二）破坏我们的法币，使我们民众对中央失去信仰，造成普遍的恐慌。

（三）扬言中央政府，已变成地方政府，无抗战的意志与实力，使友邦感到失望。

（四）粗制滥造些傀儡组织，造成联邦政府的伪名，由平津伪政府，南京伪维持会，蒙疆，汉口，广州等伪组织中，抽调几个走狗出来，组成一大傀儡班来代替中央。另组一对支中央机关，为太上政府，来作提线的把戏。

（五）绝断我们军火的来路，用挑拨，威胁，延宕等手段，使我们得不到国际的援助。

简而言之，缢鬼最后的一副狞面，就是如此。但是（一）我们的统一，我们的拥护领袖，拥护中央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万不会因此伎俩而有丝毫的动摇。（二）法币的信用，因大借款的成功，与国际物资输出的增加，只有得日固一日，近来在外汇上，

已见汇率的高涨了，而伪组织伪政府的准备银行券及军用券等在中国，却绝对没有外汇的价值。平津以及各游击区里的伪币，至少须贴水一成。在大部分的地方，用伪币简直买不到货。（三）中央的政权，依旧在游击区，敌人的后方发挥实力，中央的威信，丝毫也没有摇动。外使的呈递国书，必去重庆。我们所服从的政府，也只有中央，不是走狗汉奸，奴才逆种，决不承认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有什么伪政府伪组织。连敌人所竭力在煽动与诱惑的西北同胞，尤其是五马统率下的同胞全体，统在指斥伪组织的荒谬，向中央誓死效忠，其他的可不必说了。（四）各种伪组织的中心人物，试看有一个象人的人没有？不是失意三流军阀，便是地痞恶棍，人格破产，贪污恶劣到骨髓的鼠子。这些人渣，简直是连衣冠也不穿上的禽兽，世界上那里会有承认他们是政府的理性人与正义国？有，恐怕只是些它们的同类与疯狗罢了。（五）香港的海口断了，我们还有海防，缅甸，新疆等国际交通的大道可走。国际间对我的援助，只会因敌人的将次奔溃而增强。如英美的借款与对远东态度的合作，向暴敌迭次提出的抗议，对敌人延宕敷衍政策的声斥，与夫苏联渔约的破弃等等，只举表面上我们所知道的一端来说，不已就很明显的了么？

最后，且看一看军事局面吧！敌人所占有的地方，只是线和点，有些地方，连线也时断时续，连不起来。至于面的全部，当然依旧是在我们的手里。全面游击战发动之后，大江南北可以不必说了，就是冀东与伪满境内，我们的游击队，最近也大大发挥威力。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宣传，却是从敌人的情报里传出来的正确消息。他们所觊觎不已的江西湖南，迄今相持三四个月，有一点进展没有？广州只西阻于西江，东退出惠州，我们的游击

队已经在白云山下，市区四周进出了。敌人所夸的一月之内，将攻至重庆，昆明，兰州的狗屁梦话，能实现到十万分之一不能？

且看吧！敌人的壮丁，已经抽到了军需工人，敌人的百四十万万无理算段的军费，已经用到了百三十七万万有余，增税增至百分三百六十，而东碰壁西倒戈，迫不得已，只好早发一个宣言，夕来一个和议的变相屈膝，这种种丑态，这种种幻变，究竟是在说些什么？

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非但我们自己有此信念，就是第三国的公平观察者，如泰晤士报的通信员，英国放送协会B.B.C.的放送家B.Bartlet的自叙传Intermission in Europe的一书里，也在这样的说，其他凡熟悉东方情形，或亲自来中国视察过战地的欧美各国的先进，结论都是一样。同胞们起来吧，一九三九年，便是我们复兴建国的更生年！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南洋文化的前途

到星加坡还不久，对于一切问题，都有研究的兴趣，而都还没有入门。譬如树胶椰子的种植，和世界市场的起落；锡矿的采掘，和供求的分配；米谷之能否在马来半岛成为主要农植物之一等等。此外还有象人种的问题，杂婚在优生学上的现象，以及言语系统等，也是很有意义，并且更富于趣味的问题，可惜都还没有时间与根底来研究，所以不能乱谈。但自脱离学校以来，二十余年，其间没有三日半月，离开过书本；所以若要讲些什么，或发挥一点意见，当然只好在文化这两字上翻筋斗，我因而想陈述一点南洋文化的所见所感，以应半月刊编者的抬举。

提到文化两字，当然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则凡一切自然界物，曾经过人力的修造改进的东西，都是文化货财，所以广义的文化，几乎可以包括宇宙；如行政、国防、道路、电力、水力、渔业、气候调整、日光利用等，都是文化工作，要逐样讲来，至少也得有将来星洲的韦尔斯那么的精力才办得了，因而我所讲的范围，只能限于狭而又狭的精神文化中间的一小方

阂。

第一，先来讲人。人这一个两脚动物，亘古以来，一直到现在，也还是一个猜不透的哑谜。有原始人，有文化人，也有半开化人。而由原始人的所以能进至半开化及全文化的程度的推进力，要而言之，总不外乎教育。教育也有先天遗传教育——是人种历史的剩余价值——，以及胎教母教家教，进而至于学校社会的教育等种种的过程。在这种种教育过程当中，古今来似乎以学校教育为最注重。中国自三代起，在耶稣纪元前三四千年的时候，已经有学校的规模了；其后一直下来，到了最近，又采取西洋的文化，才成了目下的一种中国特有的教育程序；而这中国的教育，因人种的关系，播迁到了南洋，又变了一个和祖国大不相同的局面。

所以南洋的学校教育（以后简称教育），一面原也在继承中国四五千年来的文化系统，阐发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与灵性；一面却也不得不适应环境，以求与殖民地当局及多少也变质了一点的侨民社会能够配合适用。南洋教育的特点，原在这里，南洋教育的难处，也就在这里。

依我所接触不久的诸南洋教育界中人说来，在南洋从事教育事业的困难，第一，就须受到客观环境的种种限制，凡创办学校，排定课目，选择教本，聘请教员等等，都不能有绝对的自由，如在中国一样。而我们又是有祖国的异地被治阶级，要完全忘掉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无条件地去迁就客观环境所束缚的一切，终有点儿不可能。第二，是侨民社会，对教育事业的解释和期待，根本与国内的不同；所以在组织上、规程上、办事上，不能有永久的计划，彻底的改进，与新异的试验。

因有这两重困难的结果，所以南洋的华侨教育，终不能放异彩，收实果，使教育家得大展其材，而受教育者得各尽其致。可是反将过来，倒因为果，操权的人，和一部侨胞的父老，反而愈是不以教育为重，把从事教育事业的精神劳动者，看得更轻，仿佛就和自己私人出了钱雇在那里的佣人一样。

这大约是南洋华侨教育在过去，以及现在的一般情形。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在当初总有困难的症结的；最大的毛病，是在患了死症，而不晓得它的病原。现在呢？对于南洋教育的种种症结，差不多是人人都知道的了，就是侨胞的父老以及握治权的当局，也未始没有不明白这缺点的人。既然是上下都了解了这症结之所在，则倘能推诚布公，捐除私见，两方折合让步起来，图谋补救，再定百年的大计，也决不是一件难事。重要的，是在最初开始做的几个人。若有一区或一帮的学校，能本着和衷共济，为国为民，为世界的文化，而努力改进；则其收效之大与速，必可以转移风气，渐渐的影响及于全体。所以，我以为南洋侨民教育的新世纪，已由这一次的抗战，而渐露曙光了，只要有几个人，肯认定改善侨胞教育，为毕生的大业，孜孜兀兀，不休不息地做去，至诚终可以感人，理想也终有实现的一天；对这一点，我同对抗战的必能胜利一样，是抱有绝大的确信的。

教育若能改善，则一切狭义的文化，自然一定会随教育的进步而俱进。譬如说罢，工业的发展，生活的向上，卫生状态的改良，以及最狭义的文化——艺术的进步等，都是要以教育为前提的后果。没有教育，便没有文化，这一句话，或者有些近于武断，但事实上却的确是如此。所以，要想提高南洋的文化，第一，当

从提高南洋的教育做起。

复次，试问南洋这一块工商业的新开地里，将来有没有文化灿烂，照耀全球的希望的呢？我以为绝对地是有的。即从在过去那么重重枷锁之下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而论，下一代的人（The Younger Generation），已经比前一代的人进步得多了，无论在思想上、知识上、体格上。他们都知道了有一个祖国，他们都想活用他们的资财，他们也在为后来者的教育奠基础。由这进步率来推算，更加以人工的加速力，和世界文化的互应交响的势力上去，南洋的我们侨民的文化，还有不能蒸蒸日上的道理么？况且在这里，没有同在祖国一样的旧文化的痼疾，没有象祖国同胞一样的缺少冒险和勇敢的保守病，更没有那一个文化大阻碍的敌寇的摧残。礼失，则求诸野，道长，必随人而南；我在南洋，只感觉到有一股蓬蓬勃勃的新生气。这生气的扶植与发扬，只看我们这些以文化为事业的人的能否竭尽其最善去做而已。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四期

日本思想的中心

世界上无论那一个民族，从头脑的简单、顽固，思想的保守、荒诞的两方面来说，总要以日本民族为第一。就是印度民族、朝鲜民族、马来民族，以及蒙古民族等，在这一点上，都不及日本民族的彻底。

要想了解这奇异的民族性的来源，照理，应该要先究明了日本民族的人种问题之后，才能明白。但是，在日本，研究学问，是要受军部的指挥的；是马是鹿，学者须先去请教军部，才能说话。若一不小心，将真理说了出来，学者就要被判处死刑。当执笔者，在日本流寓的时候，帝大的助教森户辰男，就因为翻译了一段克鲁泡特金的书籍而坐牢；大杉荣，也因为翻译了《互助论》及法勃耳的《昆虫记》而见杀。这一种事情，在日本是很多很多；也不准报纸揭发，所以日本的真正学者，天天在那里被杀被囚，我们只是没有法子知道。前几年的美浓部达吉因讲授天皇机构说而被控，只是每年在日本必有的数千件焚书坑儒案中之一小事。自此次侵略战争开始之后，公开的或秘密的被日本军部所虐杀的学

者，为数已不止几千了，不过我们都无从知道而已。正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在日本，不能够研究日本人种的起源这一类的问题的；几个军部隶属下的人种学者，所准用的唯一材料与方法，是上军人妾宅去伺候，等军人大醉之后，随便说出来的一些主张或故事，就是材料的全部。并且连这一点点材料，学者们也还没有引用的自由，因为军部之外，还有一个警部。警部的变态心理，又是一种畸形的现象。他们因为月俸的薄，升迁的难，以及同类监视阶层的复杂与繁琐，平时就养成了一种仇视警部以外的各种人的心理。警部对军部，当然也是仇视的，但因为势不及，力不逮的缘故，便只好忍气吞声，而执下走之役。正唯其如此，所以更加强了他们仇视其他各种人的心理。警部的挑剔，虐待，无理取闹的检举，比军部还要阴险刻毒到万倍。在这两重枷锁之下，象日本人种的起源这一类的问题，在日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有准确的文献发表的；倒是被日本人所轻视为野蛮民族的英法各东方学者，时常有关于这一类的研究发表。

照世界各学者的一般研究之所得，则可以断定，日本人种确是杂种。在日本民族——也就是大和民族——的血管里流着的血，有虾夷、马来、蒙古、朝鲜的种种，而汉族的一部分逋逃者，也是组成日本人种起源的一小单位。

正因为大和民族，是上述各民族的杂种之故，所以日本人自己不愿意承认；并且由军部的眼里看来，上述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认他们为祖先，是一件极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只好造出一个神或许多神道来做他们的祖先。因此，日本民族，是神的子孙这一个神话，就变成了日本人思想的中心；而近年来愈演愈奇，神就是他们的祖先，军部就是神，所以日本就是军部这一个三位一

体的畸形辩证论法，也就牢不可破地在他们的头脑里凝结住了。

写到了这里，读者或者会起疑问，那么日本的天皇的地位，究竟要算什么呢？是的，日本的天皇也就是神，和每一个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孙一样。但是，由军部来说，天皇与军部以及每一个日本人，原都是神；但在这中间，却有正系旁系，及正作用副作用之分。日本天皇中，最正统的创始者是神武天皇，——日本的纪元，就系由神武天皇起的——是一位军神；所以攻城略地的日本军部，就是这一位军神的正系。至于天皇呢，不过是神的一个名义上的代表，实际上是应该受军部的支配的。故而日本的历史，名义上虽则是以天皇的名在纪年，然而实际上，却都是军部在那里左右一切。自谗杀其兄武内宿祢的甘美内宿祢起，一直下来，如苏我、物部、藤原、源氏、平氏、足利氏、织田、丰臣、德川等，都是军部的代表；在他们的治下，天皇非但没有一句话分，就是日用起居，都被逼迫得同乞丐一样；在明治以前的孝明天皇还是如此，现在又轮到昭和的头上来了。所以，无论从历史上，事实上来说，日本的军部，就是一切，日本的天皇不过是军部的一个御用品；也就是说，在日本只有军部才是神的正系，才是起正作用的神这一句话，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日本的传统思想是这样，所以一切的教育，社会，法制，以及生活起居，男女问题等，都只有一个根底，就是日本就是军部，军部就是神道的这一个一元理论。凡违背这一思想或与这一元理论相反的一切言论，组织，活动，都是犯法的，都可以被秘密或公开地处死的；父以此教子，子以此传孙，陈陈相因，世世相袭，除此以外无真理，无科学，也无世界。所以，日本的军部，非但负有杀戮人民，压迫天皇的使命，并且还有统一世

界，杀戮、虐待任何种族，任何国民的特权。

这些，就是日本人的思想，也即是日本人的全部头脑。所以地心吸力、电气、南北美洲等，在日本，只能说是日本军部所发明所发见的。你若提一提牛顿、来顿瓶、哥仑布等名词，就是不敬，就可以被处死，可以被监禁。

最简单的例，可以以日本武士的试刀，及日本武人的禁止女人穿裤的两件事情来说明。武士的刀，是军人的魂，凡一武人，要试试他的刀的时候，无论跑上那里去，就可以逢人便砍。这一贯的思想与风尚，在前三年的二月二十六日的东京杀阁员，与前年当南京陷落时，两个军人的比赛杀戮中国妇孺两事上，可以看得出来。此外，则日本军人，对于无论那一阶级，或那一国的妇人，都有强奸的天赋之权，也是日本的神道思想之一；所以，在日本武人是禁止女人穿裤的，为的是谋军人的便利。而军人入宫，也可以自由行动；日本历史上，凡军人污乱宫闱的纪事，每朝都有。现在，则日本皇军，在中国各地的奸淫掳掠，正书不胜书。

明了了这些，我们就可以说是明了了日本民族头脑简单顽固，思想保守荒诞的正因，也便是握住了日本思想的中心。日本人常以这一个笑话，传为日本教育上的美谈。有一先生，问一小学生说："你将来大起来，想做一个什么？"小学生立即回答说："要做一个陆军中将！"先生问："为什么不做陆军大将？"小学生说："因为爸爸是陆军中将！"

日本人的思想，头脑，三千年来，是没有什么变更的。他们的学者中间，还没有一个人出来主张，立下一个中国字是日本军部所发明的学说，却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奇事。哲学家斯必诺查

说:“人类的大患，只在自欺!”日本人正犯了这一个死症。

大家都在说，日本人是祖先崇拜狂者；但是这祖先崇拜的教义，却是由军人崇拜上来的。因为他们都只在说是神的子孙，是神武天皇的直系，所以要追源祖先，不得不倒溯上神武天皇的身上。而神武天皇却是一位军神。日本的政治、宗教、道德，都出于一源，就是一个“神道”；而这神道，就只有一个教人崇拜军部，盲从军部的唯一理论。

总之，在日本，没有天皇，没有人民，也没有国家、法律、思想，以及近代文化所产生的一切；若要简括的来说一句的话，日本就只有军部，和附属在军部底下的许多毒蛇疯犬似的军人。日本思想的中心，也不外乎此而已。

但每一个定例，必有例外一样，在日本，与这中心思想相反的思想，不时也有得出现。从历史上来看，如每一朝被军部所惨害的各文人，各忠臣，最有名的如忠臣管原，忠臣楠子，宗教家日莲上人等都是。但是忠臣或文人的势力，终于是敌不过军部的；所以归根结蒂，我们若要把日本思想的中心一言道破的话，只能如上面那样的一个说法；军部是日本的一切，日本的一切就只是军部。所谓 Nipponism 者就是 Ultra-Militarism，也就是 Jingoism 的别名。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五期

废历的新年

习俗的不容易除去，中外是一例的；新历定作了国历，推行以来，也已经有二十八年了。而废历新年的感人之切，动人之烈，还同没有改革的时候一样。本来，一年中间的祭日，节日，也兼有为休养，为调剂平时的干燥生活而设定的意义存在，可是结账，诸事告一段落，便于计算等实用的意义，终是这些节日设定的重要用意。但是，年深月久，习俗既成，也老会有舍本逐末，将原有的意义失去，而流成表面仪式的一个空壳的趋势。若要斤斤较量，说穿内容，人家或会说你是杀风景，可是凡百事情，一成了八股，一就了固定的形式，弊端就会得滋长出来。无为的精神与金钱的浪费；心理的弛怠，致影响于正业；得意忘形之后，往往曾使乐事演成悲事，因道德律一时的放松，恶事就容易开端等等，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起因，我们所以要防微杜渐，预为戒备的用意，也就在这里。

时势不同，国家多难，将无意义的精神与金钱的浪费，转移过来用到救国救民的事情上去，这当然是当前应景的一个盛举，

也不能说这涓涓小费的无补于大事。可是回过来一想，我们假如在平时，也能老以祸至无日为戒备，对国对家对自己，连一时一刻也不教育枉负之处，则到了这一个节日，正可以普天同乐，颐养一下我们平时老不弛放的心身，何至于弄得烽烟遍地，家破人亡，受敌人的这一种摧毁呢？所以，这节日的行乐之宜制止，浪费之应节省，今后的立身处世之更须奋发有为，都是平时没有准备，将光阴虚度过去了的罪罚，能了解到这一层后，再去做目前所该做的最适当的应景盛举，才算是真正地觉醒了的国民，才不愧为人世间一有用的能才。否则，随人碌碌，与世浮沉，将盛举解作嬉游，以应景当作风头，那就无可救药了。

其次，还有些人，到了这一个节日，每喜欢来发感慨，耽回忆的，这也不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曾记得法国学院的一位会员苏武斯泰，在一本屋顶哲学家的散文集里，有一段写新年的文字，说别人家都在迎新，我却独在怀古。这一种感慨怀古的倾向，正是衰老的象征。我们为警策将来，而反省过去的缺点，藉以决定今日的行动，原是可以的，但空空的发些嗟叹，做一个寻梦的人，却是不对了。象这样的倾向，我们也不得不加以防止。

总之，到了废历的新年，一般习俗，当然是不能一下子就除得了的，但我们还希望国人会有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进步。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星华茶业工友互助社开幕词

今天能参加茶业工友互助社的成立纪念开幕典礼，实不胜荣幸与欢喜，鄙人所欲向诸君贡献的，有两点意见，一，是加强我们的信念；二，是加强我们的团结。所谓信念者，就是建国必成，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应该举事实来说明。鄙人初由祖国来此，战线的前方都曾经去走过的，在表面上看，仿佛是我们失地很多，从东四省起，以及冀鲁苏晋皖浙各地，多有敌人的足迹，但实际去一走，则可以看到敌人所占据的，完全是几个在名义上的空城。实际上，则行政、游击、交通等的控制权，都在我们的手里，你只教去实地看一看，就知道敌人的后方，就是我们的前方，这句话的不虚。所以，有一位外国记者毛拉说，敌人所说的占领中国，实在是只等于几个游泳者占领了一个水池，游泳者因军器——即飞机大炮的多而且凶——优良之故，在池内原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一游过后，后面的水就包围拢来了。这话实在很准确地说出了我们游击战的姿态，敌人想仅仅以一二百万的军队，来占领我们的土地，是万不可能的。况且，近代战争，于军器战，

阵地战之外，重要的是经济战、外交战、全民实力战等。经济战，则我们有英美的后援，是大家所晓得的。外交战，则敌人早成孤立，英美法苏已在联合制敌一事，也是近来最明显的国际动态。至于全民实力战斗，则我有四万万五千万男女，已决心和敌人拼命，除游击区的富藏实力不算外，光就西南北的六七省来说，也足够抗战，至六七年而有余。我们的现状是如此，敌人的现状呢，外则，国际信用完全失坠，已无现款购买军火，内则未亡人多于在前线的军人，壮丁抽尽，民怨沸腾，内阁则三改四易，命令亦早发夕改，军费膨胀到老百姓穿不起皮鞋，军人厌战到集团自杀之风盛行，工业国一变而为全国制军需的野蛮国，输出品完全没有了。在这一个相对情形之下，你说我们的信念，是不是绝对可以加强的？这是一点。其次是加强我们的团结的一事，敌人的想破坏我们的统一，破坏我们的团结，所用的是两个毒计。一，是以华制华，弄出汉奸傀儡来杀我们自家人，我们且看他同时南北的发动两大汉奸，来主张和平一事，就可以知道。但是吴佩孚的一个通电，分明是敌人的假造，而汪精卫的一个通电，却已为我全国上下，及各友邦人士所唾弃了。敌人心劳日拙，欲破坏我们的团结，倒反而促进了我们的团结。二，是想破坏我们的金融，使人民对中央减少信心。但敌人所发的军用票，非但对外汇毫没有价值，就是在我们已沦陷的游击区里，也完全买不到东西。所以敌人的这两个破坏我们的统一，破坏我们的团结的计划，都已经完全失败了。反之，我们的团结，正因为敌人的百计破坏，而更加强了强度，这从今天的这一个茶业工友互助社的结成上来一看，即可以知道。诸君应该知道，团结就是力量。譬如，一粒砂，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结成了水门汀后，就可以造成这体育馆那么坚强的

建筑，可以抵抗飞机大炮了。我们希望这团结能够日渐推广，日渐巩固，由马来亚而及祖国，甚而至于欧美的工友，先由小而大，再由各业的团结，进而结成一民族或主义的大团结，更希望明年周年纪念开会的日子，在这里将坐满各地的代表，鄙人可以再和诸君来说一年来抗战的成功与团结的力量。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本坡要闻》

读《毛拉在中国》

爱特轧·安赛儿·毛拉（Edgar Angel Mowrer）生于一八九二年，在米西根大学毕业，一九一二年曾进沙而彭大学一年，一九一三年在巴黎拉丁区住下后，就以向英美各前进杂志投稿为职业了，写的多是关于哲学或文学的论文。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勃发之际，他正为去教一年轻俄国贵族的书之故，将去莫斯科。因而他就利用了这已办好了的护照，得上了法军的前线，为芝加哥《每日时事报》写了许多战地通信。后入该报社为干部，一九一五年去意大利，为该社罗马通信记者。当意军退出喀卜来笃的时候，他是随第二军步行退出的。法西斯蒂的压迫加紧之后，他于一九二三年就和墨索里尼告了别，而去柏林，仍为该报的通信记者。一九三三年，发表了《德国倒开时钟》一书，指出了纳粹诸凶的倒行逆施，就被迫而离开德国，重返了巴黎，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到香港，去武汉，上郑州，于我军放弃徐州之际，欲到兰封前线而未果。后去重庆、成都、昆明，由昆明转安南，而返欧洲去后，就写成了这一本《毛拉在中国》的书。是潘根丛书特刊之一种。全

书共二百十六页，十有三章。

毛拉本不是一个中国学者。他这一次只短短地化了几个月工夫跑了一圈，居然能够写出这样的一册书来，成绩总算也已经是不错了。

开端的一篇序文，他曾写出一位外国的老外交家对中国抗战胜利的怀疑。不消说这一位保守的老外交家，脑子里只充满着“中国人多是自私自利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国家观念，中国人最喜欢起内讧，有两个人在一道的时候，就会分起党派来”等陈腐的观念。但经他到中国去一看，与委员长、陈部长（诚）、宋氏一家人会了面，更上前线去与士卒共了几日夜的甘苦，到武汉、昆明、重庆、成都去一走之后，他觉得中国只教能始终团结，能抗战到底，结果一定会得到胜利。当然，国际的援助，也是一个决定这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他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许多土地，正如几个游泳者占据了一个水池一样。游泳者因为机械的精强，原可以为所欲为，想上那里就上那里，可是他前面游过，后面的水，也就聚集起来了，中国的游击战的姿态就是这样。日本人的最后失败，也就在这一个弱点，人数的不够分配。

中国军队的纪律森严，肯吃苦，认识这一次战争的意义，与老百姓的密切联络等，是持久抗战必胜的几种条件。毛拉在前线，已经亲眼看到了。只教中国的武器，能及日本的一半，那中国就可以打胜仗。日本军队的脆弱，暴行，没有计划，各自为政，经过了这一次的战争，弱点完全暴露了出来。这不待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将亚力山大·风·法儿干好善的说明，已经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事实。

而日人组织傀儡机关手段的下劣，与军队到处的奸淫掳掠，类似强盗的行为，也为他们在中国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他说到西南五省关隘的险峻，敌人的决难得逞，与夫五省实力的雄厚，宝藏的丰富，足可以应付长期抗战的供给。至于农产物的接济，他也赞成白克先生(John Lossing Buck)的意见，只教中国能注意到（一）多营可资民食的种植。（二）减少不种植食粮的土地。（三）多垦荒地。（四）注意冬耕及冬天的种植。（五）多用肥料。（六）多用有机物的肥料。（七）改良种植方法。（八）注意植物害虫病理。（九）适宜的排水工作。（十）保护与加强堤防。（十一）多营灌溉。（十二）水利的整理。（十三）注意仓库积谷。（十四）防止牲畜的传染病。（十五）多种蔬菜。（十六）食糙米与粗粉。（十七）多食杂粮，如番薯、玉蜀黍、大豆、豆荚、蔬菜之类。（十八）少造酒少饮酒。（十九）少种烟吸烟。（二十）不食鸦片。（廿一）请客勿浪费食料。（廿二）衣饰用品等件可省则省等廿二件事情，就不愁衣食的不继了。

他曾看到了中国女性，在这一次抗战中的伟大的力量，他也看到了昆明与成都等地的人民的守旧。说到了这一点，他对我们的龙主席，很有些微词。从他的这一段短短的记述上看来，毛拉先生倒的确是一位女性崇拜者，大约总因为他在巴黎住久了的缘故。

说到战争中的两国的经济背景，他看得同我们所见到的一样，总之，是日人在经济上终没有办法。

当他上武汉去的时候，英美对我的经济援助，还绝对没有传播在一般人的口头，现在，则大家也都已经知道，英美两国，同

时同样的对我有积极的援助了。所以，就单从经济的一方面来说，我们当然有绝对胜利的把握。

其次，是国际的通路，他走的时候，广州还没有失陷，所以在他的这册书里，只简单地说到了兰州可通俄国，缅甸可通云南的话。但现在，则缅甸与昆明的通路已经完成（去年九月）。兰州通星星峡而至俄国的大道，也已经通车了。所以，香港、安南，即受到了敌人的威胁，我们的军需运输，终不会断绝。当然，影响是有一点的，但我们却也早有了准备。

他所再三在抱不平的，是美国对敌人的军火的供给，轰炸机、汽油、钢铁之类，凡敌人所用以残杀我妇孺，乱炸我不设防城市的机械物品之类，统是由美国供给的居大多数，大约日人占了海南岛，还在打算占关岛的现在，美国人，菲律宾人，总该有了觉悟了。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以及司汀生等，果然有了极明显的表示。

上述种种，他的观察，都是对的。别外只有一点点他所听到的谣传与杞忧，我觉得是他的多虑。他听人说，西南五省，封建色彩太浓厚，恐怕不能维持到底，中途或会变出花样来。并且，西南五省的联络，一向是历史上的成果，若更有英法两国来一策动，恐怕这一个五省联防，要与中央有不利的行动，这完全是他听错了谣言的结果。因为我们对中央的领导抗战，是一致拥护的，抗战愈久，团结只会得加强。你若不信，就从汪精卫的这一次因倡和议，而被全国唾弃的一事来看，就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据。所以，全书中十分之九，是分析得很清很对，白璧微瑕，就在这一点点上面，可是这不过是他的好意的杞忧。

总之，毛拉终还是一位有良心的新闻记者，他的这一部小

著，可以帮助我们对外的宣传，也可以补我们宣传的不足。我希望中外人民，都能化几个钟头的时间，去把这小册子从头读它一下。

二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第二期抗战的成果

抗战十九个月，民族复兴的艰难行路，现在已进到了第三个年头，第二个阶段；已经是到了光明在望，渐入佳境的转弯角上了，离开最后胜利的目的地，只差了一箭的路程。

在这一个转弯角上，我们正可以放开眼来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将来。

过去我们的抗战唯一弱点，是在武器的不精良，政治的不澄清，军民的不联络。

但武器的相差，只教战事一持久，两方终会渐渐地平衡起来。精良的一方面，因旷日持久，消耗过大之故，军器的质和量，势必至日就衰退。而初战时军器不优越的方面呢，因竭力追赶的结果，持久至一年两年以上，军器当然会一日千里地作长足的进步。在这背后，更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能发生莫大的影响：即一，是国际的援助，二，是对外经济信用的有无。从这两点上来说，我们的地位，当然要比敌人健全得多，这是谁也明白的。所以，敌人最初持以攻城略地的唯一强处，——就是武器的精

良，——到了现在，也已成了强弩之末了。

况且，战事自入第二期以后，我所凭守的，都是山河险隘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敌人机械化部队，却绝对地失去了效用。

看清了这一点，并将敌人国内的一般论调来作参考，就可以知道敌寇目下的进既不能，退又不可的状态，是必然之势。

敌人当进攻武汉之先，为欺骗民众，消除反战思想起见，老早就在国内宣言：只教武汉攻下，中国全部就算被征服了；只教武汉能攻得下，中国的中央政府，就等于一地方的政权，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就告结束。以后，不必再用兵力，只用政治的力量，来改组各傀儡，使联合起来就行。这宣言，是当近卫下台之先，敌对一般反战国民宣示的誓言。所以，到了目下，敌人要想再征重兵，深入到西北或西南去，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只能把东边的兵，调往西边，南边的兵调往北边地，日日在故作增兵的样子；而实际上，则这些军队，只有在运动之间，受了我游击队的袭击，数目在日减的一个倾向。明了了这些，就可以知道，敌人于进入了武汉之后，以后就不敢再进一步，只作作毫无目的的各地轰炸，聊满足他的破坏欲望，是他们预定的计划。

所以，抗战自入第二期以后，我们就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以后，便是我们一步一步地还击敌人的时机了。各地游击队在敌人后方的日夜出击，原是我们主动作战的姿态的一种，此外，则正规军的大规模出动，也正在计划之中，大约不久的将来，失地就会一处一处的收复。

其次，在抗战发动的前后，我们中国政治的不良，是大家都晓得的。旁的事情不必说，单就贪污的一点来讲，全国上下，简

直是无吏不污，无官不贪的样子。我只教举一个小例出来，就可以证明。譬如在我们江南的某省，一般人都说教育是比较进步的。但自前年十二月廿五该省首府沦陷之后，那位教育当局者，还在把各校长的缺，使人四出在那里兜卖，某校长是几千元，某校长是几百元；而附带的条件，是买了这某缺的校长到差以后，每月更要报效教育当局的私人若干。而更加荒唐的，是一江的西北部沦陷之后，到了江东复由这当局去创办了一个青年学生团，在一区水丽湖碧的风景地带。学生报到的共有三千余人，本来是由中央订定，每月每人给学生伙食费六元，服装杂用费二元，统由省府财政收入项下指拨的。但这当局呢，伙食费每人克扣剩了三元一月，服装杂用费则一文不给。所以，中央于这抗战时期，想发动青年去组织民众的这一个计划，结果，只运气了这一位当局发了大财。一个穷光蛋，到了现在，居然有数十万美金存在美国纽约银行，数十万港币存在香港汇丰银行了。而他个人在抗战中的唯一工作哩，就是诱骗良家妇女，和女学生等，一个一个在轮流和他同住。大家试想想，握一省最高教育行政权的人，尤其是在该省沦陷之后，这一位官吏尚且如此；我们的政治再不澄清一下，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委员长当这第二期抗战的中间，已有很大的决心来肃清这些贪污了；所谓政治重于军事的主意，就在这里。在第二期抗战的期间，只教政治能够澄清，则壮丁的补充，游击区的整理，就马上可以就绪。敌人破坏我统一，破坏我金融的阴谋，是绝对不会收效的。

况且，各地的傀儡，都半是地痞恶棍之流，民众对他们非但信用毫无，而且只教防备一疏，大家就在设法执行他们的死刑。这是我们每日在报上就可以看到的事实。敌人蓄谋已久的以华制

华的梦想，终于是一个恶梦而已。

最后，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了。抗战之初，我们因为忙于军事的应付，对于组训民众的一层，没有加以十分的注意。并且又因为小组织的互争民众，致发生摩擦的现象，亦随地都有。但现在到了第二期的阶段，大家就觉悟了；大家都晓得民众实在是比土地、政权更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因素。从前的古公亶父，不堪夷敌的侵凌，率老百姓而来至歧下，奠定了数百年周室统一之基，就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教训。所以，我们在持久抗战的第二期里，这一个组训民众，使军民得联合一气的工作，不得不彻底去做了；而且实际上，各战地政训处，以及民众动员委员会，也已经次第成立。打游击时的交通联络，情报侦探；对敌人的破坏交通，故作谎报等工作，确已切实地在收效果。委员长所说的民众重于军队的政治设施，已在军民密切联络的一点上，见到了实行。

所以，总括起来，我们在前期抗战时期里的种种弱点，现在已都在加以改正，并且也实际上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成绩；只教再进一步，就可以做到武器转弱为强，政治澄清到底，军民打成一片的理想境地。

试想在这一种自强精进的局面之下，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的日子，还会得很远么？所以，早则半载，迟则一年，我们就可以看见敌军因纪律的全无而崩溃，敌国内因压制的过度而骚然，国际因暴敌暴行的重复而受严重制裁等现状的叠发。

敌人的强占海南岛，乱炸香港附近的英国兵营等等，虽说是因他们海陆军部互争权势而出的乱子，但实际上恐怕也有加强对英法的威胁，想逼他们出来调停的用意在那里。

此外则世界大战，不发则已，若一旦果真勃发，则日寇的末落，更加要快一点。因为美对日的海军，是三对二的比例率；而苏俄对日的空军，是五对三的比例率。世界大战发动之后，苏联与美国，势必至于联合起来，来制止这太平洋的搅乱分子的。美国的四万吨以上的军舰，与俄国的超巨型轰炸机均可以制敌人的死命，是谁也知道的常识。英国各预言家的预言，说这一次的世界大战，若果真爆发的话，则战争期间，决不会延长至象上一次一样的根据，就在这些重兵器的进步的上面。试想想弹丸的一个岛国，值得几个大炮弹与巨量炸弹的一击呢？

抗战进入了第二期，我们距离胜利的日期自然是愈近了，同胞们，大家应该再努一步力。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七期

苏 联 与 日 本

防共协定的对象，彰明皎著地，指的是苏联；罗马柏林轴心的推磨者，当然也明显地是苏联。而照现在的世界现势来一看，倒仿佛是只有中国、英、法、与捷克、波兰、西班牙等国，卷入漩涡，实际是法西斯蒂口号中的对手苏联，反而象退居入了第二线的样子。这原因，究竟是在那里？所以，第一，我们不得不先研究一下苏联的态度。

决定苏联态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自然是在他们内部统一，而以实际行动出现的清党问题。大家也都晓得，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基洛夫暗杀事件发生之日起，以一九三七年为顶点，直至去年年终告一段落的苏联清党事件，实在是使苏联的向外发展，和国内的生产建设，受到绝大阻碍的一大原因。反政府的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右翼偏向派肃清的结果，苏联政府，在这四年内，就完成了唯一的一件国内团结，政治上统一的工作。

一，反对政府的外国奸细的肃清。

二，官僚主义者、腐化分子的剔除。

三，参加初期革命的新贵阶级，对于建设事业不能积极帮助的老朽的驱除。

四，中下层阶级的团体负责人，利用清党而滥用职权，或挟私怨而报公仇的糊涂分子的纠正。

五，新的有力干部的拔擢登庸，渐次将国防方面、行政方面、生产建设方面的机构健全合理化。

上举的五项，是苏联在这四年内所做肃清工作的内容。这工作，现在已经是完全做了。

在这工作进行的中间，苏联自然对外不得不采取和平政策，对内更不得不定充实国力的大计。第一期的五年计划，获得了理想以上的成绩。第二期五年计划，于后半期就起了清党的妨碍作用，成绩只收到了八成。去年当第三期五年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中，苏联自然只有埋头于生产建设重新整理的一条大路好走。况且各种机械，都因为竭其全力而应用了十年的结果，在最近一两年内，不得不全部加以修理与补充。出产品的数量，虽则增加了，但质的方面，更不得不使日趋优良化的现在，为苏联本身计，当然是不能倾全力来向外发展的。

此外则还有一层，美国与苏联的合作，并没有切实的表示，英法与苏联，又各有心事，貌合神离，在这一个国际情形迟疑的环境下，苏联对国际的事情，当然是不能采取积极的态度的。

所以，这一回三月十五，苏联公然拒绝了日本渔业协定的延期请求，将在海参威公开投标决定勘察加内海渔权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推想得到一二。

第一，最合理的结果，是日本付出重大的代价，仍复取得这渔业采取权，如西伯利亚东段中东铁路的样子。这代价，当然是

很高很高，事实上就等于朴资茅斯条约的完全废弃。

第二，是苏联自己保有这渔权，在她的第三期新五年计划内再增加一项东海岸渔业生产的计划。

至于因这渔约问题，而或将惹起对日的战争，这一个假定，在现在的情势下，却是决不至于实现的。

第一，是日本的不敢；第二，是苏联的不值得。

我们只教将过去的历史事实来一看，就可以知道俄国的对外作战，一向是很慎重的。对拿破仑的战争，其原始，也不过因为保尔一世的疯狂乱算的结果。到了保尔被杀，亚力山一世继世的时候，政策就绝对地变过了；把向外的苦心积虑，转向了内。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飞渡尼门河，侵入莫斯科，致演成不战而自败的那一次战争，也并不是俄皇亚力山大发动的，所以他们只取了一个消极抵抗的策略。一九〇四年，和日本的开战，俄国也是被动的，否则，她的波罗的海的舰队就不会得调动得这样的慢。

所以，这次在这一个渔业约定纠纷，将次达到最大结局的现在，我们也只能以历史的事实和苏联的现实情形为根据，而来观察推断苏联的态度。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八期

和从那里讲起？

日本军阀，每到了一个进既不能，退又不可，泥足陷得更深一层的狼狈境界，总老是勾结汉奸，来倡和议；南京放弃的时候，是这样，武汉放弃的时候，也是这样。起先声明说，必要打得中国屈膝；往后又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现在这一位在国内向军阀们屈膝，在国外向苏俄又屈膝的屈膝首相，已经去职了，换上了以警吏起家的平沼骐一，又在四处勾结，高唱和议了；说什么华中华南尽可以撤兵，仍旧以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为对手，只教中国能够讲和就行等等热昏语，在那里乱喊。

和平，本来是世界上有正义人道感的各国家，都一致拥护的；而我们的抗战，实际上也正是为了拥护和平与正义；与日德意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绝对相反。但是到了目下这抗战第二期的阶段，在我们形势上势非牺牲不可的土地与人民，已经照预想到的样子牺牲殆尽，此后只是渐渐趋向胜利的一途前进的现在，还有什么和议可讲呢？

并且，在视条约如废纸，以信义为刍狗的侵略热狂军阀操纵

下的政府，配不配和我们来讲和，有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资格呢？

我们虽则并不发出声明，不承认敌方现在军阀操纵下的政府，绝对不欲以侵略军阀为对手；但实际上，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对敌方军阀政府的不承认，不屑以为对手的心理，却大家都是一致的。

所以，即使退一万步说，日本要想向中国求和的话，我们的对手，绝对不是日本侵略军阀当权的政府，而是日本爱好和平的民众。只有日本的民众，大家起来，推翻了侵略热狂的军阀，肃清了军阀的走狗和余党，公然向中国来提出报上所传的那四条条件：一，不索土地军费；二，撤回驻华及满洲国的驻兵；三，取消反共协定；四，与中国及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话，那中国自然可以有磋商的余地。

因必要象这样的议和，根据了这些条件而签订的和约，才有东亚永久和平，中日共存共荣的希望。否则，不过是一时糊涂之策，两国藉作第二次大战准备的休战状态，断断乎不是和议。敌方军阀，不过想假此以欺骗国内民众，夸耀自己的军功，预备作第二步蚕食的一次消化午睡而已；我们中国，决不会上他们的当，日本的民众，想也不愿意受他们的欺的。

南宋李伯纪公曾经说过，能战者然后能守，能守者然后能和。说到能战，我们已经打了二十个月的仗了；说到能守，则此后的西北与西南，敌人休再想更前进一步。在这一个战守两可的现势下，和不和的主权，绝对操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的政府当局，亦曾声明，愿由九国公约签字国出来凭公处理，其他的诡计，勾结，阴谋，暗算，一例地不予接受。虽不直言不以日本

侵略军阀操纵下的政府为对手，但实际上已经很明显地表示出了视条约为废纸，毫不顾及国际信义与公法的“手执机关枪的野蛮人”，是没有资格来和我们讲话的。

敌人正唯其看穿了我们的这一决心，所以，只好使用种种劣策，来勾结在其掌握中的失意军阀，和国民党内意志薄弱的人，大倡其和议。殊不知心劳日拙，国人早就看出了他们的肺腑，中央马上也有极坚决的表示了。他们虽极其煽惑的能事，但终不能摇动我们的信心于万一。

外国人，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趣味隽永的谐谑，说：“日本对中国既已不宣而战，将来少不得必至不讲而和”。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只教长期抗战下去，日本的民众和士兵，一定会看穿军阀们的恶毒，而倒过戈来和我们握手言和的。这话渐渐有了证明的事实了。试一看各地敌兵的厌战和暴动，敌国内军需工厂的爆炸与怠工，就可以明白。自然，久战之后，和平当然是会来的，可是在侵略军阀操纵下的政府，却断然不是我们的和平的对手。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九期

日本的议会政治

日本议会政治的崩溃，换句话说，也就是日本宪政的没落，与法治精神的完全的绝灭，当然是兆始在三年前（一九三六）的二二六叛逆事件的出现，完成在这一次侵华战争的发动。

中国在闭关自守的古代，尚且有一句话，叫作天下以马上得之，但不能以马上治之。这就是说，军事并不是人世社会的一切，这也是说军事不过是为达到一个理想，实现一个目的的暂时手段的一种。以拿破仑战术理论著名的卡尔克劳粹维梓，在他那本名著《战争论》头上也决定的在说，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长，人类在这世上经营努力的结果和理想的实现，必然地须由于政治，而不是由于军事的。人的一生，社会的各处，若只是战争的话，那不能执武器，不能辨黑白的婴孩，就不会长成大人了。从这一点极普通的常识来想，就可以明白人类是决不为了杀戮与战争而出生，社会也决不只因战争而存在，或可以成立的。

所以，蒋委员长说，政治重于军事；人类的所以能进步，国家的所以能富强，社会的所以能安定，根本就都在于政治。政治

的上不上轨道，便是决定一国家，一民族，或一人类集团的能不能存在的指南针。

日本的明治天皇，唯其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千方百计，才奠下了宪政的基础。他首先就取消了利欲熏心的军阀的特权，其次，便限制了武士阶级的横行，再其次又规定了人民上下全体的权利与义务。执有武器的个人或阶级不能任一己之私，而妄作妄为之后，集团的安宁，才保得住，社会的共同利益，才有发展的可能。少数人应该牺牲他们超出限度外的欲望，而尊重他人的自由；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前，一己或一小集团的私欲，是完全应该绝灭的！这便是法治的精神，这也就是日本宪政的要谛，与日本议会政治的由来。日本亦正唯其坚实施行了这宪政之后，才足以致国内的富强，才有和中国与俄国两次战争的胜利。这真理是日本国民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明白了解的常识；但这常识，现在却被极少数的军阀完全以刀剑枪炮的威胁，包掩蒙蔽下去了。

被视为日本宪政唯一础石的议会，尤其在这一次，第七十四回所谓兴亚议会开会的期中，我们很彻底地已看到了日本议会完全的破产，与日本宪政的凄惨的临终。日本已经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了。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然用不着议会，更加也谈不到政治。

一百万万元以上的军费以及其他的本预算追加预算案，是不许议员质问而定要通过的，根本召开议会，提出议案这一举动，就是多事。

国民精神总动员案，虽则已经宣布实行得很久很久了；但日本国民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精神，应该怎么样的动员。还有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瞎说，结局就只有这五个大字，至于内容、限度、

建设方法等等，非但议员们不知道，日本国民完全不晓得，就连在口头上说惯的阁员们自身，也摸不着一丝一毫的头脑。

内政改革案，已成了无期的延期，国民再组织案——近卫内阁所提倡的——简直是为大家所忘掉了。

由这次平沼内阁所造成的提案中最切实的两件议案，就是所谓物资动员计划，以及生产扩充四年计划的两案，内容也不过是加强了强夺民间的一切物资和限制其他一切产业，统使归并到军需工业去的一个变相的法令。

说到外交，只空空提了一提"道义外交"的一块金字招牌，说到大政的方向，更只是些"万民辅翼"、"总亲和总协力"（日本的全体主义，并不与西洋的相同）等空洞的名词。为政者以这些话来搪塞民众，而民众代表的议员们，也只轻轻以一笑了之，上下相欺相蔽，便完成了这日本目下的万民辅翼的政治全体。

尤其可笑的，是从前代表工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产社会大众党，现在竟想与高标法西斯主义的东方会合成一个新党。社大党的三十几位议员们，竟把人民生活的高涨，恶性通货的膨胀，工资的低减，租税的激增，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的毫无等问题，完全转换成了全体主义军国的造成。

至于对中国侵略战的善后处置呢？议员们也不敢问，阁员们也不敢答。全体上下，只在看军阀们的醉狂的兴致的如何。只有一点，却是由海陆两军部的代表说出了，就是汪精卫即使上台做了傀儡，万事听从日本的指使以后，华中华南的日本军队，也是决不撤退的。

所以，日本的宪政，日本的议会政治，现在已经完全崩溃

了；以后就只是军阀摄政，关白或幕府制的复活，万一事机不巧，军阀要自起内讧，则擅行废立，划分南北朝的历史旧剧，也许会得重演一次。近来报上，已频传着日皇将亲政的消息，举一反三，从这些地方看来，或可以知道一点日本政治内幕的实情。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二十期

日本的赌博

《日本的泥足》著者弗来大·优脱莱女士，在她那本新著《日本在中国的孤注一掷》里（第一章末节，二十一页）曾经说起，日本在中国的赌博，争点有三。一，是不用大规模的战争而夺取华北。二，是预计南京陷后，国民党中的卖国分子，会投降日本，来做傀儡政府的首领。三，是英美两大国，不会用经济绝交的方法来阻止日本的侵略。

当去年五月，优脱莱女士在写这书的时候，她断定地说，一二两着，日本是输了；因为我们大规模地揭起了抗战之旗，而南京陷后，国民党中的卖国分子，也不敢公然出来主张投降。

事至最近，局面似乎一变；叛国分子，已经公然出来主和了，但可惜是迟了一年，这一输着，仍旧要连输下去。

至于第三着呢？我们对罗斯福总统，与赫尔国务卿的正义呼声，当然是有耳共闻，美国早已不供给侵略者以轰炸不设防城市的飞机了；英国的助华态度，更加显明，当然结果，是会走上联合经济制寇这一条路上去的。

优脱莱女士，在去年五月，就说日本是必败无疑，但当时还说第三着赌博日本还得到了相当的成功。现在则可以断定三着连输，泥足不拔，日寇的末日，当然是就在指顾之间。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

教师待遇改善问题

因六六节的将次到来，教师的联合呼声，是待遇改善的要求。我虽则没有当过一般学校教师（尤其是马华的）的经验，但从诸友人的口中，及纪录的叙述，与在国内所见到的一切情形综合起来，总无时不觉得精神劳动者，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在二十世纪社会里，所受到的虐待确乎超出在任何职业者之上。

工作的劳苦，与给养的菲薄，还是余事，而在马华（就是战前在国内也有这一种倾向）的教育界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教师地位的没有保障。

国民教育的导师们所负的责任（无论在战时与平时），是如何的重大，各国的改良教育的重心，都安置在小学教育即国民教育的一点上等问题，是有智识者所一致承认的，此地可以不说。可是，对于负这样重大责任的教师们，当局者却在视为厮养走卒，可以任意招来与驱走；因而，教师们自己，也起反射作用，只以失业问题为中心思想，有抱做一日和尚吃一日斋之心，也有出卖人格，唯祈保全地位之事。在这一种局面之下，要想谋教育的进

步，自然要比缘木求鱼，更加难了。

所以，关于教师待遇改善的初步，我以为不必张大其词，多举条款；第一，只从严格诠选有真才实学，与有经验与人品的教师，而给以保障，就可以奠定教育的初步基础了。先不必说百年大计，如终身年功加俸，及养老退役年金等，但只须先决定一个计划，然后去择定一个人才，计划是三年的，就加以三年之聘，十年计划则聘十年，以此类推，教育效率，自然会得增加。

要做到这个最小限度待遇改善的地步，光是依立法，或公家的命令，来作后盾是不够的。每一个学校的基金保管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健全组织，当然是首先的要着。其次，则教师们自己的团体，也该加以反省和筹济。教师之中，未必没有败类；年老或失业的，自然也要加以救济。败类的剔除，救济的互助，是教师们自己的事情，地位的保障，与人才的诠选，是学校当局的事情，两方面双管齐下，互相淬励，则教师待遇改善的始基，或能渐渐的趋于抵定。

现在是抗战时期，一切问题，都只能从权论断。可是华侨教育的不振，在过去的一大半责任，实在还应该由祖国的教育当局来负。

侨胞披荆斩棘，开辟洪荒，在南洋各埠的历史，已经有七八百年了；但自明初郑和出国的卷宗全部被焚之后，祖国和侨胞之间，就断了数百年的关系。民国成立，中央才有侨务委员会的设置，然而一则因人选失宜，二则因国内缺少统一之故，对于侨胞的教育，终于取了一种不问不闻的态度。

教育事业，既成了由几位侨领出资的私人事业，则一切的措置规划，自然要由这些出资者的私人好恶来决定了；华侨教育的

变成目下这一种状态，谁能说不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现在虽则在军事第一的抗战时期，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应该集中到抗战胜利的一点上去，但为准备第二代民族的实力，为预造将来建国的人才起见，我对祖国还是希望能划定一笔经费，拟定一个计划，与此间的侨领及行政当局和衷共济，分力合作，来定下侨民教育的始基，来改善教师待遇的事业。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抗战中的教育

教育，谁也晓得是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设施。革命在革心，民族复兴，就要靠民族能一代一代的有进步，这些都是一般常说的话。而抗战以后，无论对于民众，对于军队，甚至于对于俘虏，各军事当局，就地的知识分子，以及当时当地的其他各当局者，都在竭尽全力，施以启发或坚持的教育。象这些从前并不是从事于教育，现在也并不是专负国家指定的教育责任的人，都看到了教育的重要，各在负起重任来苦干了，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也就是我们抗战所以能支持过去，最后胜利所以必能得到的一种事实证明。但可痛心的，却是抗战以前，就负了教育专责，抗战以后，也仍在吃教育饭的那些名闻全国的教育专家，以及全国上下的各教育行政长官，还是不知人间有羞耻悲惨事，而只在无功而受禄。

先从大学来说罢！我国国立大学，在抗战之前，已经有二十余所了，分配地点，大半是在沿海一带，以及故都的北平，首都的南京，通商口岸的上海、天津、青岛等处。

自从这次抗战事起之后，当时的大学当局，事前既没有周密的准备，事后也只迁移了几个办事的人，和一些光身的教授们，到西北西南的内地去。大学的名目虽则仍旧存在，办事员教职员们，虽则也仍在支薪领俸，可是仪器、工厂、图书，却多没有了。不但这些教育工具完全没有了，有些大学，简直连学生也没有了，可是象这样的大学，国家也仍在支出经费，维持他们的名目。

最可笑的，是几个大学，同时迁到了一地，于是，就变成了联合大学。几个校长，就联合起来组成了校长团或委员会，同一科目的教授们也同样地组成了教授团或委员会。假如说，有三个大学罢，每一个大学，教职员本来有二百人的话，于是组成联合大学之后，教职员就有六百人了。可是学生呢，联合起来，恐怕还不到六十个。

而这每个大学的经费和场面呢，却是和战前一样地在支出，在安排的。

至于已沦陷，或半沦陷的省分呢？教育经费，当然也同样地为省库支出的一大宗。可是小学呢？是由治安维持会的汉奸们在主持了。中学呢，就在省府迁移所在地的乡村里挂上一块招牌而已。学生的有无，功课的授否，教职员的如何？大抵是外间人所不易晓得的。

本来是教育比较进步的江浙两省，情形就是如此，其他的直鲁豫皖等地，当然也可想而知了。

我们试想想，在这一种教育行政，和教育制度之下，来应付目下生死存亡的紧急局面，那里能够赶得上军事迈进的步骤？

过去中国之衰，原因虽有种种，但教育的不振，当然是主要

的基因之一，而现在抗战已到了将近两年，军事的进步，一日千里，敌我的比较，死伤人数，不打折扣的话，照现在的统计算来，是敌死三而我死一，可是政治的澄清，尤其是教育界痼疾的革除，还是没有起色。这当然是以后大可注意的一个问题。

近来，因为侨胞的教育问题，常常有人谈起，故而联想到了在抗战中的我国的教育。

从祖国来的人们，大家都在说，抗战建国的军事，我们已经有把握了。但是，政治总还没有进步到配合得上军事的地步。对于教育，我尤其有这样的感想。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祝教师们的奋斗

今天是教师节，马华各处的教师，所最感苦痛的，是在那些地方？要减少苦痛，应该如何的奋斗？这些，我想教师们本身，当然要比我们认识得清楚，所以用不着我们来饶舌。我们在这里所希望的，第一，就是想祝教师们奋斗的成功；第二，是祝教师们于成功之后，更要奋发勉励，为国献身。

祖国抗战，将近两周年了，不达最后胜利的目的，抗战决不会终止。所以，以后再继续几年战争，是谁也不敢预说的。在目前，我们第一，还须坚苦卓绝，尽全力以期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这虽是在这时候的每一个中华国民所应尽的职责，但是教师们却是知识分子中的领导者，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所以在启发和鼓吹的一方面说来，教师们却同平常的人不同。他们可以通过了学生的媒介，而风掩到各中层的家族中去的。

其次，是抗战胜利之后的建设的责任。这一步工作，恐怕比抗战还更为艰苦，更为重要。文化、实业、道德、政治，以及其他的一切，在抗战胜利之后，都非要重新从头建设起不可。在抗

战期间所借的外债要还，所被破坏的工商业要兼程赶进，文化事业、国防事业，以及一切的一切，都要加以彻底的整理与创始；而担任这些重要工作的人才，现在，就都刚寄托在各位教师们的手里。这一个重任，恐怕比起现在负军事全责的我们的领袖，还更要重大到好儿百倍！

敬爱的教师们！被拿破仑蹂躏后的德国复兴，全赖费希德所提倡的国民教育的普及！而我们的这一次的被蹂躏，比德意志当时，还更凶惨。这创痍的修复，与现代国家的组设，我们就只在盼望各位教师们的能为我们造出一代新人才来担负起这种亚脱拉斯的重负。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看英将妥协至若何程度

倭寇的搜劫英轮，枪杀英国在华人民，封锁租界，鼓动反英罢工，与明目张胆地宣传驱逐英法势力，一半当然是倭军阀的一贯蛮干政策，一半也是倭想加入德意军政同盟的敲门砖；换句话说，就是格外卖力，以期讨好德意，表示其国力并未降到三等国以下，教德意不要看不起这矮种黄人。

倭人的色厉内荏，只怕人家看自家不起，因而开始加紧坠井下石的那一种工作，真是最得意的拿手好戏。这一次的对英强横侮辱，逼英到底，原是大家所目睹的事实；可是在历史上，当庚子年八国连兵入京的时候，倭人也曾经得意地干过这一手了；这岛国根性，若说是武士道的特点，那我也没有话说。

此次的天津事件，“结果，当然或以妥协来结束。”本来张伯伦便是世袭的妥协主义者，但我们应该促醒英当局的注意，这一次可比慕尼克不同。慕尼克约定在英国方面所牺牲的，只是一点国际的信义与面子；这一回在中国，却须牺牲及英国的实利了。一着放松，全盘便输到底，英国以后若不想在东亚保持利权则已，

否则，这一回可就是一个最初的试探，以后还有印度，还有南洋问题在哩！

所以，这次天津事件英国的或出于妥协的一途，当然是必定的趋势；但我们须切实注意到它妥协的程度。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

倭武人的神化

我们中国，自从抗战以来，最好的一个现象，是文人的武化，与文武的同化。关于后者，陶行知先生仿佛还曾写过一首很有趣味的诗。反之，在敌国呢？倒相反地，武人神化的倾向，近来可愈加显著起来了。

在六月号的《中央公论》上，有土肥原贤二的一篇荒唐言，他把自己的阴谋毒计，侵略中国，断送日本青年许许多多性命那一件事情，吹得至大至伟，无以复加。

最好笑的，是说他自己，比德国尼采、法国罗南、服尔德等更会革新，更为伟大；凡西洋历史上的伟人，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的，原因，就在他的能向中国来逞凶图霸。

还有一事，他还没有明白的说出，但意在弦外。看他的文章时，读者自然会意。那就是"日本的天皇"在他眼里，也简直是等于零。武人的神化，蛮勇主义的压倒一切，到了这一位土肥原贤二的这一篇文字，总算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

倭军人的蛮横压倒一切，更可以在桥本欣五郎的在五六月

《改造》及《中央公论》、《日本评论》等志上的言论里找出许多材料。他公然夸张他故意在芜湖炮击英国军舰的得计，大骂日本一般国民及外交家政治家的不做排外先锋的软弱无骨。

据他的意见，似乎英国的驻日大使，以及现在居留在日本的少数商人及宣教师等，都可以自由杀戮，或非杀戮不可的。

在他的无论那一篇文字里，只是再三的说，值得拜倒的，唯有日本的"兵"，"兵"，"兵"。他也同土肥原贤二的口气一样，开口他在中国一年半，闭口他在中国一年半，他是"兵"，而日本的值得拜倒的只有"兵"。在这里他也忘记了"可畏哉的天皇陛下"或"神武天皇"与"天照大神"。

敌国武人的跋扈，从前原都象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而现在则并王莽都不如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人在敌国的横行蛮暴，现在已经到了从古所无将来也决不会再有的顶点。

在同一《中央公论》六月号的一篇座谈会记录里，我们可又看到了几位政论家的预言，说日本将起一民间的大变动无疑，而这变动，也许可以在今天起，或明天起。但最迟最慢，总也不会得出一年以外的。

物极必反，察变在微，我们再从敌国取缔物价规程的急切施行，及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的黑市大涨与币价的大落来观察，则敌军阀末落的日子，恐怕就近在重阳的风雨节前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倭敌已在想绝计了

最近在《日本评论》六月号上，读到武者小路氏的《牟礼随笔》，中间有一段说，敌机来侵中国之时，假如不用炸弹，而来散发中国的法币，大约中国的人民，必会大加欢迎。在起初，或者中国人还会疑心，法币上有毒药，或有细菌。但利之所在，必有不怕死的人去拾着试试；一经试过，觉得确是法币，则大批人民，必会前来争夺，而欢迎日机的飞来。

他并且还极希望军阀们去实行试试，说不必过多，即用二三万元法币去试试，成绩一定可观。这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文学家的幻想，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日本除了军阀以外的人民，是如何地在厌战，如何地在希望战事的能早日结束。

这种厌战的心理，怕战事拖长，先天不足的岛倭必至陷入泥潭而遭灭顶的心理，不但是敌国的一般人民有之，就是敌国的政客与军阀中间，也未始没有。

敌国的杂志新闻，都在异口同音地说，平沼的上台，当然是抱有结束事变的自信的，若没有这一种自信，而不能赶快把事变

结束，则何必换一个内阁，何必你平沼的来担任总揆？

并且，自平沼上台以后，时间已经有半年多了；但结束事变的象征，还一点儿也没有。因此，有些气急的评论者，已在开始猜测平沼倒台后继任的人物了。

另外还有一个铁证，是最近小矶的入阁而做了大臣。听说小矶的所以能入阁，是因为平沼晓得他对于结束事变，是有成算的缘故。并且他也是军部中的一个八面玲珑的人，老平沼对军部有走不通路的时候，也可以由小矶来通一通气。小矶和平沼，原是从前国本社（日本法西斯蒂最初的团社，系由平沼领导的）中的老同志。

小矶入阁之初，对新闻记者，也曾露过口风，说他对于结束事变，原也有一个很好的案在胸中。

凡此种种，都在证明敌人的再而衰，三而竭的症候已近了绝地。敌国总崩溃的时期，但看它这次的最后一次疯狂——对英威胁——的结果如何，便可断定寿命。万一英国完全屈服，则倭军阀还可以大张旗鼓地再向西北及东南狂拼一下，然后毕命，否则就只能这样地灯尽油干下去，而最后可由倭国人民起来一下子便送终了。

这些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断，也不是居于交战国地位的我们对己有利的偏见。这实在是目下倭敌阵营内的铁样的事实。

所以，主和论者们，老在煽动我们视听的一句问话，就是“抗战到底”，究竟是要到怎么样的底（？）的这一个解答，事实就会来答复了。或者说，倭敌所想出来的这种种绝计，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答复，也是一样。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抗战两年来的军事

抗战两周年，我们沿海的各省，就是平汉粤汉线以东的各省，在战事初发的时候，就有人主张全部放弃的，而到了今日，在面积上，仍有十分之七八，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人所占的，谁也晓得，只有几个据点，和几条时断时续的游丝似的线。

先就山东、安徽、江苏的三省来说，二百余县，我们的政令所及，敌兵所未到，及被收复的县分，共达一百三十几县。在这区域里的我们的正规军，尚有三十余万，配备齐全，战斗能力，异常坚强。此外的游击队，民众自卫队，以及红枪会的军民不分的我们抗战分子，总计约有七十万内外，山东西南部，皖西北部，以及皖南全部，江苏中部西部，全在我军的控制之下。

浙江六十几县，被敌占去的，只浙西的七八县，其余的各县，敌兵简直完全不敢进入，虽则濒海的宁波、温州、台州，最近或有敌兵上陆的可能，但几个已经塞死的海口的一时被占，于全般战局，早不生什么影响。

在浙东西皖南一带（即第三战区），我军的布置，川军，湘

军及新四军，混合起来，约有四十万内外，而保卫乡土的民间自卫队，散处在各地的游击队，尚不算在内，所以连鲁皖苏浙各地合计起来，我正规军共有七十万，游击队及自卫军等当有百万以上。

福建，谁也晓得，被敌占去的，只有金厦两岛，最近敌在三都澳上陆，决不敢西进入古田，南下至罗源，而袭取福州。因为只占领一个福州，在作战上，是一点儿意义也没有的。分布在福建省内的我们的正规军，共有八万，自卫队，以及可以充游击队的壮丁，总计共有五十万以上。在福建，决不会展开大战，而敌人也不会愚蠢到如此，想向闽西闽北进展，而包围浙赣；最多亦不过空占几个沿海孤岛及县城而已。

至于广东呢？敌最近占予汕头，前卫伸至潮安，又为保卫广州，而向西向北，只占了百里内外的三角洲一带。我军最近且已攻近广州七里之内，敌人的西入广西的迷梦，早已惊醒了，而这一方面的我们的布防部队，又是最富于广东精神的两广健儿；正规军的数目，在十万以上，此外的老百姓，都是可以作游击战的斗士，男女合计起来，壮丁不会下于百万之数。

这是单从沿海各省而说的敌我军事对峙的局面。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有人主张全部放弃的这些地方，现在我们尚有这样大的潜势力在，在其余的腹地，敌海军大炮，以及飞机的毒气恶弹势力所不能及的河南、两湖、江西、山西，更可以不必说了。

先从陇海铁路自郑州以东算起，一直西去，沿陇海线及黄河的两旁百里内外，完全是我们的重军驻守之地。河南一省，被敌占去的，只豫东北的几县，及平汉路上二三据点而已。湖北，则汉水，襄河以西的山地，敌人虽则在他们五月攻势之下，付了将

近十万人死伤的代价，也不能再进一步。湖南的敌人，只局促在岳阳附近，其用意唯在保卫汉口，冀免被我军逐出。要想南下长沙，而攻衡州，直冲桂林，决非敌现在的兵力所能达到。江西亦只在南昌以西，高安以南，奄奄待毙而已。

敌人的想全占山西，因以巩固察绥河北，而又西可以袭陕，南可以下川，这梦已经做了一年多了。但五台山一直到了现在，还是在我们游击队的手里。太行、中条两山区中，敌人总攻八次，倭尸堆积，终不得逞。晋西的偏关、离石一带，只在拉锯，攻入河套的企图，当然是在以后一两年之内，决不能实现的。而山西全省内部的我们游击队的布置呢，在六月中，路透社记者曾亲身去遍历过了，铁路线以外的十里之遥，敌人就不敢冒险轻进一步的。

此外，在河北，在东三省，在察绥，在内蒙，我们的游击队，与反正的伪军，当有八十万以上，这是在每日的战报上，都可以看得见的事实，并非凭空捏造之数。

所以，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战略，我们已经实际上做到了。

以后，我们只须比较一下敌我尚剩的战斗实力，就可以知道最后胜利的终将谁属。

照陈诚部长的估计，敌人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常备军五十余万，早已牺牲待尽，因为敌死伤已经到了八十余万的数目。现在散置在中国各线的敌人军队，共计有三十三个师团，百十余万兵力。以后敌人的兵员，即使以后备军及苏伪边境的驻军与台鲜并国内的防守军合计起来，总共也不会越出一百万以上的人数。所以即使扫数调来中国，也不过百万左右，可是事实上，这是绝

对不可能的。除苏伪边境的驻军二十万，各地及国内防守军二十万不能调动，训练未成年龄过幼及过老的预备军五十万不可以用上战线之外，现在所尚能调动的敌军总数，最多也不过十余万人。以这十余万的老弱残兵，要想来征服腹部中国，岂不是在做梦？

与此相反，我们中国现存的实力呢，除上述沿海各省的兵数之外，最精锐的中央军队，还有整整未用的一百九十八个师，共两百万人保留在那里。——这是根据六月份《亚细亚》志美国记者哈儿同·汉森氏的统计的——此外则机械化部队，与新空军的编制，最近也完成了，即使各地的游击队，及旧日的各省杂牌军都不算在内，我们的抗战主力，还有这一百九十八个师。

至于指挥的将帅呢，除敌人所最怕的蒋委员长、白副参谋总长，八路军、新四军之外，还有卫立煌、李宗仁、汤恩伯、孙连仲、薛岳、胡宗南、张发奎、张自忠的几位虎将。中下级军官的干部，自从放弃徐州与武汉广州之后，全部都改任补充过了，改任了都是有国家民族观念，有军事政治学识的新进青年。

军火的储藏，自放弃广东时起，已满可以支持两年的战争。最近西北从中苏路，西南从滇缅路日夜输入的数量，因系军事秘密，我们也不晓得详细，但是照外电所露的一鳞半爪来计算，当然是不会比从前由香港输入的，更为短少。

最后，还有两件可以注意的事情。我们在各地训练的新兵，尚未编入队伍的壮丁，总计还有二百三十几万。而各沦陷区的青年，以及海外的侨胞，与夫沿海各省的工人农民，日日向军事当局呈请作志愿兵的，当局正在苦于收容不了。而敌人则最近新在施行总动员法第四条，要无理强迫民众去当兵了，这是一点。其

次，我国的士兵，个个都以驱逐敌寇出境为天职，敌忾心的一致高涨，与夫保国家保民族的信念的例外坚强，是比抗战当初，更增加了十倍；而敌阵营里的自杀，反正亦投降我军，自动毁坏火药库、汽油库、司令部的事情，近来只日见其多。这在人和上的不同，又是一点。

上面所述，只极粗略地举了一点军事上的大概，以后当再从财政、政治上来作一点比较，或就可以窥见一斑敌我在这两年战后的总势。

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

敌人自从七七以来，到本年度会计年度终结时止，已经和将支出的军费约共一百七十五万万元有奇。

一九三七年，一般军事费十四万一千万元，临时军事费二十五万五千万元，共三十九万六千万元。

一九三八年度，一般军事费十二万五千万元，临时军事费四十八万五千万元，共六十一万元。

一九三九年度，一般军事费十一万五千万元，追加军事费九万一千万元，临时军事费四十六万零五百万元，外国库开支七万万元，共七十三万六千余万元。

这是从他们公开标明的军事费中积算下来的数字。此外更有与军事有关，当局为避免百姓的诽议，而改头换面，从预算项下支出的，如厚生省的伤兵疗养费，农林省的马政费，工商省的军需贸易补助费之类统计起来，当不会比二十万万元更少的。

所以，我们说得简略一点，就可以说是敌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已经用去了二百万万元的军费了。而其他的行政经费，及一

般预算当然还不计在内。譬如一九三九（本年）年度的预算全部就有一百十一万五百万元，其中是包括其他的政费等在内的。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专赖轻工业和不正当营业以维持命脉的国家，这庞大的支出，当然要靠发行公债（国内的，因对国际，敌全无信用），剧增租税，滥发国家银行不兑换纸币，限制入口货，强迫百姓节衣缩食，和强制百姓贮蓄这种种方法来挖肉补疮。

敌国的内外公债，截至一九三八年末止，已累积至一百七十万万元了，再加以一九三九年度，汇合起来而不得不发行的内债八十万万元，合计内外公债，已达两百五十万万元之数。我们总该记得，敌理财名家高桥是清翁百万元公债可以使日本破产之语，现在则这破产限额的公债，已经超出了一倍又半。

敌国公债的承销，完全是由国家银行及其他的邮政储金局与地方银行等负担的；所以发行公债的结果，无异于纸币的滥发，结果自然终到了通货恶性膨胀的地步。

因这恶性通货膨胀而起的物价飞涨，生活不安，早已为敌国举国上下的一大问题。去年则限制人民购买货物，变成一人一物的制度，结果弄得八十岁的老妪老翁和三岁的小儿女，也不得不到商店中去充数购买。今年又施行物价统制的强制执行，致弄得黑市横行，货物质料粗劣到不能再劣的境地。

对国内原可以用高压政策来压服，但对国外，敌却没有方法了。因为敌在国外的存金，于今年六月，已经用完，以后的出口货，将从减少而至于绝无。而军需的原料，油、钢铁及其他一切重工业的生产资财等，敌都须向外国用现金来购买。敌国的纸币和伪币，是对外没有信用的，所以，只 能 想 出 法子来劫夺我们

的关税白银现金和法币去弥补对外的亏损。天津对英的强硬侮辱，以及破坏我法币信用的种种阴险毒策，原因就多在这里。

至于敌国百姓的负担呢？从七七到本年会计年度终了时止，以人民七千二百万人口来计算，敌人民每人的侵略费负担额（包括租税，摊派公债，及强迫储蓄等在内）已经有三百四十七元。而总计敌每人的收入，以敌国经济学者所算定的每年总得一百二十万万元来计算，只得一百六十六元而已。

大概说来，敌自开始侵略以来，因限制输入，与物料征收的结果，输出工业（中小工业），已完全陷于停顿的状态。又因军需工业特别膨胀的原因，军需原料输入的数量自然加至几十倍还不止。壮丁都当了兵，农村也完全破了产，渔业虽还能以女工来代替，但因遭受各国杯葛的结果，输出也骤形见少。人造丝、生丝、棉织物等工业，当然是同一样的状态。

至于政治哩，更完全不值得一谈。敌国所以能致富强的旧法治精神，早就破产了，政党中人，只有因互捧财主为总裁的内讧与分裂（如最近的政友会），以及卑谀军部而欲分得微利的合并（如已往社会大众党与东方会的合并而未成）之类，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军阀之间，也浸成了只知分赃掠夺的风气；在中国被侵略区里所搜括去的货财税额，完全是几个头目没入私囊的，敌国国家，原得不到丝毫的利益。并且因分赃不匀之故，海陆军起磨擦，各特务机关又起磨擦，宪兵与步兵，步兵与工兵又起磨擦的事情，是日常的现象。

上面所说的，是敌国政治、经济公开的大致情形，还有内幕的黑暗与冲突矛盾，自然更是厉害，在这里当然不能细说。

反过来看一看我国的经济状态，则自抗战以后，于廿六年九月一日，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廿七年五月一日，发行国防公债五亿，七月一日救济公债一亿，以及最近发行的建国公债六亿，共计十七万万元。并之金公债，关金一万万单位，英金一千万镑，一共也不过四十二万万元。

至于去年年底一亿二千万美金，和伦敦二千五百万镑的借款，系存在外国的正货，用以平衡外汇的储金，并非拿来作为战费的。这一笔存款，我们现在只用去了十分之三，现在还有十分之七，存在那里，用以保障法币的信用。此外则战前白银和金子的输出，存储在英美的金额十六万万元，到现在也还有六万万元以上的积存。

而我国对于国民生活的限制全无，即租税的增加，在半沦陷区反而全免，在未沦陷区，亦只增加了百分之二的事实，是大家所知道的。

至于我国公债的推销呢？一半由于人民之竞购，一半分摊给各省去派销，国家银行所承受的，只有十分之三强。所以纸币绝对没有乱发，准备金亦完全没有移用。法币信用的所以能对内对外，都维持过去；伦敦市场的公债所以能不跌（见敌《日本评论》六月号木村增太郎《中国在财政上的抗战力》），原因就在这里。

一面再看看我国自抗战以来的政治罢，大家都晓得的，中国自民元以来，绝不能做到的全国统一事业，却铁样的做到了，澄清吏治，统一政令，发展交通，各党合作，此外的种种政治设施，要五十年才做得成的长足进步，统在这两年之内完成了。以后的团结，只会得日坚一日，建设发展，也只会得日快一日。

抗战整整两年了，现在的敌我之间，军事（见昨日《晨星》

栏）状态是如彼，政治与经济的状态又如此。我不敢妄断一句最后胜利将在何时，我只把实际的情形，报告了一个极简略的大概。

至于国际的同情，以及今后世界大战万一发生——（照我的判断，是但泽问题决不会在最近就引起大战）——之后，中日的局面更得如何，却又当另作检讨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意义

淞沪一带，当然不是大决战的战场，尤其是在海军大炮射程之内的一带地方。

可是这一次我国抗战中的一段序幕，接芦沟桥七七而起的八一三的沪战，它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第一，上海是中外人士集中的地方，在上海附近的一举一动，完全是同在巴黎、伦敦、纽约，或柏林、罗马附近的一举一动一样，最容易唤起全世界的视听。

第二，沪战发生后，我们才展开了全面抗战的阵容，并且已显示了我中央抗战到底的决心，敌人的在虹桥机场挑战的轻举妄动，实在就是它今日欲进不可，欲罢不能的泥足的第一步。

第三，因沪战的发动，敌人的蚕食诡计，事件地方化的阴谋，才被我们粉碎。

第四，敌人陆军的无力，作战的拙劣，经沪战的证明，纸老虎才被揭穿。它的增援军队的来得不适当，即在飞机大炮（海陆空合作的）等优良武器掩护之下，死亡率之高，仍远超出了我们

的预想之外。

敌人此次的冒险深入，师老无功，若以拿破仑的墨斯哥失败来作比的话，那淞沪的一役，和拿破仑飞渡尼门河后，在斯墨伦斯哥的一场苦战，是完全情形一样的。

我们的所以要纪念八一三的沪战，为的就是上举的诸种原因。我相信一年半载之后，我们定可以在淞沪的失地里，重建起巍峨雄壮的战胜纪念碑来。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新加坡《总汇新报·世纪风》

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

关于八一三抗战的意义，已在《总汇新报》的《世纪风》里写过一点了，再来重复一遍的话，是：

一，因八一三的抗战，而耸动了全世界的视听。

二，因八一三的抗战，而展开了我全面抗战的阵容。

三，因八一三的抗战，而证明了敌军的脆弱，我军的刚强。

四，因八一三的抗战，而坚定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

凡此种种，都是使我们不得不纪念八一三这一个日子的理由。可是抗战正在好转，胜利也在目前的此刻，我们应把只纪念某一个日子的决心，移换作日日纪念，刻刻纪念，如吴王夫差之使人立门侧，每逢出入时唤发复仇的警告一样。

所以，八一三的到来，只有增加一层我们日日铭刻在心的预备复仇的决意和实践而已。

回想起两年前的此日，笔者正在上海；空气虽则极度紧张，大家还以为敌人决不敢冒此大险，而进攻淞沪。因为敌国政府的

计划，是在竭力想把芦沟桥的事件地方化，而实现它的逐步蚕食的野心。

但是，敌政府无法统制军部，敌军部又无法统制驻在中国的敌少壮军人（所谓出先军部）；所以，步步深入，致陷成了目下的这一个小蛇吞象，吞吐不得的苦境。

在我们这一方面呢，原是早已觉悟到要拚一下命的。因为蚕食之祸，其来也渐，被它局部吞食，必至万劫不复，非演成国亡种灭的慢性毁灭不止。

果然，八一三的沪战爆发了，这淞沪一隅的几个月抵抗，我曾经把它比作俄军对拿破仑的在斯墨伦斯哥的那一次苦战。徐州的会战，当是拉·墨斯哥伐的一役了。现在敌军虽已占领了我们的南京、武汉，同拿破仑的占领莫斯科一样。可是拿破仑还有自知之明，还知道自行退出，而顽固不灵的敌军，恐怕要全变成了骨灰之后，才能够退还岛国。

抗战两年又一月，敌我的情形，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国际上，已形成与战前相反的地位。万一敌竟加入德意军事同盟，而促成苏联、美国、英法在远东的大联合时，倭寇的覆灭，我们的胜利，将更来得迅捷。欧洲大战，虽是敌人最在希望的事情，但希特勒，墨索里尼，却不会象敌军阀那么的没有远见，没有自知之明。

所谓八九月的世界大战争勃发的危机，已因波兰的强硬，和法英苏三国的同盟而和缓了下来。欧局一靖，远东问题，就将在敌经济崩溃的一原因下，彻底的被清算。

我们原不存依赖友邦助我之心，但友邦为自己的权益的被侵，却自然不得不起来予打击者以打击。

法币的跌价作战，我们已粉碎了敌人夺我外汇之毒计，傀儡的将次登场，亦只是敌计无所出的穷余下策而已。大约明年的八月十三，我们已可以在沪战的废地上筑起伟大的纪念碑来了。我们只须再努一下力，再抗一年战，以后就是胜利的日子。

廿八年八月十一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九 一 记 者 节

九一记者节的由来，是源于民国二十二年《镇江日报》记者刘烈士煜生的被害，后经浙江《东南日报》的提倡，定这日为新闻记者节。于是“九一”这一个日子，便永为全中华民国的新闻记者所纪念，所祝福。

推源祸始，刘烈士的被害，原也只为了一篇抗敌的文章；因为当时中央还被恐日病者们所包围，采取的犹是睦邻的政策。不久之后，杜重远的一篇《闲话》，也曾经惹起了一场文字狱来。

记者节的设定，当然是为了保障言论的自由，保障记者的人身安全，和敦励记者的品格，使记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得提高。

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所以记者所负的社会的使命，比任何公务员及自由人，还来得重大。所谓无冕帝王的这一个称号，由来也即在此。

社会是动的，永久在向前迈进的，新闻记者的使命，自然也不能落社会之后，而凝固在一个圈内，新闻记者不但要和社会取同一的向前迈进的步骤，并且还要比社会先进一步。所以，新闻事

业的发达与否，言论界的被不被人尊重，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高不高，就可以很准确地反映出这国家这社会的进步不进步。

军阀专政的各独裁国内，言论绝对须服从指挥刀，笔阵只成了一层炮弹后面的烟幕；这结果，自然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文化的没落，与社会的衰退。

当中国抗战正转入第三年的这紧急关头，我们为中国的新闻记者的，自然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先要谋解放我们的民族，抢救我们的祖国。内则鼓励民众，尽出力出钱之责，巩固团结，肃清败类，决意抗战到底，自不必说；外则对善邻修好，尊重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国民，努力于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与国际文化的促进，也是目下急切的任务。

东亚既已战云笼罩了大地，西欧又似乎在山雨欲来的前夕，在此危机一发的瞬间，我们所须要的定心丸，还是以最沉静的理智，来死守住我们的岗位。

我们在这一节日，首先自然得为我们的那些殉国的勇士们志哀，其次更不得不为我们的那些卫道的文化烈士们致敬。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那些为社会正义而牺牲的热情记者们，才是我们的榜样，亦即是冥冥中在监视我们的英灵；纪念九一记者节而不思为国家社会献身，不思为正义人道殉职的人，这人就根本不是记者。所以，我们的信条，就是：

（一）新闻记者们的必须团结。

（二）将生命献给正义与人道。

（三）拥护抗战到底国策。

（四）实行精神总动员。

（五）誓守国民公约。

（六）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而努力。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纪念九一八

今天是“九一八”八周年纪念日！关于九一八的由来，意义，以及这八年中敌军阀对我的阴谋续出，与夫我全国上下，一致团结，誓死保卫我们的国土、主权、独立与自由，等等，已在十五日的本栏钟达琳君的一篇纪念文字里说过了。在这里可以不必赘述。

我们今年的纪念九一八，第一在纪念着它是给与我们新中国以复兴之机的催生针。

我们只须冷静地考察一下，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民生活，在这八年之中，完成了一个如何惊天动地的大飞跃；以八年以前的诸种状态，来和今天——虽则在敌军的践踏蹂躏之下——全中国的一切情形一比，谁也会觉到这长足的进步，是摩西以后的一种奇迹。

其次，我们纪念今年的九一八，和往年不同之点，是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间前进的诸人士，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锋；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不

惜牺牲一切，来抨击法西斯蒂强盗的先觉者，我们是最早看穿了法西斯蒂的欲壑难填，最早觉悟到非以武力来抵抗，是不足以打倒这些疯犬们的民族与国家。我们是能以实际行动来贯彻我们的主张的。

又其次，今年的纪念九一八，是在后代历史意义上，迥然特出的一个转变点，恐怕在五年、十年，甚至百年、千年以后，也永会保持着它的异彩的，这特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建国复兴的最后胜利期，决然地于今年九一八以后，将很迅速的到来。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可以种种方面的实事来作证明的。

（一）敌国上下，自受了美日废止商约，苏德缔结不侵犯条约两大打击之后，愈见得手忙脚乱了。先是反英的，现在想反过来拜英。内阁的更迭频频，在中国军部的寇酋的朝令夕改，再三变换组织，终无法压制反战各士兵之心，以收速结速和，以华制华的实效。而敌国最大的窘状，尤其是人口的大量减少，兵员的不够应付，敌国全国，自都市至农村的人心厌乱，生活的不安。

更有甚者，是敌新组的内阁，和横蛮军阀，还是势成水火，暗斗明争，在阿部未上台之前，就已见之于陆军当局所公布的一篇谈话（见八月廿九日大阪《每日新闻》"陆军对新内阁的希望"条）。

敌军阀们还在要求急进侵略，不尚空言（对内阁的施政而言，即对速和速结的政策而言）。绝对反对和英国妥协，要独霸东亚，独吞中国（这对阿部于九月一日所公布的谈话，在中国对第三国家有妥协可能时，也愿意妥协之意，针锋相对）。

这从敌的一方面来分析，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必然地就在目

前的一个证明。

（二）从我们的一方面来讲呢，新训练成的机械化部队，有国家民族意识的青年新军三百万，已于最近配备完成，枕戈待命，在晋中，在长江流域，在东战场，在粤沿海一带，各只在静候着总攻击令的颁发了。

我们的最大的凭借，总之，是在兵种的源源不绝，土地资源的广大无垠，以及抗战到底，精诚团结的这绝对不会摇动的一个大决心。

敌寇的傀儡，也许最近会袍笏登场，敌国的外交，也许最近会颠倒一变，但是，这些丑剧，结果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证实敌人的百计俱穷，最后的一个回光返照，即敌国所说的"断末魔的苦闷"而已。

因此种种，所以我们今年的纪念九一八，和往年以及将来的纪念九一八有迥然不同的特殊意义。我们更要以万分乐观的情怀，来争尽我们出最后一个钱，沥最后一滴血的天职，因为这就是最后胜利的另一个名称。

至于欧洲大战的与我抗战无损，以及我们是和欧洲英法波站在一条抵抗侵略的线上等等，本栏已屡有文字发表过，这里自然不必再说了。

二十八年九月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今年的双十节

每一个国庆纪念日，都值得我们来庆祝，年年总有该庆祝的一个特别理由，但是今年，却来得最为充分。

第一，因为今年的国庆纪念日，是抗战开始后的第三次的国庆日，也就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将次到来的第一个国庆日。

第二，每年到了这一个纪念日，我们都不得不追忆从前开国时，诸革命先烈创业的艰难；所以，在今年，我们更不得不特别的淬厉奋发，加强团结，集中意志与力量，来发扬光大我们开国诸先烈手创的国家，早日完成我们全民族抗战建国的大业。

第三，在欧战开始，敌人与苏联暂定边衅的此刻，我竟能以半月的守御，歼灭敌人抽调过来的精锐之师三个师团，使易攻难守的长沙城，仍安如磐石。这就是敌军总崩溃的前奏，也就是我们新练的雄师，川滇黔诸省的健儿小献身手的开端。我早已说过，两湖将为敌人的最后坟墓，鄂西、湘南的诸沼泽和山区地带，是我们最后歼灭敌军的天定地域，这话，现在已经露了一个应验的征兆；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是单从长沙外围战的大捷来说，今年

的国庆纪念日，也完全和过去的二十七个国庆纪念日不同，是该由我们来大大地庆祝的。

有此三个理由，我们在今年的纪念日，真觉得前途希望无穷，这国庆日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扭处。

回头再来一估计敌人的种种失策，我们就更可以预卜着半年之内，前线将更有惊人的捷报传来，至少至少，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可以把敌人驱逐出扬子江的北岸。这话，有什么根据呢？请先从天时来说，河北的大水灾，就是敌人梦想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一个大打击。河北平原的棉花，大豆，以及长芦的盐田，山西及北平附近的煤铁，在平时已经不能如敌人理想那么地有丰富的收获的，今年自然更加没有希望了。并且一入秋季，塞北就会下雪，冀南也将寒冷到使戍军不能守住夜岗的地步。这时候，正是我游击队活跃的时候；在山西，在河北，我们在这一两月之内，一定可以使敌军多加几万无言凯旋的灰骨。

再从地理来说，鄂西一带，敌人总攻了无数次，损失了将近十余万的人马，到现在还是依然不动；西不能渡汉水，南不能得潜江；入秋水浅，敌人对洞庭的青草，对下峡的急湍，将更计无所出。而一鼓下长沙，绕常德而袭沙市，入衡阳而夺桂林的迷梦，不消说，早已被我们的守军，粉碎得片甲无存，所以，今后的抗战地势，除山陕的山岳地带，早已证明敌骑的不能寸步伸展外，就是在两湖，在河南，在赣西北，都是于我有利的。

三，讲人和。敌人正在苦心经营的一个最后计划，就是由汪逆出来组织的伪中央。以此傀儡政府为中心，它此后的政治进攻，经济进攻，就可以不劳而获，欺骗得我国沦陷区的民众，欺骗得在东亚有利权关系的各与国了。可是傀儡争权，唯利自视；华北王

傀儡，和南京梁傀儡，绝对不愿和汪傀儡合作，来组织一卖国股份傀儡大公司；所以，汪逆能否登场，还是一个问题；即使袍笏登场，扮演了加官进爵的第一出傀儡戏后，其后马上就会因傀儡的互轧而塌台，是谁都料得到的。这就是第一使敌人的以华制华诡计不得售的病根。其次，则敌人的兵众，到了这侵略第三年的时期，实在是厌战惧战，已经到了极点了。这从这次长沙的守御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兵器是敌人的好，大炮、飞机、战车、战舰的配合，是他们的来得齐全；运输工具，又是他们的来得迅捷；何以敌人这次对长沙这一块地的总攻，还会得失败的呢？是他们的兵众，无斗志了，中上级的将校，又不时在起冲突，最后，就连担任侵略中国统帅的西尾请到了，也终于没有办法。

所以，从这种种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是操到了胜利的左券；此外，只教国际方面，如美国的海上的活动，和苏俄的远东的大操，再加上一点颜色，对敌人表示一下态度，则侵略者就可听到四面的楚歌声，兵败如山倒。内部的裂痕，和外部的崩溃，不难同时出现的。

我们在今年的国庆纪念日，应该特别庆祝的理由，就此也可以明白了。可是，庆祝的方法，我们也不得不和往年不同地来变一变，就是更要尽我们出钱出力的责任，更要巩固我们的团结，更要坚强我们的信心，更要协力起来肃清国内外的汉奸们！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人的文化侵略

敌人除用了飞机大炮的屠杀进攻以外，谁也知道，还有政治进攻，经济进攻，甚而至于和平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妓进攻等种种手段。但是兴亚院的工作做得最起劲，一批军部御用的学者文人也顶卖气力的文化进攻或文化侵略，才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一个最毒辣的计划。

他们先要使我们忘记国族，所以就授以日文，改变小学教科书；再要证明中日亲善的实际，所以就从由我们这里劫掠去的金钱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示义卖恩，颁赐小惠。或设奖学金，或选派优秀学生至敌国留学，或对于一二稍有声望，甘为奸人走狗的堕落文人与所谓学者，予以小小的荣誉。这么一来，沦陷区的读书种子，就尽入敌人的彀中。再过几十年后，便可将中文完全废止，使炎黄子孙，完全甘心情愿自称作日本的臣民了。

这是他们的计划大概，与希望的一般，可是事实上，他们这一个侵略，又和他们的军事侵略一样地失败了。

第一，我们在沦陷区的小学生，教科书有公开的与秘密的两

种，这事情，已在各报的通信栏里，登载过了好几次；第二，是沦陷区的各教员，大部分都还是良心未泯的青年，他们的嘴，他们在课余之后的工作，却是敌人的刺刀手枪所压服不下的。

厦门小学生在敌人的节日所写的标语，各战地后方的秘密报的销行的广泛，就是这倾向的证明。

其次，且看汪逆在上海所发行的报纸，虽说销路有了三万，但这一个数目，却是奴才向主子报账时的幽灵数目，实际上恐怕连三千都还不到，而读者又只是受津贴的汪派的徒子徒孙。

至于什么文化协会，什么文化座谈会之类的文人拉拢政策呢，被拉的又多半是在中国并没有地位声望的四五流以下的文人。他们又大抵是几个报酬一拿到之后，就可以公然声明，并非是心甘情愿出卖灵魂的奸人，这一条死路，是敌想尽方法，怎么也走不通的。

最近在十一月号的《改造》杂志上，读到朝鲜籍的一位作家张赫宙所写的杂文，说在间岛、图门之间，日本人所说的匪，我们所说的义勇军，还是有绝大的势力。他们所散布的主义宣传，文化种子，据日本军事当局自己说来，也是决不能以日本的兵力来消灭的，除非是他们情愿自己来投降送死以外。

文化侵略，原是各种侵略之中，最毒辣的一种，可是敌人于施行侵略之际，第一，没有远大的计划，第二，拉不到有力的干部，第三，摸不到有效的路线（方法），它的结果，非但没有正的力量，反而还增加了负的声势。

我们的文化，历史实在太长久了，虽经了辽金元清数百年的压抑，复经了最近西洋文化二百余年的侵蚀，可是，结果，还依然一点儿的动摇也没有。

在文化上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雅量，我们当然自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须加以一番科学的精练的决心，在近几年来，也已经一步一步的确定起来了；我们的文化阵营，在长期抗战的中间，只会向坚实的一方面发展。反之，敌人的固有文化，不但不够来向我们进攻，恐怕将要在敌军事、政治、经济，同时崩溃的时候，完全消灭成一张白纸。所以，将来若须建设东亚新文化，使敌国上下，能受到真正文化的恩惠，这责任反而还在我们的肩上，同隋唐之际，我们去开发倭夷时的情形一样。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迎 年 小 感

一九三九年，祖国在浴血抗战的苦斗里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一九四零年的新春。这个一九四零年，断断乎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转纽；新年开始，就有了粤南的大捷，与赣鄂的连胜，以后，自然只会得一层更上，我们的反攻，只有着着胜利的一途。

胜利原是我们的，当然无可疑问，可是到胜利之路，却并不是一条坦途。我们全国的民众，不问在海内海外，必须团结得更加巩固，责任的偿尽，必须做得更加彻底，为国牺牲的觉悟，必须更加坚决，才有希望。

因小故而自致分裂，执己见而妄责他人，事未做而先来一番叫嚣，都不是致胜之道，这一点我们可得留意。对于同一阵线内的人，只有鼓励与劝导，或好意的批评，使他的错误能够纠正，方是真革命者对待同志的爱。舍大前提而不谈，先来争论细事，甚或至于因理论而乱及于行动，自家先在战壕内，杀得血流漂杵，这是为仇者所快举动。

当然，对于汉奸、汪派，我们是不必姑息容情的，但是对于同道者们，决不能怀有对敌人以上的仇嫉。所以，在这一个最后胜利年内，我们只希望大家都能脚踏实地的去做我们的工作，依最有效力，最经济的原则，去完成我们的任务，用远大而正确的眼光，去分别出我们的敌人友人。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关于宪政

上星期日，因为大家得空，有六七位朋友，聚合在一起，作了一次关于宪政问题座谈。对于这一问题，国内的新闻杂志上，当然已议论得详详尽尽，就是在星洲，我们的新年特刊里，也已经收罗了各位立场不同的代表者的文章。宪政的必须实施，实施宪政的有助于抗战建国，以及何为宪法，现今世界上有几种典型的宪政等，现在实在是可以不必赘说了；因为人家早已订成了书，制成了有系统、有意义的文件，推叠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教有心思，有趣味去翻读一下，就可以原原本本地得到全部的智识和判断。

所以，我们所谈的重要之点，不外乎底下的两项，第一，立法是纸上文章，是容易求其完美的，就譬如国际间和平合作条约的签订。重要的，是在这完美的法令的实施；遵法者能不能照条文去遵守，执法者能不能照条文去执行。过去中国的每一次的选举，何常没有很完美的选举法令？然而选出来的代表怎样呢？大抵总是以贿选或欺骗威胁等手段得来的居多。

就譬如说敌国罢，名义上居然也是一个立宪的国家，关于财政预算，人民负担，以及外交军事诸大政，是非由议会批准，不能决定的；可是事实上又怎么样？议会对于军阀们提出的议案，敢不照样通过么？

故而，我们对于这一次宪政的施行，是在望其真正的实施。对于人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各党派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都能真正照法定的条文般能够实现。空头支票，或者发了支票而又加以涂改，及打折扣的宪政，在我们是以为大可不必的。再进一步，万一宪法公布施行了，而实际上仍不能实现时，那当用什么方法来制止？这是重要的一点。

其次，是关于马来亚华侨，和宪政的问题。譬如国民代表大会中由马华侨胞所公选的代表数目，是不是足够代表全马华的侨众大多数的利益的？人数问题是一项。此外，则这些代表的产生方法，是不是尽善尽美，足以完全代表各阶层及大多数的侨众的意思的？代表产出问题，又是一项。

总括那一次座谈的结果，除必然的话，及大家已经明了的一般的话不说外，我以为重要之点，也不外乎上述的两项。

方法原是很多，但欲求一果能实现而又最少弊端的较为理想的规定，却也颇非容易。并且即使由几位有识者想出了适当的方法，而这方法的能不能被采用，又是一个疑问。

因而，处士横议，只能作一种参考资料，及鼓励大家起来从实在处研究宪政而已；说来说去，还是宣传这一点工作，倒是实实在在，可以做得到的，当然，效果的如何，暂且可以不问。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阁的倒溃

报载敌国内阁，因对中国的用兵，南北失利；而国内的人民生活，又困苦到了极端，所以政党首先表示不信任，要求阿部辞职；军阀复以危言相逼，谓即使用速成方法，滥造出一中国伪中央新政权，亦不足以抵销倒阁的理由。

总之，无论如何，在此情形下，阿部内阁已经日暮途穷，处入不得不倒之境了。于是倭国政论家，想来想去，想得没有法子，就有些人主张组一元勋内阁，来压抑气焰万丈的跋扈军人，与汹汹不静的人民怨怼。

所谓元勋内阁者，就系指过去明治二十五年第二次伊藤内阁上台，萨长的元勋如黑田、大山、山县、井上等都参加进去那么的内阁而言。

但是敌军阀侵华的野心不戢，对第三国的损害行动不停止，仍是这样的一味蛮干下去，即敌国的形势，只会得一日险恶一日，即使组成了无论什么内阁，找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张伯伦入了阁，也是没有用处的。

中国的侵略战事不停止，敌国国内的人民生活决不会复常，欧美各国对敌的哀求媚谄，也决不会给以一丝的返报，是铁定的事实。敌人自作聪明，谬以为中国可全吞，世界可独霸，而倒来倒去，唯其内阁万能之是求，岂非本末颠倒的一大笑话。

敌国的倒阁运动，对我原无甚利害的关系，但就这事的本身来说，就证明了敌国上下的束手无策，内则人民愤怼，革命将兴；外则兵连祸结，与国全无，不出一年，行将见敌军阀们之为民众所屠歼，实属毫无疑问的事实。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美 倭 之 间

美倭间的商约取消，断绝有约的商业关系，将从数日后的一月廿六日起实现。大家都知道，美上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毕德门，在倡导嗣后禁止军火输日，绝对断绝经济交往，以作对日不顾公约，侵略弱小民族，轰炸不设防城市，损害美国在远东的财产与商业利权，及危害美国在中国的宣教师，侮辱美籍留中国妇女们的报复。

倭军在中国对美国的暴行事件，据去年格鲁驻日美大使的声明，已积有六百余起。现在距离该声明之日，又有好几个月了，事件总加上去，如最近上海倭军侮辱美籍妇女之类，大约总该有七百件无疑了。

美国是舆论有绝对权威的民主国家，舆论之所趋，往往会见诸政治与政策的实施；而美国全国的舆论，当中日战事起始时候的百分表，就已如下列：

同情中国的：五九巴仙

同情日本的：一巴仙

两不同情的：四十巴仙

现在当然连百人中间的一个同情日本的人也没有了。在这一种状势之下，美倭商约的再订一事，自然是无从谈起。又加以倭阁新组，政策未定。一方面在极力想拉苏联，一方面又在想联英制美（米内是主张联英的），看起来，在一月廿六日之前，美倭间的关系，决不会有如倭方所希望似的顺利的解决。

可是，我们也不敢盲目判断，以为从此以后，美倭的经济关系，就会得全部断绝。因为南部加利福尼亚州，对日的输出，在一九三八年中，总数为四五·三五六·四九九美金。比之同年该处向英国、菲律宾、苏联、澳洲、加拿大、荷兰西印度群岛、智利等七国所输出的总数四五·一三一·八九二美金，还要多两万多元。而美国全国，在一九三七年向日输出的总额为三万万美金，就是从德克萨斯输出的油与棉花，有三三·三三六·零四四元，从纽约输出的机器军器类有六一·零八一·三二三元，从华盛顿州输出的木材及其他有二五·零六四·七一零元，从金山输出的货品有二二·五三六·一九三元美金。

平均倭国对南加利福尼亚州一年之中，每日要付十二万五千的美金。虽则南加州在最近已接受了为美国商输公司建造四只大船的合同，二年之中，可以有七百五十万元美金的收入，但对于倭国购买军器材料的一个大主顾，是决不肯轻易放弃的。

况且，欧战起后，美国的海运业、商业，在欧洲方面已受了很大的打击，若要找条出路，自然只有向太平洋的一方面来。

所以美倭间的断绝商业上关系，若只限于军火、飞机材料、汽油之类，那或者还可以办到。若完全至于断绝，则南美的棉花，一年就要减少二三千万美金左右的销路。此外，则倭国每年

对美输入的一万万金元的生丝，亦将绝迹。使美国而短少这一万万金元的货物抵销额，则美国的商业，亦将受到重大的影响。

倭国对美，是次于英国及加拿大的第三位商业关系者，所以，美倭之间的经济关系，完全至于断绝，想来是决无此事的。我们在这里，只希望美国的商家，尤其是南美加州、德克萨斯州及奥克拉呵马诸地的汽油商家，能够主持一点公道，将正义一方面的铜码加得重些，将金钱一方面看得轻些，能够把直接可以用来屠杀我民众的军器、汽油；及飞机材料等加以制止，禁不输倭也就够了。此外则能够绝对不买倭货，固属最好；否则，工人不穿生丝制的衬衫，女子不着丝袜，也是对中国大有帮助的一种表示，我们在这里，谨以最大的诚意，奉劝太平洋彼岸的热爱正义人道的诸位友人，要顾全到世界人类的大局，大家一齐起来，拥护毕德门的提案。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美倭商约废止期届以后

现在倭国外交上最大的困难问题，是美国对倭的不肯续订商约一事，前天在本栏里，我们已经约略说过了。可是这一次废约的期到（一月廿六日），也并不是马上美倭便会断绝一切经济关系，我们也从事实上，下过预测；现在再将这事的来由与废约来谈一谈。最后，我们总希望美国能一秉正义之心，毅然决然，将军火、飞机材料，及汽油等直接可以屠杀我妇孺的各种输出品加以制止。

原来美国政府对倭的不满，是在倭国的没有政府；这征之于罗斯福大总统的直接电倭皇抗议一事，已可见端倪。

其后倭军在中国，损害美国的财产权益，及侮辱美国的子民，尤其是妇女，事件积至六七百起，而每一次美国的抗议，终于得不到倭的答复，或解决。原因是在倭政府不能命令在中国的军阀，而在中国的倭军阀，又不能受一个统帅的命令。甲地的倭军，就不会听乙地倭军的话，日皇自日皇，日阁自日阁，日外务省又自日外务省，在中国的倭军又各自为倭军，而无统一，而不

负责任，而决不能一致。

美倭间的不能直接开会谈判解决两国悬案，原因全在乎此。倭方恐惧开会谈判，因为谈判的结果，决不能够实现。美国也不信任日阁，及在中国的倭现地军阀，因为他们都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而不能负全责。

即以被逼不过，而勉强生出急智，希图献小媚以缓和对方的长江下游开放一事来说，就证明了倭现地军阀的各不能够一致。所以，开放长江航路，只是一句空言，而实际对于第三国在中国的权利尊重，仍是毫无裨益。

其次，则美国的内部，也还不能坚决取最后的态度，原因是在顾到实利，而还没有预备好与倭绝对断绝经济关系后的补偿方法。日元的连系到了美元；日产品生丝，在美国日常生活用品上的必要；棉花、煤油、农产品、木材等的生产过剩；大西洋及北欧航路的受到威胁等，都是使美国不能取斩钉截铁的态度的症结。

所以，美倭商约废止期届以后，大约总还有一个惰性继续商业往还的无约时期，要存在美倭之间。在这中间，倭必将竭尽其献媚邀宠的能事，而图挽回美国上下对倭的感情。其间，则代表南加州的利益，或与倭美商务间有关的各美国议员，将起而为倭活动，自属毫无疑问。我们不已经听见过波拉议员的说话了么？此外，则明年度到期的总统选举阵，对芬兰对欧战的纵横排阖，对此事也不无影响。

从这种种方面看来，我们对美倭间的关系，也并不望其能马上有明显的结局，况且，赫尔国务卿，现在又是万事都持慎重态度在从事的。

归根结蒂，我们只希望美国在一月廿六日后，禁止军火输日

一事，能够实现，那就算是美国对正义、人道，已尽了它的职责。此外，则我们的抗战，自当本自力更生的精神，一直坚持下去。

至于日阀的想将伪中央速制成功，其中就可以利用伪中央来对付美国的一层，却只是倭军阀单独的如意算盘（这原也是所以使倭对美不急急于开正式谈判的原因之一）。无论伪中央的能否成立，能否代表中国的民意；即使傀儡登了场，可是美国也决不会上日阀的当的。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勿骄勿馁的精神

自从高陶将汪逆与日寇缔订的新关系调整要纲内容公布以后，卖国的汪逆，自然已经露出了为来为去，只为了四千万元关税截留金交付的这一条尾巴。而在日寇方面呢，也实实在在显示出了近卫三原则的实际内容，与夫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及皇道政策的具体计划。

傀儡们上了台之后的种种丑剧，我们自然不难预见；譬如伪满倭国与伪中央的交换使节啦，伪中央对英美苏各国的一边威胁排斥，一边屈意奉承的外交两重奏啦，各地土匪流氓的拉拢编组成伪军啦之类。但是最重要的一幕，恐怕还是倭寇与伪中央，伪中央与各地方伪府，以及伪中央中间自己的对分赃争利夺权的几个场面，这些当然是不在话下的应有之景，总之，只是证明了傀儡们的实际，与夫显示出敌寇的操纵手法而已。这些形形色色对我们的民众决心，对我们的抗战计划，以及对我们的与国的友谊，是决无丝毫影响的。反之，倒可以使我们更坚决地获到国内大众，以及友善各邦的更坚强的扶助与拥护，使抗战更能增加一

分决定的力量。

在这一阶段里，要紧的，可并不在甘心卖国的奸党们，倒是在我们自己抗敌阵营的应该严防被敌利用，致起分化的一点。敌人放出的在山西境内，国共军队，自相残杀的恶宣传，原不值得一驳。更可笑的，还有云南与中央的乖离等不具常识的谣言。可是从这些敌谣来加以分析，则可见敌在军事上，已无法进展，以后的唯一策略，就在利用政治，来分化我们团结的阵容。

其次，则抗战日久，人心易生玩忽，胜后成骄，略挫变馁的倾向，也容易滋长；我们在这一年中，尤其更不得不重振精神，着着来准备敌军的出乎意外的袭击。譬如敌人这次在浙东的偷渡钱塘江，炮轰镇海，分明是袭取浙东，因以威胁江西福建的初步。还有粤桂两省的增兵死拚，也是敌决不肯轻易放弃打通粤汉路企图的明证。鄂中的崩溃，系大批寇兵南调的结果；而山西的失败，是严寒的季候与险峻的地势，予敌人的打击；各路前线，现在虽则似乎暂入平静的状态；但是傀儡登台，敌阁筹备稍稍就绪的一月半月之后，敌在各线，总将有一次最后挣扎的猛烈反攻无疑，我们所不得不预防的，倒是在这些地方。

所以，当抗战初期，领袖所告诫我们的两句话，叫作"闻胜勿骄，遇挫勿馁"的精神，我们在这时候，更应该重振一下，并且还要勿懈勿弛，坚持我们拚战的初衷，比抗战初期，更得奋发一点，才能在今年之内，争得到最后胜利初步第一段的成功。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等春季过后

在前些日子，我们就料到敌人在两广总有一次最后挣扎的攻势；而同时在东战场的浙皖，北战场的晋绥，也必于春到雪溶之后，再有一番动作。在我，是沉着应战。勿馁勿骄，始终抱着长期抗战的决心；在敌，则这一次攻势，就是孤注一掷的总进攻。若攻而得手呢，则傀儡马上可以上台，一面也将利用欧战春期猛烈交攻的当中，要挟张伯伦，欺蒙罗斯福，在既沦陷区中，和英美成立一妥协局面。若攻而失败呢，则势将缩紧战线。致意于华北及长江下游的整理，而勉强制造一可以持久的计划出来。这是一二月后，敌人所必取的态度。

我们是原早已料到这一层的，所以，最近就注全力于西北西南内部交通网的完成。滇越铁路若有问题，滇缅铁路就可以起而代之了。若能照目下的情形，各地时时获得小胜，而较大规模的战事，取一个争夺进退的形势，要求敌人以较大的牺牲，则我们只须等至今年的六月，敌人就会因内部的崩溃（从食粮、经济、政治各方面），和国际的箝制（从九国公约签字国的谴责方

面），而呈一个很显著的败兆。

兵败如山倒，攻心得利，自然比攻城更有效力；今年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年，这话的索隐，该从这些地方着眼的。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废 历 新 年

我国自废除旧历以来，历年已有二十九岁；但习俗总不容易除了，尤其是一般商家的结账，及银钱来往的交代上，总爱以旧历年终作结束的居多。

这习惯的养成，只能归之于一般人的惰性、习熟性、封建性，和科学智识的不广泛流布等原因。

说这是守旧或这是恶习惯，也很难说。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每当换朝代，易主子的时期，总以改正朔，设祭祀，创服式，或制装饰等为正民视听的基本制度。不记年号，但书甲子，痛恶披发左衽，以及清朝入关之后的因不肯薙发而甘殉国族的事情，历史上皇皇各有记载；一样是守旧，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恪守旧制时，我们倒也并不反对，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曰：其愚为不可及。

所以，到了旧历的新年，在商业上来一次结束，在日常生活上来一个休息的节日，也未始不可。

不过节日不可过多，快乐不可过度。因休息而致心身放弛，

因作乐而致发生灾祸，是常有的事情，这在平时，尚且不可，更何况乎在这国家多难的战时？

有人提倡节约年节宴会以及一切糜废之金钱来救国，当然是极合理的主张。

可是，我们的最终理想，总还是在服从国家的命令，确守一元的理论，不要把元旦弄成一年之内有两个，将大好的光阴和精力金钱，枉费在嬉游作乐的上面。

平时在国内，我们大抵自国历新年起至废历新年间的一段光阴，往往会在惶惑、松弛、期望里白白的过去；这是由历日二元制给与一般人的精神上的打击。

其次，说到商行为的结束账目，若立意要改，亦何尝改不过来，岂不是每月结账的制度，一般也在那里施行遵守，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么？

总之，历日、划期、记数等等，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约定，是对于时间、空间，以及无限等抽象对象加以限制的一种方法。但历日既久，人为之法，反来支配着人，亦犹之乎人造的货币反能支配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但从根本上一想，则克服这一种习性，本是很容易的事情。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军阀的讳言真象

这次日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因在众议院提出质问，问政府以对付中日战争的具体计划；即如何处理事变？对于日本这一次的空前大牺牲，将如何取得补偿与善后？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内容，究是什么等，为军阀们所不满，举国骚然，分成赞助军阀与反对军阀的两派，互相水火，结果如何，虽无从预断，然而我们从这里，却可以看出以下的诸点。

一，日军阀的野心，大者在侵吞整个中国，小者在掳掠中国的子女玉帛，饱一己之私囊，进个人之爵位，这才是日军阀财阀们的具体目的与计划。若经人一问，自然难以直说出来，恼羞成怒，指鹿为马，原系日军阀之惯技；二二六事件，不妨重演，芦沟桥发端，也不妨轻启，而要他们具体答复，说出真情，则是万万做不到的。

二，这次敌军阀的发动侵略，实系不度德，不量力之行为。其牺牲之大，人民之苦，远超出于日本任何时代之任何对内对外战争。军阀们只想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蒙蔽人民，假造出种种

胜利的虚伪报道（对内），与皇道仁政、新秩序等好听名词（对外）。但一经揭破，则真相毕露，温犀有灵，诸怪自然无色；其必拚死命，而来一次反动，自是当然。

三，则证明敌国上下，厌战心理的高涨，对军阀们的一意孤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四，足见敌阁的速制傀儡中央，也决不是一条出路；这在我固早已见及，即在敌国的为政者中，亦已大家知道是弱点了。

因斋藤的一问，与军阀的一怒，我们便可以看出上列的四点，大约敌国在今后，象这一种的言论，也将迭出不穷，我们且看军阀们再有什么方法来掩饰他们的野心与失败吧！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粤桂的胜利

继着长沙外围的大捷之后，其次是粤南的大捷；这次桂南之役，虽说还没有结束，但是前半段争夺战中，我们已毙敌两万，克服宾阳武鸣，南下势如破竹，包围了南宁，预料敌在南宁，必将增军死守，我们的战略，是等他援兵聚集之后，先断他的后路，然后再以瓮中饿鳖之计，等他们瘦毙在南宁。

交战二年零七月有奇的日子中，我们的连捷音讯，在近半年中，尤其是纷至沓来。这一个现象，究竟是好是坏，我也可以不必说；而且，在数百万人对垒的局势下，扫毙几万敌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象这一种战势，所给予敌人的全线精神上的打击，可不是笔墨所能形容，数字得以算出的。

敌人的虚伪宣传，是陆军的百战百胜，海军的世界无敌，而这一次，可竟被没有枪械，没有战斗能力的我中国老弱之兵所迭败，看他们在前线作战的士兵，以后会起怎么样的感想？

统制新闻，压迫言论的手段，在敌国虽则周到得无以复加，但是残存回去的伤病兵会说话，装载回国去的尸灰木匣会说话，

第三国的通信机关、言论机关会说话，交战以后激增的寡妇数目会说话，象这样的皇军的战绩与荣誉，终有一日会在敌国的民众之间大白的；已经是因种种苛征暴敛，限制榨取，而苦得无以为生的敌国民众，难道真会得同绵羊一样，永远任军阀们去吞骨衣皮，尽情宰割的么？

我们的希望，并不在将敌军的主力，一举而消灭，也不在旦夕之间，就可以把各处名城同时来克复，我们就只想象这样的一扫两万人，再扫数千人地对敌国的民众，加以一种警告。杀日本民众的，并不是支那的为保卫乡土而战的英勇军队，却是在他们自己身边的几个军阀。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在浙闽的攻势

近几天来，为桂南的大捷的激刺，我们对于敌寇向浙闽的进攻，似乎少注了一点意。

这次乘大雪满江之际，敌寇偷渡钱塘江，竟占领了萧山县城；同时敌海军又迭攻宁波镇海，企图登陆，用的仍旧是两面包抄的战略。可是，我驻镇海守军，早已有备，故而终将敌寇打退。渡过钱塘江的敌兵千余，亦已被我包围，在歼灭中。

这次敌人在浙闽的冒险，显然是绥远失败，粤桂失败后的一种掩饰作用，其目的是在进占宁沿海区以后，又可以大大地向敌国内民众，及沪上外人作一次胜利宣传的企图，而且奉化一带，又是我领袖的故里，敌在西南西北无计可施之下，进占一不关大局的沿海小地区以自慰，也是穷余的一计。

所以，敌此次的进扰浙闽，其企图原不在分散我军的主力，以救粤桂之危，更不在预备大规模地攻袭浙赣路延线，要华中再起一场激战。要之，不外乎想多占领些可以供作宣传用的城市，以掩饰半年来屡战屡败的羞辱而已。

我们在浙闽的防务，纵不能说是充实，但是敌要想长驱直入，不费几师团兵力，而占领我金华、宁绍、泉漳，却万不可能（我在刘建绪将军麾下布防的军队，约有十万）。

我军若能在浙东的山水之区（自绍兴向西南，就系山区和水流很多的区域了），要予敌以一次象在桂南似的打击，则敌军东南的全线，必将象冰山似的骤行崩溃，我们且静候着这一方面的捷讯罢！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永久的和平

二月廿二日巴黎发的路透电报，曾报有司蒂芬·金·霍尔司令的一段演词，大意是说这次大战结束以后，当由英法两国民各自警惕，组织维持和平的联合委会，勿仅仅以己国之利益，或和平时期的安易常态生活为满足。英法国民，要同时是法国国民，也同时是英国国民才对。又说，世界上的国家，要同时并进于一个文化之域后，战争才能避免，否则就不能够免除每一代的一次大战。

金·霍尔司令的这一篇演词，原只是在现在的状态下，向英法国民说的话。我们只教读西洋历史，不是健忘的话，应该想到在百余年前，当英法争霸时代的欧洲，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总而言之，第一，个人的野心，是挑起大战的直接主因，这是最简单明了的事情，如日本的军阀们，德国的希特勒等，这些人当然是死有余辜。

而第二呢，则分配不匀，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也就是酿成第二次战争的要因。譬如一九一八年的战争结束后，凡尔赛和约，

就不见得公平，在密约里已被判定作瓜分材料的土耳其，就最早起来推翻这和约了。恶魔希特勒的横行，还只是在日本强夺了满洲，墨索里尼霸占了亚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

所以若要奠定永久和平的基础，也并不难，只教和约能定得和平，而定了公约之后，各能够坚守就对。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存牺牲他国，以博取己国的和平利益之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惯玩这一手把戏的国家，最后终也不能够免于牺牲，是自然的因果律。

在这一次大战之后，我们当然希望在全世界，有一个比较长久的和平时期，但这一个比较长久的和平的造成，却必须在于这次大战的战得彻底，与这次战后和约的大公至正，与坚强有效的两点。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错综的欧局

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到了欧洲，引起的反响，自然是甲国与乙国不同。这事，我们在本栏里已经说过，大约将来的结果，总也不过如我们所料的那样。这是目下欧局的一根纬线。

希特勒发表演说，同时拉拢意苏日作他的同党，色厉内荏，情见于辞。说包围封锁，已有漏洞。漏洞云者，小孔之谓也。素喜夸大口的希特勒，不意也竟发此小言；以欺德国民众则有余，以蒙天下人的耳目则不足，故作危言，预备讨价还价，亦是应有之事；同时来和张伯伦的演词一比，显见得一方面是君子，一方面是恶棍了，或者换一句话说，一方面是富有之家的千金之子，一方面却是穷极无赖的跳梁暴徒。

我们对于欧洲的和平，虽始终还在怀疑，但对于这次大战的将行扩大，却终不敢相信。

近东的风云，苏土的紧张局势，在六七日前，已似乎是酿成了矢在弦上的样子，可是我们终究不相信土耳其会在这一个时候，向任何国开起火来。至于苏联，则更不必急急于在这一个时

候，以武力来占领黑海的锁钥，打通薄斯薄拉斯海峡，而闯入地中海东北岸来和那些海霸们以兵戎相见。此事，我们可以断定决不会发生，要紧的倒还须看黑衣首相，和韦尔斯相谈之后的计议如何而后定。

希特勒要巴尔干为他的生存空间，则墨索里尼，也不肯轻轻地答应，要联合起来攻苏联么？意大利还没有作此牺牲的准备。

芬兰问题，大约会在不久的将来解决，说因芬兰之故，而致涉及欧洲更大的混战，我们也不敢相信。

总而言之，欧战的局面，在目下似乎是很错综复杂，且也大有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样子，但是平心静气地来分析一下，则绝大的转变，也决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我们且静看那位美国上宾于周游欧洲之后的反应罢！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从苏芬停战说到远东

苏芬停战之后，东西的政论家就有许多预测将来变局的言论发表。我们自然不相信苏联会更进一步地向罗马尼亚或土耳其进攻；我们以为继续拉把洛条约精神的苏德互不侵犯约定，界限仅止于互不侵犯，或小有接济而已，此后的苏联，一定又是来一个五年的和平计划无疑。

至于苏日的对抗，中苏的友谊，我们自然只希望能比现在更有进步，可是事实上能得到怎么样的收获，则一时亦很难说。影响于我国抗建的将来最大的，倒是在美国副卿回国以后的罗斯福总统的决心，和英法对德的战意的两点。

假使英法而有和意，假使德意而有可以商谈的具体条件提出，则半年之后，欧洲的和平，就可以一时出现。报载德将在西线作总攻的准备云云一类的消息，我敢断定是希特勒的假装法术。试问德在西线进攻，有胜利的把握么？即使西线有了尺寸的进展，可以保得住在波兰捷克，甚至于在德本土，不会有大事变发生么？况此外德国还须留意到巴尔干及中欧哩！

我们前回，已经说过，芬兰问题，不久就可以解决，而欧洲的战局，将在韦尔斯返美之后，或许有一个转变。这事情就在两月之后，可以验其应否了。

可是欧战即使告一段落之后，中日问题，也必不能同时解决，是铁定的事实。我们的抗战，要抗到底，不自今日始喊出来的口号，而敌阀也先已装上了傀儡，动员了全国物资，缩短了战线，在作持久的准备了。

在这两方相对峙的局面之下，一面原要看我们的抗建工作做得彻底与否，来定最后胜利的迟早，可是另一方面，则欧美与苏联的助力，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英工党议员克利蒲爵士，曾在上海接见记者时说："中国必获最后胜利，英国只等在欧战转变之时，对日必更有动作。"而美国的金元借款，却早已公布成事实了。在这一情势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日的对峙，究是于谁有利的。

汪逆的登台，敌寇的分头乱窜，对大局绝没有半点的关系。或者当傀儡政府成立的前后，敌寇在沿海各地（当然是在闽浙两省），有一点骚扰，也未可知。但这些沿海小地的一二处的得失，终是只能作为敌阀遮羞，为傀儡捧场的点缀，实际上的得不偿失，却与敌的占领我内地的点线，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的中日战争，就无异于龟兔的赛跑，我们只有从努力持久的一法，来争取最后的决胜。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土罗的问题

苏芬停战以后，举世的视线，已转向到了巴尔干，最成问题的，是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两国。土耳其因经济（输出入）关系，与德比较接近，虽有英土法土协约在前，而事实上英法所保障者，为欧洲各国若向土侵略时之行动，苏联倘向土耳其有所作为，则英法未必能引协约而与以援助。所以，一般的猜测，以为苏联既对芬兰可以用兵，则对土耳其亦可以提出准许苏联黑海舰队得自由进出达达内儿海峡等要求。况且，自新土耳其成立，举国厉行近代化、工业化之后，苏联对土耳其的物质上、技术上的帮助，亦很可观，苏土的友谊，本来也是十分亲善的。这一层，当然会使英法不得不起疑虑，而加以预防。

其次，则罗马尼亚之倍萨拉媲亚，苏联始终认为不属于罗国之失地。若仿苏德瓜分波兰之成例，来瓜分罗马尼亚，事实亦很可能，所以一般观察者，总以为继波兰、芬兰之后，而将被苏德牺牲者，当为罗马尼亚。

这巴尔干两国，对苏德之关系，原属可虑，然我们却敢断定，

在目下，苏德决无余力，来向巴尔干用兵。一般猜测，都系杞忧。理由是很简单。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国内团结一致，伊势抹脱·伊内奴之毅力与决心，断不比已故之凯末尔为较弱；苏联当然对此点也看得很清，与对芬兰之态度，决不至于一样，此其一。

再则，巴尔干各中立小国之联盟，土耳其对伊朗、阿富汗等国在宗教上之联系，亦足以威胁苏德而有余；英法的后盾，更无论矣。

至于罗马尼亚问题，虽较土耳其为危险，因德对罗之物质供给（尤其是汽油），视为生存必须品之一；然而苏联与意大利两国，对德亦岂能任其所为？吾人但以此次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之会谈，及罗王赦免国内纳粹系之铁卫团两事来遽下判断，未免对国际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所以，对罗马尼亚的将来，说它会变成亲德结苏，以勉求已身之不被瓜分则可；若说德苏意三国连成一气，马上会向罗马尼亚下屠刀，则事属必不可能。这其间，尚须看英法的外交与实力，以及美意两国的意向如何，方能定局。

在这里，因赦免铁卫团事，而顺便不得不提一提的，却是罗马尼亚王加罗尔二世的家事。原来加罗尔二世，因恋一犹太妇人来泊斯扣之故，一时曾被迫出国，而让王位于其幼子。一九三〇年，因其弟尼哥拉斯与曼牛等之助，始能复国。亲王尼哥拉斯，原系纳粹系铁卫团首领之一，于一九三八年被放逐出国者。此次罗王赦免铁卫团，当与尼哥拉斯有关的无疑。特附记这一段经过于此，或亦可作将来罗马尼亚国内政起伏的参考。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

三二九纪念日，谁也知道是为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于民国纪元前二年在广州起义殉国之故而设定的。自民国成立以来，年年此日全国各地的举行纪念，都非常盛大，尤其以广州未沦陷以前的这一日的景况为最盛。

笔者曾在广州躬逢过这盛大的纪念日两次。每年到这一日，不论晴雨，广州北郊，自北门小北门起至黄花岗的数公里路上，几乎全为热烈纪念烈士的群众们所填塞。车水马龙的四字，不足以形容出这群众热烈参加纪念行列的景象。

途中的沙河镇上，在这一日销售的沙河粉的数量，据说要占全年的销售额三分之一。

但是，这一个创造民国的烈士的埋骨之区，现在是已为敌占了。我们当向空遥祭，血泪交流地在默念的几分钟内，切齿痛恨的情绪，又岂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痛恨之中，尤觉得切齿的，是号称这些烈士的同胞之中，竟有一个生长在烈士们埋骨之乡的汪逆，也正在乘这一个时机，上

伪京去组成了出卖党国，出卖民族子孙的伪府。

为纪念先烈之故，我们更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加强抗战的决心，出钱出力，为建国的后盾，固无容更说。但今年的这一纪念日内，我们觉得还更不得不多增加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要尽我们的全力及粉碎汪逆的破坏我们抗建的阴谋。诚然，南京的傀儡戏，无论在国际友邦的眼里，或在我国同胞的心目中，是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虫鼠狗彘的行为。可是敌人的必欲制造这一伪府，想用以来作剥削我民众，欺骗我同胞，分散我们力量的爪牙之计，却是亡我国灭我族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假使此阴谋，而有一分半分的成功，则沦陷区的收复，敌人的经济产业的崩溃，以及兵种的枯竭等绝症，至少至少必有一二年的残喘，可以苟延下去。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最后胜利，必要迟一二年，方能到来。我们的抗战最后胜利，是固定的事实，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所争的就是时日迟早的问题。

所以，当今年这一个七十二烈士的纪念节日，我们于国民公约中所指的种种应尽的职责之外，更不得不加重一层粉碎伪中央阴谋的责任，理由就在这里。

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了。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人在这一个临终的生死之际，必更有一次回光的返照，加紧的进攻无疑。象南京伪府的组成，还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毒例，我们的抗建精神，在这里自然也就不得不更加振奋了。但愿我们都能不污辱七十二烈士之灵而努力迈进！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

南京傀儡登台以后，于我的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于敌的速制和平，希图自拔的阴谋诡计，完全没有什么影响一事，我们已经再三说过。而敌阀及敌国议员之中，也有早见及此，自己在说傀儡们并不能发生多大作用的话。至于国际间呢，除不为内阁及议院所公认的英驻敌国大使，有模棱两可的声言以外，如美国、法国等，都曾正式有过声明，不承认这以武力制造，破坏公约的伪府。

既然是这样不中用的一群丑类，那么，敌军阀为什么偏要出四千万元的代价，买他们登台呢？这当然是有理由的。

第一，那四千万元收买金，本来是我国的关余积存之款，是敌军阀们群思染指，而各不敢一个人私吞的巴里的苹果。所以，借此机会来投一下机，做一次大家可以分赃的买卖，岂不一举而两得？何以见得这一举是敌阀的投机呢？

大家且看罢！今后的傀儡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欺骗中国民众，向民众搜刮，而去分别报效日军阀的私囊，这是一定的事

实。私的报效了之后，还要对公的加以献金。所以有人在说，只恐怕傀儡们的政治弄得好好，我们沦陷区的民众为他们骗去，那就正中了敌阀以华制华的毒计。可是，对此一杞忧，我敢担保，傀儡们的贪污剥削与无理，将远在中国任何一期的最恶政府之上；要望傀儡们有澄清的政治，是万万不可能的。

第二，敌国国内经济崩溃，产业界破产，兵源断绝，因恶性通货膨胀，乱发赤字公债，无理增税之故，人民生活陷于极度不安，且食粮不足，频年荒旱，是我们大家周知的实情。所以，今后敌人的侵略，是不能再以兵力而来大举入寇了；到此山穷水尽之际，自然只能利用傀儡们而以政治来进攻。我们首领所说的，傀儡上台，是敌人最后的一着棋子，实系千真万确的名言。

我们且看罢，敌人利用傀儡的政治进攻，将自闽浙两省开始，渐而深入于两广苏鲁；其程序将不外乎是先行挑拨离间，利用游说收买政策（即所谓以利诱），此而不灵，然后将联合敌伪攻略些不关大局的小地（即所谓以威胁）。这就是傀儡们在今年之内所预定的计划。

最后，我可以断定，傀儡们的命运，至多不过两年。因为在这一两年之内，首先群丑将因争骨而起内讧，其次则敌阀将也因看穿了傀儡们的无用而不予以支持；若再加以我们的加紧反攻，与国际间的对敌压迫，则两年之内，寇军自身且将不保，又何以能顾及卵翼下的傀儡？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欧战扩大与中国

欧战发动了七八个月，弦上之矢，终因英法的加紧封锁，而使纳粹疯徒不得不下最后的一次孤注。德舰向丹麦、挪威进攻，挪威发炮还击，一面将首都迁至哈玛，是欧战第二期真刀真枪相见的序幕。

野蛮的日耳曼人不守公法，不尊重中立法规，事不自今日始的。第一次欧洲大战时，就曾放过毒气，用过达姆弹，侵入过比利时。这一次战事发生后，中立国的船只惨被击沉的，已经不止一次两次。德国这种野蛮的行为，若要寻对偶，只有日本的军阀们了。日阀们的追击英国驻华大使，炮击巴纳号，就是可以与德国媲美的行动。

这次德国的向北欧进攻，取的当然也是先下手为强，速战速决的战略。可是北欧各国，比不得波兰，德国的多树敌人，分散战线，当然是自取灭亡的下策。它的用意，当然是在威胁中立各国，使不附英法而为已用，如巴尔干的各小邦，就是它示威的对象；但是这一种野蛮行动的结果，恐怕终于不会逃出世界正义的

最后裁判。这一次德国的失败，无疑地将与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蹂躏了比利时的中立的结果一样。

德国的这一种狗急跳墙的疯狂行为，当然是与东方的侵略国敌寇是有事先的默契的。敌寇海军的结集厦门一带，其目的当然不仅在向美国的海军演习作反示威而已；它的目的，同时是在向英法示威，而使英法的封锁网，终不能完成。

德国若可以有这最后孤注一掷之举，则敌寇何尝也不可以于南京傀儡登台的这前后，再来一次最后的大举进攻。我们已经屡次说过的，敌寇或将向闽浙两广，加强攻略，因以遮掩绥西桂南大败之羞，而间接亦可以壮一壮傀儡政府之胆。这预测恐怕会在不久之后而适中，我们且看阿部到南京部署定后的行动罢！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为己与为人

英大儒培根说，为学是有三种作用：一，是为一己私自的快乐；二，是为了对人作装饰，如有辩才之类；三，是为了修得能力，可以应世处理事务。

而孔子之说为学，只分作为己与为人的两类；照孔子之意，为己是为了自己的德业，不必广求人知（人不知，而不愠）的意思。为人则是专务表面夸耀的事情了，这是不对的。

古人都把夸耀他人，徒务虚名的事情，看作不是为学的本意。英国斯宾塞论教育，亦以一般人有将教育、教养，当作装饰品看的天性，以为是野性的遗留。譬如对土人，赠以食物（系人生必须品），远不如赠以贝壳珠钻等装饰品来得喜欢，就是人性喜浮夸之一端。

但我们的解释，则为人两字，应从好的意义方面来解说；就是说，我们求学问，一面原是为了想增进自己的德业，一面原也是为想服务于社会人类。孔子也曾说过，“学而优则仕”，仕是为社会国家，当无疑义。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也”，爱人是爱及于人，易使是易为人用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为学目的，当然第一是在修己，同时第二也是在为人服役；不过此地所说的为人，并非如孔子所讥讽的只图夸耀于人，求知于人的那种虚浮浅薄的欲望而已，是实实在在为国家社会人类服役的意思。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教育》

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

敌人利用汉奸，成立傀儡政府，想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恶毒计划；因知道了用兵力来征服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敌阀最近就趋向了用政治进攻的手段。最近，看敌国的各大杂志，及各大政治家所著的言论，综合起来，大约他们的目标有二。

一，是利用傀儡政府，来和我们的中央政府，争取民众。他们把民众，分成三种。即一，是甘心附逆的汉奸们；二，是对于国家民族，认识不甚精确，或苦于久战，不能解决生活的中间层分子；三，是抱抗日到底决心的真正中华民国的国民。对这三种民众，第一种和第三种，是不成问题，都无可挽回的；所以他们现在在竭力争取的．就是第二种的游移分子。

二、是通过傀儡政府，不惜用任何手腕，来破坏我们的法币信用。敌阀们也知道，联银券和华兴券是不够和法币在沦陷处竞争的；所以现在就想用更毒辣的手腕，更雄厚的力量，来制造出一种可以与法币对抗的货币券出来，以达到使法币失效，而民众

不得不对我中央发生怀疑的目的。

这两个政治进攻的目标，第一个当然是会失败；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游移分子，只教稍有血性的同胞，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倾向到敌人一方面去的。而那些志趋不足，操守毫无的人呢，早已走上了出卖国家民族的道路了，今后改向的人，恐怕不会得再有多少。

至于破坏法币的经济阴谋呢？却多少是要我们想法对抗一下的；不过征之于过去三年的敌人的政策，则我们的壁垒，也异常的坚强。即使没有英美的援助，我们的法币，也并不是轻易能被摧毁的；这只须一看沦陷区民众，尚且对法币有极端信仰的一点上来一看，就可以知道。

况且，对此毒计，我中央也早已有备，到了敌寇精疲力竭的现在，来重兴这一经济战争，其势早已成了强弩之末，决不能同在两年前一样的足以威胁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抗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此后正有一个比在军事上还要紧张的时期；但这一时期我们的能安然度过，是毫无疑问的，过此而后，便是最后胜利到来的日子了。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文　人”

三月二十日，立委王昆仑氏，在重庆宴苏联作家及中国作家的席上，有人提议，联合起来，写一封信来给我的消息，早在香港报上见过。本坡的《星中报》，亦将此消息转载。诗是四句：“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施谊当然是孙师毅的另一写法。此外列席者，是苏联的作家费德连克（他也用了中国笔，写了“都问你好”的四字），及米克拉舍夫斯基（他写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两句孙子兵法）。这两位苏联作家竟能用中国的毛笔，写出这样的字（虽然是象初学会写字的小孩般的笔法）来，倒也真真难得。当日的列席者，还有一时传说已被敌人谋害的陈波儿、方殷、戈宝权、葛一虹、阳翰笙诸君。

沫若在诗下，还写有几行短信：

>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

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终于到了现在，也被证实是事实了。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时穷节乃见，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不能见松柏之坚贞，自是确语。所以，耳未听见过炮声，足未踏入过战地的许多文化人，只站在后方的后方，高喊着前进，或用尽心机，想打倒几个在同一区域中作同事的同人来献身手的，亦当以这些先例为前车之戒。能做一点实际工作，当远胜于专向同事作人身攻击等事，为益多多。

鲁迅也曾说过，既然是人，自然也要性交，若只拿住性交的一点，来攻击个人，则孔夫子有伯鱼，即使是圣到无以复加的圣人，恐怕日常生活，也是和我们这些庸人，相差无几的。

“文人无行”，是中国惯说的一句口头语；但我们应当晓得，无行的就不是文人，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近则如洪承畴；远则如长乐老，他们何尝是文人，他们都不过是学过写字，读过书的政客罢了。至如远处在离敌人数千里外的异域，只以为月薪比自己多一点，生活比自己宽裕一点的同事，就是阻遏自己加薪前进的障碍，是敌寇，是汉奸，是一手压住世界革命的魔鬼，象这样的文人，当然更不是文人了。因为这些人们，敌寇不来则已；敌寇若一到门，则首先去跪接称臣，高呼万岁的，也就是他们了。对这些而也称作文人，岂不是辱没了文文山的正气，辱没了谢皋羽的西台？

因听到了故人而竟做了奸逆的丑事，所以一肚皮牢骚，无从发泄，即以我个人的境遇来说，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他们也都未曾在副刊上做过慷慨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击过什么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精神上的指导者。

我们的抗战，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这中间，自然更有许多花样出来，可以给我们叹赏，或给我们唾骂。我们只要抱住一点贞心，使用我们的双眼，静静地看，实在地干，到了最后胜利之日，便可以分辨出，究竟是谁强谁弱，谁真谁伪来了；现在所说的一切空话，究竟还都是无凭的呓语。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侵略者的剿灭文化

在最近伦敦《泰晤士报》的文艺附刊上，看见有下列的两个消息：

一，三月九日文艺周刊消息栏：美国自由文化协会，曾以一千镑赏金，给奖在德国境外各流亡作家所著之德国文学书中去年最佳之作品。这奖金，为居住曼彻斯泰之德流亡作家亚诺儿特·盘代氏所得。审查委员会系在汤麦斯·曼主持之下所审定；委员中有里翁·福希脱房轧氏、勃罗诺·弗兰克氏、亚儿弗来特·诺衣曼氏及罗道儿夫·奥儿藤氏等，都系被纳粹逐走之德著名作家。盘代氏得奖之小说，为以瑞典作背景之政治小说，系氏之第一部作品。盘代氏旅居英国六年，当希特勒未当权之先，系德国西部一民主主义日报之投稿者。该得奖小说之出版处，在欧美两地，正在进行谈商中。

二，三月十六日文艺周刊消息栏：据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长亚赛·罕美儿博士所谈，现有数万千之中国古版书籍及未印之手写稿等，大量在向美国输入。其中有不少为数世纪来所罕见及未被

发现之珍本。此等书籍，大部系从东四省及中国西北部售出，因收藏者恐被日寇掠去，而使文化种子绝灭，故咸愿以低价售给能负责保藏之美国图书馆内；因一经美国保存，此项珍品，将来始有公开供给研究或再作影印之希望。

读了这两项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出黩武穷兵的军阀，是如何的一种动物。而东西一例，侵略国家会同时同样的作剿灭文化的刽子手，也是一件奇事。

但是，文化是不会被暴虐者灭尽的，同人类的不会尽被侵略者虐杀净尽是一个样子。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之后，也还有伏生的口授经籍，孔壁的埋藏孤本，结果，独裁者终传不上二世，而中国文化却已传下来到现在有了五千年的光荣历史。

侵略者，譬如是野火，被侵略的文化譬如是长江大河的流水，水流决不会绝塞，被火烧得沸了，反会得跃出流程，来消灭火种。

这一譬喻，可以用之于文化，也可以用之于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战争，史绩俱在，这是决不会错的定理。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我们的国策，自抗战开始之日起，就已经决定了的；不，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在未抗战以前，就决定了的。抗战的最大目的，当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为达成这目的之故，首先必须将侵略我的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要想打倒侵略我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对内，只有集中意志力量，精诚团结，使无一点间隙可乘；对外，只有联合凡能助我的国家，或精神上、物质上对我表示同情，于我有利的无论那一友邦，共同奋斗。

至于我们的策略呢，是长期持久，空室清野，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中途决不言和，绝无妥协，违反者就是汉奸。

凡以上所说各点，是谁也知道的抗战常识，本来是并不须要再提的。但是直到最近，我们无论在祖国与在星洲，都听到了一种国共磨擦的宣传，甚至还有人在提倡，说制造磨擦，有时候，也属必要，所以现在先从团结问题说起。

我们是为了抗战，所以才开始团结这一事实，是谁也明白的；而且只有团结了之后，才有力量抗战这一常识，也是谁都知道的。抗战军兴之后，不但国共携手，枪口一致朝向了外，就是从前与中央不一致的中国青年党、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党等，也都精诚团结起来了，我们抗战中国的统一与团结，到了苦战将近三周年的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第二句话好说呢？

要知道国共磨擦这一口号，原是敌人制造出来的；你们且试去看一看敌人发行的倭字新闻纸，及在敌人势力下的中文伪机关报就可以知道；他们没有一天，不在大吹大擂，宣传国共的行将分裂，重庆中央统一的势将不保。我们自己，若也来受了他们的宣传，而附和其说，岂也不就成了与敌人为伍的奸人？

并且，即使国共之间，有了些须磨擦，但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来说话，我们总只希望这磨擦会减少，会消灭，以收精诚团结的实效。决不应该来过事宣传，或夸大其辞，或鼓励怂恿，使这磨擦日见扩大起来的。制造磨擦，有时候亦属必要等论调，当然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忍说的话。

其次再说联络友邦，共同奋斗的这一方面。敌人在反英，敌人卵翼下的伪组织在反映，是天天在报上都可以看见的事实。在抗战建国的现阶段，我们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也应该反英么？

英法和德的战争，不管它的性质如何，我们难道一定要希望敌人的同盟国胜利的么？法西斯独裁国，敌人的同盟国胜利了之后，于我们还是有利的呢？还是有害的？

我们应不应该先置祖国抗战于不顾，就跑到德国去投军，而

帮德国打倒了英法再说话？

英国驻重庆的大使夫人，在放映电影，募款而援助我国的难童，我们对此还是要予以赞助的呢？还是要予以破坏？

我们应该知道，援助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援助我们自己。为援助我们自己之故，我们才有时需要援助他人。反过来说，帮打敌人的敌人，岂不就成了打击我们自己？

革命者应该看准现势，善用策略，不应该株守了陈腐的或幼稚的理论，来指导动作。革命的目的，是在成功，不是在白白的牺牲，而造成几个英雄。这些是在抗战的现阶段，我们所应有的信念。

再其次，要讲到祖国实际的抗战形势了。我们的战略，在持久，在消耗敌人的兵种与资源。我们的反攻，不必要一定占领几个城池，只求消耗敌人的兵力财力，而搅乱它的后方，断绝它的交通。所以，围攻一地，并不必要速战速决，这是一点。

我们的反攻，是对敌人进行的抵抗，我们的目的，是在设法使敌人消失进攻的能力之后，才一举而收到胜利，这又是另一点。

最后，是敌人的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的对抗。争夺民众，敌人与汉奸决不如我之确有把握。敌人破坏我法币的工作，无论它做得如何起劲，目的终于也不能达到。我们的法币外汇跌价，自是一种经济战略；以后也许还要再跌，跌至两便士的程度；但法币的信用，仍是可以维持的。我们将自动使法币对外汇跌价，跌至敌人所收买的法币，不能发生多大效用的程度。目下，敌人所发行的华北联银券五万万元，及上海华兴券五百万元，在名义上虽则是和日元联系，对外汇率应与日元一样，但在事实上，则非要换成中国法币后，才能购买中国的外汇，就是我们要使法

币对外汇率跌下去的一个原因。敌人与伪逆等，看到了前此这破坏法币的工作失败之后，现在正在计划发行一种不与日元联系，以关余作准备金的伪中央币出来，以抵抗法币；但无论这计划的能否实现，我中央却早已事先准备，定下了抵制的方法了，军政经各部联合起来的封锁委员会的设制，不过是这经济抗战的一个开端，今后的在沦陷处内外的物产集散，货币进出，以及购买外汇的再统制等，大约不日将有中央制定的整个计划发表，在这里可以不必说了。

（此稿系在数日前写就，后来接外来稿件，如洪令禹先生、欧阳健先生等的论文，论旨大抵相同，故将此稿搁起。现在欧西战事，又变一局面，大约纳粹疯狂，已到了最后关头，势将在荷比受到很大的打击，因而欧战结束期，恐将不出今年年底。欧战结束，则我国抗战形势，自当一变，大抵情形，当在两三月内可以见到，现在暂且不提。）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华中大捷与色当战役

这一次敌以七个师团的大军，分三路向我襄樊进扑，三路败绩，死伤在五万以上，演成我军自台儿庄、昆仑关以来之再度大捷。捷报飞到上海，致我国币骤涨，敌币外汇暗市大跌，敌方证券，更惨跌至不可收拾。但这华中大捷的消息，在马来亚，因正与纳粹狂侵荷比卢中立消息同时传来，故反应还不见得十分狂烈；而在中国各地，却已都在庆祝欢呼，计日围攻武汉三镇了。

当然，这次的大捷，我们承认还不是最后的决战。不过从人心的奋发，与给与敌人军民的动摇打击一点上来说，则这一次鄂北豫南之役，确是使敌人全线总崩溃的一个前奏。

今后我们若能在两广及晋北等地，再来象这样的几次歼灭捷战，则敌人的反战潮，与国内的不平分子，就将一齐起来，打倒敌阀无疑。这事也许在今年年内可以出现；也许要到明年春夏之交，才会发动。总之，敌人的兵力，已到再衰三竭的边际，此后将丧失尽大举进行的能力了。我们的最后胜利，自然因此一捷，而又接近了一步。

从东亚来看欧洲，德国或可以攻进法国，而至巴黎的近郊，但两方的决战，恐怕将仍在莱姆斯与圣昆丁之间。德军若不败则已，若一有败象，则如冰山立倒，将至一蹶不能复振。所以，我们以为欧战结束，或可以不出今年年内。

英法是决不会完全溃败的。即使是意大利参加入了战争，但在西线及法国境内，联军总能转败为胜，打击德国。

我们预料欧战结束，会比中日战事结束得早，就因为德国在今后，决不能再维持到一年以上。

至于荷印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已在替荷印拉住敌寇的泥足了。就是没有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苏联远东军及远东舰队的威胁，敌寇已经到了精疲力竭，动弹不得的境地。

况且敌寇胆怯如兔，决没有纳粹狂徒等的魄力，要它同时与一国以上的国家交锋，就在平时，尚且不敢，何况更在中国消耗了实力百分之六十的现在。

所以，我们认为意大利的参战与否，与欧战大局的关系还不大；不过因意大利的一动，而使美国与苏联也同时撑起腰来，那时的世界大局，才有一个大大的变动。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意大利参战与敌国

欧战已转入第二阶段，德军与英法军在巴黎外围将行决战的前夕，最大的问题，自然是意大利参战的时日问题。假使巴黎外围战而旷日持久，于德不利的话，则意大利的参战，自然可以给与将崩溃的纳粹德国以许多威势，而法国有受夹击的可能。假使意大利的参战，而目的只在地中海，非洲的法属各地，以及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则法本国的战局影响还少一点，但军心也不免要动摇一下。

但笔者仍始终抱有英法联军必胜的信念，即使意大利在今明宣布参战，英法军必将背城借一，更加奋发起来，哀兵制胜，是兵家的定论。所以我们对于欧局，总仍旧抱着乐观的态度。

现在我们所应顾虑到的，倒并不是在欧局。第一，我们且首先须想一想，意大利若参战之后，我们敌国将取怎么样的一种态度？

敌经济使节团在罗马，和墨索里尼会不会签订密约？敌兵的集中华南，军舰的齐集海南岛，用意究竟是在那里？

敌人的不敢向荷印、马来亚进攻，是一般人都想得到的事实；那么在南洋各地，最轻而易举，能供敌人侵略的地方，是在那里？

进可以夹击我云南广西，退可以作为南进的根据要港，既不必苦战恶斗，又不至挑起美国、苏联的恶感的一块敌人所垂涎的肥肉，不是法属的安南，又是什么？我白崇禧将军已经说过了。

所以，在这一个欧洲大战，将行决定胜负的重要关头，我们料到意大利必至投机而起，而跟踪意大利投机之后，将起来发一下趁火打击的小财的，当然是日本向越南的进攻。

敌人既有胆量向越南动手，则在中国的英法租界，及香港广州湾等，自然也有问题。这些在目下虽然还是一种臆测，但万一不幸而言中，则中国的处境，自然又要加一重困难，因为海口的被封锁，将因此而更被严密监视的原故。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今后的世界战局

纳粹的闪电法宝，打到了巴黎、里昂，总算是最后的一道金光，今后的世界战局，当然是又另外成一局面。

一，纳粹能不能飞渡英法海峡，打到英本国去？是一问题。我们对这问题的解答，当然是只一“否”字。

二，英国会不会动摇她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问题，我们当然相信英首相的演词，英国为维持她的独立、自由、与生存，是非抗战到底不可的。而足以使英国抗战，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是在美国的能否就行参加战争。

三，美国假加参战，当然局面会得大变。美国不必送陆军到欧洲大陆去，只教她能正式宣布参加在英法的一方，则法国的单独讲和，就不能如德意所预计般的那么完满；而英国这边，无论在空中，在海上，以及物质、战器、经济各方面．都立即能得到很大的帮助。此外即帮凶国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也将受到绝大的打击。

四，不问美国的将正式参战与否，这一次美 内 阁 的 改组结

果，对日法西斯蒂，自然给与以当头的一棒。我们预料今后的美国，在太平洋上，先要施行其积极的政策。第一，南洋各属，会直接间接，受到美国的武装保卫。美日商务条约，决不会再继续订定，而美对日的禁运，在实际上，名义上，都将见诸实施。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关键，却是苏联与英美及巴尔干的关系。我们预料，今后苏美英必能接近，而巴尔干的火药库也不致于爆发。

土耳其现在虽则还未表明积极态度，但势必倾向于英美的一方，是已定的事实。

当然，世界局势变幻无常，在笔者草此文时，法国的议和使者，还正在奔走中呢！

不过我们相信，战争若一持久，则德意必败；若不持久，则又当别论。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最近的侵略形势

最近，因法德停战，欧局大变的结果，敌人的侵略形势，又呈现了一种四面加紧包围，务祈急求结束对我战事的窘象。

第一，敌在北方，竭尽了向苏俄屈膝的能事，结束诺蒙罕战后诸事宜，苏伪定界，渔约解决等交涉，将次第举行了。

第二，对于租界问题，在敌阀们的心目中，这时本是攫夺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但美英苏三国的渐行接近，又系使敌胆骤寒的重大威胁。倭人要想开罪任何一国，在中国战事牵制之下，是怎么也不可能的。所以敌对租界，只在虚言要挟，而终不敢诉诸武力。天津、上海等租界上的严重局势，此后将随英国抗战步骤的稳定而低潮。

第三，包围香港的四周，制止安南的海陆运输，甚且向缅甸方面，也有威胁抗议的企图，对瓯江的航运，以及宁波闽地的内外交通，都思垄断，这些全不过是敌最后挣扎，妄想早日结束战事的一种焦急状态的暴露。至于向我行都重庆的频频轰炸，更是彰明皎著的这一个野心的揭示了。

可是我们与法国不同，有的是土地资源，有的是人民兵种。我们的抗战实力，已经可以有独力支持的把握了。不信的话，就请细按一下欧战开始后，我们这一年来抗战的成绩，就可以知道。

所以，对于海口的严密封锁，在我并不是足以动摇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的决定因素。法国的不愿做亡国奴的自由人民，尚且在那里整理海外武力，想和纳粹暴徒拚命到底，敌阀的这一点点威胁，又岂能压迫我这庞大的民族，甘愿求和屈服做亡国奴么？

敌人的结集海陆空军于东京湾、海南岛、围洲岛一带，看来是对安南已有矢在弦上之势；但这也还是一种试探，使报传的英美对于保卫南洋的密约属实，则敌的进攻安南，当然还有曲折的步骤，而这一次敌阀对南进政策的初步冒险，究竟敢为与否，将成为敌国内倒阁起政变的一重大原因。

我预料敌国内的政变，将不出这一两月的时间，而侵略安南之举，必然地须同时成为激起政变与安定政变的一个锈腐铁锚。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人对安南所取的策略

敌人于法本国溃败之余，必将发动其趁火打劫之侵略行为，原早为吾人所料及；不过敌人此次所用的策略，却是不战而取的步骤，是容易为吾人所忽略的。

希特勒之并吞奥国、捷克，原是这一种策略之最成功者；到了养肥之后，则虽用英法的大军，也不能制裁他了。这是一个不远的殷鉴，而日本对安南，也正在模仿着这一个法子。

我们预料敌人今后的步骤，第一着，当然是派兵舰去控制海防、西贡，以及沿海一带；然后再制造出一种藏本事件之类的事件，而公然令陆军上陆；第三步，则要看他的还是南下，还是西进了。南下则渐渐的蚕食马来半岛，西进则图谋缅甸、印度。敌人原早已把中国和印度及南洋群岛视作囊中之物的，只看他想于何时，及用那一种方法来探取而已。

但在中国因急进而失败之后，此后的敌国，对南洋，对印度，所取的当然是渐进的蚕食政策。他的触须，近已伸到了缅甸，我们只须看他另一只小足，究将跨向南来，或跨向西去。

英法一误再误，既已受张伯伦、达拉第之累在先，照理，此次是决不应再踏慕尼克之覆辙的；可是消息传来，似乎颇有于西方绥靖失败之后，再来东方绥靖一下试试之概；这真教旁观者清的我们，不得不为英法再捏第二把冷汗。

总之，敌人的侵略安南、缅甸，从根本上说来，有关于我国军火接济的事小，有关于南洋群岛及印度的事大，美国终还是一位鞭长莫及的门罗绅士，提出几次抗议原是可以的，但并无切身之痛，所以用不着来拚命力争，不知英国的当局，对这一位模仿希特勒氏的小小胡子，究将用什么方法来对付？

原载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国目前的致命伤

敌阀与中国搏斗了三整年的现在，在敌国最成问题的，自然是人的资源和经济的资源的枯竭的两点。

人口在日本的统计，本是照大正年间的一次国势总调查后的推算而决定的，男女老幼总计起来，混说是七千万。但这一个数目，当然比实际的人口，要多算一成之儿，并且有许多北海道的土民，琉球岛的从未服过兵役的部落渔民等，也一总计算在内。而日本国民的性别，一般又是女多于男，和我们中国的男多于女恰恰成一个反比。

所以，照这一个情形来下推断，日本总人口中，除去三千七百万的女子以外，省下来的三千三百万男丁之中，再除下三分之二强的老弱与未成年的男子，其中最多最多，也不过有一千万人，可作劳动工人，耕植农夫，经商，作吏，及服兵役的壮丁等。但是据一般的统计，要送一个壮丁，去前线作战，至少至少，在后方为给养这一个壮丁之故，如送衣食与薪给，赡养出征人的家属，与供给以军需弹药之类，要有七个壮丁，为他的后

盾，才过得去。因此，在战争开始的时期，我们就估计日本全国，除驻防台湾、朝鲜与日本本土的留守军队及维持治安的警察宪兵二十万，压制伪满，及防范苏联边境的军队五十万以外，得尽量送到中国大陆上来驻防作战的有效正规军，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二百三十万人的数目。这估计，为增强我们的警觉性，和定下作战胜利的基础准备起见，自然只会估计得过高一点，决不会估计得过少，当然是不会有错误的。可是在这二百三十万的敌国正规军之中，于三年搏斗之余的现在，还能在火线上作战的壮丁，难道得有超出一百万以上的数目的可能么？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敌兵在中国战场上死亡及因伤病等而消灭战斗能力的总计，实在已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数目。

因此之故，所以敌人在中国前线便形成了点线不能联络的凋落现象，而在敌本国呢，则发生了劳工不足，产业停滞的极度恐慌。

因农村青年的出征，而致影响到食粮的不足，因产业工人之群趋至军需工厂，而致一般生产不足，直接间接影响到生活不安，物价高涨等记事，我们在敌国的新闻杂志上，天天可以看到。而在我国各地，无论在游击区与对阵区，敌人或三千或五百地零整在被我们歼灭的数目，我们只教有耐性去计算，一天一天的累积起来，一年一月，又该总计有若干的一个惊人巨数？

这是敌寇妄想征服中国，三年以来，最感到痛苦的“人的资源”枯竭的一点。

其次再说到敌国的经济，自从侵略中国的战端开始以来，到去年的会计年度终止时止，明中暗中，敌国已支出了超过三百亿的军费政费；而一九四〇年的预算，除表面上说得出来的项目，

亦已超过了百亿之外，其他如军费的临时追加，秘密造舰费的支出等等，总计起来，恐怕不会得在一百三十亿以下。

而对这庞大支出的应付，在敌国不外乎竭泽而渔的加税，滥发赤字公债，使通货恶性膨胀（滥发不兑现纸币、军用票，及变一名目的纸币如联银券、华兴券等），流用国民节约贮金等几条绝路。因为敌国是先天不足的国家，资源是一点儿也没有的。生产原料、重工业军需工业的原料，一切都须仰给于外国。兼之敌国在国际间信誉又差，自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事以来，外债是分文也没有借到的希望的。因这种种原因的结果，在敌国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物质不足，物价飞涨，和平生产工业全停（因之对外贸易亦形停顿），重工业的企业，全都因煤铁电力不足而枉费资财，半途僵毙的诸种最坏的恶现象。

其中尤其是影响到民众生活，致使全国社会一般发生不安的，是物价的高涨的一点。政府虽竭尽全力，想推行低物价政策；无如事实上，生产停顿，物资不足，所以官定低物价价格，虽则皇皇在那里公布，而产家及贩卖者，终不能好好的就范。所以经济警察，物资总动员计划等高压统治政策，尽管由你去公布施行，但是暗市的价格，却一日也不停地在三倍五倍的超过官价而飞涨上去，阿部内阁的倒溃，原因也就在这里。并且因为在华北及上海等处，滥发了与日元联系的联银券与华兴券军用票之后，这与日元理应同价的纸票，比我法币要低跌二三成；因之在伪满，在华北华中，同是一种劣货，因纸票价跌之故，卖价会涨至比敌国内更高二三倍之数。敌国的物资，自然亦因而外流，反使敌国内变成即使有了现款，也买不到物品的窘象。而这些物资，流到了华北华中，换成与日元联系的华兴联银券后，结果还是等

于塞漏洞的泥沙，对于敌国外汇，仍是毫无补益的。

敌国逢到了这两大资源枯竭的致命伤后，现在所急急乎想谋自救的一条出路，就只有赶快结束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一个最后的希望。他们的不顾人道，频频轰炸我战时新都，并将第三国的使馆、医院、学校及妇孺一齐炸毁；以及不顾国际公法，并未宣战而阻止第三国与我的交通等手忙脚乱的恫胁暴行，归根结蒂，原因就都是为此。

敌阀到了目前，事实上已走到了崩溃的末路了。向中国再行宣战么？这事在法理上在实际上，都已不可能；因为他在南京已经制造了一个傀儡政府，而又早已对我中央政府宣言说不再视作和战的对手了。用实力来征服全中国么？兵员不多，力量不足，即使想保现状而谋对峙，尚且不能，更何况乎要上溯长江的天险，北袭晋陕的山区呢？

迫不得已，敌阀就只有一个趁火打劫，向我接壤的诸与国去施行威胁的下策。但在中国的泥足未拔，英美各国亦已看穿了他的阴谋，轻易是决不会上这无赖者的当的。越南、缅甸、香港、津沪，风云虽似极险，但我敢断言，敌人决不敢再冒一大不韪，而有动武之举。

总之，我们的抗战已整整三周年了；从此再过一年半载，我们就可以安稳地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地了，希望我们全国上下内外的同胞，当此时机都能在这最后关头，再齐心努一步力！

原载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特刊》

今天是九一八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又是“九一八”九周年的纪念日了。关于这日阀公开侵略我国的最初蛮动的经过，想系我们每饭不忘祖国的侨胞们，所永不能忘怀的至痛事，现在可以不必再说。我们要特别于每年的这一个日子，不得不站起来说几句话的，是世界上的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都应该存一个自力更生的心，联合起来，自己来解放自己。原因是为了那些不关己事的安定国家，对了隔岸的火灾，决不肯出死力来挽救的。

虽然，当时美国史汀生，也曾仗义执言，指斥过日阀的不该，要求过英国的合作，出来共同对付这一搅乱太平洋和平的罪魁。可是安卧在厝火积薪之上的英国，当时那里会想到九年之后的今日，这些炮火炸弹，也竟能飞到伦敦的皇宫！

从九一八之后的意对亚比西尼亚的侵略，与夫德意合作，推翻西班牙民主政府的阴谋，以及这次欧洲诸中立国弱小国的被侵被并，原因虽则久已伏于九一八的敌阀的一举，然重要之点，总仍在于诸被压迫民族的不肯真诚合作，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历史是循环，盛衰也是起伏互易的。我们的抗战伟功，虽则还未完成，但最后胜利的把握，已竟有了十之八九。洗雪九一八之耻，洗雪甲午以来的累代国耻的时日，恐怕已经不远了。要紧的，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努力。

出钱出力，已经做到了我们的饱满点没有？精诚团结，已经有具体的事实表现了没有？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定属于我的信念，有时候有动摇没有？凡此种种，都是要我们来宿夜匪懈地反躬自问一下的。阖闾死后，吴王夫差，曾使人立于门侧，于出入时令喝门一声："夫差，尔忘杀父之仇乎！"夫差必对曰："唯，不敢忘！"我们的必于此日，想特别站起来向大家高喝一声的，也就是这一个意思。我民族代代，对这比毒蛇猛兽更凶恶万倍的敌阀，将永永不忘，非至寝其皮，食其肉，鞭其尸后，此仇方得雪也。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

去年敌国一年来的政潮起伏，对国际对中国的态度变幻，虽则丑态百出，奇形毕露；然而简单的说一句，就是因对华事变的冒险失败，经济濒于破产，政治已经破产；想全国法西斯化，而又化不成功，想结束对华事变而又结束不了的断末魔的苦闷。

一九四〇年即敌国昭和十五年的开头大事，就是在我粤北的一次大败仗，打得那些华南贼寇，抱头鼠窜而逃，伤亡将近二万余人。而敌国内的第三代短命内阁阿部，却因国民生计的困难，低物价政策的失败，米、电力、石炭以及一般资源的枯竭恐慌和少数阁僚的不易补充，政党间磨擦的尖锐化，更加以军部对他的不满而下场。

继阿部而起的无米内阁米内，当然也不是能炊的巧妇，一月十六日上场之后，首先就碰到了美日商约废弃的一个硬钉。通货恶性膨胀，黑市横行，继米粮、电力、石炭，及日用品不足之后，更加上了壮丁死亡日多的劳动力的不足，因此众怨沸腾。人民对军部对敌阀侵华失败的不满和愤慨，就在第七十五次议会开

会之初，变作了斋藤隆夫向军部向当局的严厉责问辞，而引起了摇动全国的大波澜。

这一场风波，总算是将斋藤免去议员职务而勉强收了场。但泛滥在全国各阶层间的不满与不平，却是无法消灭的。因而敌阀情急智生，为消灭国内的反抗与厌战倾向起见，就加速使阿部来南京与汪逆私订和约，想借此以欺骗敌国的百姓，但事机不密，这和约全部，又为高陶所揭露。

国际间的情势呢？因外相有田八郎，想缓和英美，拉拢苏联而失败的结果，法西斯军阀就乘机抬头，当四五月欧战扩大，荷兰危急之秋，逼迫有田，发出所谓关心荷印的谈话，趁火打劫，认为“若欲实行新秩序”，“大东亚经济圈”等，这正是黄金不符的机会。敌寇南进的暴徒侵入以后，又有什么“大东亚”的声明。不但如此，当荷兰被纳粹吞并，军部法西斯，尤认传声筒有田的声明为不足，于是更群起而攻击有田的所谓“东亚门罗主义”的一段声明，是未经四相会议通过的。对于米内内阁所提倡的借助重臣，调整国务之议，攻击得尤为激烈，于是元老重臣的汤浅，就也因而被迫而去了职（汤浅最近传已赍志以殁）。

军部法西斯的凶焰，自此更相继增高，对议会政治，也提出了严重的弹劾，一面暗中又使近卫提倡所谓“新政治体制”的口号，想把敌国六七十年来的宪政，一举而击破，组成全国一党，纯粹法西斯化的军部独裁的政体。

自五月中旬以后，荷比相继被纳粹所蹂躏而屈伏，六月十四日，德军侵入巴黎，六月十八，我宜昌陷落之后，素来就主张联德意，反英美苏联的敌军部及走狗们，气焰更不可一世了。在国内则利用佃俊六陆相攻击有田，攻击内阁，而欲使米内倒台，逼

迫各政党自行解散；在国外，则开始发动侵略越南的军事，以要求禁止运输接济中国之军需品为名，向越南、缅甸而进迫，意欲马上实现其南进的野心。

米内内阁于七月十六日被迫辞职之后，继米内而上台的，当然是除军部的走狗近卫而外，无人敢尝试这一个内外交窘的组阁任务了。于是由“政治新体制”而“大政翼赞会”，列举了许多抽象的要纲，一面想讨好军部，一面又要想结交财阀，渡过这一个经济濒于破产，政治已经破产，军事也已显露了败征的难关。

自九月二十四日，敌军开入越南同登，而进据安南东京地方，一面又派小林去荷印而想攫夺荷印的资源。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轴心国军事政治经济同盟条约公布以后，敌寇在国际间的孤立地位，便更形孤立了。英美当然是已一变了她们对太平洋的含糊态度，对于敌寇取了平行的强硬政策。如重开滇缅路的运输，以大量军需及借款助我等，便是实例。本来是有可以接近的趋势的，近来可也因为敌凶焰的高涨之故，而表示起犹豫来了。并且又因欧洲的战局，英则渐渐加强，大有反击纳粹，使之溃退之势。意国现已到处被击，军事上大大失败。敌阀自然不得不起绝大的烦闷。前次闲院宫的辞职，仅仅显露了一点敌自认加入轴心国同盟为失败之朕兆的倾向，到得近来，自然更为显著。

至其向我的和平进攻，提出种种诱和条件，又恳求德国从中调解；逼汪伪政府于十一月三十日签订和平条约；任野村大将赴美国大使之任，冀求美国对敌寇的态度转变等，就是敌阀自认加入轴心同盟失败以后的种种反应。

总之，目下的敌国内外，一则因经济陷于绝境，不能稍有松一口气的机会，一则因世界各民主国已联合了起来，同时对它加

紧压迫的结果，实在已经到了不能动弹的地步。并且更因近来我国加紧了总反攻的准备，豫计明年春夏之交，在我华中华南以及河北一带的敌寇，将因受我全面反攻，而有总崩溃的可能。我们在这一个抗战将得最后胜利的关头，同胞自然要更加团结，更加出钱出力，共赴国难，才可以造成一九四一年的全线总胜利的局面。我国胜利的曙光，今晨已经普照大地了；今后大家自然应该一步一步的使它发扬光大，坚强炽烈起来。我们欢迎这一个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一年。

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英国实际上已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的外交部长郭泰祺氏，曾经屡次的说过，ABC 三国实际上早已是同盟国了，不过在形式上还没有签过字而已。这一句话，实在有事实证明，我想可以不用再来一一列举。既是同盟的兄弟之邦，则休戚与共，患难相扶，自是天经地义。象这一类的话，我想，不说也罢。所以，我们的对于援英，实在用不着再来宣传，再来说些必须援英的理由的。

不过，同我们捐助祖国的难民的义举一样，这一种运动，希望要从多方面去做，更要向最有意义，最有效力的各方面去努力才行。譬如中英美苏的一条阵线，如何能使它加强，打击侵略国家，应从那些方面同时下手去做等，还得兼筹并顾到才是道理。

直接的出钱，原是一法，但是没有钱的人呢，也可以去出力。譬如同我们回祖国去效力的机师，和投军的志愿兵一样，我们在马来亚，也一样的可以去帮助军运，或投身入保卫马来亚的志愿军团的。

我们既系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反侵略民主集团，则这一集团

中的任何一环，和我们的关系，差不多都是一样。国家民族，当然是第一要顾到，但是集团的利害，也就是我们的利害，其间相去，或有五十步与百步的不同，而最后的结果，却终于是一样。

我国的抗战，事实上早已和英美的反法西斯战争溶合在一道，我们原是希望祖国的抗战胜利，可是同时英美的胜利，也必然地会影响到我们的胜利。

因此，我只想作一句简单的结论，就是援英运动，同我们援助祖国的运动是不可分的。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三十年的双十节

双十佳节，轮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十回。敌国明治维新，到甲午为止，其间不过数十年；苏联自十月革命起，到这次和纳粹拚命为止的经过时期，也不过二十余年。人家都曾在短期间中作长足的进步。而我们却进步得很慢的原因，一句话说尽，就是因为受了外来恶势力的压迫。这些外来的恶势力，硬要绊住我们的脚，而不愿意我们向前进。当然，一半的原因，也在我们自己民族的觉悟不早，以私害公，借了外国的借款枪炮，来肥己，来自相残杀。不过这一种恶现象，到了芦沟桥炮声响后，便一扫而空了。所以今年的双十节，我们来庆祝它，有两重的意义：即一，明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年的双十节；二，是抗战事起后第五次的双十节。

从第一点意义来讲，三十而立，我们自今年双十节起，应该可以走上独立自由的坦途。

从第二点意义来讲，今年是我们开始胜利的年头，证据事实很多，简略的一举，就有下列的几件：

（一）湘北的大捷，这便证明了我们的愈战愈强，十足可以自力更生。

（二）在远东国际局势的对我有利。如星洲军港会议，马尼拉英美军政要员的会议，香港英美中三国的财政经济会议，都是与我们的抗战建国有关，而足以制敌寇的死命的。

（三）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到渝，以及美国飞机厂的加紧工作，赶制助我的飞机，这些就是为敌寇挖掘坟墓的锄铲。

（四）这次重庆参政会议，就将开会，各党各派团结的问题，必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

（五）苏联与荷印，各已站在我们的一面，将强硬对付敌寇。

（六）纳粹的将近崩溃，就是我们间接的胜利，因为敌寇是纳粹的帮凶，而我们却是民主阵线中最初对侵略者抗战的急先锋。

有此六件事实，也尽可以证明我们今年应该大大地来庆祝一下双十节了。可是闻胜勿骄，是委员长的明训，而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又是诸葛武侯对我们的教条。所以，我们到了这最可以欢欣庆祝的日子，一方面仍旧要不忘记国父之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约到了明年的此日，我们的抗建工作，必将有更伟大的成就，请大家还是到了黄龙，再来痛饮，我们目下的标语，仍旧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装帧设计　林　墉　刘世仁　尹　文
特约编辑　王自立　陈子善
责任编辑　邝雪林　潘耀明　林振名

郁达夫文集
（国内版）
第八卷·政论 杂文
*
花　城　出　版　社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国内总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海外总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印张 3插页 300,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285　定价 1.75元



书号 10261·285
定价　1.75 元